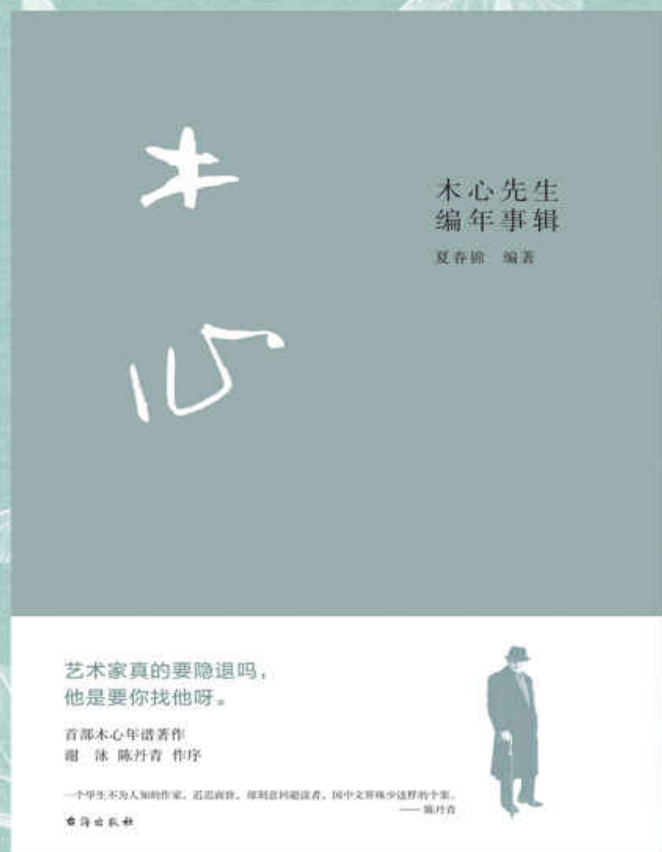


木心、路遥年谱套装

(全2册)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



路遥年谱
我渴望投入沉重

总目录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

[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

木

心

木心先生 编年事辑

夏春锦 编著

艺术家真的要隐退吗，
他是要你找他呀。

首部木心年谱著作
谢 泳 陈丹青 作序

一个毕生不为人知的作家，迟迟面世，却刻意回避读者，国中文界殊少这样的个案。

—— 陈丹青

台海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木心先生编年事辑

作者：夏春锦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5-01

ISBN：97875168294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一](#)

[序二](#)

[几点说明](#)

[插图](#)

[卷首](#)

[家世](#)

[编年](#)

[附录](#)

[代跋 追寻那个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自跋](#)

序一

春锦兄执意要我给他的新著《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写几句话，我乐意为之。我读木心的书不多，只对他的生平稍有常识，为这样的人物做年谱，我以为非常值得，也非常重要。春锦写过《文学的鲁滨逊》，是木心前半生的经历，而这本却是木心完整的一生。

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和方志一样，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非常难得。现在方志传统一直得到继承，政府各类机构虽变来变去，但我印象中，“方志办”始终保留，这非常不易。但年谱传统，在西式专著体例冲击下，学术地位下降了，这实在可惜。年谱最见学术训练功力，毫无疑问，它本来就是正宗的学术著作，但在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重视。大学里念学位的人，也极少能以年谱申请学位，以为年谱算不得什么学术著作，我以为这种习惯，大错特错。一般来说，坏年谱也还保存有用史料，而坏专著连史料价值都没有。相同领域，相同人物，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

往年我在山西太原曾读过一部《王恭襄公先生年谱》，作者张友椿，早年专门研究太原地方史的一位专家。这部年谱的谱主王琼是明朝太原的一位名臣，成化年间的进士。为年谱作序的常赞春先生是山西榆次人，京师大学堂出身，是林纾的学生。常先生就极赞同当时还年轻的张友椿为乡贤做年谱，以为这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开创性的年谱，完全可以在学术界安身立命。

学术工作，眼光非常重要，年谱这样的著述体例，听起来似乎容易，但选择给什么样的人做年谱，年谱是不是第一部，却非常能见出作者的学术眼光。春锦选择木心先生，这个选择包含了他的学术判断，如果要讲学术水平，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他能做这样的决断，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这是第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年谱，虽然春锦谦虚，只用了“编年事辑”的书名，其实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谱。第一部年谱最“值钱”，因为有开创之功。

年谱的体例，古今一理，但年谱的做法，却有古今之别。手工时代的年谱难，网络时代的年谱易，这是一般道理，不做细部区别。手工时代所有材料均要靠读书而来，长期积累是做年谱的家法；网络时代年谱做法的规则是检索，在学术修养外，网络技术成为必要的学术准备。给谁做年谱，是否第一部，成为网络时代判断年谱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春锦这部年谱满足这样的时代条件，是一部成功的当代名人年谱。以后再出新谱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后的木

心研究也绕不开这部年谱，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
这部年谱也就不会过时。

谢 泳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于厦门

序二

现代中国作家的简历，以我所知，恐怕是木心的自撰为最简扼，仅三十六字：名字、生年、籍贯、学历、客居地。他去世后的再版本，添上他归来到逝世的年份，也才够五十字吧。

现代中国作家出书最迟者，就我所知，恐怕也是木心：五十六岁抵纽约之前，他从未在大陆发表过一个字。首册简体版文集在大陆面世，他已七十九岁。

木心是谁？但凡初闻其名，初读其书的人，都会有此一问。当今市面，这几十字会是何种效应，木心当然知道，怎么办呢，他一再引福楼拜的话，叫做：

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中国作家而特意称引这句话，木心之前，似乎没有。这是他的立场，他的游戏，他的公然的骄傲，也是他的经历所含藏的苦衷。而在晚年访谈中再次说起同样的意思，他忽而笑道：

艺术家真的要隐退吗，他是要你找他呀。

这是真的。木心的每句话周边必会站着别的意思——“他要你去找他呀”——梁文道说起过有趣的观察，他说：“五四及今，读者读罢书还想趋前面见的作家，除了鲁迅和张爱玲，第三位，便是木心。”

鲁迅与好些晚辈作家的行谊，不消说了。张爱玲却不肯见人，至少，很难见，木心与她同调。二〇〇九年我亲见晚晴小筑门外站着一位愣小伙子，从广西来，苦候终日，天黑了，老人就是不见。其时秋凉，这孩子穿着T恤，木心唯嘱咐给他买件单衣。纽约期间，我也亲见不少访客被木心婉拒。二〇〇三年，耶鲁美术馆为他办了体面的个展，他居然不去开幕式，记者找他，他也推阻。

一个毕生不为人知的作家，迟迟面世，却刻意回避读者，国中文界殊少这样的个案。西方倒是不罕见，最近的例，是备受瞩目的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弗兰特，她不进入宣发出书的任何环节，从不露面，以至她的整本访谈录不断被问及为何如此。

木心非但不露面，回归后几乎不接受当面的采访。直到他的葬礼，各地赶来的上百位青年才见到他，而生前介绍自己，这个人只肯给几十个字。

其实他越是这样子，读者越想见他。

他不写回忆录。他说，回忆录很难诚实。但有谁到了中年晚岁而不回想自己的往昔吗？遗稿中，我发现他在世界文学史讲稿最后一页，写着平实而简单的记述——那年他大约六十六岁——某年在哪里，某年到

哪里.....这是他唯一的“年表”，自己看看，没有发表的意思。近时木心遗稿拟将出版。在数十册小小的本子里，不下十次，他零碎写到某段往事，同样简洁，譬如抗战期间避难嘉兴的一段：

小学四年级

租住燕贻堂

出入天后宫弄

秋季运动会

一百米短跑冠军

看上女生

她叫盖静娴

她是不知道的

结伴拔草的男生姓周

头发黑得发乌 香

级任老师特别好

钱之江，现在还记得

忆写往事，木心鲜少渲染，直陈年份、地名、街名、人名。

遗稿的好几处页面写满名字，譬如：

方圆、老熊、六十、兆丁、陈妈、春香、莲香、顺英、秋英、海伯伯、管账先生、教师、阿祥、祖母、母亲、姊姊、我、姊夫、剑芬溶溶 十九人

这是他历数幼年的故家——也就是乌镇东栅财神湾一八六号——总共多少人，其中大半是仆佣：

这样一个家，我只经历了五年，之后，在杭州、上海过了四十多年，美国二十五年。

显然，他在自言自语，毫无示人的企图。他曾说，老了，记性差，忘了某事某人、某书某词，硬想，保持想，直到想起，能锻炼记忆力。那些年我俩交谈，话到嘴边，想不起，下一回见，他会喜滋滋说：呶，想起来了呀！于是一字字说出，有时到家就来电话，报告他豁然寻回的记忆，哪怕几个字。

遗稿中另有两组更“庞大”的名单，一份应是上海艺专的同学姓名，另一份，是他寄身近三十年的工艺美术工厂员工。锻炼记性吗？我想，晚年木心是在不断反刍行将过完的一生，而当转头面对外界，就那么几十个字。

读者不会放过他。学者更不会放过——定居桐乡的夏春锦，可能是试图追索木心生平行状和家族谱系的第一人。为读者，也为文学研究，他苦寻资料，试图拼接木心简历之外的一生。我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呢？以下的意思，自知不能说服人。

我不认为读了文学家的生平，果然能认知“那个人”，甚或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学。生平、文学，不是核对的关系。一份处处求真的传记，可能布满——也许是——善意的错讹，即便再详实，也不可能破解卓越的小说、神奇的诗，何以卓越，何以神奇。

西人云：作品有时比作者更聪明。艺术家最为隐秘而珍贵的一切，全然凝在作品里、字面上。倘若好到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种种，分明裸露着，却未必见于他的生平。

真的。倘若我是木心的侄甥，仍无法获知为什么他能写出“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交往二十九年，有时，我巨细无遗介入他的日常，他开口，我便知道会说什么，但我还是不明白何以他在赠我的诗中写出“仁智异见鬼见鬼，长短相吃蛇吃蛇”。

木心逐字解释了——还特意说，“蛇”的读音应作“啥”——但于我而言，仍是谜。我喜欢谜，为什么要破解它？

为人立传，很难很难，甚或难于文学。作传者的功力，品性，大诚恳，简直等同创作。恕我直说，我不记得看过可读的中文传记，并非作传者不良，而是，恕我妄说，自引入西洋人“传记”体写作迄今，现代白话文水准尚未准备好书写体贴入微而知守分寸的传记。

我并非是为木心专来说这番话。我也不曾与他深谈过：为什么不写回忆录，为什么不要相信传记。我是以自己的经验，或曰“痛感”：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是苦心交付给作品的另一个自己，为什么读者总想离开书页，掉头找“那个人”？

我不认为谁能写谁的传记。人，人的一生，何其复杂，而况木心。早年我曾热心读过一二册《鲁迅

传》，丝毫不令我豁然明白鲁迅，那是另一人的想象，另一人的手笔，读过即忘，而每次读鲁迅的随便哪篇短文，我好似和他面对而坐。

这一层，木心说得痛快，近乎板着脸：“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但我知道，木心身后必有人要来写他，琢磨他。这是令我无奈而近乎痛苦的事：我目击他如何守身如玉般，维护私己。他渴望尊敬、荣耀、文名，但绝不是希求一份传记。除了他留下的作品，我不指望世人了解他，认真说，我也并不自以为了解他——那才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

以上的话，我愿如实说给春锦听，也说给读者听。我爱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为身后有传记的人。我不得不坦言，春锦发来的书稿，我不曾读，在我的恒定的记忆中，那个长年与我倾谈言笑的人，才是木心。

没见过木心的读者，怎么办呢？好在眼下这本书是“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不是传记。尤使我宽心者，是谢泳先生为此书写的序言，他以中国“年谱”这样一种传统体例，肯定了春锦的工作，他说：

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和方志一样，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这是第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年谱，虽然春锦谦虚，只用了“编年事辑”的书名，其实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谱……以后再出新谱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绕不开这部年谱，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这部年谱也就不会过时。

这是平实剀切的话。我不是学者，我该从自己与木心的漫长交谊中，退开几步，放下己见，顾及众多爱木心的人，而春锦所做的一切，正是念在日渐增多的木心读者——三十多年前，木心毫无声名，我俩在曼哈顿人流中且走且聊，或在各自的厨房煎炒烹煮，相对抽烟，万想不到桐乡有个孩子，名叫夏春锦。

今木心逝世十年了，春锦做这件事怕也快要十年了吧。身为同乡晚辈，春锦的工作，允为美谈。

陈丹青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写在北京

几点说明

一、本书书名《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其意是将木心先生的生平行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时间分年、季、月、日四个层级，如有季不确定者则以“是年”出之，如有月不确定者则以“本季”出之，如有日不确定者则以“本月”出之。一年之中则依照具体时间确定者在前、不确定者在后的原则排列。如有年份不确定者，则归入大致的时间段，时间不确定者则暂时不收。

二、本书分“卷首”“家世”“编年”“附录”四部分。“卷首”为木心先生的姓名、字号；“家世”汇集其家世背景及家庭成员情况；“编年”则为其一生之经历，涉及求学、任职、交游、创作、际遇诸端；“附录”收录木心自制的两份汉语年表和一份日语简历。“自制年表一”现在在木心故居纪念馆展出；“自制年表二”现在在木心美术馆展出。其中如有考证、补充之必要则以按语出之。

三、本书尽力做到两点：一是尽编者所能，最大限度地搜集目前所能见到的木心先生的生平资料，可

确定时间者不论巨细，悉加选录；二是对资料进行必要的考辨，尽可能地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四、本书征引的资料主要来自木心先生业已出版的 personal 著述、研究木心先生及其作品的著述、与之相关人物的著述、地方文献、公私馆藏资料、木心与师友间的来往书简、媒体访谈等。凡有出处，均一一注释，为方便检索，一律采用随文注形式。

五、本书编者叙述部分提及编年对象的一律用笔名“木心”，引文中如出现曾用名和其他笔名则遵从原文献。

六、本书能直接征引当事人现成叙述的不再做转述，以保存资料的原始性。引文中如有错漏，则加按语说明。

七、除编年对象本事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以按语形式略加介绍，以为本事之助。

八、对于部分存在两种以上说法，且笔者无法判断者，则将二者并置，以备进一步考辨。

九、本书编年纪事以西历公元纪年为主，一九四九年（含）之前则辅以民国纪年，以明时代之变迁。

十、本编年的时间下限为二〇一六年，有关木心去世后的相关资料亦酌情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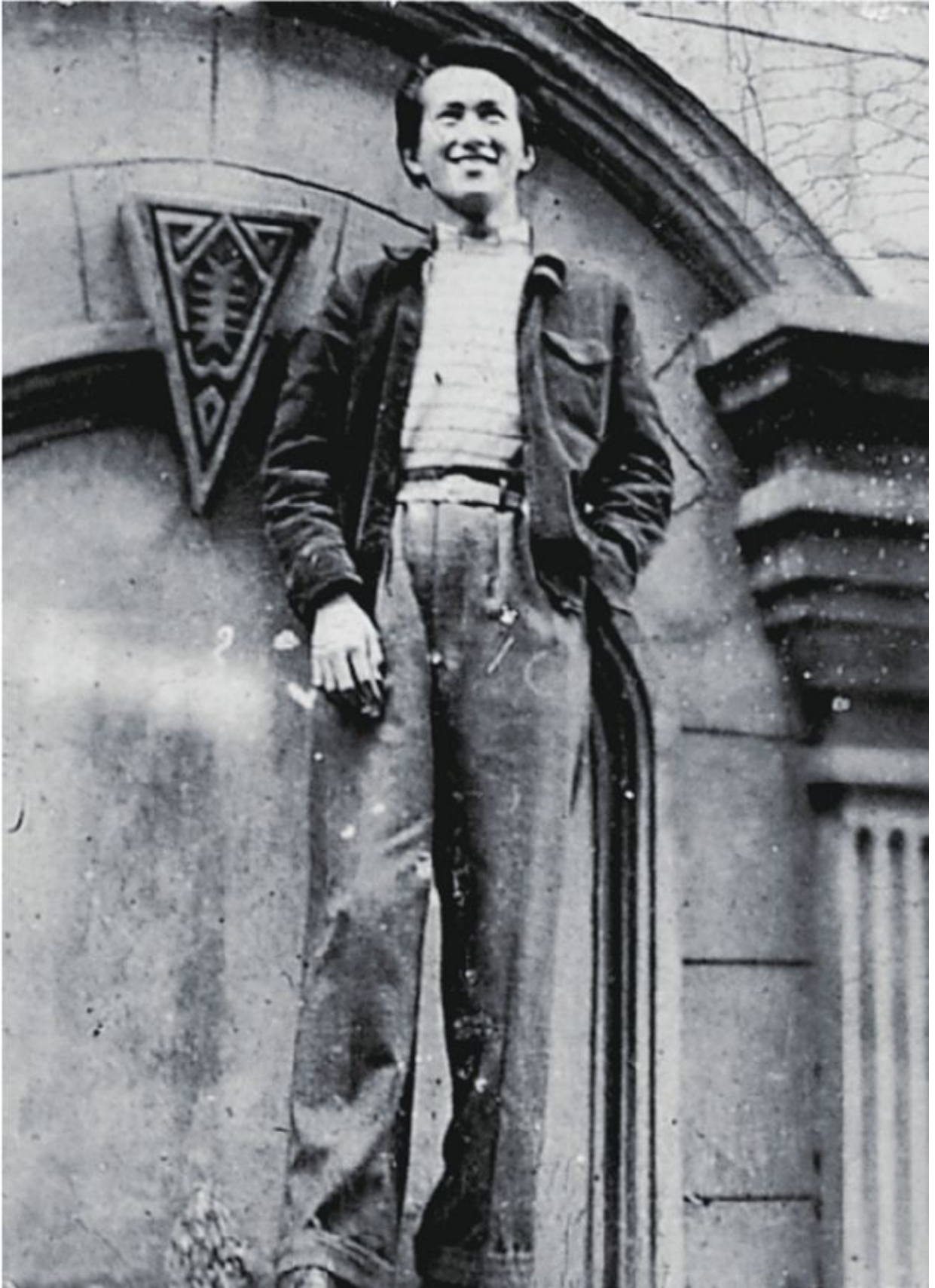
彩图



回乌镇定居后的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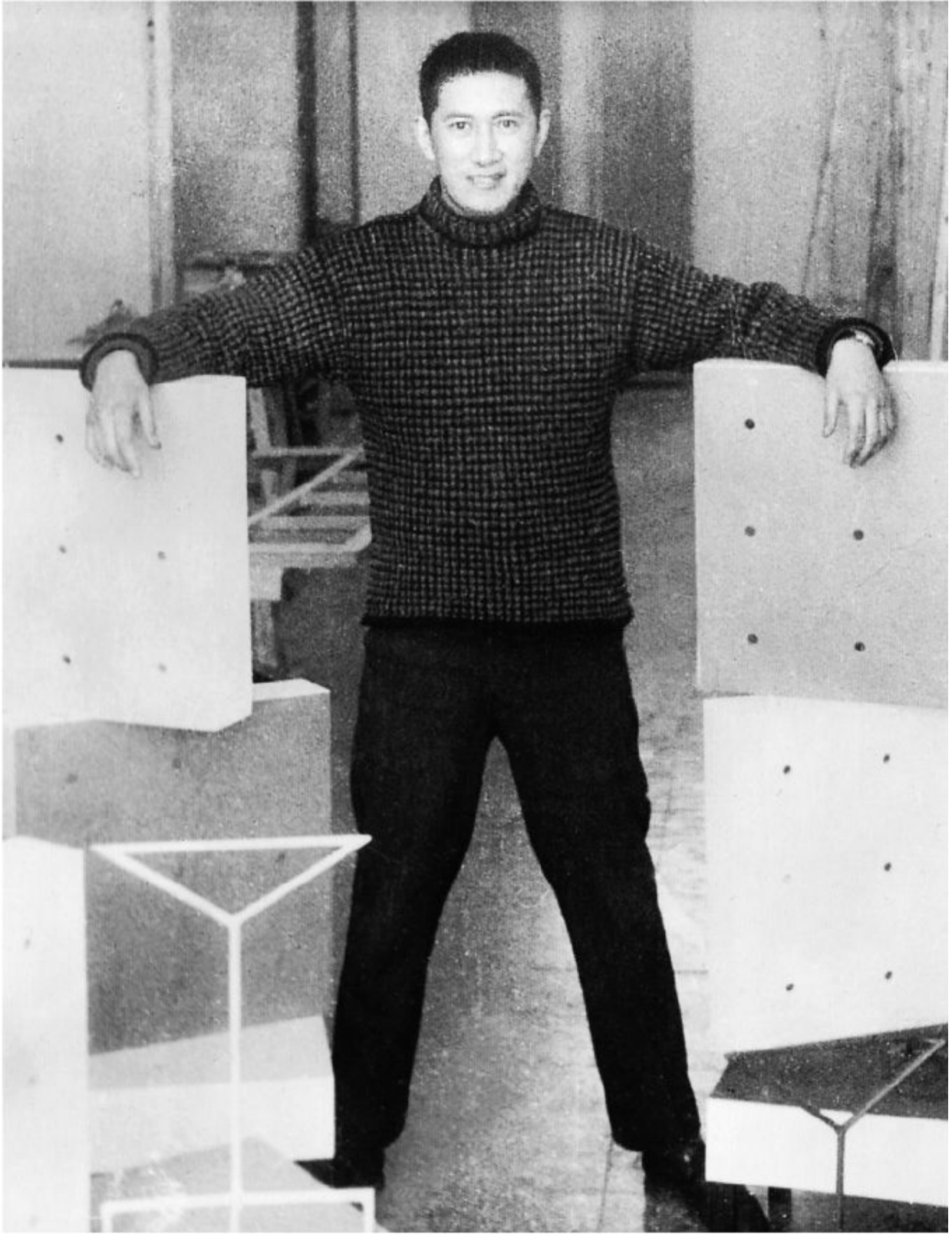
木心的全家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读于上海美专时的木心



一九四六年的木心（后排右二），右三为杨可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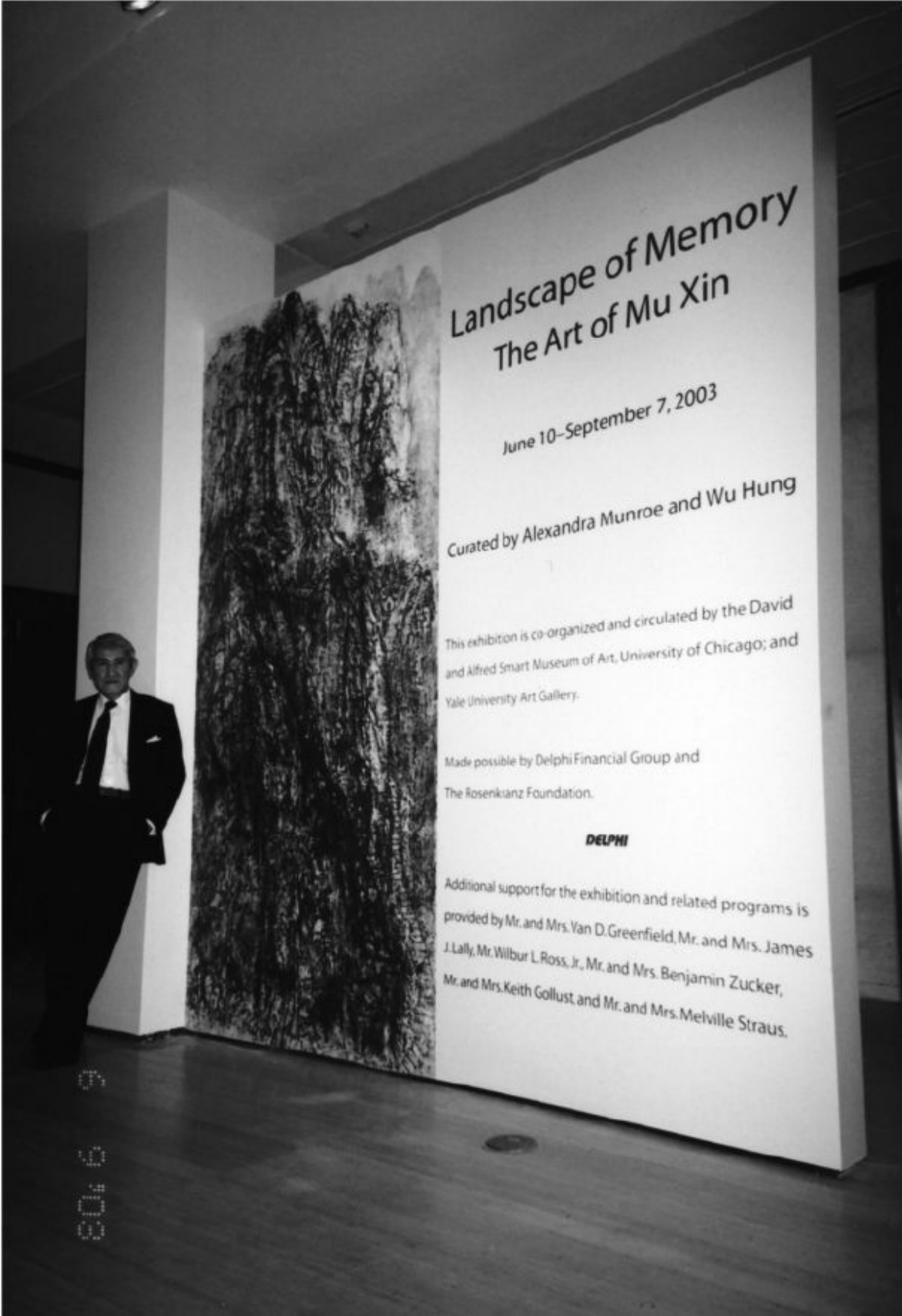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木心



约一九七二年的木心



一九九一年木心摄于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



Landscape of Memory The Art of Mu Xin

June 10–September 7, 2003

Curated by Alexandra Munroe and Wu Hung

This exhibition is co-organized and circulated by the 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Made possible by Delphi Financial Group and The Rosenkranz Foundation.

DELPHI

Additional support for the exhibition and related programs is provided by Mr. and Mrs. Van D. Greenfield, Mr. and Mrs. James J. Lally, Mr. Wilbur L. Ross, Jr., Mr. and Mrs. Benjamin Zucker, Mr. and Mrs. Keith Gollust, and Mr. and Mrs. Melville Straus.

二〇〇三年，在“记忆的风景：木心的艺术”画展上的木心

卷首

木心（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名孙璞，又名孙仰中，字玉山，亲友昵称阿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改名为孙牧心，从此成为其通用名和正式名。

木心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八四年所使用过的笔名有罗干、吉光、高沙、裴定、马汗、桑夫、林思、司马不迁、赵元莘、杨蕊、阿辛、木心等。其中木心为最常用的笔名，始用于一九八二年年初。

少年时父母为防木心夭折，曾送其出家，取法号常棣。

按：罗干是木心少年时代的笔名。抗战胜利后，木心与沈钤（笔名罗凡）、邵传发（笔名邵凡）、徐宜诚（笔名青戈）在家乡创办油印刊物《泡沫》，木心负责编写诗歌、散文，即以罗干为笔名。《泡沫》出至第五期时被迫停刊，之后木心将编辑工作带至杭州。当时他正与叶文西在杭州创办业余艺术团体——杭州绘画研究社，实为杭州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新的《泡沫》上曾发表叶文西写的小说《夏衣》，主角亦名罗干，其原型即为木心。

孙，东吴人氏，名璞，字玉山。后用“牧心”，“牧”字太雅也太俗，况且意马心猿，牧不了。做过教师，学生都很好，就是不能使之再好上去：牧己牧人两无成，如能“木”了，倒也罢了。其实是取其笔画少，写起来方便。名字是个符号，最好不含什么意义，否则很累赘，往往成了讽刺。自作多情和自作无情都是可笑的。以后我还想改名。（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8页）

吉光、高沙、裴定、马汗、桑夫、林思、司马不迁、赵元莘、杨蕊。（见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版的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该期特设围绕木心的“作家专卷”，其中在《木心著作一览》中列有木心本人提供的一九四一至一九八四年间所使用的这九个笔名。）

古说“木铎有心”，我的名字就是这里来。（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39页）

按：古书中并无“木铎有心”的成语，笔者多方查阅亦未能找到直接的出处。但他提醒我们木心之名显然与“木铎”这一传统器物有关，隐含着特殊的内涵。[可参考拙作《木心笔名刍议》，《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家世

木心祖籍浙江绍兴，自祖父孙秀林于清末举家迁往桐乡县青镇（今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1]，遂成桐乡人。经过两代人的经营，孙家在乌镇内外有田地达两千亩，家道殷实。木心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最着迷的是艺术和宗教，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购物的经验。家里颇有读书氛围，家人普遍具有文化修养，有藏书楼，富有古籍。

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在都市在乡村在我家男仆的白壁题诗中缓缓地流，外婆精通《周易》，祖母为我讲《大乘五蕴论》，这里，那里，总会遇到真心爱读书的人。（木心：《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4页）

夏天乘凉，母亲讲解《易经》，背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91页）

在那种时代那种家族里，不说魏晋遗风，而唐宋余绪似乎还没有消尽，母亲、姐姐、姐夫、姑系舅系的老少二代人，谁都能即兴口占一绝一律，行酒令、作对联句，更是驾轻就熟……（木心：《海伯伯》，《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

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
页)

祖父孙秀林

(? ~一九二七)，绍兴人。为人身强体壮，精通农艺，为自耕农。曾只身赴湖州帮助妻舅开荒创业，妻舅不幸去世，在安顿好舅嫂与内侄后返回绍兴，再谋发展。途中路过乌镇，在同乡郑七斤家逗留多日，发现乌镇创业条件优于湖州，遂举家迁居乌镇。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孙家田产不断增加，没几年还添置了抽水机和碾米机，成了耕田大户。孙秀林育有两女一男，儿子名孙德润，年最幼。两女成人后先后出嫁，长女嫁乌镇北栅的一户种田人家，幼女嫁乌镇南栅沈家庄邵家，为嘉兴著名眼科专家邵传统之母。两位女婿亦是绍兴移民。孙秀林于一九二七年木心出生当年病逝。

按：有关孙秀林的资料目前主要见于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三人合写的《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一文。现将其中的关键内容节选如下：

孙秀林身强力壮、勤俭有为、头脑灵活、农艺精通，在绍兴已小有资财，时属自耕农。来乌镇前曾只身赴湖州帮助妻舅开荒创业，事业有成时，不幸妻舅逝世，孙秀林囿于世俗偏见，安顿好舅嫂和内侄的生产和生活之后重返绍兴。途中在乌镇东郊同乡人郑七斤家逗留多日，了解乌镇的气候水土、风俗人情，得知乌镇的创业条件优于湖州之后，下定决心，回绍兴卖掉了田地、房屋和家杂，来乌镇一搏。

孙秀林告别乡亲，挑起一副箩筐，装着必不可少的衣物被蓆和生活用具，上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面跟着背驮大小包袱的妻子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一家五口晓行夜宿，渡过钱塘江，全凭两条腿从绍兴走到了乌镇。

他们虽然带着一定数量的银圆，这是全家的生命所系，是日后发家和安身立命的血本。一路上舍不得花钱雇车搭船，连一日三餐也是沿途随时埋锅造饭，吃饱了就走，天黑了就在人家檐口或荒庙凉亭中歇宿。

总算一路平安到了乌镇东郊坝头郑七斤家。在郑七斤帮助下搭建“绍兴蓬子”——草棚，添置农具，购买良田和荒地开始农作。凭着孙秀林夫妇的勤奋和精明睿智，加上连年风调雨顺，田地不断扩大，农工不断增加，不几年有了耕牛，更添置了抽水机和碾米机，成了耕田大户。而孙秀林夫妇仍旧和农工们一起参加田间劳作，他们虔心佛教，随着财富的积累，逐渐加大了修桥铺路、造庙修庵和行善积德的投入，因而受到绍帮人和本帮人，以及农工们的尊敬。

斗转星移，孙秀林也看到了自身的“老之将至”和儿女即将成人。

儿女们需要有更好的读书环境，自己也得有个颐养天年之所。因此开始向镇上发展。

他们先在东栅河南板桥头（太平桥）买下一幢三间二进、围有围墙的楼房，安顿好妻小。好在坝头离太平桥不远，自家又有农船，乡间留有田庄屋，不影响生产管理。住了几年之后，又感到单门独户不够安全，想另觅居所，虽然有人断言，此屋形状像一颗“官印”日后会出贵人。

（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187—188页）

孙秀林夫妇笃信佛、道，晚年更为虔诚，家中设有佛堂，供的是观音大士，早晚上香，逢节更盛。镇上诸寺庙举办佛事，孙氏夫妇必沐斋前往，不敢少怠。每年春秋必往杭州、苏州、上海等大庙进香，往返多日，不知疲惫，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常说孙家能有今天都是菩萨所赐，不可暴殄天物，天理昭昭，善恶必报。镇上凡有善举，孙家莫不全力相助，唯恐人后。而平日持家俭朴，为善却不惜钱财。

孙家富庶之后，农民本色不变，夫妇两人仍和农工一起参加农业劳动，和农工亲密无间。对家中吃口重、困难多的农工，体恤有加。每当农忙季节或时令节日还有酒肉相待。为此，农工们个个忠心耿耿，不敢有半点怠忽。当然，受惠的还是孙秀林。

对佃农也不刻薄，孙家租田，是“世袭制”，即轻易不换佃户，佃户的耕作权可以父子传承，也可转让他人，孙家只问收租、交纳田粮。很少有佃农故意欠租欠息的情况发生，更不需强行催索。曾有一佃户因故欠租多年，自知理亏，有一日手持香烛，向孙秀林谢罪。孙秀林连忙扶起，细问端详，孙秀林道：“人有旦夕祸福，大家是做田庄人，靠天吃饭，租米不妨待你宽裕时再付。”还挽留这位佃户吃了饭再走。为此，孙家在镇上，在乡下，在农工、佃户中口碑甚好。（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190—191页）

父亲孙德润

（一说孙德顺，？～一九三三），自幼体弱多病，常年医药补品不离身，勉强读完高小后即在家调养。父亲孙秀林很早就任在绍帮人中为其物色贤淑能干的媳妇，经人介绍与沈珍完婚于太平桥旧居。婚后两人生下孙彩霞、孙飞霞和孙璞。能作诗。为人乐善好施，为此曾被评为开明绅士。

儿子孙德润最小，自幼体弱多病，几乎常年医药补品不离身，勉强读完高小，即在家调养。孙秀林预知儿子的难处，所以很早就任在绍帮人中物色贤淑能干的儿媳妇，终于找到一位能干且通文墨名沈珍的绍兴姑娘，在太平桥旧居择吉日完婚。（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 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191页）

母亲沈珍

（一八九五～一九五六），亦是绍兴移民。父母家开有地毯厂。为人知书达理，贤淑能干。在婆婆去世后沈珍协助丈夫孙德润料理家务，并商请郑七斤之子郑阿海管理田庄。孙德润去世后沈珍更是一人独挑孙家大梁，不负厚望，将孙家里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沈珍笃信佛道，能积德行善，平日督促二女一子课读甚勤。抗战时期，沈珍携全家到嘉兴邵传统家暂避，后又趋避于杭州，乌镇家业由家仆郑阿海看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珍随孙彩霞一家迁居上海高桥，与木心一起租住在沈家大院。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高桥。

一九二七年仰中诞生，同年孙秀林因病逝世于太平桥居所。不久，秀林妻亦亡故，沈珍襄助孙德润料理里外家务，并商请郑七斤之子阿海主持田庄管理。阿海朴实勤勉，成了孙家的“管家”。

迁入财神湾孙家厅不久，孙德润旧病不治逝世，时在一九三一年，仰中甫五岁。从此沈珍一人独挑孙家大梁，果然不负孙秀林生前厚望，将孙家里里外外处理得井井有条。沈珍一如公姑笃信佛道、积德行善。平日督促二女一子课读，彩霞、飞霞毕业于中市立志小学，又送嘉兴省立二中就读，飞霞在读中学时染病，回家诊治无效而弃世。（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

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191页)

抗战胜利后，沈珍曾率全家回乌镇重整家业，时儿子孙仰中崇尚进步，看穿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常劝导母亲沈珍：“天快亮了，尽快将田地散发，转让给原主或佃户。”沈珍听从儿子的劝导。（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2页)

大姐姐孙彩霞

（一九一六～一九六七），曾就读于乌镇立志小学，毕业后到嘉兴省立二中求学。后经黄妙祥介绍嫁给在泰兴昌纸店做学徒的王济诚。

王济诚

（一九〇九～一九八九）亦是绍兴人，为人朴实勤俭，婚后出任孙家的账房。一九五〇年王济诚得到岳母的支持，带着她给的一千块钱到杭州与人合开了一家纸店，后来又搬到湖州与人合开了一家新华纸店，本钱也是沈珍所出。两家纸店均为合股经营，王济诚均任副经理的职位。一九五二年，纸店倒闭，王济诚失业。加之沈珍体弱多病，需人照顾，王济诚、孙彩霞夫妇遂带着儿女迁居上海高桥。经木心介绍，王济诚于育民中学谋得教导处职员一职，后又调到凌桥中学工作。有子女五人：王剑芬、王宁、王竞、王奕、王伟。（按：另有一女因家里女孩过多，刚出生便送给了奶妈抚养）孙彩霞一九六七年冬心脏病复发去世。王济诚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小姐姐孙飞霞（一九二五～一九三九），曾就读于乌镇立志小学，毕业后亦到嘉兴省立二中求学，期间因染病回家诊治，医治无效后去世。

【注释】

[1] 如今的乌镇由原来隶属于吴兴县的乌镇和隶属于桐乡县的青镇于1951年合并而来，这之前两镇行政上虽有区分，但因紧挨并联，

无法截然区分，本书除此处特别标注为青镇外，下文将按照现在的习惯统称乌镇。

编年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一岁

◎三月十七日（农历二月十四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东栅太平桥（一说栏杆桥）畔的孙家老宅。

◎据自制年表一、二（见附录）显示，从出生至一九三五年一直在乌镇。

◎是年，祖父孙秀林病逝于老宅。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五岁

◎是年，举家迁往财神湾新居（今财神湾一八六号木心故居纪念馆所在地），人称孙家厅和孙家花园。

按：房产为孙秀林在世时花了上千银圆从孔家购得，原为孔家的部分房屋和花园。

事也凑巧，有财神湾西首的孔某，在外埠另展宏图，意欲卖去老屋。孔某宅园的东首是徐家厅，住有一位饱学的徐老夫子，再过东就是财神湾了。那位徐老夫子后来成为孙秀林儿子的启蒙老师。

孙秀林瞅准当口，花了上千银圆买了下来，略事修葺和增建。从此，半爿孔家厅和孔家花园，变成了孙家厅和孙家花园。

（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188页）

按：孔家即孔另境家。孔另境（一九〇四～一九七二），原名令俊，字若君，笔名东方曦、隽、君玉等，茅盾夫人孔德沚胞弟，散文家、剧作家、编辑出版家。著有《斧声集》《庸园集》等，选编有《现代作家书简》《小说史料》《剧本丛刊》等。将房屋与花园售给孙家的应该是孔另境之父孔祥生。据孔另境自述，其父“为一纨绔子弟，不习文墨。祖父逝世后，即将家产挥霍殆尽，并将住屋也售去”。（孔另境：《孔另境自传》，《孔另境先生纪念文集》，乌镇孔另境纪念馆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347页）

孙家厅在乌镇东栅财神湾西首，临街下岸三间楼房，靠河处有专用“桥洞”（河埠）；临街上岸也是三间楼房（俗称一直落），中间正对头墙门，留有一条出入的过道。六间楼房的楼下起阁较高，以利开店营业，楼上起阁较低，为了营业，居处只好将就一点了，这是乌镇沿街店面房舍的特色。孙家曾租给他人开店，收租生息。上岸曾开过茶叶店、糖果茶食店和染店，乌镇有名的朱家馆——朱德泰就开设在下岸，专营包酒菜和门市供应，颇具特色。

头墙门用铁皮包裹，钉有“漫天星”，有一对黄铜狮首衔环。门坊颇有气派，额有“五世其昌”四个砖雕大字，这大概是孙秀林的一生期望，也可能是孔家留下的旧貌。

墙门内是宽阔的石板天井，走上街沿进入三开间平厅，正中挂有“积善堂”匾额，白底黑字古朴苍劲。这堂名不知是孙秀林的主意，还是绍兴老家的沿袭。“积善人家庆有余”是祖训，是孙秀林的自励和对子孙的启迪。有人云“富不过三代”，恐怕孙秀林也有此后顾之忧。

平厅的屏门和两壁挂有中堂、书画，一式台条几椅，俨然是乌镇厅堂的规范格式。陌生人进门观望，还当作是“书香人家”。平厅的翻轩下三间一统是落地堂窗，裙板上刻有“精忠岳传”浮雕，上半扇是花格玻璃窗。后檐中间也是落地堂窗，眉板、裙板和脚板上刻有花卉、羽毛等吉祥物，两边是矮墙，上有统间花格玻璃窗。

玻璃始兴于法国，中国人能制造玻璃为时较晚，为此起始时价格不菲。据说孔家厅原来是花格蛎壳窗，是孙秀林刻意改装的，这也反映了当年孙秀林的经济实力和他见过世面的眼界之广阔。

二墙门靠近平厅的后檐。进得二墙门也是石板天井，两边有东西厢楼，连接北边的三间楼厅。东厢楼下是账房间，西厢楼下是会客间，楼厅下用可以装卸的板障分隔成三间，中间是客堂

间，两旁是膳堂间和起居间，楼梯在退堂的东边，所有前后檐的托几、雀替，以及楼梯栏杆也有精美的雕刻，而前后堂窗的裙板上刻有二十四孝等浮雕，和前埭平厅的浮雕呼应为“忠孝传家”，这是孔家的遗物。厅上厅下，都是花格玻璃窗，所以十分亮堂。如有红白喜庆，楼下卸去板障就是一所三开间的堂楼，更显气派。墙门大开之时，人站在街上北望，可见层层叠叠，直透三埭楼厅的屏门上的锦幔字画，有点“侯门深如海”的华丽气概。楼上连厢楼折隔成十间房间，这就是老太太的佛堂间与儿孙辈的宿处和书房间，以及下人等的寝处了。

紧接楼厅是东西相向的两排平坡，各有三五间之多，西坡是堆栈和柴间，东坡是灶间和下人房舍，是孙秀林自造的。平坡的北端中央是一个圆洞门，顺着东西平坡中间的石板甬道，穿过圆洞门，就是后花园了。

花园占地不广，原是孔家花园的一隅，但也有亭台、假山和鱼池，连同花草树木当是原来主人孔家之物，也算是孙秀林夫妇颐养天年之所了。（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乌镇掌故续编》，徐家堤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188—190页）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六岁

◎入学，就读于乌镇东栅集贤坊小学。

按：集贤坊小学校长为徐冠英（一八九三～一九七一），原姓施，幼时因家里无力抚养被送给徐姓人家，故改姓徐，取名家城，字冠英，乳名连松。十四岁入乌镇中市云绵绸布店当学徒，自学不辍，后就读于桐乡县师资讲习所，毕业后回乌镇集贤坊小学任教员。几年后因工作勤奋，教学有方，升任校长，并与同事李爱文结为连理。徐冠英虽性格内向，却崇尚进步，和族兄、同盟会会员徐家驹为莫逆之交，受其影响，笃信三民主义。（参见2001年版《乌镇志》、2003年版《乌镇掌故》等）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七岁

◎是年，父亲孙德润去世。

按：孙德润的去世时间，邵传统等人误作一九三一年。

我七岁丧父，只记得家里纷乱，和尚尼姑，一片嘈杂，但我没有悲哀。自己没有悲哀过的人，不会为别人悲哀，可见欣赏艺术必得有亲身的经历。（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94页）

◎是年，转入位于观后街的私立敦本初级小学就读。

按：乌镇私立敦本初级小学系乡绅徐棠（一八六六～一九四〇）于一九〇六年出资创办。木心就读时的校长是颇负名望的老学究徐期百，偏重古文教学。（参见2001年版《乌镇志》、2003年版《乌镇掌故》等）

◎七月下旬，茅盾携全家回乌镇参加祖母逝世一周年的除灵入葬仪式，前后一周时间。

按：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子夜》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木心于少年时就在乌镇见过茅盾，当时木心称他为“德鸿伯伯”，但这只是邻里之间的一种亲昵的称呼，并不能说他们之间就有亲戚关系。（参考拙作《木心与茅

盾》，《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由于木心当时年龄尚幼，交往和交流一定不会深入，彼时茅盾在木心心中更多的是邻里“口碑上”的印象：

当已经成名的茅盾坐了火轮船，卜卜然地回到故乡乌镇，从来惊不皱一池死水，大家连“茅盾即沈雁冰”的常识也没有，少数通文墨者也只道沈家里的德鸿是小说家，“小说家”，比不上一个前清的举人，而且认为沈雁冰张恨水顾明道是一路的，概括为“社会言情小说”，广泛得很。

茅盾回家，旨在省母，也采点《春蚕》《林家铺子》这类素材。他不必微服便可出巡，无奈拙于词令，和人兜搭不热络，偶上酒楼茶馆，旁听旁观而已，人又生得矮瘠，状貌像一小商人，小商人们却不认他为同伙。

在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文人严独鹤，《申报》主笔，同乡引为光荣，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报上了，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木心：《塔下读书处》，《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7页）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八岁

◎是年，正式从师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水墨画。

按：据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八岁习画。”

我家坐落于幽僻的水乡古镇，难得随长辈到都市来游览。自幼只可能在纸上用水墨写写梅兰竹菊，若要以五色油彩借麻布表现湖光山色，这辈子，太渺茫了……

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9—110页）

◎春，茅盾将母亲从上海送回乌镇，并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负责翻修老屋后院的三间平房，茅盾为此亲自画了一张新房草图供黄妙祥参考。

按：黄妙祥系绍兴移民，早在光绪末年，黄妙祥就操劳宁绍会馆的运营。宁绍会馆为宁绍帮的联络议事之所，也供客死他乡的宁绍同乡暂时停放灵柩，贫富相济、有难同当。黄妙祥和沈家特别是茅盾本人有着亲密的关系。茅盾的曾祖父沈焕还在汉口经商时，曾汇款回家让长子沈恩培（茅盾祖父）开了一家泰兴昌纸店。纸店坐落于乌镇镇中心的应家桥北堍下岸，两间店面面街临河，以经营纸张、摺簿、锡箔为主，同时内设刻字柜，由一位姓

傅的师傅经营。开店伊始，纸店的经理是沈焕的一个侄子，沈培恩则负责监督业务。但两人均不善经营，待一八九七年底沈焕回乡安度晚年时，盘查店务后撤了两人的职，同时提拔了当时只是纸店刀手（切纸工）的黄妙祥为经理。沈焕于一九〇〇年秋逝世，三子分家后泰兴昌归沈恩培所有，但沈恩培无意经商，仍由勤勉的黄妙祥继续任经理。（参见邵传统、王松生、徐家堤《东栅孙家厅：绍帮移民孙秀林和其家人》及拙作《木心与茅盾》）

我在一九三三年夏回乡为祖母除灵时，发现乌镇的老屋现在清静了，只住着我母亲和四叔一家。老屋后面那个有三间平房的小院，更见幽静。……但三间平房已坍塌，需要翻修。我同德沚商量，她也同意，并补充道：“房子修好了，妈妈可以搬进去住，你那一堆洋装书，也可以搬一些到乌镇存起来，免得搬一次家受一次罪。”[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69页]

◎秋，乌镇茅盾旧居后院的三间平房在黄妙祥的操持下翻修一新，茅盾亲自回乌镇验收。本年冬至明年春，茅盾夫人孔德沚上海、乌镇之间来回跑了好几趟，从上海运回一批家什和十几箱书。

一九三四年秋后，房子盖好了，我亲自去乌镇“验收”，也为了接母亲来上海过冬。黄妙祥陪我看了新房子，果然不错，尤其木工做得细致。室内光线充足，很合我的意。黄妙祥笑着说道：“镇上已经有不少人来参观过了，都说这是沈家大少爷亲自设计的洋房，要来开开眼界。”我也笑道：“这算什么洋房呀，不过还实用罢了。”这时候室内还没有家具，我就把布置房间，美化环境的任务交给了德沚。后来，那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德沚在上海、乌镇之间来回跑了几趟，从上海运去了一套沙发，十几箱书（其中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茅

盾：《一九三五年记事》，《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71—272页]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九岁

◎据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至一九三六年曾一度在湖州。

◎是年，敦本初级小学并入植材小学，木心随往植材小学插入三年级就读。木心在植材小学就读时的同学有徐家堤、魏午堃、钱履坤、陆渠清、吴柏松、沈钤（沈罗凡）、沈品年等。

按：植材小学由乡绅沈善保（一八六九～一九三九，字和甫）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出资创建，原名乌青镇中西学堂，校址在东栅孔家祠堂，为当时县内第一所新式学校。从该校毕业的知名人士有作家茅盾、作家孔另境、报人严独鹤、画家徐昌铭等。（参见2001年版《乌镇志》、2003年版《乌镇掌故》等）

这所学校儒学为本，西学为用，开设经史（后改国学）、英文、数理化 and 体操等课程。一九〇七年迁北栅奉真道院（北宫），占用三元阁、斗姥阁等殿庑房舍，更名乌青镇植材高等小学。逐年扩建校舍，开辟操场，增添图书仪器等各种设备。图书馆藏书丰赡，更有诸子百家经疏，名人文集列传，《通鉴辑要》，《万有文库》（卢学溥赠），《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沈善保赠），《小学生文库》（沈雁冰赠）等珍贵图书。一代文豪茅盾（沈雁冰）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曾就读于该校。（高玉林：《木心的家世和早年生活》，《木心逝世三周

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0—21页)

据植材小学老校长潘尔昌回忆，木心是“年龄最小的，但是聪明好学，常到图书馆借阅古书，周末学校演出童话短剧他也会参加”。

.....

钱履坤亦回忆道，一次他与木心“一同去东栅（集贤小学）给小同学吹上一曲口琴，孙仰中有一只可以双面吹奏的大口琴。其父亲故世（木心七岁丧父），挽联是木心自己写的，字迹清秀，所以，联想起孙仰中本人的性格和一切，他是瘦长个子，眉目清秀，聪明好学，他性格内向.....”（高玉林：《木心的家世和早年生活》，《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1页)

我们小时候的小学教科书，有许多世界名著。唱莫扎特，我们却不知道。那时我就在教科书上读到了勃朗宁的诗，非常喜欢，叫做《花衣吹笛人》。（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26页)

◎九月，茅盾回乌镇停留两个月，期间创作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十岁

◎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在祖籍地绍兴，自制年表二则显示本年仍在湖州。实情如何，有待考辨。

◎十月十四日，茅盾回乌镇，约待了十天。期间痔疮发作，不能行动，以致在得知本月十九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也无法赶回上海参加鲁迅的治丧活动。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十一岁

◎七月七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日军进驻乌镇，乌镇被占领。

按：日军占领乌镇后便开始了烧杀抢掠，八年间共造成近六百人死亡，伤亡人数占桐乡境内各乡镇首位。

日军侵华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魔爪伸向乌镇。这天下午，阴霾细雨，日军数百名从吴江县平望方向进入乌镇北栅。一进镇，就纵火烧房。晚上，日军驻西栅的西高桥一带，强行敲开店铺住户，入内住宿。其中一股日寇在雨中闯进费姓民家，有两名从青岛来乌避难的妇女惨遭强奸，户主婢侄两人早已躲入大批竹器中，才免受辱。次日，日军向东、南、北三栅搜索，枪杀了医生姚景新、植材小学传达室工友皇甫貽生、南栅糖坊张金荣等十多人，并抓走了沈乐笙和南栅新桥弄口酱鸡店沈姓小老板。当天上午，日军由水路开往双林，临撤走时又放火烧了西高桥两旁民房十数间。（沈侃铮、徐家业、张森生：《日军在乌镇的罪行》，《桐乡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汇编》，中共桐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00页）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至一九三八年在祖籍地绍兴。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十二岁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在嘉兴，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还在绍兴。实情如何，有待考辨。

◎年初，百余名日军再度进驻乌镇，扎营于植材小学，对校舍进行了破坏。

他们把校内的课桌、教具烧光，校舍也被拆毁。最为可惜的是学校藏书楼中，历年珍藏的诸子百家木版孤本，以及整套《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名贵文献，被洗劫一空，其损失之巨，实难估量。学校里的所有树木全被砍去建造碉堡。（沈侃铮、徐家业、张森生：《日军在乌镇的罪行》，《桐乡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汇编》，中共桐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00—101页）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十三岁

◎据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在乌镇。

◎乌镇沦陷后，植材小学难以为继，学生被遣散回家。孙家除了延续自家家教外还先后聘请了六位家庭教师，其中一人为前清举人，一人为东吴大学毕业生沈氏。木心不仅系统地阅读古文，还通过阅读课外书特别是大量外国作品，开阔了视野，培养了世界性的眼观。

故乡先遭轰炸、炮击、烧杀奸掠，后来就沦陷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维持会”来撑局面，百姓过的是近乎亡国奴的生活。我们小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毕竟没有一般小学中学的热闹生动。我就愈加偏爱于绘画、看课外书。画，已是“西洋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是“五四”以来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诗，以及外国小说的翻译本，越读越觉得自己不济，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1页）

我从小是在家里请家庭教师授业的，家里的藏书非常多，古文是有系统地读。再加上看一些世界性的书，我是读着《圣

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的作品长大的。（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名仕》，2006年12月）

我在考入正式的大学之前曾是六个家塾教师的门生，四个是被淘汰了的，两个是历久不衰的学问家，教中国古典文的是前清举人，一代名儒，教西洋现代文的是东吴大学早几届的文科学士，杜威博士的高足，二师言之谆谆，诚心诚意要我学贯中西，我却是东风西风过耳即忘，此心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木心：《海伯伯》，《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页）

家庭教师无疑是饱学鸿儒，师生各得一“顽”字，师顽固，生顽劣，日本轰炸机在头上盘旋，先生要我写“忧国伤时”的诗，写不出，忽成一首七绝，三四两句是：“大厦渐倾凭擎柱，将何良法挽神州？”老夫子摇头：“束手无策，徒呼奈何？”我说：“有策！”“什么策？”“将何、良法，萧何、张良的办法啊。”我心不在焉，想去开高射炮。（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0页）

沈罗凡在孙家陪读。

我和他是植材小学同学。抗战初，植材小学遭日军焚毁，牧心母亲曾延请东吴大学毕业生沈氏家教，我在他家附读。（沈罗凡《怀念牧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开始接触大量的外国经典。

我的几个家庭教师中，有一位是新潮人物。他教我读《圣经》，简称“读熟五经、四福音，就可以了”。（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2页）

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慕，却没想到“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22页）

气质和品味，我更近瓦莱里。但我一直偏爱波德莱尔。不忘记少年时翻来覆去读《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沉醉的夜晚。我家后园整垛墙，四月里都是蔷薇花，大捧小捧剪了来，插在瓶里，摆书桌上，然后读波德莱尔，不会吸鸦片，也够沉醉了。（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01—602页）

叶慈是我少年期的偶像，一听名字，就神往，这种感觉我常有，许多人也有。（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92页）

读到上海的时事性刊物《新生》。

边读边回忆少年时在故乡沉醉于《新生》的那段蒙昧而清纯的年月，双倍感怀——各有各的佛罗伦萨。（木心：《雪夕酬酢：答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6页）

按：《新生》，系杂志，周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创刊，是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时事性刊物。名义上由杜重远任主编，实际由艾寒松主持。该刊继承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宗旨，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主张抗日救国。该刊创刊号的主要栏目有：老实话、文化消息、随笔、小说、一周大事记等。创刊号上有杜重远写的发刊词，其中指出：“本刊的宗旨是光明正大的，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本刊的态度是无偏无党的，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本刊的内容是深入浅出的，期成培养新知的园地。”

◎约在是年前后，在黄妙祥的帮助下向茅盾书屋借书，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

按：孙家与黄妙祥既是老乡又沾亲带故。起初孙秀林与黄妙祥颇有交情，宁绍会馆的营建和运作，孙秀林也出了不少钱和力。绍兴移民子女嫁娶，首选同乡人，孙彩霞与王济诚的婚事也是黄妙祥一手撮合的。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先生携眷生活在内地，沈太夫人大概已经逝世，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棧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淡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琅嬛福地了。

……茅盾的回忆录中大事表彰的“黄妙祥”，就这样常来道说沈家事，又不知为什么我叫他“妙祥公公”，黄门与沈门四代通家之好，形同嫡系，我的二表哥是黄门女婿——由此可见一个古老的重镇，世谊宿亲，交错累叠，婚来姻去的范围，不外乎几大氏族，一呼百应，周旋固是顺遂，恐怕也就是因循积弱的原委了。

我对沈氏的宗谱无知，对茅盾书屋的收藏有知，知道了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

事情并非荒唐，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说：“你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还整齐清爽。”那是指我会补缀装订。（木心：《塔下读书处》，《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8—30页）

少年在故乡，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家”，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我狼吞虎咽，得了“文学胃炎”症，后来想想，又觉得几乎全是那时候看的一点书。（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0页）

读到高尔基、巴比塞以及大量“五四”新文艺作家的作品，其中特别看重茅盾在古籍中留下的批注。木心认为茅盾的传统文学修养不在周氏兄弟之下：

世界文学经典是诚惶诚恐的一类，高尔基题赠、巴比塞们签名惠寄的是有趣的一类，“五四”新文艺浪潮各路弄潮儿向茅盾先生乞政的是多而又多的一类，不少是精装的，版本之讲究，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超越者，足知当年的文士们确凿曾经认真，曾经拼力活跃过好一阵子。古籍呢，无甚珍版孤本，我看重的是茅盾在圈点、眉批、注释中下的工夫，茅盾的传统文学的修养，当不在周氏兄弟之下。看到前辈源远流长的轨迹，幸乐得仿佛真理就在屋脊上，其实那时盘旋空中的是日本轰炸机，四野炮声隆隆，俄而火光冲天，我就靠读这许多夹新夹旧的书，满怀希望地度过少年时代。（木心：《塔下读书处》，《木心 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0—31页。）

靠读书来“自救”，其中读到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和《鲁拜集》译本：

我少年时，江浙地区的书香门第都已败落，而富裕人家多数是醉生梦死，少数热血青年则投奔革命，吴文化根本不成气候。我的“自救”，全靠读书，“书”是最神奇最伟大的，十三四岁时我已将《文学大纲》（郑振铎主编）通读了几遍，后来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几乎全凭当年记忆。（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我在十三岁时见到《鲁拜集》译本，也爱不释手。奇怪的文学因缘，凭本能觉得好。（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29页）

对于儿时所受的教育，木心晚年回顾说：

.....我的两个家庭教师，其一毕业于教会大学，这样，希腊神话，四书五经，《圣经》，同时成了必须背诵的。我想，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些西方吹来的影响，我会是怎样一个人？每次都想不下去。

西方人如果没有接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是欠缺、遗憾，而东方人如果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就不止是欠缺、遗憾。是什么呢？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流作家，谁接受欧罗巴文化深，谁的自我完成就更出色，如有例外，外到哪里去？现代文化的第一要义是整体性。文化是风，没有界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一个教师。我的开口奶是白牛奶，但这之前，中国文化的黄连和蜜水也喂过我呀——如此回顾，好像真的找到了我的起点（不能讲是终点）——我在威尼斯买了一面镜子，照照，发现我还是一个黄肤黑发的中国人——西方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耶稣一直在我心中。（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39—140页）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十四岁

◎据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在嘉兴。应是避居嘉兴，住在表哥邵传统家。

按：邵传统（一九一八～二〇〇六），浙江桐乡乌镇人，一九四二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嘉兴建西联合诊所主任，嘉兴联合医疗机构管委会主任，嘉兴市中医院眼科主任、副院长、顾问，嘉兴市一届、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嘉兴市委员会一届、二届主任委员。

乌镇沦陷后，抗日志士和一些散兵游勇纷纷组织游击队抗日。一时间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几乎个个声称“筹措军饷抗日”，而向中产以上人家敲诈勒索。孙家也收到几次“恐吓信”，被敲诈了不少钱财。木心和他母亲沈珍眼看在乌镇待不下去了，就外出“避难”，乌镇家业由管家郑阿海（海伯伯）留下看守。母亲带着木心先去嘉兴投亲“避难”。当时，木心的表哥邵传统在嘉兴开设禾光眼科医院，已小有名气。患难见真情。邵传统对他们母子悉心照拂，代为租屋安顿。（高玉林：《木心的家世和早年生活》，《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4页）

对于嘉兴，木心有深刻的记忆，据他自述是在嘉兴时开始创作俳句，还曾在此求学：

嘉兴，我是熟悉的，曾住在天后宫弄，燕诒堂，求学于“模范小学”。北大街，张家弄，寄园，南湖，都在我的忆念中。说来你

们不信，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俳句”了。换句话说，我的俳句的诞生地是嘉兴。（沈秀红、孙飞翔：《木心先生六日在乌镇度中秋》中所引木心的话，《嘉兴日报》，2006年10月7日）

◎写作初露锋芒，并有少量作品开始发表。

我最早投稿，十四岁。在湖州、嘉兴、上海。退稿倒没有，但少量发表。后来几十年没有投稿，出国后，又开始投稿。（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5页）

小学时代，我的作文还真不错，我说：“姐姐，帮我开个头！”姐姐便执笔破了题，我说：“你这样写，叫我怎样接得下去呢？”姐姐嗔道：“真笨……”她承之转之，全文已得四分之三。我说：“唉，最后的感想最难了！”“有什么难。”她又捉笔瑟瑟草就扔给我，我赶快称赞：“姐姐真聪明！”看到她的笑容，便知下次求她再写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上学。家庭教师，当堂交卷，苦苦混到十四岁，明里五绝七律四六骈俪，暗底写起白话新体诗来，第一首是这样：

时间是铅笔，
在我心版上写许多字。
时间是橡皮，
把字揩去了。
那拿铅笔又拿橡皮的手
是谁的手？
谁的手。

从此天天写，枕边放着铅笔，睡也快睡着了，句子一闪一闪，黑暗中摸着笔，在墙上画，早晨一醒便搜看，歪歪斜斜，总

算没逃掉，例如：

天空有一堆
无人游戏的玩具，
于是只好
自己游戏着
在游戏着，
在被游戏着。

又如：

画一座琪花瑶草的无人岛，
画许多白帆向它飘
这也是膏笔的圆谎么

渐渐积多了，在嘉兴、湖州、杭州、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记得有次寄出稿件后，卜了一签——“小鸟欲高飞，虽飞亦不远，非关气力微，毛羽未丰满。”好厉害！上帝挖苦我，我不再写诗而专心画图了。（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5—17页）

按：以上引文中的三首诗是目前可知的木心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

◎与湖州一女孩每周通一信，交流读《圣经》心得。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她字迹秀雅，文句优美。她坚持以上的论点，我则力主《新约》的文学性、思想性胜过《旧约》。……后来我

们在苏州东吴大学会面，幻想破灭。再后来她转入南京神学院，信也不通了。《旧约》没有能使她爱我，《新约》没有能使我爱她。……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0—71页）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十五岁

◎据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在乌镇。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十六岁

◎十月三日，日军与国军在财神湾发生冲突，随后日军借口居民中藏有游击队，放火焚烧从化坛桥到财神湾一带房屋一百多间，并架起机枪，不许市民救火。

一九四一年乌镇四乡的游击队不时在镇上出没。日军熊谷部队慑于我游击队机动灵活的战术，龟缩在南栅河西张家花园里面的巢穴中，一二人不敢轻易上街。十月三日下午二时，五名日军带领翻译胡公敢和姘妇杨阿凤、情报员韩田娜，去东栅搜查，行经财神湾处，碰到一九二师——一八团班长李宗海。李立即掷去一枚手榴弹，炸死日军一人及胡公敢。当日军集合三十人杀来时，李班长等已无踪影。日军借口居民中藏有游击队，立即放火烧房。从化坛桥西起，到财神湾一带，到处点燃，并架起机枪，不许市民救火。还杀害居民一人，打伤两人。大火自中午烧起，烈焰冲天，终夜不息，共烧掉房屋一百多间。（沈侃铮、徐家业、张森生：《日军在乌镇的罪行》，《桐乡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汇编》，中共桐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01—102页）

◎秋，据自制年表二显示在嘉兴。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十七岁

按：自制年表一本年所标示的年龄为十六岁，乃周岁。

◎春，前往杭州报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杭州艺专”）。

按：据木心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春至一九四五年年底均在杭州。自制年表一却显示本年在乌镇，秋季在嘉兴。互有出入，详情待考。另，木心在《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的访谈中说“我十五岁就离开家到杭州”，记忆有误，应是十七虚岁。（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木心离开乌镇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一是为了报考杭州艺专，为此遭到家人的反对。

我明知国立艺专迁到内地去了，然而我是抱着投考艺专的心情和意图来的，时常在平湖秋月、罗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带踽踽独行。（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2页）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喜欢文学，而家里希望我读法律或医学。我不愿意学那些，但是整个家族都反对，反对得很厉害。（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我怨的是自己家庭的纠纷，使我童年受苦，决心出走。（沈秀红、孙飞翔：《木心先生六日在乌镇度中秋》，《嘉兴日报》，2006年10月7日）

其二是逃婚，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

老家静如深山古刹，书本告诉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我所最向往的，我知道再不闯出家门，此生必然休矣——一天比一天惶急，家庭又逼迫成婚，就像老戏文中的一段剧情，我就“人生模仿艺术”，泼出胆子逃命。此后的四十年是一天天不容易过也容易过。（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1页）

◎到杭州后爱上逛旧书店并大量购书，最嗜读的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等国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

杭州旧书店多多，多到每天只要我出去逛街，总可以选一捆，坐黄包车回来。最嗜读的是“欧洲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没有料到许多故事是好事家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我却件件信以为真，如诵家谱，尤其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特别使我入迷着魔。（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2—113页）

十七岁到杭州，我不喜欢西湖，胸中充满着崇高伟大的理想，最好是看到高山大海，悬崖峭壁，所以要听贝多芬，要读莱蒙托夫……我的童年少年很苦闷，没有心情接受普希金那种典雅的美。倒是暴烈、粗犷的美容易起共鸣。但要说真正理解，十六七岁的人不足以认知贝多芬，也谈不上懂得莱蒙托夫。（木心讲

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36页)

◎住在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日常生活由女佣料理，自己一心要做知易行难的艺术家的艺术家。期间到思澄堂随范牧师学钢琴，作印象派油画。因追求西化被亲友批评，遂尝试与世家子弟交游，终因理念不同而作罢。

一九四三年，我住在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女佣料理日常琐事，我独进独出，一心要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书越买越多，画则全作油画，走的大致是印象派的路子，喜欢尤特里罗，他的街头风景，也不是实地写生的。下午三时至六时，照例在“思澄堂”范牧师那里练琴，钢琴，每月付学费。

藏青哔叽学生装、黑呢西装、花格羊毛衫、灯芯绒裤子……意思是我当初一袭长袍揖别故乡的，到得此时在外表上全盘西化了，这是四十年代初的浙江小镇上所做不到的。某日家信至，内示凡有从杭州回乡的亲戚长辈，都认为我单身在外，无人督导，显得华而不实——我深感委屈了，与我所梦想的“艺术家”相比，我真是表不及里、里不及表……更滑稽的是，我自以为处于“流浪”“失恋”“奋斗”的进程中，艺术家不是都要这样折腾，千锤百炼，然后一举成名的么，家书中之所以有此一番旁敲侧击的“庭训”，猜想是“蘋南书屋”主人，袁老夫子对我的批评，他是我姐夫的业师，精鉴赏，富收藏，而对“西洋画”无知识，有成见。我初入“蘋南”，老夫子每来夜谭，看了我带出来的山水花卉和隶真行草，以为然，孺子可教。不久，我弃长衫布鞋，取西装革履，满屋油彩气味，画具画材狼藉，难怪老夫子要在他给我姐夫的信中，来那么一句“华而不实”。好在他怕闻油彩气味，夜谭从此不继。

居有顷，母亲来杭州办事，当然也是为了要看看儿子，我想不免要甄检“华”与“实”的公案，结果陪母亲游山泛舟，逛街选物

之余，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英国纹皮皮鞋、瑞士名牌金表，还印了几匣名片。母亲说：“先一步步学起来，以后就老练，独个子在外面，要懂交际，别让人家瞧不起。”我趁势问了那讥评的来源，诚然是“蘋南书屋”主人的高见，母亲笑道：“真的华而不实倒先得一‘华’，再要得‘实’也就不难，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你姐夫，实而不华，再说也华不起来，从前你父亲是正当由华转实，无奈去世了，否则我们这个家庭也不致如此，我是说，你要‘华’，可以，得要真华，浮华可不是华……”

母亲归去后，我尝试与杭地的几许名门世家的子弟辈作交游。其中擅书画的那些个，都各有师承，谨守传统“六法”，一派仿作，毫无才气，更使我惶惑不解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根本无视“现代”，意识不到欧罗巴（世界性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而生活享受呢？却来得个会赶时髦，西方物质文明的种种新鲜玩意儿，他们捷手先得，自命不凡，男男女女凑在一起时，像是谈恋爱，又不见得真相干，这种场合和氛围，使我废然退出，仍旧回到“蘋南书屋”，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概念丛里，走我自以为是的“路”，而且有点明白何以“西湖边上没有画家在写生”的道理了，既然艺专因战事迁去内地，杭州就没有主流的“洋画”，只有支流的“国画”——我像离群之雁，只等艺专回来，才有入群齐飞的可能。而就这样孤雁单飞，也不失为一种自强的训练，与所谓名门世家的后代的交游经验，使我知道“浮华”真的只是“浮”而不是“华”。（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3—115页）

◎是年，在杭州举办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

八岁学画，十七岁在杭州开了一次成功的画展。（陈英德：《也是画家木心》，《联合文学》创刊号，1984年11月1日，61页）

◎是年前后，到过上海，在上海初次读到张爱玲的散文。

我初次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几本杂志间，十五岁的读者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木心：《一生常对水精盘：读张爱玲》，《作别张爱玲》，陈子善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126页）

按：“一九四二年”系木心误记，当为“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十八岁

按：自制年表一本年所标示的年龄为十七岁，乃周岁。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春在杭州。

◎是年，作诗《英国》。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十九岁

◎是年，一直在杭州等着报考杭州艺专，但该校迟迟未迁回。

◎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在上海菜市路原址筹备复员。九月二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九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复职视事，十五日新学期开学，二十日正式上课。此为民国三十四年度第一学期，木心尚未入学。

按：刘海粟（一八九六～一九九四），名槃，字秀芳，号海翁。江苏常州人。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任上海美专校长期间，倡导美术改革，成就卓著，被誉为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拓荒者。据陈丹青回忆，木心曾忆及他在上海美专求学期间因文笔突出刘海粟一度想让他做自己的秘书，遭木心婉拒。

◎抗战胜利后，与沈罗凡、邵传发、徐宜诚在乌镇创办《泡沫》刊物，为八开油印物。此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罗干”，负责编写诗歌、散文，文字“幽美清

雅，富于情致”。《泡沫》总共出了五期，因反对政府摊派国民捐款，被迫停刊。

按：一九九六年版《桐乡县志》误作“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创刊”。

抗战胜利后，我（周注：笔名罗凡）与邵凡（周注：邵传发笔名）、徐青戈（周注：徐宜诚笔名青戈，徐冠南子）、牧心（周注：笔名罗干）在乌镇创办《泡沫》刊物。牧心编写诗歌、散文，幽美清雅，富于情致。当时由于反动政府压榨崇桐两县农民，摊派国民捐款，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泡沫》坚决支持这一正义行动，曾发表《论国民捐献》《再论国民捐献》（周注：两论，系沈罗凡撰写），尖锐指出它严重损害农民利益。我们把《泡沫》第四、五期，张贴在乌镇北花桥、应家桥堍。……但我却遭到了乌镇警察所的传讯追问，《泡沫》也因此停刊。（沈罗凡《怀念牧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杭州成立“美术工作者协会”，积极加入，成为该会会员。

那年秋天，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喜讯突如其来，杭城一片爆仗声，入夜万人空巷提灯庆祝，在近乎昏晕的欢欣中，我冷冷地看到一己的命运面临转机。

似乎到了这时杭州才有“文化界”，呼地冒出许多画画儿的、编报儿的、演戏儿的……大抵兵分三路，一是从内地“大后方”赶程而至，二是在浙江山区作游击队于今整编入城了，三是原本隐蔽身份至此就站了出来，反正一时人才济济，都显得精明强干，唯独这个蛰居于“蘋南书屋”、寝馈于欧罗巴文化观念的惨绿少年，一入“文化界”，确实难于适应，但我还是看样学样地努力周旋。

很快，杭州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我也就此成为会员，开会时，这些“美术”的“工作者”，个个能说会道，握起手来，紧得发痛，还要上下左右摇几摇，自道姓名时，叫“阿大”，叫“阿羊”，在画上签名也就是“阿大”“阿羊”，衣着一概平凡朴素，谈论所及，“某某，人很热情”，“这张画，趣味好”——我不免发愣，“热情”，怎么就放在口头上，“趣味”，我却看不出来。他们都画农民、小贩、码头工人、乡村集市、城市路边摊……那事事为首的“阿大”者，画风很像丰子恺，只是太像了一点，而更多更精彩的是搞木刻的，题材总与“革命”有关，我注意看，觉得自己是望革命之尘而莫及，尤其因为读过不少俄罗斯小说，“革命”，非常悲壮，非常罗曼蒂克，转而对于中国式的革命，我有的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然而一九四几年那光景，杭州地区的“美术工作者协会”，似乎并无特殊的内在性质，大致是一些画画的青年中年人，想在长期的压抑苦闷之后，吐吐气扬扬眉就是了。（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5—117页）

◎此间，通过夏子颐得以结识夏承焘，长谈通信，诗词往还，成为忘年之交。

按：夏承焘（一九〇〇～一九八六），字瞿禅，晚年改字瞿髯，别号谢邻、梦栩生。浙江温州人。曾任无锡国专、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赞誉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著有《夏承焘集》等。

我与夏承焘先生是忘年交，我们相差有二十几岁。初见夏先生的样子与我读他诗句中的风流潇洒状颇不相符，他黑黑又不高。（夏烈：《与木心先生的下午茶》，《出版人》，2006年第4期，58页）

抗战胜利之后，与夏承焘先生成了忘年交，诗词往还，我才野性稍戢。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夏先生是无论如何比我懂得多。他手抄四福音书中的箴言给我，《葡萄》篇，《梁木》篇，还有“主啊，兄弟得罪我，原谅他七次够了么……”他用来解释儒家的“恕”道，因为夏先生准备原谅我七十七个七次，所以我一次也没有得罪他。（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0页）

温州的夏承焘先生，号称近百年第一词家，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我们长谈、通信，他每次寄作品来，都写“木心仁兄指正”，他快近六十岁（按：夏承焘生于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虽大木心二十七岁，但此时还不到五十岁，木心说他此时近六十岁系错觉），我当时才二十几岁。（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78页）

浙江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承焘先生曾与他是忘年交，来信启首是：“木心仁兄大人阁下”；木心回信，则称承焘先生“夏丈”。（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我和夏承焘先生也并非严格的师徒，我们倒是忘年交，经常通信，谈论学问，他把他的诗给我看，我把我的画给他。（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中所引木心的话，《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二十岁

◎一月一日，杭州举行“元旦美展”，木心拿出几幅油画参展，受到好评，初步圆了童年以来萦心不释的画家梦。

按：有关此次美展，现存一帧木心与版画家杨可扬等三人的合影。《文学回忆录》二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一页之间的插页照片说明中误作“摄于一九四六年他在杭州的第一次个展”。

杨可扬（一九一四～二〇二〇），原名杨嘉昌，笔名阿杨。版画家。浙江遂昌人。一九三七年开始木刻创作，参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编审近四十年。期间被选为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版画学会会长等。曾获“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代表作有《教授》《江南古镇》等，风格简洁质朴，大气浑厚。著有《可扬版画集》《可扬藏书票》《可扬艺事随笔》等。

果然，未到年底，就在民众文化馆举行了集体性的画展，参展的作品居然很多，国画占颇大的面积，而木刻漫画泱泱乎成了主流，我拿出的几幅油画风景，都上选，画的是树木、教堂、桥、河，不足指名是什么地方，似乎巴黎，似乎伦敦，反正从照片上的印象并合起来的。

展览会很热闹。筹备期间我每天去工作，感到自己实地投身社会，又怀疑这种事务性的忙碌算不算“艺术活动”，与之一同工作的几位年长者，在我眼中都是饱经风霜、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大哥，有的似乎病着，有的似乎贫着，我不病不贫却比他们自卑，

因为我幼稚无知，虽然读书已不算少，可是书本上所得来的有关艺术的常识、知识、概念、观念，与眼前所接触的人物事物，全对不上号，“阿大”“阿羊”“热情”“趣味”等，与希腊雅典、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印象派……毫无关系，他们大概生来就是画豆腐浆摊、码头工人、玩杂耍的。

但我还是很兴奋，看到自己的画挂在墙上，男男女女走过，停步，指指点点——初步圆了我童年以来萦心不释的“画家”梦。接着，便是《东南日报》的报道和评论，认为此次展览十分成功，选出几位画家作为赞美推荐，其中竟然涉及我，大意是那几幅风景清丽脱俗，且能以中国画的笔法入油画，洵为难得云云。

（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7—118页）

本月，杭州艺专迟迟未迁回，上海美专登报招生，木心遂去信报名，以同等学力作为插班生考入该校三年制西洋画专修科一年级就读。

按：有关木心进入上海美专的时间，存在多种说法：

一、据自制年表一，一九四五年初就在上海美专，乃记忆有误。

二、据刊载于二〇〇六年三月五日《外滩画报》上的《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访谈，木心是“十九岁”（一九四五年）到上海，亦属记忆有误。

三、木心在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提供给桐乡地方文史研究者周乾康的简历中说是“十七岁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亦属记忆有误。

四、据自制年表二，一九四六年初“进上海美专”。

五、据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京艺术学院为木心开具的《学历证明书》中说木心“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

在我院前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三年制西洋画系肄业”。

六、笔者翻阅了上海档案馆所藏的上​​海美专“三十四年度第一学期（按：一九四五年九月开学）各系组学生学业成绩操行等第总册”，尚无木心成绩。至“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按：一九四六年一月开学）各系组学生学业成绩操行等第总册”中才第一次出现木心的成绩。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断定木心进入上海美专的准确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一月。

艺专迟迟不迂回，上海美专倒先复校，登报招生了，我立即去信报名，很快就收到通知，按期去上海应考。在这个号称人间“天堂”的西子湖畔，我认识了很多​​人，却始终无友谊可言，遇事只是在“蘋南书屋”中默默地想，默默地决定。窗下一条混浊的小运河，对岸的织席工厂，终日机声轧轧，景况是很凄惨的，而全凭十八岁这个年龄，使我麻木而自信。不过我隐隐看到母亲对世道的估量已不符实际，我父亲的一代，确凿要善于交际，讲究体面，而战后的新生代就全然平民化了，且以此为标榜，为“革命”的前提。我靠在窗栏上凝望慢流的河水，想起那些“轶事”“传记”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不幸，也还是幸。

赴上海应考的前夜，我独自走上湖滨的一家餐馆的顶层，算是钱行，要的是西菜，一杯葡萄酒。当年很流行的一个励志的说法：“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原是觉得文字累赘词义伧俗，此时想起，倒许为剜切——始于懵懂的虚荣心，胡乱地画起油画来，得机会就率尔拿出去展览，那报载的好评无非是记者的例行故事而已。

除却个人的短距离的“生世之叹”，“艺术究竟是什么”这大疑​​题更使我不安（因为我已经知道艺术是什么，才决意永别故乡），到了杭州，先遇的是一伙摩登的纨绔子弟，后遇的是成群“美术工作者”，是八年战乱使中国自外于世界艺术潮流？抑或中

国就没曾进入过世界艺术的行列之中？十八岁的头脑加上一杯葡萄酒就更糊涂了。

上海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冒险家的乐园，一个非鱼非龙的年轻人，即将投入鱼龙混杂的黄浦滩。

“望湖楼”独自晚餐，极目黑沉沉的夜湖，白堤的柳丝间灯光闪烁，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感到实而不华的悲凉。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坐落于斜桥菜市路底，那是大都会的南边陲，接近市郊农村，空旷安静自不必说，待到亲临实地，此区域不仅是一个庞杂的果蔬鱼肉市场，而且周遭密布着小吃店、路边摊、裁缝、鞋匠、烟纸什货……烟雾迷目，腥臊刺鼻，时值春初雨季，街上满是人、满是伞、满是水潭泥泞、一片可以使街面震动的喧嚣市声——杭州西湖此时柳丝嫩黄，柔媚如梦，这里可真是红尘乱世了。

……

校舍，正面看是一幢相当宽阔的四层西式大楼，无奈临街，显得商业气，黑漆的铁栅门颇为威严，我跨进去的刹那，心想：这是我的艺术之门，门外汉的阶段就此结束。抬头又眺见里面的照壁上设有长龕，水泥塑出一个“美”字，由肥肥的十二只尖角组成，校徽便采此为图案。

我本能地推开“会客室”的门，五六只鸡咯咯乱叫，破旧的沙发上全是鸡粪，可见八年抗战，这里一直是荒废着的。

教务处光线幽暗，只有一个脸色苍白、须眉乌黑的中年人，是教务主任，我报名三年制西洋画专修科，大学程度。（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8—120页）

三年制西洋画系上午一概是实习课，下午是理论课，教授有陈士文等。

那时的所谓“西洋画专修”，上午一概是实习课，从石膏素描渐进到人体素描及油画创作，其他如水彩、粉笔、速写是间隔性的穿插。下午，理论课，美术史、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生意清淡，因为翻翻书就可以应付考试，而教师讲讲就讲到物价高、薪水低、老婆又要生孩子，劝大家不要学艺术。实习课的风气则不然，我至今还留连那时候的学生的生活习惯，晨起盥洗，早餐既毕，换上浆洗一清的衬衫（多数是纯白），打好领带，擦亮皮鞋，梳光头发，挟着画具健步经长廊过走道上楼梯进教室，教授总是先在那里，衣着更为严谨。我们的C教授终年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无懈可击；薄型皮鞋和狭边呢帽，一望而知是法国带回来的；右手无名指上白金的钻戒款式古雅，巴黎十年养成的飘逸深沉，先成了我们的楷模。课间休息时，我们拿出画册来请C教授品评讲解，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分别等级毫不假借。他认为胆大：大画家，胆小：小画家，使我们这群男孩女孩气壮神旺、自负日高，而论素描基础之奠定，他又说画桃子要连桃的茸毛也画出来，大家又为之瞠目结舌。（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1—122页）

按：“C教授”即陈士文（一九〇七~一九八四），字器先，浙江仙居人。国立西湖艺术院国画系肄业，一九二八年自费进入法国里昂美术学校攻读西画，因受到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的青睐转为公费，得以继续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执教于上海美专和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任国立英士大学艺术专修科教授、科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任教，在上海美专担任西画人体教授。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受聘于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后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

林风眠之外，木心怀着尊敬回想的另一位老师，是留法归来的陈士文，一个完全被遗忘的前辈：“上课走进来，总归笔挺，白衬衫、黑西装。”画得怎样呢？“几件静物一摆，清爽，不啰唆。”

说及此，木心慨然：“当年我们对陈先生表示佩服，你晓得他怎么说？他说：

‘不过毕加索、马蒂斯而已！’”[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39页]

木心对上海美专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风十分赞赏。

上海的私立学校，社会舆论称之为“学店”，校长是老板，教师是职员，学生是顾客，名义是“作育英才”“读书救国”，实质是谋利敛财，误人子弟。理工工科文科的私立大专固泛泛如此，上海美专虽不例外，而我却十分赞赏它的传统作风，那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可容可包却俨然兼容并包，虽然无所谓学术自由你完全可以学术自由，就是由你自己去好自为之，这倒不期然而然地遵循着蔡公子民先贤的遗箴。对于顽劣成性散荡成习的我，天时地利人和足够足够了，我在上海美专所享用到的“自由”，与后来在欧美各国享受到的“自由”，简直天海一色，不劳分别，如果你有一分才具，那么再加一分自由，别的还要什么呢？美术学校的概念是画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卫生间，就好了，教师的话中听则姑妄听之，不中听的他自己听，“自由”，就是谁也别奈何谁。三年五载生息其中，是一枝玫瑰便会开玫瑰花，园丁的脸是不像玫瑰花的，所以我至今还在喜欢还在感激上海美专，那光景，学生奇装异服、玮意琦行，一概不遭物议，迟到缺课只要缴足学费安然无恙，大意是：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校长教授就此特别显得慈眉善目、神闲气定，师生相敬如宾，宿舍简陋，食堂寒伧，那你可以自己去租房，可以上白俄开的小西餐馆，或者说到底，学生时期的艰辛是必修是“天降大任”之关键一课，缺了倒是难补的。（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9—130页）

按：木心在《战后嘉年华》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其就读上海美专之初学习、生活的几个方面，因篇幅较长，以上仅节选部分。此外，木心就读上海美专西洋画系时同在该系就读的同学（部分）有：

刘冠华、朱聿、郑为、张安之、姚铭忠、林中行、王伯敏、陈素平、许庆皋、贺鸣声、孙嵩元、夏子颐、葛克俭、胡瑞芳、周石峰、严涵青、顾生鹤、王玉璘、陈业恒、杨岫晴、劳坚清、张震川、花剑琴、王卉、陈静园、邬显豪、黄兆锟、花咏青、桑叶舟、胡世德、任意、沈开逸、史济利、蔡璜、冯启灵、黄宗秀等。

◎三月，谢海燕自重庆返回上海，就任上海美专副校长。

按：谢海燕（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原名益先，又名海砚，字燕园，笔名海燕行。广东揭阳人。一九三五年刘海粟旅欧回国，力主已在上海美专兼任西洋美术史教授的谢海燕担任教务长。一九四四年被任命为国立艺专教务长。抗战胜利后辞去国立艺专教职，复员回沪，任上海美专副校长兼艺术教育科主任。

◎四月，上海美专成立校复员委员会，拟订复员计划并调整学制。厘定养成艺术专门人才之科组为五年制，养成艺术师资人才之科组改为绘画、音乐、劳作三组，学制三年，教育部委办之劳作科为二年制。同时厘定课程标准，采用学分制。九月奉准试行，复员计划亦次第付诸实施。

按：据夏子颐等回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美专兵分两路：一路留上海继续办学，处境困难；一路内迁浙、闽，参加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成立艺术专修科，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原址，重新会合复校。原在内地就

读的陈沙兵、葛克俭、夏子颐三人亦于一九四六年二月随校迁返复学。他们早先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从事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是党的外围积极分子。复学后由施月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子颐、吴平、朱瑚：《风雨战斗迎黎明：回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地下党的斗争》，《南京艺术学院史》，王秉舟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287页）

◎四月，陈沙兵、葛克俭、夏子颐在上海美专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美专党小组，上级党组织派姚永祥兼任小组长。

◎是年，上海美专的学生运动异常活跃，木心画宣传画、演话剧、上街游行，还积极投入到鲁迅提倡的新兴版画运动中。

一九四六年五月，党小组引导并组织部分同学举办“五四运动文艺欣赏会”，观看秧歌舞剧《兄妹开荒》；结合中国木刻协会（即抗战时期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活动，组织同学参加“鲁迅逝世十年纪念大会”，听了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茅盾、叶圣陶、许广平的演讲；组织同学到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先生墓；邀请文艺家许杰、戏剧家田汉、熊佛西来校讲演；发动同学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又一次听了郭沫若等著名人士的讲演。

参加进步活动的同学一次比一次增多了。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举行反内战示威大游行，欢送马叙伦等代表赴南京请愿时，“上海美专”同学闻讯列队赶上游行队伍，高举“上海美专反对内战”的大幅白布横幅标语，引起人们的瞩目，新闻记者争拍镜头。（夏子颐、吴平、朱瑚：《风雨战斗迎黎明：回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地下党的斗争》，《南京艺术学院史》，王秉舟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289页）

从一九四六年下学期起，美专党组织以上海美专学生互助会名义为学校 and 同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一时期，我们充分运用漫画、木刻、宣传画和活报剧等艺术手段作为有力战斗武器，积极开展创作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夏子颐木刻《闻一多》，贺鸣声木刻《心诉》，吴树之木刻《失业者》《流亡》，张怀江木刻《苦力》，葛克俭木刻《消息》《药》（木刻组画），曾景初木刻《检查》和校友麦秆木刻《放回来的爸爸》、陈沙兵漫画《美国佬滚出去》、沈开逸巨幅张贴漫画《巨拳猛击美国佬》等，以及许敦乐、汪志大（现名汪子豆）、顾生岳、陈力萍、戴铁朗、孙牧心、周富华、洪世清、郑光耀、庆宝华、蔡璜、丁洁因、方莉莉、沈韵鹃、史济利、邹启枚、陈曼生、陈延龄等许多同学精心制作的漫画、木刻都被随时磨印或复制油印成千百张传单随着示威、游行队伍散发、张贴。许多木刻佳作还参加了当年中国木刻协会举办的每年一届的全国木刻展和出国展，影响十分巨大，不少作品并先后为国内外美术馆收藏，成为历史的见证。

为了配合历次示威游行活动，同学们还根据不同的主题作了许多巨幅宣传画，自编自演活报剧，在校园里，在外滩，在南京路上和示威游行队伍行进的马路上、广场上，都显示了上海美专学生运用多种革命艺术形式为爱国民主运动作出贡献的才能。以孙牧心、杨艺生为骨干组成的上海美专进步话剧团，在一次演出中，杨艺生朗诵了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获得高度评价，在学生运动遇到阻力时，同学们每每从中受到鼓舞。又如一九四八年夏子颐、吴树之为“五四营火会”和“纪念五二〇周年”和“庆祝上海学联成立一周年大会”绘制的《争民主、争自由》巨型宣传画和夏子颐、吴树之、许敦乐三人合制的《反美扶日》的巨型宣传画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这幅三人合作的宣传画，用长达一百大张白报纸连接起来，可称当年学生运动中最大的一幅宣传画，给人印象深刻，鼓舞着数万参加大会的各校进步同学的斗志。同学们用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参加大会表演，绕场一周，前面走的是美帝

国主义战争贩子，后面跟着的是“四大家族”，捧着金纸糊成的饭碗向美帝乞讨。精彩的化装演出，把主奴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确实给群情激愤的同学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个节目的演出剧照后来还刊登在香港的进步刊物上）。

正是这样，一次次地刺痛了反动派的神经。在特务头子的策划下，一批批带着特殊身份的“学生”混进了学校。这批家伙并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成立了“北方同乡会”，妄图分化瓦解同学，和学生会分庭抗礼。一九四八年四月他们进一步撕下假面具，改“同乡会”为“上海美专戡乱建国委员会”，扬言要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当进步同学在校园里公开揭露“戡建会”的真面目、批判他们的反动行径时，特务分子因为理亏竟动手行凶，制造武斗，当即受到进步同学的严厉制裁。自从特务“学生”进校之后，开展进步活动便进入更加艰苦复杂的阶段，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经过严酷的斗争，但学生会在广大正义的同学支持下，巍然屹立，在不断向敌人的冲击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夏子颐、吴平、朱瑚：《风雨战斗迎黎明：回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地下党的斗争》，《南京艺术学院史》，王秉舟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290—292页）

◎六月初，茅盾由香港回到上海，住在山阴路大陆新村。木心跟随黄妙祥之子黄阿全前往茅盾家“叙旧”，茅盾以书相赠。

茅盾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见过面。但他不是我的远亲，我们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已。他有名气，但待人谦和，所以当时的文学青年都来拜访他，出了书都请他指教。我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抗日战争忽然胜利，我的宿疾竟也见疗，便去上海考进一家专科学校，在文艺界集会上见到茅盾先生，老了不少，身体还

好，似乎说仍住在山阴路。不久黄妙祥的独生子阿全自乌镇来，约我去沈雁冰家叙旧.....

似乎是夏天，初夏，一进茅盾的卧室兼书房，先入眼的是那床簇新的台湾席，他穿中式白绸短衫裤，黑皮拖鞋，很高兴的样子，端出 茶，巧克力，花旗蜜桔。（木心：《塔下读书处》，《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1—32页）

◎七月，民国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各科的成绩：

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各系组学生学业成绩操行等第总册
三年制专科西洋画系（孙牧心）

		平时	考试
理论	国文	80	80
	英文		90
	色彩学		78
	艺术概论		70
	平均分数		79.5
实习	素描	80	85
	平均分数		82.5
	学业总平均		87
	缺席		24
	操行等第		甲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美专档案 Q250-1：207～221）

本月，茅盾委托夫人孔德沚代表自己回乌镇祭奠亡母，得知抗战期间家里的藏书被三叔沈叔庄藏到了

夹墙里，几年下来线装书都已霉烂，只剩下少许洋装书。

回到上海之后，我们就打算回乌镇一趟，在母亲坟前烧一箩黄表、锡箔，献上一只花圈。然而我一直抽不出身来。拖到七月，决定让德沚一人先去。四五天后德沚回来了，带来了两箱已长霉点的洋装书。……又告诉我，后院三间平房内的家具已荡然无存，都被三叔（沈叔庄）变卖了。这两箱书是从夹墙里取出来的。母亲去世后，三叔发现家里有那么多书，就害怕起来，耽心里面有抗日的内容，而这种书又不能卖，只好藏到夹墙里。几年下来，线装书都霉烂了，只剩下这些外国的洋装书。[茅盾：《抗战胜利后的奔波》，《我走过的道路》（下），茅盾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417—418页]

◎十月十九日下午，参加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等十二个文化团体于辣斐大戏院（后改名长城电影院，已拆除）联合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此次集会鲁迅逝世十年来上海举行的第一次正式的也是最隆重的纪念活动，名流云集，计有周恩来、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柳亚子、沈钧儒、许广平、马叙伦、邓初民、夏衍、冯乃超、于伶、丁聪、袁鹰等。作家袁鹰对此有回忆，可见当时会场的气氛和青年们的感受：

会场并不大，大约也就是六七百座位吧，早早就坐满了。文化界以外，更多的是青年学生、教师、职工。这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年来第一次正式地、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十年前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悼唁活动和起灵送去虹桥路万国公墓的长长队伍，也还记得队伍前面那幅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大旗。多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赶上那个悲壮的场面，今天能有机会参加纪念大会，是既感到幸运也感到兴奋的。

舞台后方悬挂了巨幅的鲁迅木刻像，最突出的是两道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那是中华木刻协会的画家们，主要由丁聪、沈同衡、麦秆等几位集体创作——他们参考叶浅予前几年在香港进步文化界纪念鲁迅时画的一幅像，放大到一大幅白布上，日夜赶制，汗水和墨汁一起挥洒，在十九日大会举行前完成，使每个到会的人，一进场就迎来那两道剑似的横眉，也会立即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那句诗。（袁鹰：《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假如鲁迅活着》，陈明远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207页）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与夏子颐、王伯敏等冒险前往万国公墓瞻仰鲁迅墓。

按：夏子颐（一九一八～二〇〇〇），字贤洛，别名立如。浙江温州人。一九四二年二月转入上海美专求学。一九四八年任浙南游击纵队宣传队长。先后参加“战时永嘉木刻通讯社”“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和“木刻研究会”等美术社团的活动。一九五〇年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曾任附中校长、版画系讲师，一九八三年任浙江美术学院师范系主任、副教授。夏子颐乃夏承焘侄子，上海美专求学时期，与木心交往甚密。

王伯敏（一九二四～二〇一三），别名柏闽，笔名田宿繁，斋号半唐斋。浙江台州人。一九四六年六月插入上海美专西画系学习，一九四七年七月毕业。历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博士生导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主编有《中国美术通史》等。上海美专求学时期，王伯敏与木心关系密切，曾一起与夏承焘相往还，王伯敏的笔名田宿繁亦是木心所取：

我的笔名，一度用过“田宿繁”，这是同学孙牧心给我起的。当时，民主运动高涨，白色恐怖。他知道我买了不少进步书籍，出于好心，将我所买的进步图书，只要有“王伯敏”签名的，——添加笔画。如“王”，两旁加两竖，即成“田”；又“伯”字，上加宝盖

头，即成“宿”；又“敏”字，上加草字头，下加“系”，即成“繫”。同学们无不以为妙。这位姓孙的同学，是浙江桐乡乌镇人，穿着整齐，喜欢读尼采的诗，有点才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又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民主运动，声言要做个无党无派的革命者。有的同学说他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他不以为然。他宣扬“世界上只有善、恶，美、丑，光明、黑暗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区别”。而今这位同学出国了，我与他在上海美专分别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王伯敏：《上海求学》，《王伯敏美术史研究文汇（第3编）》，中国美术学院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79页]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我们男女同学事先约好，三三两两分头去上海郊区的万国公墓，瞻仰鲁迅先生。当时白色恐怖，大家的行动，无不小心翼翼。临出发时，年长一点的同学夏子颐（当时是地下党员）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盯梢的人，如果在中途甩不了可疑的盯梢特务，宁可回校，装作没事，千万不能再前往。”幸好这天没事，大约十时许，大家陆续到齐了。

在墓前，我们向鲁迅像行三鞠躬礼，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那时，鲁迅墓没有怎么特别的营建，简单而朴实。墓地鸦雀无声，也没有别的来人。墓地长满了青草。一位有心的女同学，事先做了三朵纸花，从袋中取出，插在墓前，一下子，使这座伟人的墓显得更有光彩了。我们大家都很严肃，心情也很沉痛。因为抗日战争刚结束，国民党又在发起内战，这，教人如何不愤怒，又教人如何不心伤。有一位女同学竟悲伤到哭泣了。

.....

老照片中的十二位青年自左至右是：王伯敏，张小泯，方莉莉，葛克俭，丁洁因，汪伦英，林晓丹，孙牧心，陈沙兵，冯方晖，夏子颐，郑奇丙。[王伯敏：《瞻仰鲁迅墓》，《老照片（第三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105页]

◎民国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各科的成绩：

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各系组学生学业成绩操行等第总册

三年制西洋画系（孙牧心）

		平时	考试
理 论	国文	78	90
	英文	75	70
	透视学	80	80
	平均分数		77.2
实 习	素描	90	
	水彩	80	90
	平均分数		87.5
	学业总平均		82.35
	缺席		4.5
	操行等第		乙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美专档案 Q250-1：207～221）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二十一岁

◎四月五日，在杭州拜访夏承焘，获赠夏承焘所作词两阙。午后，与夏承焘、夏子颐、郑德涵游览栖霞岭上的紫云洞。

按：郑德涵（一九一八～二〇〇〇），字君量，号廬庐、查庵、颐一老人。浙江平阳人。毕生在安吉县第三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在诗词书画印上均有建树，著有《廬庐词剩甲稿》。

四月五日，……以今早所写二词赠牧心，念缩小题目能提高文字之理，思为一小文说制题。……午后，与牧心、子颐、君量游紫云洞，不到十年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一九四七年》，《夏承焘集》第六册，夏承焘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686—687页）

◎四月六日，再到夏承焘家中，夏与之讲庄子和佛学。不久回上海，与夏承焘保持书信联系。

四月六日，……牧心来，与讲庄子游于不得退而皆存及佛家悲智双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一九四七年》，《夏承焘集》第六册，夏承焘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687页）

六月三日，……发王伯敏、孙牧心上海信，问贤洛安否。（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一九四七年》，《夏承焘集》第六册，夏承焘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699页）

◎五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爆发。此时作为上海美专学生会骨干的木心因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一次为逃避特务追捕，跳窗时跌伤脚踝。

牧心在上海美专，曾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并担任了上海美专学生会副主席，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有一次他为了逃避特务追捕，跳窗跌伤脚踝。（沈 罗凡《怀念牧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七月， 民国三十五年度第二学期各科的成绩：

三十五年度第二学期各科组学生操行成绩总册

三年制西洋画系（孙牧心）

		平时	考试
理论	国文	90	80
	英文	68	70
	解剖学	75	
	透视学	82	75
	平均分数	77.50	
实习	人体	87	89
	水彩	82	80
	缺席	34	
	操守等第	甲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美专档案 Q250-1：207～221）

◎八月，在杭州过暑假。多次往谒夏承焘，与之谈词论艺。

丁亥（一九四七年）八月，予归西泠孤山。晨夕清凉，每诣罗苑，与瞿禅先生叙词事。夏丈自释其“浑脱旋如风，眼波无处逢”之句，意指二次国共谈判可堪制泪，看天已“伶俜十年”者，亦感证时势，而非儿女伤心语焉。浮光世事，草草劳劳，荏苒四十年，夫子自道，声犹在耳。（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十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45页）

其间结识杭州艺专学生席德进、潘其銮。

按：席德进（一九二三～一九八一），四川南部县人。五岁习画，十七岁进入成都省立艺专，后转入国立杭州艺专西画系，师从林风眠。一九四八年毕业，同年前往台湾，任教于省立嘉义中学。一九五二年以后以绘画为业，一九六二年赴美国参观考察艺术，又遍游英、法、意、德及西班牙诸国。后于巴黎从事绘画创作和研究三年。一九六六年返台，曾任淡江文理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台湾“中国美术协会”理事。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在台北病逝。木心与席德进的交往可参考《此岸的克利斯朵夫》一文，见于《温莎墓园日记》。

潘其銮（一九二八～二〇一六），生于福州，一九四七年考入杭州艺专，为林风眠画室学生，一九五〇年学校批判“新派画小集团”时被迫退学。一九八一年定居美国，在加州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六年，获得雕刻和陶瓷双硕士学位。曾任教该学院雕塑系。

木心与潘其銮的相识，有点惺惺相惜。暑假，潘其銮一个人搬到教室里住，每晚可听到大礼堂里的钢琴声，十分惊奇，怎么会有个音乐家在这里？后来知道是孙牧心在弹，弹得很好，潘其銮就站在外面偷听。那时候潘其銮的水彩画画得很扎眼，每天在草地上画时，孙牧心也悄悄地来看潘其銮。接触了一段时间，孙牧心拼命地跟潘其銮谈文学，互相之间沟通很好，觉得潘其銮才

华出众，值得做朋友。（徐宗 帅：《林风眠与木心背后的潘其璠》，见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

◎民国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各科的成绩：

三年制西洋画组一年乙级学业成绩及操行名次缺席记

分名册一览表（孙牧心）

		平时	考试	平均
理 论	国文	80	70	75
	英文	60	80	68
	解剖学	72	78	75
	美术史	96	92	94.4
	平均分数	78.1		
实 习	水彩实习	85	90	87
	人体实习	92.4	90	91.44
	平均分数			89.22
	学业总平均	83.66	90	80
	缺席	20.5	90	80
	操行等第	乙上	90	80
	名次	73.41	90	80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美专档案 Q250-1：207～221）

◎在上海求学期间因患有肺结核时常咯血，曾寄宿于一位女同学家中，历时一年半。

木心的手帕时见血丝，午后伴有低温；他又懒得去南京路“抛球场”找邬医生拍个片子（一位世交的肺科放射专家），他一味盯上美专会客厅大镜框里装着的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以分散注意，“后来注射了一些盘尼西林，症状才得以缓解”。为方便去学校，他寄宿于那位日后一道参军的女同学家中。坐落于现今陕西南路、建国路北端，坐东朝西有三条一式一样的弄堂，是现今原样保存的步高里，中间一进十五号便是木心在上海的养病处，历时一年半。这户人家经营某种“暗行生意”，木心被当作“选帝侯”般款待照料，但是他自有一套防身保护自己的绝招。在木心起居的亭子间写字台上，永远摊开一封某女士写来的情书，数日一换。（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3页）

◎是年前后，喜欢读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作品。

一九四七年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气氛，颇似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那一段。那时我喜欢读的已不是高尔基，是安德烈耶夫。（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59页）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二十二岁

◎六月五日，数十名便衣特务制造了震惊上海的上海美专“六五血案”，大批学生受伤，学生会主要骨干吴树之等八人被殴成重伤并先后遭逮捕入狱。夏子颐因在交通大学参加上海学联紧急会议幸免于难。上海美专党小组积极营救被捕学生，木心亦参与其中。

美专党小组全力以赴，开展了一场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首先，争取了刘海粟校长的支持和同情，并电告在杭州养病的副校长谢海燕。谢先生及时赶回，与流亡在外的进步同学取得联系，并由夏子颐和施达德起草了“上海美专‘六五’流血惨案真相——敬告师长、家长、校友、同学控诉书”，以学生会名义，大量散发，呼吁社会各界伸张正义，抗议政治迫害。同时，组织流亡在外的进步力量，会同学生会主席周富华、上海学生会副主席沈开逸、上届学生会秘书长许敦乐、学生会骨干孙牧心、史济利、庄宝华、施达德、周育洛、任意以及进步同学丁洁因、方莉莉（现名方里）、沈韵鹃（沈平苑）、何无奇、杜若、朱瑚、包玉筠、余竹君、刘佐尹、林晓丹、叶芳、陈曼生、杨艺生、汪志大（现名汪子豆）、戴铁朗、晁玉麟、吴建华、陆华平等，分别拜访著名律师史良、民主人士马叙伦、上海市商会主席等社会名流，呼吁营救被捕同学。校长刘海粟、副校长谢海燕、教务长宋寿昌及王挺琦、洪青等五位教授也挺身而出，联袂探牢，慰问被捕同学。刘海粟校长还亲自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提出口头抗议。在北京的同学王伯敏、在温州的同学葛克俭等都纷纷以校友、同学名义响应声援营救工作。分散到各地的许多同学也多方募集慰问

金，不断为被捕同学输送营养品。当时，夏子颐、周富华、沈开逸都是反动派追捕的重点对象，他们时时转移隐蔽地点，依靠孙牧心、何无奇、周育洛、庄宝华、方莉莉、陆华平、吴建华从中联络，进行工作，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小组负责人还多次派周育洛冒着风险潜入校内进行侦察和了解情况，肩负着地下交通的秘密任务。此外还把不断征集到的营养品，包着报纸，夹上字条，由同学轮流送给蒙难同学，以互通消息，互相鼓舞斗志，并将他们的血衣带出监狱保存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上海学生运动实物史料展出）。（夏子颐、吴平、朱瑚：《风雨战斗迎黎明：回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地下党的斗争》，《南京艺术学院史》，王秉舟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293—294页）

◎七月，被上海美专开除，从该校肄业。

按：有关木心从上海美专肄业的时间，存在多种说法：

一、据自制年表一，结束上海美专学习生涯的时间为本年夏。

二、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说是“一九四八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非毕业，应是肄业。

三、据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京艺术学院为木心开具的《学历证明书》中说木心“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我院前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三年制西洋画系肄业”。

四、查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美专档案，“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学生成绩总册”中有“孙牧心”名字，成绩中只有“缺席”一栏得二十五分，其他成绩均无。名字边上有手写标注“已令退学”，本学期退学的同学还有李敏、沈开逸、夏子颐。（上海档案馆藏上海美专档案Q250- 1：207～221）

综合以上资料，将木心从上海美专肄业的时间下限定在一九四八年七月。

关于木心从上海美专退学的原因，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的说法是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

二十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此间前往杭州，在杭州艺专附读。

按：据木心提供给周乾康的简历中说，“后就学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夏葆元称为是“半路插班”“转学”。其实是因与潘其銮认识，住到了杭州艺专，并在此附读。

杭州艺专有个特点，只要有一个同学在校就读，就可以带人来住，学校是不管的，只要给食堂交上伙食费，就可以在里面吃饭。孙牧心就是凭与潘其銮认识，住到了杭州艺专，俨然成了杭州艺专的“学生”。（徐宗帅：《林风眠与木心背后的潘其銮》，见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

◎九月，到台湾。（按：据自制年表一，本年秋在台湾。据自制年表二显示是九月“到台湾”）在台期间的身份是台南糖业中学美术教师。期间偶遇在嘉义中学教书的席德进。去了阿里山，作诗《阿里山之夜》。在台期间与潘其銮有书信往来。

按：关于此次台湾之行的动机有“写生”和“秘密工作”两种不同的说法：

木心钟情于塞尚，曾去台湾嘉义写生了一批塞尚风格的台南风光。（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2页）

上海地下党派牧心去台湾完成一秘密工作，以台南糖业中学美术老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沈罗凡《怀念牧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是年前后，陈士文打算赞助木心前往法国留学，因时局剧变未走成。

我的美术学校的指导老师C教授（按：即陈士文），他曾留法十年，赞助我去巴黎，可是时局剧变，我来不及走了。（木心答、童明问：《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18页）

一九四九年二十三岁

◎是年初，因母亲来信催促，遂返回大陆，住在杭州金沙港。

按：据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初“回杭州”。自制年表一则显示本年初在杭州金沙港。另，沈罗凡说是“一九四八年春回沪”，有误。（沈罗凡《怀念牧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与浙东游击纵队杭州联络站负责人之一的叶文西等成立“杭州绘画研究社”，叶文西任社长，木心任副社长。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

按：据木心提供给周乾康的简历及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实际应是副社长。

叶文西（一九二五～二〇一四），河北保定人。一九四七年毕业于杭州艺专。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编审，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一九四九年春节后，我的少年好友、“杭州绘画研究社”的副社长孙牧心同志，来信促我速去杭，有事相商。我叩别了年近古稀的老父，赶赴杭州。从城站乘公共汽车到岳庙下车，快步走向金沙港，眼前一座白色三楼小别墅……原主人早去香港，现在却是杭州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对外是一个业余艺术团体：杭州绘画研究社。我……迅速走进右面一间小房间，这是孙牧心同志的卧室。只见他正和一个穿淡灰色派力司长袍，圆圆的脸，不

长的身段的青年低声谈话。他看见了我高兴地说：“想不到你这样快就到，老伯（沈罗凡父亲沈铨，字远孚）同意吗？”他感叹地说：“老伯怎舍得你离开他。”看我手里拎着两簋篮三珍斋酱鸡，笑着对那个青年说：“今天你可以尝到我家乡的名肴了。”又赶紧替我介绍：“这就是叶文西同志。”我紧握着叶的手说：“牧心早和我说过你了。你们办的《泡沫》，我也看过。你写的小说《夏衣》，主角罗干就是牧心吧！”这是我和叶文西同志的初次会晤。这天傍晚，……我们两人……沿着湖畔散步，牧心边走边告诉我：“关鹏同志明天到杭州治病，要住一个星期，你陪伴他，要照顾好他，为了安全，你俩可以住到清泰街我家去。”关鹏同志，一九四八年我曾在艺专见过他一面，我知道他是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负责文化工作的，……由于我在杭有几家亲友，街道也熟悉，还挂着浙大旁听生之名，干掩护是比较合适的。我就一口答应了牧心的要求。实际上关鹏同志这次来杭，主要是动员艺专学生去浙东搞文艺工作。我非常关心他的生活起居。陪他去医院治病，更注意他的安全……一周后，关鹏同志由我送他到钱塘江边。之后，我就住在金沙港这所别墅里。我关心这所别墅，关心这所别墅的每一个同志。尤其是关心孙牧心和叶文西同志。……常来之客有艺专学生会主席王泰生同志、常委范才根同志，……他是艺专地下党负责人之一。

为了迎接解放，绘画研究社的主要任务，是绘制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这在黎明前敌人更猖狂时是很危险的。我日夜警惕着画社周围的动态。……也常去“平湖秋月”附近浙大宿舍夏瞿禅（承焘）教授家，主要是受叶文西之托送去一些秘密书稿。……夏教授谈古论今，逸趣横生，我常乐而忘返。（沈罗凡《怀念牧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春，迫于生计，应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省立杭高”）之聘，在该校担任图画教员。待遇可

观，出入从众，深受学生爱戴。同事有董秋芳、许钦文、孙用、宋清如等。

己丑（一九四九）春，余导学武林贡院，登坛敷说，出入从众，羡优孟优旃之犹得寓言。余则沧浪清浊不及纓足，雪夜闭户，守灯咕嚅：

此心耿耿欲何之，谢家屐痕懒寻思。

钱塘有潮不闻声，雷锋无塔何题诗。

大我小我皆是我，文痴武痴一样痴。

龙吟虎啸草堂外，骚人冷暖各自知。

（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1页）

按：“省立杭高”位于杭州贡院旧址，所谓“武林贡院”即指“省立杭高”。

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当地简称“杭高”，校风严正克实，师资都是大学教授水准，校舍是科举时代的“贡院”，昔者试士之所以曰贡院，府州县学生员之学行俱优者，有副贡拔贡优贡岁贡等名，经贡院试乃升入太学。而我在这里任教，纯为生计所迫，不意莘莘学子间，颇有矢志追随者，我想，艺术的道路需要有同行的伙伴，与其默等“朋友”的出现，不如亲手来制造“朋友”。

我的年龄是二十刚出头，他们则还不到二十岁。

人生，可说是乍开门，下台阶，还未踏上路。（木心：《同情中断录》，《同情中断录》，木心著，台北：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208—209页）

◎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不久木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随军南下温州，在军政治部文化部任干事，从事宣传工作。

按：据画家徐昌铭回忆，解放初他领导的配合宣传的美术小组中有一个不声不响、埋头工作而艺术不凡的青年就是木心。

徐昌铭（一九二九～二〇一八），乌镇人，少年时求学于乌镇植材小学，十六岁辍学，前往上海某丝织厂学艺。长期从事美术设计工作，于装饰画、漫画均有建树，尤以写意动物画知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系国家一级美术师。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孙牧心同志随廿一军南下温州，在军政治部文化部任干事。（沈罗凡《怀念孙木心》，转引自周乾康《木心的少年伙伴沈罗凡》，未刊稿）

“六五”事件斗争胜利了，被捕同学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了，革命意志更加坚决了。正如卢汉华说的：“监狱是我们的政治学校。”出狱后吴树之、李凌云、陈力萍、卢汉华四人立即投奔浙东纵队去了，刘鸣也经香港进入广东东江游击纵队入伍。在他们的影响下，林克松、丁洁因、刘佐平、陆华平、吴健华、冯炎、白衍等同学也相继进入浙东游击纵队参军，在武装斗争中，他们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姚白痕、孙牧心、方莉莉、周富华、谷一新等，亦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夏子颐、吴平、朱瑚：《风雨战斗迎黎明：回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地下党的斗争》，《南京艺术学院史》，王秉舟主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295页）

他在解放部队中做宣传，因自小患上结核，一边喋血，一边坚持扭秧歌打腰鼓，热情不亚于任何先进的时代青年。为获取这份资料，我访问了当年与他一道参军的艺专女生，木心对于这位暗恋他的妙龄女孩置若罔闻，一心革命！关于木心的不近女色传说纷纭似有隐情。（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2页）

◎七月，因病退伍，回到杭州养病。正值暑假，因病得闲，闭门重读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木心从军，在部队做宣传，绘制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的巨幅肖像。此时，死亡暗影重起——他开始咯血，大量地咯——以至于黄军装的前襟沾了一大片血迹，血仍不停地涌出来，秧歌还是照常不停地扭。木心与死神相对抗，自暴自弃地不断扭动身躯，任由血洒遍地，终于博得部队领导的同情而给予特批退伍……（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4页）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下半年仍回“省立杭高”任教，住在皮市巷。

按：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初至八月底在“省立杭高”任职。其中自制年表二显示一九五〇年全年在杭州皮市巷。

期间作有旧体诗《贡院秋思》：

黄石桥边水波寒，鱼父看厌敬亭山。

羞将俚歌道哀乐，惭有闲情逐鸥雁。

遗袜惹来人济济，挂剑飘去影冉冉。

回看社庙斜阳里，金人肩头噪暮蝉。

一九五〇年 二十四岁

◎八月底，从“省立杭高”辞职，上莫干山，一直待到十二月。在莫干山期间一心读书、写作、画画。

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

“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当时我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按：即“省立杭高”）执教，待遇相当不错，免费住的房间很大，后门一开就是游泳池。学生爱戴我，其中的精英分子真诚热情。初解放能得到这份位置，是好的，但这就是“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换作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我雇人挑了书、电唱机、画画工具，走上莫干山。那时上山没有公车的。

头几天还新鲜，后来就关起来读书写书。书桌上贴着字条，是福楼拜说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

长期写下去，很多现在的观点，都是那时形成的。（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77页）

住在近剑池处父亲孙德润留下的别墅里。在此写出三篇论文《哈姆莱特泛论》《伊卡洛斯诠释》《奥菲司精义》：

是我在寂寞。夏季八月来的，借词养病，求的是清闲，喜悦这以山为名的诸般景色。此等私念，对亲友也说不出口，便道：去莫干山疗养，心脏病。于是纷纷同意，我脱身了。

八月，九月，十月。读与写之余，漫步山间。……那时，战后的莫干山尚未通电……莫干山半腰，近剑池有幢石头房子，是先父的别墅。战争年代谁来避暑？避暑和避难完全两回事。房子里有家具，托某姓山民看管，看管费以米计算，给的却是钱。我在他家三餐寄食，另付搭伙之资——刚到的一个星期左右，我随身带来的牛肉汁、花生酱，动也没有动。他家的菜肴真不错。山气清新，胃欲亢盛，粗粒子米粉加酱油蒸出来的猪肉，简直迷人。……我在莫干山也写这些东西，三篇：《哈姆莱特泛论》《伊卡洛斯诠释》《奥菲司精义》。……（木心：《竹秀》，《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1—23页）

在莫干山期间，研读福楼拜、尼采的著作，并接受福楼拜的艺术观和艺术方法：

一九五〇年，我二十三岁（按：应是周岁），正式投到福楼拜门下。之前，读过他全部小说，还不够自称为他的学生——被称为老师不容易，能称为学生也不容易——（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76页）

我接受福楼拜的艺术观、艺术方法，是在二十三岁（按：应是周岁）。当时已厌倦罗曼·罗兰。一看福楼拜，心想：舅舅来了。我到莫干山时，读的是福楼拜、尼采，由挑夫挑上山。（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72页）

我曾模仿塞尚十年，和纪德交往二十年，信服尼采三十年，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多年。凭这点死心塌地，我慢慢建立了自

己。（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88页）

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46页）

我与尼采的关系，像庄周与蝴蝶的关系。他是我精神上的情人。现在这情人老了。正好五十年。（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97—798页）

◎是年深秋，首次到杭州玉泉林风眠家中拜访。

按：林风眠（一九〇〇～一九九一），广东梅县人。画家、美术教育家。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巴黎第戎美术学院、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专习油画。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校长。一九二八年创办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授、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顾问，上海美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晚年去香港，并逝世于香港。著有《中国绘画新论》《东西艺术的前途》等。

一九五〇年秋天，记得西湖白堤的群柳黄叶纷飞，那么是深秋，第一次作为林家的客人，后来知道林先生也是寂寞的，后来又知道几个年轻人常去探望他，他不致太寂寞——近玉泉了，灰色围墙，里面的院落颇宽敞，居中一幢法国式的二层别墅，也是浅灰的，四周果木扶疏，都落叶了，说是林先生当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时建造的，楼下正房是客厅，很大似的，四壁立满图书唱片，坐具是几个茶褐色丝绒的蒲团，空旷有点荒凉……我又想假如不荒凉倒不对了，这时我已踏上楼梯，十九世纪戈蒂叶他们去见雨果，也难免是此种心情，最好楼梯长得走不完，将面晤一位

深深崇敬的师尊，不怕问，不愁考试，只着急于怎样才能让他明悉我的真诚，我当时的感觉可以形容为“绝望”。这是首次，也是末次，林先生不会看重我，我也不会再来。

中等身材，深褐色皮鞋，爱因斯坦也爱穿这种圆头厚底的，隐格花呢宽裤，灰米黄粗绒线高领套衫，十分疏松，脸上布满笑容，所以看不清楚，只觉得颜肤光润气色极佳，头戴法兰西小帽，也深褐。另外，一只烟斗——林风眠。（木心：《双重悲悼》，《同情中断录》，木心著，台北：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30—131页）

木心曾谈起自己和林风眠的师生关系：

我和林风眠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我们很谈得来，他喜欢我，我在绘画风格上受他的影响。（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中所引木心的话，《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林风眠先生有一时期画风时露抽象风调，我托人传言：“何不进入纯抽象？”后来晤面时，先生说：“我只画自己懂的东西，不懂的东西画不来。这样吧，你写一篇‘论纯抽象’，我要是懂了，就一定要画画看。”我深感师生行谊恳切，满口答允照办，起稿未竟，风暴陡起，此愿终未了也。[木心遗稿，转引自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

（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40页]

◎年底，木心偕母亲沈珍及外甥女王剑芬迁往上海，借住在世交王松生家中。王济诚则带着沈珍资助的一千块钱，带着其余的家人在杭州与人合开了一家纸店。

一九五一年 二十五岁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一月至八月在上海江湾。此间闯荡谋生，做过医学挂图、舞台布景、临时代课等临时性工作。

一九五一年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的辍学，有的辞职，都从杭州转到上海了，在当时，诚是古怪行径，由于受不了那些集体主义的“规章”“制度”，甘愿流浪谋生，以为上海不同于杭州，或者还可以容许我们闯荡。

.....一心去打工，医学挂图、舞台布景、临时代课，有什么做什么，市内房租贵，借宿在郊外，吃路边摊，自备胡椒粉也算是一种阔气。（木心：《双重悲悼》，《同情中断录》，木心著，台北：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34—135页）

在上海高桥的时候，我做过音乐老师，小学，真的有一架钢琴，不大的，每次上课搬来搬去，教完课，拿工资，一叠子钱，我心里高兴了，心想这下又有一段时间可以不打工了.....（曹立伟：《木心片断追记》，《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80页）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从本年秋起在上海浦东高桥育民中学工作。先在教导处任职员。

按：上海市育民中学始创于一九四七年，创办人为江苏武进人施燮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施燮华一直担任着这所学

校的校长，而这期间的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间，木心亦在此工作，度过了他的五年中学教师生涯。

该校创办之初的校名是“私立四维中学”，含“四人维持”办校之意（四人指施燮华、黄振极、刘导源、陆君翼），同时又符合当时蒋介石所倡导的“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之说，一语双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四维”之名已不合时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校名更改为上海市私立育民中学。没过几年，学校改由上海市教育局接办，性质由私立变公立，校名遂又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变更为上海市育民初级中学。两年后因蓬莱中学有高中六个班并入，从此成为完全中学，才又改作了今名——上海市育民中学（下文简称育民中学）。学校创办之时，位于高桥镇西浜头，由于校舍简陋，地处偏僻，一九四九年迁至西街承园，即现在的育民中学所在地，今为西街二一七号。

◎是年，作旧诗一首：

春申浦东一江之隔，无十里粉场之尘嚣，有五柳晋贤之岑寂。赁屋于遗老，剪韭于新圃。以俗还俗，浑忘秦汉：

水乡萋萋野云低，荳花香残燕子肥。

一从以酒代药后，三春无梦倒也奇。

此辛卯（一九五一年）旧吟，去今卅余年。海外孤露，自赎平安，月白风清，每难自禁。回首于不堪回首者。（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5页）

◎是年，王济诚关闭了杭州的纸店，举家迁往湖州，与人合作开办了新华纸店。木心曾偕母亲沈珍到湖州看望姐姐一家，并亲手设计了纸店店招。

一九五二年 二十六岁

◎是年，育民中学因规模扩大，需新聘美术和音乐教师各一名。木心闻讯向校方提出，可由他一人同时担任这两门课的教学，而把自己的教导处职员一职让给王济诚。王济诚一家遂从湖州迁居高桥，顺便照顾体弱多病的岳母沈珍。

按：王济诚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在育民中学任教导处职员，此后调到凌桥中学工作。王敬钊编《上海市育民中学校史（一九四七～一九八二）》将王济诚离开育民中学的时间误作一九七三年。

在该校任教期间木心受到学生的喜爱和敬重，曾将自己的一架钢琴租给学校，每月得租金三十元。有诗《小镇上的艺术家》述及这一段生涯：

国庆节下午

天气晴正

上午游行过了

黄浦江对岸

小镇中学教师

二十四岁，什么也不是

满腔十九世纪

福楼拜为师
雷珈米尔夫人为友
我好比笼中鸟
没有天空
可也没有翅膀
看样子是定局了
巴黎的盘子洗不成了
奋斗、受苦，我也怕
先找个人爱爱吧
人是有的
马马虎虎不算数
夜来风吹墙角
艾格顿荒原
哈代，哈代呀
看样子是就这样下去了
平日里什么乐子也没有
除非在街上吃碗馄饨
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有时，波德莱尔
真不如一碗馄饨

◎此间和家人租住在沈家大院，房东为诗人沈轶刘，木心与沈轶刘彼此敬重。

按：沈轶刘（一八九八～一九九三），名桢。上海浦东高桥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长期从事报刊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参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诗韵》等书的编辑。著有《繁霜榭诗词集》《八闽风土记》等。

舅舅和我们一家一起居住在上海浦东高桥镇的一座临河的大院里。舅舅住在河边一栋二层楼的楼上，我们一家住在楼旁一间厢房里。走进舅舅的房间，就像进入艺术的天堂。门窗的边框都用纸糊着（像现在的壁纸似的），一个又粗又大的画框占满了一面墙，另一面墙上挂着《蒙娜丽莎》的画像。靠窗一个写字台，台上铺满了纸，放着各种画笔、颜料和画具等。两把藤椅中间是一个石墩，石墩上放一块方方正正厚厚的黑石板当茶几，上面是贝多芬的石膏像，还有很好看的茶具和烟缸。床边一个像钢琴似的小书架，上面摆了几本精装书，床头桌子也用白纸包着，上面放着一盏古典西式的台灯和类似古埃及的艺术品。窗下是一条小河，河中时有船摇过，对岸是大片芦苇、青草和树木。放眼望去，远处是一片宽广的田野，春夏季节油菜花一片金黄，秋冬则是一顷碧绿的麦田，更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几间小屋隐约其间。白天常能听到蝉轻唱，晚上常能听到青蛙低吟。（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3页）

房东是夏承焘先生的朋友，当时八十岁左右的沈轶刘老先生（现列为上海名人），他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清末秀才，隐居诗人，民国时期曾任福建省省长的文秘，酷爱唐诗，常见他边吟诗边锄地种菜，后出版有施蛰存为其作序的《繁霜榭诗词集》等书。（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4页）

此一时期木心与李梦熊、潘其銮等来往频繁，李梦熊与潘其銮常到木心家里小住。

按：李梦熊（一九二五～二〇〇一），云南大理鹤庆人。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声乐教练、兰州艺术学院声乐教授等职。为人卓尔不群，常有惊世骇俗之见。

青春年代，经历一阵阵受之无愧的凄苦。有一次，他到乡间来避难，发高烧、大汗、昏睡几天才自己开口要喝水，喝了水，说：我来的时候，路两旁油菜花，黄、大片的油菜花，黄得好狠心。

病稍愈，他要画画，作立方体主义的分析试验。（木心：《那是往事》，转引自徐宗帅《林风眠与木心背后的潘其銮》，见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

寒暑假会有学生自杭州来上海家中小住。

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浦东高桥教书，寒暑假总有杭州来的学生住我家，伙食包在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娘阴一套阳一套，我们吃足了亏，我就说，这是饭馆里的麦克白夫人。大家哗然大笑——（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93页）

◎在高桥教书期间读完西欧作品，有些还重温了一遍。

五六年间就把西欧的作品都读完了，有的已经是重温了。

（匡文兵记录：《晚年木心先生谈话录》，《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68页）

一九五六年 三十岁

◎上半年，仍在育民中学任教。

七月九日，……夕与妇往胜利剧院看上海芳华剧团演宝玉与黛玉，遇桐乡王剑芬，谓孙牧心乃其母舅，近在上海高桥育民中学任教。（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三〕·一九五六年》，《夏承焘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541页）

◎七月，首次蒙冤入狱。在被逮捕时戴上了手铐，还被搜查了房间。关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关押期间被安排在监狱内分发图书。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月终结育民中学教职。

按：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又称思南路看守所，一九五三年五月建，位于思南路。初称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劳改处第二看守所。一九五六年在押犯人三百余人。（麦林华主编：《上海监狱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一九五六年我被迫害，死去活来，事后在钢琴上弹贝多芬，突然懂了，不仅懂了，而且奇怪贝多芬的遭遇和我完全不同，何以他的悲痛与我如此共鸣？（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94页）

◎被囚禁期间，母亲沈珍去世，时年不足六十岁。

按：沈珍遗体火化后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高桥家中，二〇一一年木心委托代威到上海高桥王奕家中将骨灰盒带回乌镇，同年四月葬于乌镇。

◎十二月，囚禁半年后出狱，得口头“平反”。

◎是年，作诗《思绝》：

小屋如舟衾似沙，灵芝劫尽枕芦花。

杜宇声声归何处，群玉山头第一家。

一九五七年 三十一岁

◎是年，进入上海美术模型厂工作。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主要从事展览会的设计。工作地点在浦西，每隔两周或节假日则回浦东与家人欢聚，期间常给外甥和学生讲中外文学和音乐。

按：上海美术模型厂，全称为地方国营上海美术模型厂，属上海手工业局。原址在上海市石门二路二六六弄十三号。业务项目有：美术设计、展览布置、各类模型、产品造型、装潢设计、绘画招贴、制版画稿、雕塑造型、时装模型、艺术灯彩。上海美术模型厂后改名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

五十年代初（按：应是一九五六年）的“跳海壮举”之后，木心为维持生计混了一段“自由职业”的生涯，除了已知的在高桥中学（按：应是高桥育民中学）担任代课老师外，又凭手艺到上海接了些设计活儿，形同现今的“创意设计达人”一样懒惰地工作着。至一九五八年随着“大跃进”形势跑“总路线”，木心被收编归队，在手工业局底下一个叫“上海美术模型厂”里当一名美工（此为类似合作社形式的自负盈亏单位）。按先生的才具，并非不能进一家更像样的单位，但是习惯隐忍的他认为这个不惹人注意的所在更为安全。（夏 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4页）

舅舅在浦西工作。连续数年，每隔两周或节假日，衣着典雅、神气而儒雅的舅舅就会与我们一家欢聚（有时会带几个学生），给我买好玩的玩具（像会翻筋斗的孙悟空、电动小汽车）

等。每次回来，午饭后，我们兄弟姐妹及他的学生数人就围在他周围，在我们的厢房里连续几小时听他风趣幽默地讲解陶渊明、苏东坡、王安石、《古文观止》等中国古代文学大家的诗词文章，及巴尔扎克、杰克·伦敦等西方文学大家的经典名著（如同他在美国讲文学史一般）。另外，舅舅还给我们讲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教我们唱他谱曲的宋词（至今我能唱其中两首），他还用宋词翻唱俄罗斯歌曲。悠扬的歌声、阵阵欢声笑语，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欢乐。那时我虽然年幼，半懂不懂，却也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浸泡在美好的文学艺术中，总是期待周日的到来。

春夏时节，饭后舅舅会带我们沿着一条偏僻傍河的小路踏青散步，路旁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紫色的蚕豆花，芳香扑鼻。我们边散步边聊天，谈笑风生，轻声歌唱，一直走到远处一座美丽的小古桥，流连忘返。舅舅非常喜欢腊梅花，经常让我去剪一两枝插在花瓶里，房间里便充满淡雅的清香。他还常带我们去房东的菜园里品梅赏菊。……

舅舅爱喝啤酒和白兰地。记得有一次梅雨季节，大家在一起喝酒，饮至过半时，舅舅脱口而出了个上联，“五月黄梅天”，问我们谁能对出下联。大家绞尽脑汁，谁也对不出来。却只见舅舅拿起酒瓶一指说：“你们看，就是它，‘三星白兰地’。”大家先是一愣，然后恍然大悟，拍手称奇。

舅舅非常喜欢雪。有一年春节下大雪，舅舅叫我用两个洗脸盆装满雪端进屋里，然后他搓搓手，一会儿工夫就捏成两只活灵活现的大白兔。舅舅和母亲用绍兴话背诵他们小时候学到的诗歌给我们听，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首：“一夜北风起，白雪铺满地，小狗看见真欢喜，追跑打滚做游戏，可怜小麻雀，飞东又飞西，叽叽喳喳叫肚饥。”（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4—95页）

木心曾谈到自己退出文艺界改做工艺美术的原因，身处洪流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不太积极，也不太落后，尽量随大流，保全自己”：

到了解放军渡江，上海杭州一个接一个“解放”了，一解放，又纷纷去参军，他们自己以为“心路历程”顺理成章——顺文学之理，成革命之章——后来呢，克利斯朵夫、普希金，统统放弃，极少数人还留恋，也留恋不了多久。我当时知道，非常难，共产主义不爱普希金的，不容克利斯朵夫的，我要走的路，被截断了。怎么办呢，想了好久，决定退出文艺界，去搞工艺美术，不太积极，也不太落后，尽量随大流，保全自己……（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34—835页）

◎进入上海美术模型厂上班后在潘其鏐家暂住过一段时间。

坐过牢房，学校除名，在五十年代是天大的政治问题，但潘其鏐没有嫌弃。在归无居处时，照样将其带回自己家，在客厅里加了一个铺，安置下来。住了一段时间，夏天到了，衣单裤短，潘妻袁湘文觉得起居不便，很不舒服，潘其鏐只得让其搬走，搬到一位学生家了。当时崇拜孙牧心的学生还是不少的。（徐宗帅：《林风眠与木心背后的潘其鏐》，见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反右”运动拉开序幕。

一九五八年 三十二岁

◎夏，游访洛阳。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秋、冬间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农业展览会（按：自制年表一作“全国农展”，自制年表二作“北京农展”）的设计工作。闲暇喜欢一个人逛天桥。

按：全国农业展览会第一届的举办时间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夏葆元说木心担任“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总体设计（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3页）有误，应是第二届。

第二届全国农业展览会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开始筹备……七月三日顾大川批准“一九五八年全国农展会展出筹备工作计划”，调整后展览内容表现为九个字：“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并确定设立综合馆、农作物馆（包括粮食、棉麻、油料、特产）、增产措施馆（包括水利、土壤、肥料、种子、密植、植保）、工具馆、畜牧馆、农村工业馆、林业馆、水产馆、气象馆、文教卫生馆、妇女馆。……第二届全国农业展览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农展馆（此时农展馆是指一九五七年建的临时馆）开幕，朱德委员长亲临剪彩，至次年五月闭馆参观人次达二百万。（肖克之：《新中国的三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农村工作通讯》，2004年第5期，63页）

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95页）

◎是年，作为设计带队在北京参与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我们组织很重视伊的，一九五八年弄一班人马到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啊！孙牧心是设计带队，来回好几次都是我到北火车站去亲自接送的——好几次，车钿报销。他有本事！一批人都有本事。木工漆工金工都搭配好的，北京对我们评价很高的，倪常明也去的。（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6页）

一九五九年 三十三岁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春至秋仍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农业展览会的设计。（按：自制年表一作“全国农、工展”，自制年表二作“北京农、工展”）作于是年的《格瓦斯》一诗提及在北京的生活。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二届全国农业展览会的同时，中央决定举办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其中内容之一，就是以“大跃进”的方式多快好省地建十座标志性建筑，人称“国庆工程”，以展示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国力。这十座建筑中就包括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的建立必然涉及展览内容，于是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开始第三届全国农业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本届展览会的目的是：配合盛大的国庆十周年大典，充分显示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与经验。性质和任务是：“突出地宣传建国十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农业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显示五亿农民的创造性劳动与冲天干劲的威力，宣传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和伟大意义。”

农业部为此成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览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由廖鲁言担任，委员有刘瑞龙、罗玉川、邓杰、张雨帆等。展览有板面四百块、小展台一百四十五个、大实物塔十八个、电动模型七十六个、沙盘模型四十二个，不计内容筹备，从形式设计到施工仅用二个月时间，体现了“跃进”的精神。

第三届全国农业展览会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谭震林为开幕式剪彩。展览分：综合馆、农作物馆、园艺特产馆、水利馆、措施馆、工具馆、畜牧馆、水产馆、气象馆、林业馆，以及人民公社工业馆、农村电气馆、沼气馆。这次展览时间较长，一直延续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但参观人数远不及前。（肖克之：《新中国的三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农村工作通讯》，2004年第5期，63页）

◎十月一日，在北京，躲在家里偷学意识流写作。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我在家自己写意识流的东西。不用在小说上，用在散文上。（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10页）

◎是年，作旧诗一首：

人皆畏朽，余岂释然？以近三十为最忧悚，逾四十便置度外，或反增今是昨非之独乐：

览尽茶蘼雕坛空，人生有恨花始浓。

频年金屋常寂寂，老去玉树犹临风。

虽然，亦有所悲：

铜雀未见春又深，满城落花马难行。

江南再遇龟年日，二十四桥无箫声。

己亥（一九五九年）之咏，距廿七寒暑。去国离忧，诚不知二十四桥为何物矣。（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3页）

◎是年，一度在上海设计某成果汇报展。

◎是年，再游洛阳。

越明年，我又去河南，在洛阳市内走了一天，睡了一宵，满目民房、商店、工厂……油油荒荒，什么伽蓝名园的遗迹也没有——我想总归要怪自己，除非一旦成了考古学家，否则不必再到洛阳来。（木心：《洛阳伽蓝赋》附注，《巴珑》，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74页）

一九六〇年 三十四岁

◎是年，大外甥女王剑芬与郑儒铎结婚，婚后辞职，随郑儒铎定居北京。木心在京期间，常与郑家往来，向他们借阅书籍。

按：郑儒铎（一九二一～一九八二），广东人，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文学双硕士。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一年任浙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任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曾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译英小组成员之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舅舅曾参加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工作（按：此项工作主要是在一九五九年），经常到北京，常去大姐姐家（她家藏书丰富，对舅舅来说，这儿不啻第二个“茅盾书屋”），大量向大姐夫借书阅读。（王伟：《在天国再相聚言欢——追忆舅舅木心与姐夫郑儒铎的交往》，《北京青年报》，2013年4月1日）

一九六一年 三十五岁

◎暮春，初识画家陈巨源、陈巨洪兄弟，应邀就饮于上海南京路广州食府。仗酒言志，作古体诗一首。

按：陈巨源，一九三九年生于上海。一九七九年上海“十二人画展”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福建人民出版社美术设计。

陈巨洪，陈巨源之弟，一九七九年上海“十二人画展”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现居美国。

辛丑（一九六一年）春暮，淞滨初识画家原、泓二子（按：指陈巨源、陈巨洪），籍粤，乃就饮于南京路广州食府。杯谈渐酣，仗酒言志：

若有人兮山之阿，餐菊兮啜桂露。

临深慨慷作高歌，履薄轻颺起妙舞。

沉醉百年未尽量，精思万代乐逾度。

跨长虹兮携太白，笑斥群匠昼葫芦。

（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十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44页）

据陈巨源回忆，他们与木心相识是经由王元鼎的介绍：

按：王元鼎，一九四一年生于上海。毕生致力于油画、水彩画的创作，历任中国美术设计家协会秘书长、上海水彩画研究会会员。

一九九二年定居美国，一九九三年荣获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颁发的促进东西方艺术事业特殊成就奖。

最初认识木心，听王元鼎介绍，是一位设计界的高手。他仪表不凡，衣着讲究，十分清高，只与像元鼎这样有品位的人来往。我和巨洪自然热切希望与之交往，希望一睹他的丰采。在元鼎的安排下，我们在新雅粤菜馆宴请了木心。

初次相逢，木心如天人下凡，谈论艺术，古往今来，如数家珍，各种流派，艺术观点，任意点评，如探囊取物，如在云端，对人事万物，一目了然。我们洗耳恭听，暗自敬佩，庆幸结交如此高人，至今未见有过木心者。（陈巨源：《与一代奇才木心的交往》，《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47页）

谈到木心，我和他有数十年的友谊，最近曾到乌镇与他见面。……有史以来，我最崇拜东坡、李白，第三个可以算木心。他对我艺术上的影响不言而喻，他第一个发现并肯定我的艺术，那时我们常常得到他的引导，会按他的指导去努力，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就像魔法师，充满魅力，使他周围的年轻人都被深深地吸引。（袁龙海：《艺术“玩家”陈巨源》，《上海采风》，2009年第2期，77页）

一九六三年 三十七岁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起至一九六五年先后从事外贸、广告等工作。

一九六四年 三十八岁

◎是年，在“四清运动”中，孙彩霞被查出名下拥有多张地契，均系当年的嫁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彩霞即被定为地主）

◎是年，应邀与潘其銮等参加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首届中国出口服装展。

一九六四年，首届中国出口服装展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徐昌酩跟着张仃做此次展览会的陈列设计，“要做的比服装都美”，这是当时他们达成的一致目标。这次展览的规模很大，有凌燮阳、宋连祁、施福国、马永春等人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孙牧心（木心）、潘其銮等加盟。（曹汝平：《“五颜六色”的创作者与见证者——徐昌酩先生访谈记》，《设计》，2014年第8期，165页）

一九六五年 三十九岁

◎近年在上海美术模型厂专事生产工艺竹帘画及毛泽东立体画像。年底，被调到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任“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总体设计。遇见担任展墙插图的夏葆元。

按：夏葆元，一九四四年生于上海，一九六五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本科油画系，后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艺术指导。一九八一年任上海交通大学美术研究室画部主任，一九八五年任上海油画雕塑创作组负责人，一九八八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同年移居美国。二〇〇五年任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长期从事西洋画、中国水墨画的研究创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夏葆元绘画作品选》等。

一九六五年底，我偶遇八年前从大字报上读到的“孙牧心”本人，苍白的脸，下颚微凸呈尖状，头戴黑色绒线帽，上有绒球，蒙克画里的那种。初次相见我对他怀有戒心，因为市面上多的是“干劲十足”的人。那些年这位文艺大才屈居在一座破庙（后来得知是尼姑庵），专事生产工艺竹帘画及“文革”流行的毛主席立体照片，近日获悉中华牌香烟的壳子也出自木心之手设计。因为与所在单位是同一系统，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像样工作，便是与木心的破庙单位合作，布置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内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简称“双革”）展览会，木心任总体设计，我担任展墙插图。（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

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4页)

◎能把马列著作背得滚瓜烂熟，每周带领大家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内容如数家珍。

每周政治讨论，木心带领大家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竟能如数家珍随口道出某一页第几段的内容。（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5页)

◎“文革”前，好友李梦熊怂恿木心续写《红楼梦》，踌躇不定，最后决定放弃。不久两人因故绝交。

二十年前，我和音乐家李梦熊交游，他就想写《从徐光启到曹雪芹》。我们总在徐家汇一带散步，吃小馆子，大雪纷飞，满目公共车轮，集散芸芸众生。这时，中国大概只有这么一个画家、一个歌唱家在感叹曹雪芹没当上宰相，退而写《红楼梦》。

结果他没写这篇论文，我也至今没动笔论曹雪芹。不久二人绝交了。友谊有时像婚姻，由误解而亲近，以了解而分手。（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35页)

一九六六年 四十岁

◎据自制年表一、二，本年初起又回上海美术模型厂工作。

◎五月，“文革”爆发。

◎“文革”之初，尚未受到冲击，与钢琴家金石等交往甚密，彼此切磋音乐。

按：金石，生于一九三三年，上海人，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自幼从其父金武周博士学习，后从师于潘美波、玛格林斯基、张碧华、俞便民等名家学习钢琴演奏艺术。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兰心剧场举行钢琴独奏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次公开举办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一九五六年受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一九五八年更名为沈阳音乐学院）之聘，到该校任钢琴教师。杏坛执教半个世纪，学生遍布世界。历任第一届全国钢琴比赛特邀评委及选拔出国参赛国际钢琴比赛选手五人专家评审组成员等。编著有《浅论声音》《车尔尼钢琴练习曲的训练和应用》《钢琴教学丛书》等。

浩劫之初，余犹无恙。有钢琴家金师（按：即金石）自挹娄返申省亲，滨友咸集，奏肖邦、李斯特诸曲于深院幽宅。夤夜从事，盖大违禁忌也。翌夕，聚饮市南豫园，同座以即席赋句为趣促，感金师之妙艺，掇长短以倾忱……越明年，金师以私举音乐会入罪，搜身得此手稿，旋下狱，卒贬为牧猪奴。（木心：《西

班牙三棵树》三辑·其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2页)

木心醉心音乐，与钢琴演奏家金石交游密切。……金石曾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在上海兰心剧场举办过国人首次钢琴独奏会，后来虽在沈阳音乐学院任钢琴系教授，但每来上海探亲，常会同木心见面。有次金石在朋友处举行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曲目为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木心特地赶来，并与金石当场切磋演奏中的技巧。金石曾同我提起，木心不仅对音乐有很高的灵性和敏感，还能作曲，而且与他有过相同的经历：当年隔离审查期间，他们都曾在硬纸板画上黑白琴键，在上面偷偷练指法，免得技艺生疏。（铁戈：《木心上海剪影》，《财新周刊》，2017年第2期）

◎冬，因孙彩霞的出身为地主，惨遭抄家。木心受其牵连，数箱画作、藏书、乐谱、唱片和二十二册（一说二十本）自定文集等被全部抄没。

一九六六年冬天，晚上我们刚躺下睡觉，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母亲、小姐姐和我从梦中惊醒。一群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拿着枪棒闯进家门，翻箱倒柜，满屋查找所谓“四旧”的东西。我家的首饰、照片等值钱物品，及舅舅的数箱珍贵的画作、文稿、藏书、乐谱、唱片等，装满了四辆“劳动车”，悉数拿走。没过几天，又来继续“搜查”，敲墙撬地板，挖地三尺，并将舅舅屋里当茶几的厚黑石板砸碎找金银财宝。他们让母亲跪在地上接受批斗，让我和小姐姐在一旁站着陪斗。白天受红卫兵监视，连晚上睡觉也常听见屋顶上瓦片碎声，抬头望天窗，看见有人在监视我们。（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木心纪念 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5页）

画余写作诗、小说、剧作、散文、随笔、杂记、文论，自订二十二册，“文革”初全部抄没。（《木心先生讣告》，《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页）

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7页）

禁囚之前我一生的文学绘画作品全部被焚毁，所谓“在绝望中求永生”，其实只能是“无愧于艺术对我的教养”，明知从此被剥夺了艺术创作的权利，我根本不配有信心。然而世界性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和取拒，在我心里决不放弃一贯的主见，层出不穷的主见。华格纳年轻时谒见贝多芬，得到教诲和慰勉，告别时，贝多芬说：“以后你痛苦时，请想起我。”贝多芬以其道德力量之强，担当了人性中的最大可能，我又惊讶他对人生痛苦的体验之深，使我这平凡的不幸者也得以引贝多芬为知己。（童明、木心：《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14页）

一九六七年 四十一岁

◎冬，孙彩霞被批斗后心脏病复发去世。

◎木心自本年起在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工作。

按：据秦维宪所述，木心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工作单位是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厂址“坐落在石门二路、新闻路交合处，曾经是破尼姑庵的厂房”[秦维宪：《木心的人生境界（上）》，《新民晚报》，2015年12月28日]。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前身即是“上海美术模型厂”，“文革”中厂名发生变更。

一九六八年 四十二岁

按：自制年表一、本年所标示的年龄为四十三岁，误。

◎据自制年表一、二显示，本年七月至十二月，被上海静安公安分局关押。被关押的原因是在“清队运动”中不肯向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的造反派承认自己是地主出身，而坚持认为自己是学生出身。

关押期间以默默地背书和唱歌来抵挡寂寞：

三十多年后，在监狱中是没有人不寂寞的，先是什么都断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几个月挨过，才知道寂寞的深度竟是无底。于是开始背书，背书，绝妙的享受，不幸很快就发觉能背得出的篇章真不多；于是在心中唱歌，唱歌，记忆所及的词曲竟也少得可怜，兜底搜索，这支儿歌也挖掘出来，有言无声地唱着。感谢女教师预知她的学生要身系囹圄，早早授此一曲，三十年后可解寂寞云云。（木心：《笑爬》，《琼美卡随想录》，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9—130页）

◎年底，静安公安分局对其进行宣判，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回原单位监督劳动，管制两年。

按：据夏葆元所述，曾被转移到位于徐家汇附近的一个民间组织私设的监禁地：

木心还告诉我，他后来转移到一个民间组织私设的监禁地，位于徐家汇附近，犯人每月允许冲一次“热水龙头”，当热水直达

头颈以下的脊椎，“这一种舒服是如同死一般的舒服”。另一则是某冬日午后，看守允许犯人到天井放风，木心搁了一块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翻起丝绵棉袄来，此时从徐家汇远处传来了电车声、人的喧闹声，木心一时感到十分平静和满足，“我对生又充满了希望”，“这种声音简直是从另一世界传来的福音”。还有一则故事更为悲凉离奇：某夜他从囚禁的木栅栏的缝隙里逃逸，“可见我那时有多瘦”，出了囹圄后想想没有地方可去，又钻回刚潜出的木栅栏。（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5页）

一九六九年 四十三岁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一月至一九七〇年七月“在厂劳改”，负责扫地、扫厕所等体力劳动。

一个月后“文革”爆发，他便杳无音讯，传闻他在本单位原地监督劳动，扫地、扫厕所什么都来，当然丧失了竹帘画和立体照片的制作权，处境极度堪忧！木心后来告诉我，他单位原有一对半残的痴人，口中常流涎水，是他们单位最低等级的“贱民”，现在木心终于和他们走到了一块儿，居然比他们的等级还要低，这两位痴人对于木心的“加盟”高兴得不得了。（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5页）

六十年代

◎开始酝酿长篇散文《巴比伦语言学》，终未完成。

青年时构想一部诗剧，介乎《查拉图斯特拉》与《浮士德》之间的东西，两幕写过，便知道这是不行的，无法表现近代的当代的思想和情操。从六十年代开始，酝酿一部《巴比伦语言学》，写法是：分章而连续。体裁就是这种融合诗、小说、评论的散文。字数当以百万计。（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6页）

一九七〇年 四十四岁

◎是年七月，被撤销管制。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厂隔离审查”。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十二月起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在地毯厂审查”。

七十年代初

◎木心曾在飞马牌香烟壳背面列出此一阶段的写作成果目录，计有十五种：

《和打猎一样》《凡尔街十五号》《进来，主角》《政治负数》《十字架的一半》《逻辑弥撒》《公共回忆录》《巴比伦语言学》《论批评精神》《蛋白黄论》《单体对话录》《原始忏悔录》《魔术兴亡史》《田园诗关系》《现在我发言》

一九七一年 四十五岁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十月至一九七二年二月“在绣品厂隔离”。

按：据王伟回忆，本年上海美术模型厂一度派人来抄家，之后木心便杳无音讯。王济诚让幼女王奕到上海美术模型厂要求探视木心，被造反派拒绝。

一九七二年 四十六岁

◎是年，厂组织将木心的材料上交静安区公安分局，分局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管制三年。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三月至六月“在本厂防空洞隔离”。被要求写检查，却不停地偷偷作曲。初入地窖时每日抽掉一包烟，后减为半包。

按：有关此次隔离，木心到纽约后作有《三号防空洞》一文，详细描写了囚禁细节，现藏于木心美术馆。

中年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我便在一盏最小号的桅灯下，不停地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致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之程度。（木心：《很好》，《琼美卡随想录》，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5—106页）

◎在防空洞隔离期间写出一百三十二页《狱中手稿》，约六十五万字。解除监禁后将手稿缝在棉袄夹层中偷偷带出。

按：《狱中手稿》的写作时间童明说是“一九七一年”（童明、木心：《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13页）。而巫鸿则说是“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期

间”，他称之为“狱中笔记”。（巫鸿：《读木心：一个没有乡愿的流亡者》，《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巫鸿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20页）现以木心自制年表一中显示的“在本厂防空洞隔离”的时间为准，判定写于一九七二年三月至六月之间。

舅舅监禁释放后回到高桥家里，悄悄给我们看他在地下防空洞中穿的脏旧不堪的棉袄、结扣计日的布带和在洞中偷偷写下的密密麻麻的六十六页（按：此处的“页”应是“张”的意思）日记，并讲述怎样巧妙地把日记缝在棉袄夹层中偷偷带出来。（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5页）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木心在上海某单位的防空洞里被非法囚禁十几个月（按：误，被囚禁在防空洞应是四个月）。过来人都知道，这类的事当时屡见不鲜。不同的是，木心在囚禁期间用做检查留下的六十六页信纸的两面，密密麻麻写了一部和历史人物对话的“手记”，类似意识流的散文。他在去世的前一年说：“（当时）我下了地狱，莎士比亚、莱蒙托夫还有许多人都和我一起下了地狱。”（童明：《张之洞中熊十力，齐如山外马一浮：从木心的一副对联说起》，《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3页）

这部手稿并非就是一件文学作品，它也非书法绘画符码谶图，别的艺术以其“是什么”而入品类，此手稿却以“非什么”而取自立，它宁系属于视觉艺术的宽泛范畴，在既成的有定义的艺术门类中，似乎未有与之同性质的例子。别人的手稿都可解读，作者也冀求被解读，我的这部手稿已难以解读，不希望得到解读。文字失去了意义，有什么可怕呢，也许倒是可祝贺的。（童明、木心：《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木心纪念专号：〈温

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13页)

数十年后，当木心被问及“凭什么来执着生命，竟没有被毁，没有自戕”时说：

艺术家最初是选择家，他选择了艺术，却不等于艺术选择了他，所以必得具备殉难的精神。浩劫中多的是死殉者，那是可同情可尊敬的，而我选择的是“生殉”——在绝望中求永生。（童明、木心：《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14页)

◎据自制年表一显示，本年六月至一九七九年年底“在本厂劳改”。

◎是年十二月下旬，秦维宪从培明中学毕业后被分进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始识木心。木心此时作为头号阶级敌人受尽凌辱和摧残。

按：秦维宪，一九五四年生于上海。曾当过工人、教师，一九八三年七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探索与争鸣》主编、编审，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在历史的拐弯处》等。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下旬，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我从培明中学毕业分进了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这家由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脱胎而来的小厂，坐落在石门二路、新闻路交合处，曾经是破尼姑庵的厂房，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做塑料花的车间，几无劳动保护，注塑的毒气无孔不入地侵袭着工人的肌体。

一次卸完货，从拉料车间的破门帘后闪出一位年近半百、风度儒雅，着补丁整齐的劳动服之人，他双目如炬，深藏眸子冲

我一笑。我自幼喜读古书，讶异于此人颇有仙风道骨，遂脱口一声：“师傅，您好！”不料，他脸色骤变，连连摆手，示意我不能这样称呼。以后，我们多次相遇，他总是一迭声说咱俩有缘。我从老师傅口中得知，此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其知识之渊博，在上海手工业局无人能望其项背，这就是木心先生。我这个小青工，很快被厂内头号阶级敌人木心先生的学识与风度所吸引。

当时，木心处于人生最坎坷、最痛苦的低谷，他作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黑五类”，任何人都可以侮辱、欺凌他；而他却整天强装笑脸，对任何人都得点头哈腰，人性被彻底扭曲！更有肉体摧残，且不说他经常挨打受骂、被批斗，单以强劳力而言，他干的是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除了倒便筒（厂里没有正规厕所）、通阴沟、铲车间地上的机油外，还经常跟着铁塔似的装卸工扛原料；其中通阴沟、铲机油最累，我曾帮他通过阴沟，阴沟内胶水般的污泥足以将得过肺病、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木心击倒！

木心为了排遣痛苦，大量抽烟，似乎烟雾会带他遨游在无限美妙的艺术世界里。令人心酸的是，木心拿的是生活费，为了省零点一四元车钱，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都是走十几公里上下班，因而抽了大量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给肺部留下严重的隐患。我厂一些青工一方面劝他不要抽“生产牌”，一方面尽量给他些好烟抽。有一年秋天，我斗蟋蟀赢了零点四九元一包的“红牡丹”，立即赶去与他共享。[秦 维宪：《木心的人生境界（上）》，《新民晚报》，2015年12月28日]

曾与他在同一设计公司的梅文涛提到一件往事：一次他到木心的厂里去联系设计业务的事，刚进厂门，一眼看到木心穿着脏旧的工作服，弯身低头，用双手在厕所通到墙外的阴沟里捞污秽堵塞的垃圾。当他无意间抬头看到梅文涛时，立即将头再低下去，避开碰撞的视线。见此情景，惊讶之中的梅文涛也不敢上去

同木心打招呼，事后彼此也从没在朋友间提起。这一瞥将木心长达七年之久的处境展现无遗。当有朋友问起他在厂里干什么工作，他只是微笑地说“打打杂”或“杂务工”，但其实每天都在打扫男女厕所，干最脏的活。（铁戈：《木心上海剪影》，《财新周刊》，2017年第2期）

一九七五年 四十九岁

◎是年，因工友凑钱请吃饭走漏风声而被厂里批斗，罪名是“腐蚀青年”。

◎是年，被撤销管制。

◎是年，作诗《歌词》。

一九七六年 五十岁

◎二月，五十岁之际，从新近制作的百幅小尺幅转印画中选出五十幅，自编为《玉山赢寒楼藏画集》。陈巨源、陈巨洪兄弟得知后，为之设宴祝寿，并索观画作。

按：据陈丹青所述，“文革”末期为木心转印画制作的第一个时期。[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50页]

丙辰（一九七六年）二月，予起寿，奈南冠双加，莫展一筹。奴役生涯，日未出而作，日入不得息。胼手胝足，踉跄夜归，涤垢平喘，俟四邻俱寂，乃锁扃蔽窗挑灯牕作小画累百。选五十成帙，自签《玉山赢寒楼藏画集》，为陈氏昆季知，以设宴贺寿索观。（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6页）

“文革”后期，舅舅被关在上海长治路自己租住的小屋中隔离审查。但他不顾再次坐牢的危险，常常是半夜三更用毯子当窗帘，用他独创的画技和最便宜的颜料（“文革”期间，他的工资减半，买不起油画颜料），悄悄地画出了惊世骇俗、震撼人心的三十三幅水墨杰作（为便于隐藏，画面很小）。（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5页）

按：此时，木心住在外白渡桥下长治路闵行路转角处的一幢六层砖石结构楼房内。

◎十二月八日，在读过陈巨源为自己的画作所写的评论后回信一封：

少璞顿首顿首奉书于巨源先生阁下，沪庐初识，粤楼承宴，十载神交，一泓秋水，亦明心见性之谓也。然则数峰清苦，犹自商略黄昏雨，临川芹溪辈，嚶嚶侃侃代不乏人，彼苍苍者，亏吾何甚。

璞本狷介，谪居年年，尘缘渐尽，祸福皆忘，其所以耿耿长夜，如病似醒者，方寸间豪情逸兴颉颃未已耳。

今秋挟画曝献，匪逞雀屏，实伤骥足。区区五十纸，薄技小道，壮夫大匠不为也。璞运蹙才竭，无亢无卑，其心苦，其诣孤，如此而已矣。

是夕观罢，诸公寂然，是耶非耶璞之不济耶，抑诸公之不鉴，乃有郢人逝矣谁与尽言之叹。收拾而归，嗒然若丧，途中斜阳余晖，晚晴可爱，就饮小肆，不觉微醺，窃以为明月清风易共适，高山流水固难求也。

秋去冬来，珠阁再叙，仗酒使气，诉及前悻。先生乃慷慨自剖，始昭一出声便俗之妙谛，良有以也，不禁莞尔继之，划然大笑，怨触顿释。怀书归寓，挑灯回诵，空谷足音，感荷良深，少璞何幸，吾道不寡。

先生盛誉溢美，倍增愧畏，日月山川，精髓典范之称，不亦大而无当乎。昔东坡素重米芾，往还常年，以为谙熟，及观海岳新构诗文叹曰：知元章不尽。先生近岁诸作已非畴昔，画境倩雅而登堂，诗味晶朗而入室，大有可观，贺贺。

语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先生之画可谓淡矣，盖明志之品也，诗可谓静矣，诚致远之格也。承质玉石之论，岂敢率

纷纭，容待飞觞醉月，详特斟酌。

专此鸣忱，不尽所怀，北风多厉，优维珍摄，并候。

巨洪先生康胜

少璞顿首再拜

丙辰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八年 五十二岁

◎四月初，带着新画到唐友涛家拜访，巧遇铁戈。唐友涛看过画后十分欣赏，特意作七律一首相赠。四月五日，木心亦作七绝一首回赠。

有天下午我正在唐友涛家闲聊，见木心登门而来，带着自己的新作的画。唐友涛十分欣赏，特地写了一首七律送给木心。木心阅后大喜，没过几天，就写了一首七言回赠。木心去美后在纽约华人报刊上发表一文，还特地提到与唐互赠诗文一事，报纸从美国寄出，由小翁送来。前不久好不容易把木心这首诗从故纸堆里找了出来：

“戊午清明正 少堉顿首 唐公足下

赢得春风识异人

雪里芭蕉白青青

不羨高山流水意

二横一语破痴心

恭取大乐雪斋 不具 少堉顿首 顿首”（铁戈：《木心上海剪影》，《财新周刊》，2017年第2期）

◎八月底，胡铁生复出，出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因建国三十周年大庆临近，胡铁生提议在上海举办一个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工艺美术大展，此议获得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的首肯。

随后胡铁生出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在物色大展的总体设计人选时，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志英推荐了木心。第二天，胡铁生即在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约见木心，因对其才华与学识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即将其调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展览会办公室上班，委以总体设计师之职。

按：胡铁生（一九一一～一九九七），原名克熙，自号梦熊，笔名友石半聋、石道人等。山东福山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上海商业局局长及手工业局局长。兼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工艺美术设计协会理事长。业余从事书画篆刻，为西泠印社顾问。

一九七八年八月底，“文革”结束后不久，父亲胡铁生复出工作，出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再过一年多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父亲便提议由计委牵头成立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工艺美术大展筹委会。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市计委主任陈锦华十分赞同，当即召集开会决定，由胡铁生协调上海手工业局、商业局、外贸局一起组成筹委会，并任筹委会主任。筹建班子组建后，父亲提出，一个大型展览的总体设计十分重要，此时筹委会办公室主任贺志英推荐了孙木心（按：应作孙牧心，下同）。

.....

我当时刚从部队回到上海，正在办理复员手续。那天，父亲下班回来特别开心，满脸都是笑容，就像找到了他最喜欢的字画、石头似的，让我打开冰啤酒，边喝边对我说：“我今天下午约来谈话的孙木心是个人才，是我所结识的所有字画家中最有学问的一个。”

“大画家刘海粟、谢稚柳、应野平、程十发、李苦禅、黄胄等都很有学问，但木心却不同，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精神和学养与常人不同。这个学贯中西、文学修养如此好的设计师，却长期

在工厂的最底层扫厕所，太浪费人才了！‘文革’都结束了，地主、坏分子、反革命三顶‘帽子’还扣在他头上，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发挥他的才能！工艺美术大展的总体设计师非他莫属！”父亲越说越激动。

第二天，父亲专门调看了孙木心的档案。第三天下午，创新工艺品厂的蒋厂长应约到汾阳路七十九号大展办公室，向父亲汇报孙木心的情况。他说：“孙木心业务能力很强，但政治底牌一塌糊涂，因为长期定性是‘三类坏分子’，所以只能安排劳动改造。”听到父亲要调他出来搞展会总体设计，蒋厂长担心道：“若重用此人，政治风险很大，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啊。”贺志英也在一旁说：“非亲非故的，调他出来挑重担，会有难以预测的风险。”父亲果断地说，孙木心档案我已看过，地主成分是他父辈的事，不代表他也是地主，他的历史就是“学生+设计师”！我们革命队伍中，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技术骨干，父辈都是地主、资本家，他们照样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考验，为国家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木心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让他扫厕所是极大的浪费！对国家也是损失！立即调出来，以后出任何事，任何政治风险由我承担！就这样，木心很快离开了工厂，到展览会办公室报到了。（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创新工艺品厂是上海市手工业局的下属单位，一九七八年，还没完全复职的局长、书法家胡铁生听到下级关于木心的汇报时，甚为关注同情，于是找他到办公室来谈话。见面前，他以为多年来狼狈不堪的木心一定焦头烂额，蓬首垢脸，畏畏缩缩，但推门进来的竟是一个挺挺括括气宇轩昂的男子，站在局长面前不卑不亢。一个小时谈下来，胡铁生下了决心，冲破重重障碍，拍板为木心平反，将他从地狱般的处境中解救了出来。（铁戈：《木心上海剪影》，《财新周刊》，2017年第2期）

一九七八无疑是木心的吉祥数，受贵人相助他的境况立变，从尼姑庵的厕所现场忽然搬到上海西区的汾阳路办公，七十九号是租界时期的法国总会，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陈毅市长的官邸，木心办公室的窗外透过夹竹桃的缝隙，与视线持平为一个法式大花园，内有池塘，极目望去是黑森森的高大乔木，与墙外的永康路隔绝。木心每日午后独自绕花园的小径散步，在小说《此岸的克利斯朵夫》的末尾，我们看到了对这个环境的描述。与他一起办公的是一位从上海警备区退休的官衔极高的张恢同志，胡局长授命他们在那里筹建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按：有误，应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和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当年适逢开发旅游业的高潮，在中苏友好大厦的西厅二楼开辟了一个硕大商场，专门陈列全国各地的特种工艺品，为各国外宾旅游的景点和购物处。木心被“钦定”为总体设计（相当于现今的艺术总监），兼筹备设在同一地点的上海工艺品展销公司。春秋季节，木心身披迷彩军便服，冬季身着红色鸭绒衫，快步踏上铺满红地毯的堂皇大厅，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也是延安中路一千号的一大景观，因为他就是胡铁生局长的“钦差大臣”。如有请示，木心就直接跑衡山路 西湖公寓，随时去敲胡宅的门。（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7页）

◎十月，因到胡铁生家汇报展览会设计工作而结识胡晓申。胡铁生此时已重返手工业局任局长。

按：胡晓申，胡铁生之子。现任《美化生活》杂志总编辑。

第一次见到木心时，我还身着军装，他来家中向父亲汇报展览会设计等工作，那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父亲已重返手工业局任局长。父亲将我介绍与他认识，初次见面，就感觉此人温文尔雅，五十岁左右的他，穿着得体，双眼炯炯有神，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质。（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是年，一位日本女画家来访，拟全部买下木心的画作回到日本举办画展。因提出条件，要木心把制画的方法告诉她，遭拒未成。

一九七九年 五十三岁

◎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工艺美术大展在上海工业展览馆和中山公园成功举行。不久，胡铁生决定成立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自任理事长。因木心工作突出，再次提名其出任秘书长，主持协会日常工作。

按：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没有编制，木心的人事关系仍在上海市工艺品展销公司下面的上海创新工艺品一厂。

三十周年工艺美术大展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如期开展，规模盛大，获得空前成功与好评。木心是大展的总体设计师，当记首功。父亲对他更是欣赏、器重，暗中决定委以更重要的职务，在筹备中的上海工艺美术协会中让他出任秘书长。这件事，木心来家中时，父亲对他透露过，并关照他对外勿谈此事，因看中这个职位的大有人在。我看得出，木心一再谦让，他最后表态，胡老您是我生命中的大贵人，因此，只要你决定了，我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的。在上海工艺美术协会成立大会上，父亲向一千多名会员提名孙木心担任首届秘书长时，全场一片静默，随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在台下目睹此情此景，也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胡局长真有魄力、有胆量，竟启用一个‘三反’分子任秘书长？”

之后，木心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品展销公司两边上班，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所，因此我与他经常见面，因工作关系他也来西湖公寓家中，有时谈到晚饭时间，父亲会留他一起吃饭，

喝上几杯。饭桌上，木心与父亲谈笑品议，从宋朝的山水画高峰郭熙、巨然，到元明清诸大家，他们谈得甚欢，我在旁边也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父亲与他聊得更是兴趣盎然。木心对文学诗词方面的功力毕现，看似无意显露身手，事义浅深，足见其超凡见解！看得出父亲很喜欢他。

木心先生对林风眠很是推崇，那段时间他的构图风格酷似林先生。我见过他作画，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严，对不满意的作品就当场销毁！木心还广闻博识，他知我以前学过小提琴，在部队文工团专攻法国号，便与我聊起音乐来，从巴赫、贝多芬、肖邦到勃拉姆斯，小提琴十大协奏曲，世界十大交响乐作品，他都如数家珍！对贝多芬更是推崇备至，记得他对我说过，莫扎特听过贝多芬十七岁演奏的钢琴曲后，就预言有朝一日贝多芬必定震动全世界。木心先生对《命运交响曲》特别喜爱，他曾说，这是一首光明战胜黑暗的胜利凯歌。正是木心先生对生活的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才战胜了他个人长期遭遇的不公和痛苦。苦难的经历变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他曾对我说，这与《命运交响曲》给他的力量是分不开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就连莫扎特、韦伯的法国号协奏曲，他竟也熟悉，木心就像一本百科全书。那时，我与摄影老师张志岳、木心三人常一起在工艺研究所的草坪上神聊，他经常把同时代的音乐家与画家，比如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康定斯基时期的绘画和同期柏辽兹、西贝柳斯、德彪西等摆在一起比较，他认为音乐家是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一首名曲能永远地传下去，让人们百听不厌，是多么的神奇、美妙啊！

在办公室，木心经常一手夹香烟，一手放在膝盖上，精神矍铄，恰似上海人讲的“老克勒”那种派头。同他聊天甚是开心，他从艺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神采飞扬，喜怒溢于言表；他机智即兴，妙语连珠，聊到尽兴时，简直像个孩子，很是可爱。有时我们会谈及“文革”，对这场运动，我深恶痛绝：“‘文革’摧毁了

我们少年时一心想当科学家的美好梦想，它几乎毁了整整一代人！”木心道：“你父亲当年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反右’‘文革’中屡屡被打压、被批斗、被隔离，甚至被强迫劳动改造，我看‘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和有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你们这样的革命家庭怎么会被抄家呢？”今天回想起来，这句话真是既精辟又贴切。（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上海工艺美术协会成立后不久，胡铁生又提出要创办会刊《美化生活》，用以宣传普及美学知识，指导消费，促进生产。因深知木心文学功底深厚，遂委任其为《美化生活》试刊号主编。办公地点设在汾阳路七十九号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内。

按：夏葆元在《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说，《美化生活》由胡晓申创办，特邀木心负责艺术设计。对此，李平《“我是一个远行客”：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一文提出异议，认为《美化生活》乃胡铁生所创办，并由胡铁生提议由木心担任主编。当以李平之说为是。另，《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亦说木心曾任“《美化生活》期刊主编”。

上海工艺美术协会成立不久，父亲在常务理事会上提出，应办一本会刊，宣传普及美学知识，指导消费，促进生产。父亲深知木心文学功底深厚，即委任他为《美化生活》杂志试刊号主编，打算先办一期，试试反响如何。（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作为主编的木心虽不坐班，但对杂志的排版、摄影和文稿要求很高，负责查看校样，签发稿费单。此时每月的工资约有六七十元。

方阳回忆说，木心平时好像事情很多，经常出去采访或者开会，不坐班的，也不像许多人那样把打好的午饭带到办公室来吃，他当时住在哪里人们都不清楚，（据《木心的远行与归来》，木心当时借住在虹口区大名路一六七号的旧房里。）但是他对排版、摄影和文稿的要求很高，会非常仔细地查看校样。因为是事实上的主编，所以稿费单必须由木心签发。当时每幅摄影三元钱，如能多发表几幅那就很好了。方阳记得，有一次木心在签完稿费单以后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稿费的。”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马上说：“那我们给你！”木心说：“这不行，不过你们请我吃顿饭倒是可以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木心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就是六七十块。（李平：《“我是一个远行客”：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8月29日）

《美化生活》杂志的工作人员还有副主编张志岳、文字编辑沈建华、美术编辑徐益铭、摄影编辑方阳等。

按：方阳，一九五四年生。一九七一年起供职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一九九五年起任副所长，二〇〇二年起兼任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副馆长，《上海工艺美术》杂志编委和编辑，高级工艺美术师。二〇一四年四月退休。现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业美术设计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当时《美化生活》杂志的副主编叫张志岳，文字编辑沈建华，美术编辑徐益铭，加上摄影编辑方阳，大家对木心的学识都很佩服。张志岳很喜欢向木心讨教种种事情，多次对方阳说“木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幸于一九八四年就离世了。他的夫人杨锦玉是大中华橡胶厂三老板的女儿，也与木心很谈得来。据说木心回国以后，她去看望木心，是受到欢迎的少数几个旧人之一。沈建华甚至说，整个研究所里面，他只佩服木心，木心很有内涵。因为是文字编辑的缘故，他与木心交谈最多。木心没有架

子，很和蔼的，讲话时有调侃，又很自信。年轻人说得对的，他会当面说好，并不断提及。他认为说得不对，也会指出来。有一次，在与沈交谈后，木心说：“一会儿唯物主义，一会儿唯心主义，最讨厌了。”后来，沈说自己的观点又改变了：“我的观点以今天的为中心。”木心事后感叹道：“最讨厌这种说法。”（李平：《“我是一个远行客”：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8月29日）

◎是年，向中共上海市委复查办公室提交申诉书，要求“平反”。

按：申诉书达数十页，木心留有底稿，现藏木心美术馆。

七十年代

◎开始酝酿长篇小说《瓷国回忆录》，未完成，现存小说人物表一张（现藏木心美术馆），多以亲属和家仆为原型。

人名	主角——石冲
	大姐——石雯
	二姐——石露
	姐夫——汪毅（济诚、寄尘）
地名	凤镇
女佣	丫环——春香 梅香
	莲香
	桂香
	老妈子——陈妈
教师	齐巨伯
	沈景初
账房、管家	郑阿海（海伯伯）
男佣	倪方圆 葛兆丁
	老熊 六十
	阿定（车夫）

七十年代起，酝酿另一部《瓷国回忆录》，传记性，应归小说类，字数倍于前者（按：指《巴比伦语言学》）——两部都已着手写，能不能完成，总得在五年之后见分晓，因为同时要写别的东西。（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6页）

◎七十年代末，作画《肖像系列》。

一九八〇年 五十四岁

◎据自制年表一，本年年初至一九八一年秋，在工艺美术展销会工作。

◎据木心提供给周乾康的简历，本年起任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

◎四月，应日本神奈川美术家协会之邀参加在横滨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县展（公开招募展），六件水墨画作品获金奖，本人被该会聘请为特邀资深会员。

按：叶瑜荪《孙牧心》一文中说是：“一九八一年获日本神奈川美术家协会春季大展金质首奖，特邀为名誉会员，推荐作品巡回展览于巴黎、横滨、东京等地。”（叶瑜荪：《孙牧心》，《桐乡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96年。此文内容为叶瑜荪据《海外华人名人录》等资料摘编。）时间有误。

一九八〇年应日本神奈川美术家协会之邀，参加在日本横滨举行的“国际美展”获金质奖，被请为日本神奈川美术家协会特邀资深会员。（《木心小传》，《联合文学》创刊号，1984年11月1日，58页）

漫漫岁月，沉潜艺术，终于在一九八〇年能应日本神奈川美术家协会之邀，参加了在横滨举行的国际美展，他的水墨画即获得了一等金质奖，被美术家协会请为特邀会员（今年又参加了第四十七回春季大展，以不透明水彩画获得“日本艺术新闻社赏”，美术家协会颁赠了“特别颂”）。（陈英德：《看木心的超自然风

景画》，《海外看大陆艺术》，陈英德著，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7年，353页)

◎八月二十六日，日本神奈川县美术家协会给木心寄出该会会长松田ヨシオ和事务局局长中原敬子共同具名的《第二十一届县展相关情况报告及获奖通知》，被授予神奈川知事奖。

孙牧心先生

神奈川县美术家协会

会长 松田ヨシオ

事务局局长 中原敬子

第二十一届县展相关情况报告及获奖通知

您近来身体康健、工作顺遂吧。

感谢您参加了在四月举行的县展，您的作品受到了众多参观者的欢迎。经过协会严肃公正的审查，决定授予您神奈川知事奖。奖状、奖品将随后邮寄给您。今日随信附上展会印刷刊物。

这么晚通知您，我们表示很抱歉。

(原件为日文，曹溢灵译)

◎秋，为潘其鏊作序言《东方的喜悦》，此文后收入潘其鏊的第一本画集《诗性抽象世界》（人民美术

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另作有片段《那是往事》。

◎是年，日本某机构艺术家来访，接受对方采访。

◎是年，作画《三女人》《四重奏》。

一九八一年 五十五岁

按：自制年表一本年所标示的年龄为五十六岁，误。

◎据自制年表一，本年至一九八二年七月，仍在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工作。

◎春，接受香港《中报》记者李邝采访。李邝撰录的《江楼夜谈：答香港〈中报〉月刊记者问》后收录于《鱼丽之宴》。

按：据日文简历（原件为日文，曹溢灵译，下同），绘画作品曾作为封面刊登在《中报》上，同时发表的还有《木心作品选》和《木心老师访问记》。

八十年代，一个春风骀荡的夜晚，东海之滨，画家的工作室，我们有幸拜赏了木心先生近三年来的一百余幅作品。我们已闻悉他是个奇特的人，画着奇妙的画，待到目睹这成集成册的杰作，完全超出我们宿构的臆想。华严深灵，变幻莫测，分不清何为必然何为偶然，何为表象何为观念，只觉得凜然，萧然，翩然，陶然，盎然，嫣然……（李邝、木心：《江楼夜谈：答香港〈中报〉月刊记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页）

◎夏，从朋友处得知席德进已身患癌症。

◎八月三日，席德进病逝于台中市。当月，木心闻知席德进噩耗。

◎秋，上海工艺美术展销会布展结束，木心为设计组组长，同事有王琪森等。

三十多年前，应该是一九八一年的深秋吧，也是这样一个“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的季节，在上海工业展览馆西二馆筹办三年多的上海工艺美术展销会已基本布展结束。我和设计组的组长孙牧心告别时，他挺有风度且真诚地握着我的手说：“再会！再会！我在这里收一下尾，然后就去工艺美术研究所搞协会的事体，侬有空来坐坐 噢。”（王琪森：《握别之后》，2018年2月7日《新民晚报》）

本季，赴南京，在某医院拜访原上海美专副校长谢海燕。

一九八一年秋，我在南京的医院中会晤谢海燕先生，老校长一见就叫响我的名字，蔼然前辈之风使我感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分的坏学生，于是纷纷扬扬地共怀一番旧：包了火车去旅行写生哪！蔡先生的那些话到了今天反而更有现实意义哪！医生着护士来干涉，我们抗命又继续半小时才怅然结束。（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1页）

◎十一月二十五日，因出国需要请南京艺术学院开具《学历证明书》：

学历证明书

孙牧心，男，浙江省桐乡县人，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我院前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三年制西洋画系肄业，成

绩优良。

特此证明。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 刘海粟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 谢海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五日

◎是年，因担心出国资历不足，在夏葆元帮助下到上海交通大学代课，给学生上“艺术理论”课。

按：据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说是“‘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

时光行至一九八一年，我已调往上海交通大学，某日回单位又见木心，他拉着我沿草坪边走边说：“有好心人正帮助我去美国，已经有望。不过很担心本人的资历不足，出去恐怕勿来事（不行）……”我说不要紧，可以安排你来我校讲几堂课，发一张证书给你如何？我随即把课程表上匀出的两堂课改为艺术理论课。不几日，木心前来上课，先到我办公室打招呼，我竟然草草指点，让他独自寻找隔开几幢教学楼的地方上课，而没有陪同前往。那年我三十八岁，还是不懂事，但是比我更不懂事的恐怕是那个时代，竟至现在听起来整个儿的荒谬！（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7—148页）

◎是年，作画《舞蹈者》（两幅）。

◎是年前后作画《风景》。

一九八二年 五十六岁

按：自制年表一本年所标示的年龄为五十七岁，误。

◎六月，将留学美国的打算通过胡晓申告知了胡铁生，得到胡铁生的理解和支持。

一九八二年六月份的一天，木心悄悄对我讲：“晓申，我已找好担保，准备去美国。四年前，你父亲把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充分信任，委以重任，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我感激不尽！照理应在你父亲麾下继续工作，以回报他的知遇之恩，但若不出国去闯一闯，我此生的愿望和理想恐难以实现！现突然提出要走，我觉得又难以启齿，你能否帮我先吹吹风，让老先生有个心理准备。否则，他若不同意，我是肯定不能走，也不会走的。”当晚回家后，我便把木心的想法转告父亲，他沉默了许久，惋惜道：“人各有志啊！木心满腹经纶，一旦跨出国门，会有难以估量的发展空间！我第一次见他之时，便看中其才华，在这几年的工作交往中，与他有过几次深谈，这个木心，博古通今，不但国学功底深厚，就连外国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否则我不会连续委以他三个重要职务。《美化生活》有他在，发展会非常快，在全国一定是第一流的期刊。但你想想，他也50多岁了，这个年纪还想跨出国门，可见愿望之深、决心之大，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了。作为他的领导、朋友，应该支持他！”（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八月，《美化生活》试刊号出版发行。该刊由《美化生活》编辑部编，木心主编，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出版。本期栏目有：发刊词、论坛、纵横谈、放眼量、浪花·虹彩、学·问·答。《发刊词》为木心与胡铁生共同起草，徐天润《店面设计札记》一文的标题为木心题写。

发刊词

生活需要美化。

本刊是广大工艺美术爱好者与专业技艺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技术交流、经验交流的新园地，旨在探索生活领域里的美学原理，陶冶高尚的审美情趣，以提高社会文明文化程度。同时，还负有宣传产品，指导消费，提高欣赏水平，丰富实用美术知识的多重使命。读者对象是有关专业的技、艺人员，广大工艺美术业余爱好者，以及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

本刊的内容，每期有所侧重。撰稿者多数是本市工艺美术、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日用五金等行业的工艺美术家、工艺师、工程师、设计师、技师，也企望得到广大业余作者的来稿。

读者是我师，读者是我友，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美化生活》试刊号，1982年，3页）

初期只有木心是专职主编，其他的记者、编辑都是兼职的。当时我已调到研究所情报资料室从事专业摄影工作，也被吸收为兼职编辑。我亲眼看到，木心对每一篇稿件的终审均非常认真，封面也是他特意找老同学、当时上大美院副院长任意画的一幅抽象画，构思出于康定斯基的点、线、面原理，很有创意！试刊号

的出版为正式出版《美化生活》期刊打下了基础。（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出国鉴定表单位拒不盖章，经胡铁生出面协调后获准。

木心编制所在的工艺品展销公司不愿放他，父亲还亲自做了贺志英总经理的工作，这才帮木心在个人鉴定表上盖了公章，协助他办理了出国签证手续。出国前，木心还专门赠我两幅精品画作，留作纪念。（胡晓申：《追忆父亲胡铁生与木心先生》，《美化生活》，2017年第1期）

◎申请签证时因不符合出国条件而遭拒绝，出示自编画册后获准。

他的申请递上去了，美国人问到婚姻、年龄、赴美动机、美国有什么亲戚。好像木心都不符合条件。去美国什么目的？美国人怀疑。他的申请从窗口推了出来。

木心也很紧张，但他有准备，他是智者，来签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领事先生，请你看看这个。”

木心递上一本自己制作的画册，他为自己五十年人生而作的五十幅杰作，这是他预料必不可缺的一招。果然，美国人想揽尽天下人才，独霸世界资源的心态，让美国领事见猎心喜。一见如此独特的画风，从未见识过，立刻问：

“你画的？”

“我画的”。

“喔，很好，我给他们看看。”他转身离开窗口到里面去，木心在外面都看见，三个美国人在仔细研究这些作品。一会儿，签

证领事过来请木心进去，一反原来的态度，十分恭敬地对他说：

“你画得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不让你去美国，美国需要这样的人才，美国人都很优秀，像你一样，你应该去美国。”

木心的签证手续很快就到手，美国领事还不断向他说：“Wonderful, Wonderful。”（陈巨源：《与一代奇才木心的交往》，《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50—251页）

◎赴美前专程到北京向亲友告别，送王剑芬、王宁两家挂历各一幅。郑儒铎与王剑芬为木心购买了机票。

一九八二年舅舅出国前，专程去北京与大姐姐（王剑芬）、姐夫（郑儒铎）及二姐姐一家道别，并送给两家各一幅挂历，上面印有他画的“双鹭图”及题词。舅舅出国后，曾写信给大姐姐，还寄给她四本台湾出版的他的文学作品。（王伟：《在天国再相聚言欢：追忆舅舅木心与姐夫郑儒铎的交往》，《北京青年报》，2013年4月1日）

舅舅去美国留学，他们（按：指郑儒铎与王剑芬）出钱买机票，还送给舅舅白金项链等。一九九四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舅舅的消息。大姐姐非常着急，先后写了许多封信给舅舅（让我帮她写了信封）。可惜因为舅舅搬了几次家，均未收到。二〇〇三年，我终于在网上搜索到舅舅在美国举办画展的消息并告诉大姐姐，大姐姐听了非常高兴。（王伟：《在天国再相聚言欢：追忆舅舅木心与姐夫郑儒铎的交往》，《北京青年报》，2013年4月1日）

记得我临离中国时，专程去北京向亲友们告别，大甥婿说：“舅舅的画到美国展览一定会成功，而人生呢，最好是没有名利心。”我说：“你是哈佛剑桥双博士，国内拉丁文第一人，又是大银行家的长子，所以最适合讲这样的话，要脱尽名利心，唯一的

办法是使自己有名有利，然后弃之如敝屣。我此去美国，就是为的争名夺利，最后两袖清风地归来，再做你们的邦斯舅舅。”

（木心：《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8页）

◎准备出国的行李，自己缝制出国新装。

在他挥别故国的前夕，我常在晚上到他长治路隐蔽的居室里，与小翁三人默默地饮酒。他戴了老花镜，边饮边缝制他的出国新装，令人难以置信他竟还是一位服装专家，他那身讲究的穿着原来都是出自自己的大手笔。可惜在那个年代，他只能锦衣夜行，不敢招摇。（陈巨源：《与一代奇才木心的交往》，《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50页）

◎八月末，顺利地以“绘画留学生”身份赴美，暂居纽约布鲁克林。

一九八二年初秋，我离上海时，朋侪送行到机场，赋诗为别，诗曰：

沧海蓝田共烟霞，珠玉冷暖在谁家。

金人莫论兴衰事，铜仙惯乘来去车。

孤艇酒酣焚经典，高枝月明判凤鸦。

蓬莱枯死三千树，为君重满碧桃花。

（木心：《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6页）

木心亦谈及出国对自己的影响：

我自己也承认，我是到了纽约才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如果今天我还在上海，如果终生不出来，我永远是一锅夹生饭。（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38页）

出国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如果我不来纽约，很可能会就此默默无闻地过完寻常的一生。在美国，特别是这次我的巡回展，有很多人对我的作品表现出近乎狂热的喜欢。我走的不是单向的路线，而是多向的路，文学和艺术同时走。（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秋，与陈丹青在地铁上相识，两人均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进修。

按：陈丹青，一九五三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八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其间自习绘画。一九七八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一九八〇年毕业留校，一九八二年赴美留学，定居于纽约。二〇〇〇年回国并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二〇〇四年辞职。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余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著有《退步集》《荒废集》等。

那年元月我到纽约，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们在地铁遇见了，周围挤满乘客，有位我认识的上海画家陪着他，彼此介绍。问起出国前单位，他说是工艺美术机关，所以我不知他是画家，更不知他会写作。我记得他看人的眼神，锐利，专注，狡黠，还有我熟悉的沧桑：所有“文革”风雨活过来的中年人的沧桑。

当时我们同在曼哈顿一所美术学院混留学生日子——那也是一九二〇年代闻一多留学的学院，名叫‘艺术学生联盟’——八十年代，三五位上海留学生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馆胡扯，有时木心

也在。他年龄最大，总会逗人笑，但我俩没有深交。（陈丹青答，何晶、李嘉楠问：《木心使我洗去一点野蛮的根性》，《羊城晚报》，2014年3月23日）

陈丹青与木心相识后不久，将其转印画介绍给自己的画廊老板，有意为之办展，因风格不易为中产阶级买家所识，未果。

同年秋，我与木心初交，立即将转印画介绍给我当时的画廊老板。老板惊异，打算办展待售，终因画面过于深邃幽密，不易为中产阶级买家所识，放弃了，现在想来，简直庆幸，但我俩当时的失望，犹在昨日：他坐在画廊对过的IBM大厦咖啡厅等信息，见我回出，说：“看你走过来的样子，消息不好，心里一暗。”

此也或者是他收手不画转印画的缘故之一。[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51页]

◎秋冬之际，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间骨董工作室结识画家张宏图，一起给人修骨董，持续两个多月。

按：张宏图，一九四三年生，甘肃人。画家。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在中央美院学习，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在河北农村劳动，一九七三年在北京宝石公司做设计工作。一九八二年赴美，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学习，开始转变为政治波普风格的艺术家。

如果说纽约客个个都是异数，木心则是异数中的异数。木心一肚子学问，双目高深莫测，但是挂在脸上的微笑又使你感到他不会拒你于千里之外。木心永远文质彬彬，即使去打工也一定要穿戴整齐。我们的老板学艺术，来自台湾，比我和木心都年轻，

友好，直率，谈吐不俗。老板从骨董店大老板手中接过破损的木雕、瓷器等，我们的工作修修补补以掩盖其破损之处。（张宏图：《三十年前与木心一起修骨董》，《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38页）

口袋里只有四十美元，电话都不知道怎么打。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打车找房子上了。暂住于勃罗克林（按：即布鲁克林）。修理古董、波斯经典。（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名仕》，2006年12月）

◎冬，彩墨画为收藏家王季迁所看重，被部分收购。随后应王季迁之邀搬到曼哈顿林肯中心一带的高级公寓（西六十一街三十号大楼），彼此达成协议，木心享受一个月四百美元的生活补贴，王季迁则从木心每个月的画作中任选一张。

按：据陈丹青所述，木心抵美初期，迫于生计，又回到林风眠风格的纸本彩墨画创作。因彩墨画品相好看，有市场。直到留美晚期，再度回向转印画。[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50页]

王季迁（一九〇六～二〇〇三），又名季铨，字选青，别署王迁、己干等。苏州人，旅居纽约。工山水，尤精鉴赏。其收藏之富，为华人魁首，在海内外皆有影响。

为某收藏家看重，立即迁入曼哈顿林肯中心的豪华公寓。（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名仕》，2006年12月）

冬天搬来曼哈顿，与林肯中心几乎接邻，听歌剧，看芭蕾，自是方便，却也难得去购票。（木心：《林肯中心的鼓声》，《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9页）

◎是年，郑儒铎突发脑溢血去世，木心得知噩耗，只觉人生再无意义。

舅舅非常喜欢并敬重大姐夫（大姐夫比舅舅大五岁），陈丹青老师曾含泪告诉我：“木心在美国听到郑先生的噩耗后，（一边做饭一边流泪）说，只觉人生再无意义了。”在舅舅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大姐夫，譬如《林肯中心的鼓声》一文中，他写道：“我的大甥（应是大甥婿）在哈佛攻文学，问他的指导教授，美国文明究竟是什么文明？教授说：‘山洞文明。’正直的智者都躲在高楼大厦的‘山洞’里，外面是物欲横流的物质洪水——大甥认为这个见解绝妙，我亦以为然。”

在《文学回忆录》讲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一章中，舅舅也曾讲道：“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应是外甥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同样是《文学回忆录》，谈爱尔兰文学一章中，陈丹青老师记载，闲聊时舅舅曾提道：“六十年代我外甥女婿寄来英文版《叶芝全集》，我设计包书的封面，近黑的深绿色。李梦熊大喜，说我如此了解叶芝，持书去，中夜来电话，说丢了。我不相信，挂了电话，从此决裂。”（王伟：《在天国再相聚言欢：追忆舅舅木心与姐夫郑儒铎的交往》，《北京青年报》，2013年4月1日）

一九八三年 五十七岁

◎据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和日文简历，本年春参加日本第四十七回春季大展，以不透明水溶性颜料绘制的两件画作获“日本艺术新闻社赏”，并获美术家协会颁赠“特别颁”。同时介绍张宏图一起参展。

◎夏，陈英德、张弥弥、姚庆章等艺术家来访，初识陈英德、张弥弥夫妇。

按：陈英德，一九四〇年生于台湾嘉义，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学士，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研究所硕士，一九六九年到法国巴黎，入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班研读。从事绘画及艺术评介。

张弥弥，一九四三年生于福建泉州，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学士，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研究所硕士，一九六九年到法国巴黎，入巴黎大学博士班研读。从事音乐学与美术理论翻译及编写。夫妇两人长期为台北《艺术家》杂志撰文，并出版美术理论、译作与西洋艺术家传记等三十种。

姚庆章（一九四一～二〇〇〇），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一九七〇年赴美，为第二代超写实画家代表之一。绘画创作包括油画、水彩、绢印、颜色铅笔、压克力颜料、陶画等。

今夏在纽约，姚庆章等几位朋友相约到林肯中心附近去看一位自大陆来美不满一年的画家——木心，他们告诉我木心的作品

有成熟的特异的风格。我满怀高兴而去，因早就听说上海有极少数韬光养晦苦心孤诣的画家，今天我总算能看到这样一位了！

走进西六十一街三十号大楼，踏入木心的画室，明亮整洁，画具井然。左面墙上挂着一件山石造型的大幅风景画，墨色浓郁，立时给我一种深沉丰沛的力量，似乎预示着我这次访问将收获良多。

画家摊开一大卷这类长形的横幅，又摆出一叠如小方桌面般大、裱衬完整的别种类型的风景。当看到一幅题名《北暮》时，姚庆章高声说：“东山魁夷该拜倒于你的深度。”木心说：“不，我是迟到者，迟了二十年，三十年。”

三十年来，画家未曾有过展览。我看着仍然非常年轻的他——挺健、风趣、秀雅，好像并没有受过什么挫折；虽然无机会发表作品，我还是庆幸他能画出这样的画，而且有这样多的数量。那天以后，画家又约见我，向我展示了另一部分作品，那些画幅面颇小，却是密度极高，饱蓄着咫尺千里的气势——我惊异他为何这类画都如此之小，他说“不得已也”，这时我才恍悟他也不是什么幸运者。这些精致缜密的画，用心多于用力，是每日体力劳作之余，在斗室小灯下经年累月的心智结晶——我欣赏画家的耀目的才华，感动于他坚韧的意志，更惋惜他如果当年及时展览问世，以他的学养和艺术表现力，必定是六〇年代新艺术响亮顶尖人物！（陈英德：《看木心的超自然风景画》，《海外看大陆艺术》，陈英德著，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7年，351—353页）

木心与陈英德相识后不久，陈英德被他的绘画风格所吸引，决定要为他写一篇评论。随后木心接受陈英德的采访，并被要求提供一点书面资料以供参考。就在木心随意写成的片段中，陈英德、张弥弥夫妇惊见木心文笔超凡，于是力劝木心恢复写作。陈氏夫妇

回巴黎后不久就接到木心寄去的一叠稿件，自己读过后又将之寄给了当时主持台湾《联合报》副刊的痖弦。

按：痖弦，本名王庆麟，一九三二年生于河南南阳县。诗人、编辑家。一九四九年八月参加国民党军队，不久随军辗转台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少校军衔退伍，一九六九年任台湾“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一九七七年十月起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至一九九八年退休。著有《痖弦诗集》等。

一年前当朋友把他介绍给我时，我喜见到的是一位卓然的“画家”。看他在三十年封闭的环境中能作出那样的画，我在台北《艺术家》杂志写了一篇《看木心的超自然风景画》，表达了我的敬意和感动。为了写那篇文章，我曾要求木心给我一点书面的资料，就在他随意写成的片段中，我们惊见他的文笔锋芒的烁露。我们问：“为什么不写？”他答：“写的，自己写来，大多散失了。”我们就说：“再写！另一大群人将喝彩的。”木心果真提笔了。回巴黎不久，就接到他一叠稿件，我把它们寄给痖弦。痖弦热烈的反应让我高兴自己的文学嗅觉。痖弦在“联副”陆续以重要的版面刊登了那些文章，海内外呼声随即四起。就这样，我所认识的“画家”木心，成了众人瞩目的“文学家”木心。（陈英德：《也是画家木心》，《联合文学》创刊号，1984年11月1日，60—61页）

来美之初，单纯做个画家，倒也糊涂而松泛，画可以卖钱，钱可以买酒，帝力于我何有哉。不料造化弄人，像夏加尔所画的，从埃菲尔铁塔那边飞来一对天使，男的说：尔当作文章，写了交给我。女的说：你答应，我们就回巴黎，不答应，我们坐在这里不走。男女天使一起说：不要结婚，要写文章——记得我当时确乎昏昏沉沉清清楚楚地允承了下来，街头送别天使后上楼就写，一写十六年。命运之神有两只手，这手安排“那”，那手安排“这”，我是一介既不抗命也不认命的碌碌凡夫，而能守信于诺言

之践履：是不结婚，是没有停笔。（木心：《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9—80页）

除了陈英德夫妇，王渝和林泠亦向痖弦推荐过木心：

我是怎么认识木心的呢？其实那时我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作品。一个写诗的诗友，老朋友王渝，在海外编过报纸的副刊，认识木心。她说木心这个人诗与画都了不起，是个大人才。女诗人林泠也来信提到过他，在信上说他生活困苦。不久王渝寄来木心一些文章，我一看为之惊艳。（痖弦：《只种文学作物，不种其他庄稼：说说洪范的出版规》，《文讯》，2016年8月号，82页）

木心写作全用手写，为赶稿全力以赴，一天要完成八千至一万字的写作量：

精致华美的文字后面，是每天八千至一万字的工作量，全部手写。有次为赶一篇稿，他买好牛奶面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四天，稿子寄出，发现衬衫上一层白乎乎的小东西，原来虱子前来造访四天没有洗澡的人。（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按：有关木心恢复写作后的状态，其一九八四年在回答《联合文学》编者问时亦有追述：

写作习惯呢，说来真不怕人见笑，地下车中写，巴士站上写，厨房里一边煮食一边写，并非勤奋，我想：不写又作什么呢，便写了。最喜欢在咖啡店的一角，写到其他的椅子都反放在台子上，还要来两句：

即使我现在就走，也是最后的一个顾客了。

进度一天通常是七千字，到半夜，万字，没有用的，都要反复修改，五稿六稿，还得冷处理，时效处理，过一周、十天，再看看，必定有错误发现。如果把某一文的改稿放在读者面前就可知道，我有多窝囊。（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9页）

木心从我跟他认识之后不久就开始写作，一出手就很不得了。以他的年纪，写作就是在回顾他的人生了，刚刚出手，他就已经很老练了、很老辣了。在写作的木心其实是很宅的，他就是在家里写作，所以他应该不是那种你会在咖啡馆“遇见”的作家朋友。木心的家也是小小的，后来他搬的家我就没去过，他一九八〇年代在Queens的那个家还是很小，放很多书，有一点凌乱，但是很安闲、安逸，蛮适合他的。（刘道一：《听杨泽谈木心：“文学往事”口述系列之二》，《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58页）

本季，因未答应王季迁所提展示作画方式的要求，迁出林肯中心，搬到纽约皇后区牙买加（Jamaica，木心译作琼美卡）的米德兰（Midland Estates）地段。

◎八月二十八日作文《七克》，本月另作文《街头三女人》《在日本的第一次讲演》《林肯中心的鼓声》等。

◎九月十六日，陈英德写出《看木心的超自然风景画》。此文原刊于台北《艺术家》杂志，后收入陈英德著《海外看大陆艺术》，艺术家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八、九月间，在纽约经张宏图介绍结识《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诗人杨泽。此后作品亦陆续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

按：杨泽，一九五四年生，本名杨宪卿，台湾嘉义县人。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留学，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一九九〇年返台，一九九一年出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著有诗集《蔷薇学派的诞生》等。

我是一九八三年一月进《中国时报》的海外版，做记者跟编辑的工作，木心恢复写作之后，他的稿子我就会拿来登在“人间”副刊。当时的台湾，这边的发稿的编辑里，有一位你们大陆朋友很熟悉，就是作家刘克襄，“自然书写”那一脉的。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还问我当时的情形，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是不太知道木心是谁，但总之就觉得“这是杨泽选的稿子，肯定不会有错”这样子，也就登了。（刘道一：《听杨泽谈木心：“文学往事”口述系列之二》，《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59页）

◎九月、十月，据日文简历，九件彩墨画入选《I. M. A.展》（国际现代美术家协会主办）。此展在巴黎、东京、横滨巡回展出。同时介绍张宏图一起参展。

◎十月，到波士顿，在此写有小说《一车十八人》。

◎十二月，散文《街头三女人》发表于由旅美台湾诗人王渝任主编的《美洲华侨日报》文学副刊，此为木心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该文

发表后被陈丹青读到，主动联系，从此“密集交往，剧谈痛聊”。

按：王渝，笔名夏云，一九三九年生于重庆，长于台湾，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编有《海外华人作家诗选》，著有小说、诗歌等作品集多种。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九年担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副刊主编。

第一次收到木心的稿件，感觉是惊艳。怎么有人写得这么好，这么与众不同？他的书写不带一丝当时的大陆文风。这位来自大陆定居此地的作家，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我当即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不是向他邀稿，而是建议他投稿给台北《联合报》痖弦主编的副刊。我向他保证：他的作品正是痖弦在等待着的。虽然痖弦和我是好朋友，但是我工作的《美洲华侨日报》是一九三九年“美洲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在中共地下党人唐明照、冀朝铸等人支助下创办。在这样的左派报社工作，我不敢给台湾的朋友惹麻烦，和痖弦久已不通音信。但是纽约的华人读者到底太少，我为木心的作品感到委屈，希望更多人读到。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台湾了。（王渝：《木心印象》，《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33页）

一九八三年春（按：记忆有误，应是夏天），当地华侨日报文学副刊出现木心短篇散文《街头三女人》，一读之下，我很惊讶。那时我与王安忆和阿城通信，得到他们持续寄来的小说，写得很好，但是，不消说，是我们这代人的话语和故事。可是木心两篇小文让我读到一种老练的、久违的文体——如今我才明白，那就是民国作家的文风，是我少年时阅读鲁迅等等留下的文字印记——我立刻找人要到他的电话，拨过去，说，木心你写得真好啊。

他很平静，说，找时间见面谈。有天下午他来了，进门后点了烟，昏天黑地地聊。我做了夜饭留他，谈到凌晨两点。纽约地铁通宵运行，我送他回到他在杰美卡地区的寓所，上楼继续聊，他热了两杯牛奶，各自喝了，分手时已清晨四五点钟。

从此我们隔三岔五见，他带了刚写好的手稿给我看。再后来，我就一拨拨带了画画的哥们儿找他玩。（陈丹青答，何晶、李嘉楠问：《木心使我洗去一点野蛮的根性》，《羊城晚报》，2014年3月23日）

◎是年，初次到陈丹青寓所观看其画作。

◎是年，对四十年的写作经历进行了反思，发现过去写的东西没有找到个性。

我探索了四十多年，写了近千万字，大部分毁了。自毁。一直这样过来，以为自己会写的。可是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知道以前的东西没有找到个性，好像替别人在写。（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80页）

◎是年，参观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特展《凡·高在阿尔》。

一九八四年 五十八岁

◎初春，症弦接连来信。

一九八四年春初，诗人的信从巴士海峡来，又来，他的诗文本是特别令我心折神驰的，读近代中国诗，至此才深深惊喜叹佩了。他也像伍尔芙夫人他们那样执有某种缪斯的权杖。在一次散文朗诵会上，诗人朗诵了《林肯中心的鼓声》的片段（他竟自己击鼓！）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将会知道如何是好的。（木心：《散文一集·跋》，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237页）

◎四月，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大西洋赌城之夜》，此为木心在台湾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夏，接受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采访，即《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最早刊登于《联合文学》创刊号，后收录于《鱼丽之宴》。同时应该刊之邀，准备“作家专卷”。

一九八四年，“知名度”已臻及可以办一个“散文个人展览会”了——台湾要创制一份最大型的华美的文学期刊，《联合文学》，主编向我提议：推出一个“作家专卷”，包括散文个展、答客问、小传、著作一览，要在短期内完成而即付快邮。

区区自费留学生，每周至少三天要去学院进修，而在此时期日常撰文脱稿即发，以应纽约各报之约，实在没有库存可提，《联合文学》创刊号出版的日期已公布了，我连说声“有困难”也是多余的，所以我一口答应：好，准时寄到。

时维孟夏，寓处闷热，蓬头跣足，束紧腰带，这是一场恶战，“自”与“己”战，战赢了才好与“世”战。

不堪回首而实堪回味的那些朝朝暮暮，单间小房，下临大街，嚣嘈不舍昼夜，一条支路直冲我的窗子，风水是极凶的，我望之只作‘前程远大’观，阵阵熏风中，我埋头疾书——《明天不散步了》，《恒河·莲花·姐妹》，《遗狂篇》，《哥伦比亚的倒影》……上学院签个名，躲进图书室，写，来回的地铁中，写，噢，过头三站了。（木心：《迟 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4—85页）

◎六月，经陈丹青介绍，应邀于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国家画廊举行水墨画展。此次为群展，展出的画作多半为“文革”期间所画。作品受到好评。

按：此次画展的时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和叶瑜荪《孙牧心》均作一九八四年，经陈丹青确认亦为该年。而木心提供给周乾康的简历和《木心画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的《木心简历》均误作一九八三年。

◎十二月十日至二十日，经陈丹青介绍，由巫鸿策划和组织，于哈佛大学亚当斯学院举行题为“木心：思想的风景”（Mu Xin: Landscape of the mind）彩墨画展及收藏仪式。此为木心出国后的第一次个展，获得美国美术界和各大艺术杂志的同声赞誉。

按：《木心画集》（广西师大版）亦作一九八四年，叶瑜荪《孙牧心》误作一九八五年。木心在赴哈佛前夕感慨系之，写成诗《赴亚当斯阁前夕》。

巫鸿，一九四五年生于四川乐山。一九六三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一

九八〇年前往哈佛大学求学，于一九八七年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一九九四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芝加哥大学聘请主持该校亚洲艺术的教学。目前为该校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和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著有《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等。

甲子（一九八四年）秋暮，予应邀赴波士顿哈佛大学，举事绘画个展，寓亚当斯阁（按：即亚当斯学院），备蒙优渥。时近耶诞，每夕庆娱频呈。犹太裔美籍女史裘蒂，专攻蒲氏《聊斋》。异矣，自名为九迪韵矣。知予悦曩昔之Jazz乐，雪晚相约驰车夜总会。会名“最后之采声”，入见陈设一如卅年代风调，其中憧憧如离魂者，似多“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态，蓬却继起《卡萨布兰卡》主曲无误也。九迪风姿娴变，背影仿佛英格丽·褒曼当年。巫鸿君伟岸若古罗马壮士，而锦绣其中，轩轩霞举，与九迪共蹁跹，全池为之生辉。

同座宪卿最幼，精妙现代诗，尤耽南渡词章，拟论吴梦窗辈，取博士学位。斟饮间，以为唐宋踴舞，亦每流癫狂。予然其说，昔张爱玲尝表此见，乃诵宿句“曾记弦歌中宵，舞散青螺髻”。宪卿称赏大，索全阕。惜不复忆逋，唯下半依稀：“自别后，胡沙幽雪，风尘几掩玉笛。何日重来？酒润珠喉，更唱那三叠。市桥人静，共看一星如月。”宪卿莞尔目击，知我行窃《两当轩》也。

时九迪、巫鸿舞罢归座，欲悉我等何以为噱，宪卿虽谙英语，猝然无由信雅而达也。（《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十七，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48页）

早于一九八四年我在哈佛亚当斯阁举行个展，哈佛的东方学术史教授罗森菲奥说：“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画。”耶鲁美术史教授列克朋哈说：“现代中国画中我最喜爱你的画。”（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巫鸿是这次木心哈佛画展的主要策划人，据他回忆此次展览没有一分钱筹备金，凡事多由他和陈丹青亲力亲为。

一九八四年时我正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修博士学位，也同时在亚当斯学院做助教。后者以文艺著称，很多知名的艺术家都毕业自这里，我那时负责它的美术和美术史方面的活动。学院里有一幢从西班牙搬来的十六七世纪的大厅，非常宽敞典雅，我觉得很适合做一些精美的展览，所以就 and 院长商量。院长罗伯特·凯里是做文学的，喜欢中国文化，也来中国访问过，很支持我的想法。我做的第一个展览是陈丹青的个展，他跟我提到木心。之后我在纽约见到木心，同时看到了他的画，我当即就说很愿意在哈佛大学为他办一个展览。

我在美国做大型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此前做的如木心、陈丹青、罗中立、张宏图、张健君、裘德树等艺术家的个展都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展览代表了特殊历史状态中中国和外界的重新相遇。当时的语境很清楚：中国和外界自“冷战”后就脱节了，美国人对中国美术的印象停留于古代山水画和“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对于陈丹青等写实主义的画家他们不知道，对于木心这样的艺术家也不晓得。当一些鲜活的中国艺术家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个时刻就很有意思。这些画家，也包括我自己，在进入那个场合时都很兴奋，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非商业的地方，而且是在美国的最高学府里展示作品，感到很纯粹也很舒服。

木心那个展览一分钱筹备金都没有，我和陈丹青开着小车把木心的画作从纽约拉到哈佛，在车顶绑了几个画框。途中停下车，发现画框不知去向。那是个不大的展览，但是衍生出来的东西很多，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谈它。我做过的一些更大型的展览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这也充分证明了木心艺术的力量。（巫鸿：

《木心本身即是艺术品》，《木心：告别与重逢》，为《生活月刊》第121期别册，张泉主编，2015年12月，45页)

此次展览巫鸿请来的都是比较有名的美术史家和学者。期间，木心在亚当斯学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第一次展览是非公众性的，我请来的都是比较有名的美术史家和学者，是一种小范围内类似于雅集的观赏和交流。而且他向来尊重哈佛大学，在那里办展览对他的意义不一样。他也很高兴。展览期间，他在亚当斯学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来还写了文章，把它称作“亚当斯阁”，挺有意思。别人不会称它为“阁”，他的独特可见一斑。（巫鸿：《木心本身即是艺术品》，《木心：告别与重逢》，为《生活月刊》第121期别册，张泉主编，2015年12月，46页)

哈佛画展之后巫鸿应木心之约撰有绘画评论《木心·梦·隐》，因文章观点不被木心认可始终未发表。

我于一九八四年在哈佛大学策划木心的首次画展之后，木心告诉我香港的一家杂志计划刊登一篇介绍他的艺术的文章，建议我写。我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木心·梦·隐》的文章，把他和中国传统的“隐居文化”联系起来，又把他的风景画和历史上一一些遁世者所想象的“梦境”进行了比较，他很不喜欢这样的联系，所以我始终没有发表那篇文章。（巫鸿：《读木心：一个没有乡愿的流亡者》，《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巫鸿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27页)

◎十一月一日，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出刊。刊物由痖弦亲任社长兼总编辑，台静农扉页题字，编辑委员达二十一人，其中包括梁实秋、白先勇、林文月、余英时、李欧梵、夏志清、陈映真、刘绍铭等。作者中有梁实秋、吴大猷、余光中、司马中原、琦

君、夏志清、周梦蝶、洛夫、郑愁予、杨牧、周策纵、陈冠学等。本期特设“作家专卷”，题为《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刊出《木心答客问》《木心小传》《木心著作一览》和陈英德《也是画家木心》。“木心散文个展”中发表《明天不散步了》《恒河·莲花·姊妹》《遗狂篇》《哥伦比亚的倒影》。

我当时主编《联合文学》，挂名社长兼总编辑，第一年是我自己编的，那时心里打算着能不能给木心做点事。

.....

一九八四年《联合文学》推出木心专号，题名“散文个展”，还用显著的标题“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痖弦：《只种文学作物，不种其他庄稼：说说洪范的出版规》，《文讯》，2016年8月号，82页）

编者在本卷的导言里说：

经由联副，木心在文坛一出现，即以迥然绝尘、拒斥流俗的风格，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注目，人人争问：“木心是谁？”为这一阵袭来的文学狂飙感到好奇。身逢动乱，木心的经历不平凡，成就也不平凡。在极为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自我的生活理念、文学立场，像在一座孤岛上一样，不间断地从事创作。因此，所谓“文学鲁滨逊”之说，实深含傲然雄视之情。面对这样一位作家，《联合文学》满怀惊喜。经过长达三个月时间的筹划和联系，终于集木心小传、著作一览、木心答客问及其散文新作四帖等而成此一专卷。本卷含融木心人生观照、艺术风情，是“国内”首度最完整的呈现。（《联合文学》创刊号，1984年11月1日，47页）

据《木心著作一览》统计，木心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创作的“论文”“小说”“散文”“诗”“剧本”“旧体诗

与词”共二十种，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按：应是八月）至一九八四年八月创作的“散文”“小说”“诗”共四十篇（首）。其中在《联合文学》创刊号推出之前，木心已在台湾公开发表散文、小说和诗歌二十九篇（首），发表的刊物主要集中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全录如下：

（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六年）

【论文】《汉姆莱特泛论》《伊卡洛斯诠释》《奥菲斯精义》[\[1\]](#)

《伽米克里斯兄弟们》（九篇集）

【小说】《临街的窗子》《婚假》《夏逝的赦免》《危险房屋》《石佛》《克里米亚之行》《伐哀尔独唱音乐会》《罗尔与罗阿》《木筏上的小屋》

【散文】《凡仑街十五号》（一百篇集）

【诗】《如烟之姿》（长诗）《非商籁体的十四行诗》（一百首集）《蛋白质论》（短诗集）《十字架之半》（短诗集）

【剧本】《进来，主角》

【旧体诗与词】《玉山羸寒楼余烬簃》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九八四年八月）（按：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有误，应为八月起）

【散文】

《联合报》：《大西洋赌城之夜》《林肯中心的鼓声》《街头三女人》[\[2\]](#)

《你还在这里》《竹秀》《空房》《S.巴哈的咳嗽曲》《咖啡弥撒》《七克》《爱默生家的恶客》《月亮出来了》《随想

录》《中国时报》：《试问美国人》《烟蒂》《末班车的乘客》
《圆光》《同车人的啜泣》《上当·荒年》《童年随之而去》《丑
书·智蛙·疯树》《草色》《第一个美国朋友》纽约各报：《在日
本的第一次讲演》《大师的废物》《上代的美人》《纽约的鸽
子》《失而复得的姓名》《性感未来学》《邪念的实录》《大雅
与大俗》《忆“M·D·书屋”》

【小说】

《联合报》：《一车十八人》《中国时报》：《夏明珠》
《两个小人在打架》《完美的女友》《寿衣》《芳芳No.4》

【诗】

《联合报》：《再访巴斯卡》纽约各报：《托尔斯泰的奢侈
品》《俳句九十九》

【笔名】（一九一四年～一九八四年）

吉光、高沙、裴定、马汗、桑夫、林思、司马不迁、赵元
莘、杨蕊

给王渝送去一份《联合文学》创刊号中“作家专
卷”的复印本：

其实，木心已经给台湾投稿了，而且正如我所料，痖弦非常
欣赏他。后来《联合文学》还为他出了专辑。他特地到我办公室
来，送一份专辑的复印本给我。向来沉稳、喜怒不形于色的他，
那天真正开心了，一脸忍不住的笑意。（王渝：《木心印象》，
《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3年，134页）

◎据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中的《木心小传》，
本年被邀请为“国际现代美术家协会”名誉会员，国际
现代美术家“I. M. A.展”评审委员。

按：据叶瑜荪《孙牧心》，一九八二年获日本艺术新闻奖、特别优秀奖，受聘为国际现代美术家协会（IMA）展评审委员。与《联合文学》创刊号中所示时间有出入，有待考辨。

◎是年，据日文简历，《中国时报》美国版、香港月刊《艺术家》、台湾杂志《艺术家》分别刊登、报道了木心的绘画作品，并一致给予了“他独特的画风在世界美术发展进程中占据了与众不同的地位”的高度评价。

◎是年，作诗《门户上方的公羊头》《赴亚当斯阁前夕》，作文《九月初九》。

一九八五年 五十九岁

◎三月，小说《一车十八人》，散文《你还在这里》《街头三女人》《在日本的第一次讲演》《七克》《林肯中心的鼓声》被收录于《海洋文选：〈美洲华侨日报〉文艺副刊作品选集》，《美洲华侨日报》编辑委员会编，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秋，在纽约陈丹青家中经陈丹青介绍结识作家钟阿城。

按：钟阿城，一九四九年生，北京人。在山西、内蒙古插过队，当过云南农场农工。回城后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东方造型艺术中心、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棋王》《孩子王》《树王》等。

◎十一月，散文《圆光》发表于《上海文学》本年第十一期“散文之页”栏目。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木心在大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是年，经郭松棻介绍结识童明。

按：据童明回忆，本年稍早时候他经郭松棻介绍与木心相识，“当时人比较多，也比较拘谨，两个人客套一下，没有建立主题”（《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中童明的发言，2015年8月8日，首都图书馆）。第二次见面时童明已读到木心的《散

文一集》，疑是样书。随后，童明与郭松棻、曹又方、木心经常见面，交流愈加频繁。

郭松棻（一九三八～二〇〇五），生于台北。一九五八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王怀和他的女人》，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六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比较文学，一九六九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七一年放弃博士学位，投入“保钓运动”，被长期列入黑名单，无法返台。曾在联合国任职，旅居美国纽约。著有小说集《郭松棻集》等。

童明，本名刘军，陕西西安人。一九七五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一九八一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研究生毕业证书，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任联合国纽约总部译员，一九九二年获美国麻省大学英美文学博士。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教授。著有《现代性赋格：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等。

◎据叶瑜荪《孙牧心》，本年于世界贸易中心纽约州政府画廊举行水彩画展。同年入选美国传记中心名人录。

◎是年，大都会美术馆举办卡拉瓦乔特展，曾随陈丹青一同前往参观。

按：木心不喜欢写实画，对卡拉瓦乔、库尔贝、珂罗等写实派画家评价不高。其留美期间，经常性地前往参观相关美术馆和博物馆举行的各类展览。

◎是年，作诗《波尔多的钟声》。

◎是年，作画《情人的坟墓》。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

◎作画《人体素描》。

一九八六年 六十岁

◎二月，经痙弦和叶步荣之手，《散文一集》由台湾洪范书店出版。此为木心平生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篇目：《序》《大西洋赌城之夜》《你还在这里》《圆光》《童年随之而去》《试问美国人》《烟蒂》《末班车的乘客》《七克》《同车人的啜泣》《空房》《街头三女人》《林肯中心的鼓声》《草色》《S.巴哈的咳嗽曲》《竹秀》《恒河·莲花·姐妹》《遗狂篇》《两个朔拿梯那》《爱默生家的恶客》《明天不散步了》《咖啡弥撒》《哥伦比亚的倒影》《跋》。

按：洪范书店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在台北成立，创办人包括痙弦、杨牧、叶步荣、沈燕士，是一家决意走精致文学路线的出版机构。叶步荣为主持人兼总编辑。

我跟叶步荣讲，木心的书可以出版，虽然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但是绝对有意义。后来叶步荣积极跟他联络，就出了《散文一集》（一九八六）、《琼美卡随想录》（一九八六）。

木心有洁癖，美学上的洁癖，因为他是画家，他的书一定要自己设计封面，字型、纸张、纸质、台数通通都非常严格的定好，叶步荣样样都合他的意。（痙弦《只种文学作物，不种其他庄稼：说说洪范的出版规》，《文讯》，2016年8月号，第82页）

◎二月二十三日，元宵节，参加彭亨宴后作旧诗一首：

雪消春临，骤暖若惊，繁花领露，细草贺晴。窃念野隐不得，朝隐不欲，市隐则身丁大劫，縲绁十二载。今作奇隐，隐于异国，息交绝游，晏如愚如也。

乱世受人制，早明莱公妻。

阊阖复东渐，我住阊阖里。

群狐正丘首，孔雀西北飞。

不知多许事，低头餐蛤蜊。

围阨高明户，魑魅呼魑魍。

衣锦终不归，长安难安长。

盗泉水自甘，恶木荫可留。

所欢在风尘，故作风尘游。

交谊美忘年，率性即天伦。

牛背新稚子，浮屠故情人。

竹林风流尽，海外酒常佳。

捐弃万古愁，勿复读《南华》。

昔无今有余，昔有今不足。

我亦行我素，毋劳季主卜。

大风吹南冠，投簪别洪流。

嘹唳在四海，志若无神州。

年来气转清，临岐少踟蹰。

灯下记落寞，不涉椎心事。

丙寅上元纽约彭亨宴后

（木心：《西班牙三棵树》三辑·其十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51页）

◎三月二十三日，陈丹青在纽约家中为木心过六十岁生日。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满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18页）

按：陈丹青在《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一文中将此次过生日时间误作一九八七年。

◎五月九日下午，由美国华语报《中报》“东西风”副刊主编曹又方发起并主持的“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在纽约《中报》会议室举行。木心本人出席了此次讨论会，与会者另有旅美台湾小说家、联合国高级翻译组资深翻译家郭松棻，旅美台湾诗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杨泽，旅美台湾文艺史论家、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渝，旅美台湾诗人林泠，旅美大陆学者、北美中文季刊《知识分子》主编梁恒，旅美大陆画家陈丹青。（《关于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附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按：曹又方（一九四二～二〇〇九），本名曹履铭，曾用光虹、金名、衣娃等笔名。出生于上海，台湾世新大学毕业，旅居纽约，创办并主编美洲《中报》“东西风”文艺副刊。后定居台北，主要从事报纸、图书公司、杂志社的编辑工作，曾任台湾圆

神出版社、方智出版社发行人。著有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著作六十余种。

李渝（一九四四～二〇一四），生于重庆，五岁时随家人到台湾。一九六二年第一篇小说《夏日·一街的木棉花》刊登于《文星》月刊。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定居，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系郭松棻的妻子。

林泠，本名胡云裳，生于一九三八年。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一直服务于美国化学界，主持药物合成研究。同时又是一位女诗人，著有《林泠诗集》等。

梁恒，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一九八四年在纽约创办中文季刊《知识分子》，并担任主编。因受索罗斯的邀请，出任其中国事务私人顾问以及在中国的私人代表。

出于我的缘故，木心在纽约也开始有了一个台湾文学的小圈子。木心当时在台湾发表文章，慢慢地也就成了一个作者。那个时候，我、木心、曹又方，还有郭松棻，我们四个人，三男一女，经常在一起聚，吃饭、聊天，有的时候也去China Town里面的“东方书店”，郭松棻老师的夫人李渝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艺术评论家，她倒是没有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圈子后来做的一件事，就是给木心办了一次作品讨论会，发表在曹又方当时所在的《中报》副刊上。……当时我们四个人的聚会，主要都是在谈文学，也是郭松棻为主的，木心当时还主要是一个画家的身份。（刘道一：《听杨泽谈木心：“文学往事”口述系列之二》，《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61—162页）

关于此次讨论会，曹又方在主持人开场白中做了如下交代：

“东西风”为了充实广大读者的艺术欣赏，推助华裔作家的文学活动，尝试举办专题座谈会，以后将在取得经验和效果的基础上，拓展这一设想和计划。

我们认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必然与不同层面的读者有着不同层次的内在联系，而又必然与文学同行依存着“疑义相与析”的学术契缘。因此，我们邀请了几位文学经验丰富的作家、评家，对近年崛起于海外文坛备受赞扬的木心先生的作品（此次以他的《散文一集》为对象）进行一次评鉴讨论。虽然限于时间和条件，还不可能做到周致详畅，然而我们希望有所裨益于读者们对一位作家的特性风格的理解和品赏，从而透视到文学潮流的客观规律的繁复性，和作家本身的主观因素的自为能动性，两者的深刻关系是十分饶有兴味而发人省思的——我们编辑工作者，在加强华裔作家共同构成的文学事业的整体功能上，尽一份媒介催化的作用，是应尽的责任，也是赏心乐事。（《关于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附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页）

◎六月二十日，“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发言文本在《中报》“东西风”副刊连续三天整版刊出。

◎夏，作《西班牙三棵树·引》。

◎八月，《大西洋赌城之夜》被收录于《海的哀伤》，田新彬选编，台湾希代书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九月，《琼美卡随想录》由台湾洪范书店出版。篇目：第一辑《如意》《剑柄》《我友》《王者》《圆满》《心脏》《将醒》《呼唤》《休息》《除此》《无关》《烂去》《问谁》《败笔》《迟迟》《走了》《出魔》《笔挺》《缀之》《尖鞋》；第二

辑《噫语》《俳句》《风言》；第三辑《上当》《但愿》《福气》《真的》《再说》《很好》《智蛙》《疯树》《不绝》《棉被》《步姿》《新呀》《荒年》《同在》《笑爬》《邪念》《放松》《某些》《认笨》《引喻》《怪想》《多累》《呆等》《卒岁》《后记》。

◎十月，台湾女学者郑明俐的学术专著《现代散文纵横论》由台湾长安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两辑“综论”和“个论”，“个论”中包括“木心论”（另有“陆蠡论”“琦君论”“余光中论”“林耀德论”）。

木心的散文，确然有它不可多得的优点。这种以知性、智慧以及生命来建构的心血结晶，必不容易登上销售排行榜的名次，也不容易进入年度选集中。因为大部分读者没有耐心及精力来细读理解这类厚重、凝练的知性作品。然而，就现代散文的发展而言，这样的散文实在是值得开拓的一种类型，值得作者去努力耕耘，也值得读者去细心再三品味。（郑明俐：《木心论》，《现代散文纵横论》，郑明俐著，台北：长安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8年再版，87页）

◎十一月十一日，《寒砧断续》刊载于《联合报》。

◎是年，从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按：台湾称为纽约联合艺术学院）毕业。（《台湾美术年鉴·一九九四美术人名录》，雄狮台湾美术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是年，为纪念席德进逝世五周年作《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另作文《晚来欲雪》。

◎据叶瑜荪《孙牧心》，本年于纽约市政府画廊举行版画展。

◎是年，入选《海外华人名人录》（北京）。

一九八七年 六十一岁

◎分别于一月十六日、九月二十八日给台湾读者林慧宜回信（总共给林慧宜回信五封，其中一封被同学窃走，写作时间和内容不明），其中说道：

来信收悉，感谢您数年来的关怀。

从信上看，您极有文学的气质，如果准备考大学的文科，希望您进外文系（中文可以自学）。倘若志愿是别的，那么文学作为一种素养，而业余也可以从事文学的欣赏和写作——别辜负了您优异的禀赋。

您爱读俄罗斯文学家的作品，我很高兴，俄国文学朴厚精深，充满伟大的仁慈，年轻人从这一点上开始他的文学生涯，预示着您的美好的前程。

（一月十六日）

来信都收到，每次看完就想好好作复（你的信内涵很丰富），而繁琐的世务总是纷至沓来。即使此刻决意为你执笔了，也自知是写不透彻的。

祝贺你考入外文系，什么大学呢？下信请示知。

你喜欢看我的书，不要急于写读后感。将来你该写的是“评论”。

然要到你四五十岁时才适宜此类评论。你现在就要努力写作（写你自己的）。

不能等什么知识经验够了才写作，因为文思文笔是靠从小就训练起来。

如无“幼功”，就成不了大器。读完大学，即来纽约留学，然后再去英国取博士学位。为时虽尚早，而要立定志向。你有极佳的天赋，是台湾青年中的“异数”。可惜以前没有得到好的指导，所以急需重新启程。举些小例子，写字要临碑帖的根基，你得安排出时间来练习（毛笔字）。照理应从篆隶起手，再转楷书、行书、草书。但已不可能。你就临王羲之的《圣教序》吧。写信呢，也得符合基本的格式。起首没有称谓是不礼貌的。

你寄来的《艺术家肖像》，我从前瞥见，文中描述的那个人，我认为算不上艺术家，只不过是古之“清客”，今之“UP”。他无大爱、大恨，所以创造不出足以传世的艺术品，他，还是“俗”的。

再者，你翻覆地阅读我的两本散文，这是不良的读法。一本书看过后，至少要隔半年，重看起来才有新的感觉和发现。而像《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这样的巨著，你的年龄、经历是不胜负荷的。你急于看西欧及俄罗斯的诗、散文、小说等，先看了再说，不要以为就此看懂了。

中国只有古代文学，现代则除了鲁迅、张爱玲，就没有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可言（这也正是你的见解）。

我觉得你目前急需补的是历史、哲学、音乐、美术这几方面的常识和专门性研究，所以希望你早日能到纽约来，下五年十年的苦功，你才能奠定基础。而目前我等待你寄作品来。

（诗、散文、随感），今后把写信的心力放在你自己的作品上。

一支笔的成熟至少需要二十年不停不歇的磨练。

在美国的几个朋友，都感叹没有人可以评论我写的书，我却十分明白，并非我有什么特异，而是这个中国根本没有文学，没

有文学家——我对你抱着洪大的希望。二十年后，你写《木心评传》。

(九月廿八日)

◎春，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采访，内容见《雪夕酬酢：

答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问》（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1—58页）。回答中说平均每天两三个小时阅读，十一二个小时写作。

◎据叶瑜荪《孙牧心》，本年于纽约格林威治村维克斯贝茨画廊举行版画展。

◎是年，在画家李全武的介绍下于纽约曼哈顿上城一家餐厅结识画家曹立伟。

按：李全武，一九五七年生于湖北黄冈。一九八一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一九八二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后担任湖北艺术学院美术教师。现旅居美国。

曹立伟，一九五六年生于辽宁沈阳。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并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一九八六年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波斯学院攻读硕士，一九八九年毕业。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四年为纽约画廊画家。二〇〇四年回国，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是年，作诗《牛奶·羊皮书》《FARO》《俄国纪事》《夜宿伯莱特公爵府邸有感》《点》《中古一景》《恋史》《骰子论》《春聆》。

◎是年，《夏天最后的赋格》刊登于纽约《知识分子》杂志本年第二期。

一九八八年 六十二岁

◎二月二十二日，《法兰西备忘录》刊登于《中报》“东西风”副刊。

◎二月，《即兴判断》《温莎墓园》《西班牙三棵树》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

《即兴判断》篇目：《代序（答中国时报〈人间〉编者问）》《论美貌》《塔下读书处》《昆德拉兄弟们》《九月初九》《游刃篇》《夏阑三简》《眸子青青》《圣安东尼再诱惑》《已凉未寒》《麦可和麦可》《寒砧断续》《寄白色平原》《晚来欲雪》

《从前的上海人》《聊以卒岁》《普林斯顿的夏天》

《温莎墓园》篇目：《序》《美国喜剧》《一车十八人》《夏明珠》《两个小人在打架》《SOS》《完美的女友》《七日之粮》《芳芳No.4》《魔轮》《月亮出来了》《第一个美国朋友》《寿衣》《静静下午茶》《五更转曲》《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出猎》

《西邻子》《温莎墓园》《西班牙三棵树》篇目：

《引》，一辑《中世纪的第四天》《咕囔》《寄回哥本哈根》《祭叶芝》《赴亚当斯阁前夕》《北美淹留》《〈凡·高在阿尔〉观后》《西岸人》《夕殿》

《母与歌德言》《夏夜的婚礼》《春寒》《十四年前

一些夜》《丙寅轶事》《FRACTURE》《十八夜 晴》
《泥天使》《面对面的隐士》《JJ》《斗牛士的袜子》
《雪后》《论拥抱》《旋律遗弃》《如歌的木屑》
《涉及爱情的十个单行》《甜刺猬》《我的主祷文》
《末期童话》《晚祷文》《托尔斯泰的奢侈品》
《啊 米沙》《再访巴斯卡》《剑桥怀波赫士》，二辑
《艾华利好兄弟》《啊，回纹针》《第二个滑铁卢》
《南极·青草》《埃及·拉玛丹》《无忧虑的叙事诗》，
三辑《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
《其六》《其七》《其八》《其九》《其十》
《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
《其十六》《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

按：曹又方与简志忠合作，参与了这三本书的出版。简志忠，一九五五年生于台湾彰化县，为圆神出版社创办人，圆神出版集团董事长。

◎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十四日前后两次给林慧宜回信，其中说道：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由于过久不闻音讯，颇费猜测。

读了你此次的信，仍不解前一段如此漫长沉默的真实原故。

盼你的“暮春长简”寄来，或能释我大惑。

你的诗，我翻覆读了，情致是深的，前后构思是妙的。表现的方式却流于散文化。分行分句不要学时尚的取巧。在你目前的阶段，写作第一要自然，如果强求深刻，奇特，便造作了。深刻奇特是要经过长期修炼才得到的。初始而强求，反而阻塞深刻而奇特的路。

圆神出版社已经将我的《即兴判断》（散文）、《西班牙三棵树》（诗）、《温莎墓园》（小说）印行了。

（四月廿四日）

五月四日之札顷悉，四月十一日的信也收到。这几个月来忙于画展，还得忙一阵子，故先草草简复，免你焦念。

二月二日的信怎会退回？请检视一下，是否地名或邮政编号有误，——四三二，错一字就收不到。

该信请再寄给我，好吗？其实我可以付印的书手上有着三部稿本，洪范书店认为“不通俗”，赚不了大钱，（其实《散文一集》和《随想录》按销书的单据看，一上市差不多就卖完的。大概书店主人本来认为我的作品能成为畅销书，那是估计错了）。

《雄狮美术》杂志二月号有《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写我与画家席德进的一段往事，或者你可以找来看看。（此文在纽约、加州等处反应颇强，接到不少信和电话。）《温莎墓园》在北美华人文学圈中几乎没有回响，台湾则痖弦先生来信表示赞许，诗人杨泽也以电话叫了两声好。

你问：“有没有人告诉您他是您最好的读者？”有，不止其一，但仅只含有这样的意思。

话可不是这样直接出来的。你要的“位子”无疑是得到了，前提是：在三十岁以下的读者中，你是最最好的读者，首席读者。

“浪漫”与“节制”在字面上不能对称，也不确切。但我能明白你的见解。

“发乎情，止乎礼”，这情也许大了一点，礼也大了一点，所以与常情常理不同，一般人就觉舛谬，群起而斥我为异端。而你确（却）认为这情这礼是“极大”的，那么，惭愧地谢谢你的勉慰了。

你目前正处于毕业和会考的重要阶段，暂时忘掉这些文学的事吧。以后我们有机会细细谈。纪念册、毕业赠言这类有趣的韵事，我拙于措辞，只能赠你以别的礼物，容后寄奉。

(五月十四)

◎九月二十一日，《良俚（外二章）》（按：“外二章”为《口哨》和《雪礼》）刊登于《中报》“东西风”副刊。

◎年底，李全武、金高、章学林、曹立伟恳请木心以讲课方式定期谈论自己的写作，遭木心婉拒。

按：金高（一九三三～二〇〇六），女，北京人，油画家。一九五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专业画家、副主席。一九八三年与丈夫王济达移居纽约。

章学林，版画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居杭州。

◎据叶瑜荪《孙牧心》，本年于台湾鼎典艺术中心举行版画展。

◎是年，作诗《艾斯克特赛马纪要》《寄回波尔多》《南欧速写》《致H·海涅》《参徐照句》《无鱼之奠》《咖啡评传》《爱斯基摩蒙难记》《古拉格轶事》《巴珑》《白夜非夜》《罗马停云》《东京淫祠》《五岛晚邮》《魏玛早春》《埃特鲁里亚庄园记》。《埃特鲁里亚庄园记》附注：

今岁平安夜风雨凄其，翻书翻到那十卷（普林尼自纂其九，其十系他人所搜），在二百四十七帖中，我择了致弥提乌斯的之一，致塔西陀的之二，试加分行、断点、叶韵，删之增之，蘧蘧结体——（木心：《埃特鲁里亚庄园记》附注，《巴珑》，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44—245页）

一九八九年 六十三岁

◎从本年始至一九九四年，应旅居纽约的一批艺术家之请，开讲“世界文学史”。元月十五日，在画家高小华家开课。

自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也是木心恢复写作、持续出书的时期。大家与他相熟后，手里都有木心的书。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木心在大陆时，与体制内晚生几无来往，稍事交接后，他曾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这样子算什么呢？”木心在电话里对我说，但他终于同意，并认真准备起来。

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五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那天满室哗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

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后记》，《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86—1088页）

我们讲课，称作学校、学院，都不合适。当年柏拉图办学，称逍遥学派，翻译过来，就是散步学派，很随便的，不像现在看得那么郑重。

学林、全武，是筹办者。平时交谈很多，鸡零狗碎，没有注释，没有基础，如此讲十年，也无实绩。很久就有歉意了，今年就设了这个讲席。（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页）

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光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当初宣布开课，他兴冲冲地说，讲义、笔记，将来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后记》，《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84—1085页）

我聆听了几堂先生的“世界文学讲座”，一帮滞留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内有台胞），推举木心为大家讲点什么，“为解乡愁”或

“集体取暖”，也为我们的听课费（一次美金二十元）可解决他的部分生计？在我聆听的最初几堂讲授中，木心随口吟诵多首古代波斯阿拉伯人的诗篇，让全体敬异不止。（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8页）

二十三年前，一九八九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后记》，《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84页）

◎二十九日，在薄茵萍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一讲“希腊罗马神话（一）”。

◎二月十二日，在薄茵萍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二讲“希腊罗马神话（二）”。

◎三月六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讲“希腊史诗”。

◎三月十九日，在李全武家讲“世界文学史”第四讲“希腊悲剧及其他”。

◎四月十六日，在章学林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五讲“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

◎五月七日，在殷梅家讲“世界文学史”第六讲“新旧约再谈”。

◎六月十日，在殷梅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七讲“福音”。

◎六月二十五日，在薄茵萍家讲“世界文学史”第八讲“新旧约续谈”。

◎七月十六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九讲“东方的圣经”。

◎八月二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讲“印度的史诗、中国的《诗经》”。

◎八月二十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一讲“《诗经》续谈”。

◎夏，到美国东北海岸的罗德岛消暑。

夏天，在罗德岛消暑，曾以此篇请一位诗弟过目，他说有释家的经卷味，也许把好的散文撷为诗，顺利时，会起这个现象，可惜全篇并不都是顺利的。（木心：《洛阳伽蓝赋》附注，《巴珑》，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75页）

◎九月，《爱是一种天才行为》被收录于包黛莹执行编辑的《名家谈爱》，台湾方智出版公司出版。

◎九月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二讲“楚辞与屈原”。

◎二十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三讲“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

◎十月八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四讲“先秦诸子：老子”。

◎十月二十九日，在李全武家讲“世界文学史”第十五讲“先秦诸子：孔子、墨子”。

◎十一月十二日，在李全武家讲“世界文学史”第十六讲“先秦诸子：孟子、庄子、荀子及其他”。

◎十二月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七讲“魏晋文学”。

◎年末，一次与夏葆元聚餐，探讨如何把H从上海接到纽约来。

一九八九年岁末，先生约我去纽约唐人街金国超市门口等候，下了“神殿”的他轻车熟路穿越于唐人街迷宫般的小巷，终停在一家猪油菜饭店的门口。我们上了二楼，此行他要专门和我谈谈关于H的事，探讨如何把H从上海弄到纽约来。H者，是木心居住上海外白渡桥边的一个邻居，一个修理汽车的强壮的大男孩、“愣头青”，多年来木心在他身上花出心血、教他写作并寄予很多期望。在H身上可以感到礼数的过分周全，这是木心长年调教所致吧！此时木心六十又三，已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而着意寻觅一位如同现今环绕四周、能事事照应他的人选并认同“义子”。不久H成功抵达，不久H又从先生身旁消失，据称是独自结婚去了，似再无联络。对此，先生又一次采取了“欢送”，他不信有“浪子回头”这回事，因为头也“浪”掉了，还回什么？（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中国随笔年选2012》，朱航满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149页）

◎据叶瑜荪《孙牧心》，本年获美国奈希·珂恩版画奖。同年南京大学主编《海外华裔作家辞典》邀其入列。

◎是年，参加纽约华人在唐人街银宫酒楼举行的聚餐。邂逅多年不见的张宏图。

◎是年，曾前往参观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委拉斯开兹画展。

◎是年，作诗《地中海》《茴香树》《佐治亚州小镇之秋》《即景》《在雅尔塔》《俄国九月》《阿尔卑斯山的阳光面》《致霍拉旭》《旷野一棵树》《某次夜谭的末了几句》《中古构图》《夏误》《科隆之惊》《去罗卡拉索之前》《伦敦街声》《我辈的雨》《从薄伽丘的后园望去》《道院背坡》《末度行吟》《智利行》。

◎是年，《童年随之而去》被收录于《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

◎是年，作画《魔鬼的花园》。

◎是年前后，童明将木心的小说列入“世界文学”课讲授，受到欢迎。

童明教授是英文本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的主译者，他在开讲“世界文学”的课程计划中，拟将我的作品列入，……在NDQ发表《温莎墓园日记》等文之前，童明曾向校长递呈“世界文学”课程的计划大纲，涉及我的作品时，校长阅《温莎墓园日记》才两页，就对童明说：“能不能请这位先生来我校讲课？”童明答曰：“他专心于写作，恐怕不会来的。”校长就授命他作一次专访，成一篇对话（即本集第四章）（按：即《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收录于《鱼丽之宴》），童明曾知道“哈佛”曾邀我作驻校而我未同意，故代我推却免多周折，而这次他

可不让步了，说：“既然《温莎》《空房》《对话录》都已发表，情况方兴未艾，你就让我正式开课吧。”

事后，童明来电话急匆匆地说：“非同小可的成功啊，学生、研究生、外国学者都听得出神了，课后议论纷纷，请求我再讲、专讲，他们惊喜中国作家写西方写得这样博大精深……”（木心：《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7—98页）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

◎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进修期间创作了上百幅抽象版画，为此被评为优秀学生并受到奖励。

那段日子，我们混在曼哈顿五十七街“艺术学生联盟学院”，木心尚未取得绿卡，为维持学生身份，直到讲述文学课头两年，仍须常去那所学院点卯。他穿着三楼版画工作坊的围裙，像个工人：能想象浑身石墨的木心吗？他忘乎所以做了逾百幅抽象版画，被评为优秀学生，还得奖。在美国，没有人会惊讶五六十岁的老者仍做学生。[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40页]

一九九〇年 六十四岁

◎是年起住在曹立伟家，长达近两年时间。

按：曹立伟家的住址是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六十七街与奥斯丁街交叉路口处（67 Rd & Austin St., Forest hills, Queens）。据曹立伟回忆：

木心生活很有规律，在我家住的日子，早晨六点起身，抽烟，肯特牌超淡型的香烟（Kent Ultra Light, 100），早餐常是糯米甜饭团，牛奶，有时是酒酿或烤馒头片。早餐后，他伏案写作直到中午。午饭菜通常是咸肉腊肉、炖肉、红烧肉，辅以炒青菜，有时一份罐头凤尾鱼，他喜欢这种烂烂的鱼骨鱼刺。晚饭，则多是中午的剩菜。木心的口味是典型的江南苏浙一带，嗜好甜食，糯米甜饭团、黑米糕、年糕、绿豆糕。

.....

木心午饭后总要小睡到一点半，起身写到傍晚，饭后散步一小时，回屋接着写，直到深宵，有时竟会写到凌晨三四点。文学讲座的备课讲义，每次写一整个下午，没有例外，他笑道，会对得起讲课费的。（曹立伟：《回忆木心》，《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56—257页）

按：住曹立伟家期间，有一次送童明出门，被几个中学生用手枪顶住脑门，抢走雨伞，几天后心情才恢复常态。据曹立伟告诉笔者，木心“是九〇年搬到我那里的，当时他自己的租约到期，一时没找到理想的地方，就暂时住在我那里”。

◎元月七日，在薄茵萍家讲“世界文学史”第十八讲“谈音乐”。

◎二月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十九讲“陶渊明及其他”。

◎二月二十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讲“中世纪欧洲文学”。

◎三月十六日，在陈丹青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一讲“唐诗（一）”。

◎三月三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二讲“唐诗（二）”。

◎四月十三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三讲“唐诗（三）”。

◎四月二十八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四讲“宋词（一）”。

◎五月十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五讲“宋词（二）”。

◎六月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六讲“中世纪波斯文学”。

◎六月十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七讲“阿拉伯文学”。

◎六月二十九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八讲“中国古代戏曲（一）”。

◎九月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二十九讲“中国古代小说（一）”。

◎九月二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讲“中世纪日本文学”。

◎十月十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一讲“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

◎十月×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二讲“英国文学、法国文学”。

◎十一月二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三讲“中国古代戏曲（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四讲“中国古代小说（二）”。

◎是年，作诗《我纷纷的情欲》《巴黎俯眺》《大卫》《HAROLDII》《还值一个弥撒吗》《夜晚的臣妾》《论鱼子酱》《中古对话》《老桥》《醉史》《在波恩》《纸骑士》《雪掌》《指纹考》《塞尔彭之奠》《萨比尼四季》《夏夜的精灵》。

一九九一年 六十五岁

◎元月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五讲“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元月十八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六讲“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德国文学”。

◎二月九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七讲“歌德、席勒及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二月二十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八讲“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与曹雪芹”。

◎三月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三十九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一）”。

◎三月二十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二）”。

◎四月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一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三）”。

◎四月二十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二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四）”。

◎五月X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三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一）”。

◎六月二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四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二）”。

◎六月十六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五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三）”。

◎六月三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六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四）”。

◎九月十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七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五）”。

◎十月六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八讲“十九世纪德国文学”。

◎十月二十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四十九讲“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俄国文学”。

◎十一月三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再谈”。

◎十一月十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一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续谈”。

◎十二月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二讲“十九世纪波兰文学、丹麦文学”。

◎是年，作文《醉舟之覆：兰波逝世百年祭》，作诗《雨后兰波》《论白夜》《夏末致Pushkin》《兰佩

杜萨之祝》《圣彼得堡复名》《我劝高斯》《海岸阴谋》《洛阳伽蓝赋》。

今寓海外，以为能免而竟亦不免偶兴去国离忧，在“哈佛”赋闲期间，燕京图书馆气氛寥落，临窗的乌木小桌上堆着大开本的书，是英译的《世说新语》，隔洋靴而搔国痒毕竟无济……（木心：《洛阳伽蓝赋》附注，《巴珑》，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74页）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间

◎通过一位留学生，将《狱中手稿》从国内带至美国。

按：据曹立伟告诉笔者，该留学生“是个上海人，我替他联系过学校，后来他没去注册，跑到芝加哥的一所学校去了，记得当时和木心有过通信来往，木心念过给我听”。

他出国时没有携带六十六页狱中手稿，怕海关查出没收，出国后，却念念不忘，一直惦记着。好几次我听他喃喃自语：算了，不要了。有时又说：还是得找人带出来，看看那时究竟写了些什么，想的是什么。说着说着，又回到老念头：丢掉算了，托人带也不妥，万一美国的海关拦下来，岂非惹祸……就在那年，终于有熟人来美的机会，木心再四斟酌，忽然决定试试看。那段日子我明显看出他的坐立不安，他说：要不要把笔记分散了，缝到不同的衣服里带出？因为当年他就是把手稿一页页缝进棉袄的。那一天到来了，承木心信赖，委托我亲往接机。来人行李大包小包，待我问及那些笔记，木心的朋友转头就从外衣口袋掏出一大沓，像倒土豆那样倾入我的手，说：都在这里了。（曹立伟：《回忆木心》，《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54页）

一九九二年 六十六岁

◎元月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三讲“十九世纪挪威文学、瑞典文学”。

◎二月十六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四讲“十九世纪爱尔兰文学”。

◎二月二十三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五讲“十九世纪美国文学”。

◎三月八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六讲“十九世纪中国文学”。

◎三月二十二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七讲“十九世纪日本文学”。

◎四月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八讲“二十世纪初期世界文学”。

◎四月十九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五十九讲“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

◎五月三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讲“影响二十世纪文学的哲学家（一）”。

◎五月二十三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一讲“影响二十世纪文学的哲学家（二）”。

◎六月六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二讲“象征主义”。

◎六月二十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三讲“意识流”。

◎十月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四讲“未来主义”。

◎十月十八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五讲“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及其他”。

◎十月二十四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六讲“卡夫卡及其他”。

◎十一月八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七讲“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十一月二十二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八讲“意象主义（一）”。

◎初冬，已住到杰克逊高地（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作文《媚俗讼》。

去岁春日，偶见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的讲词，随记了些感喟，拟作《媚俗讼》以抒郁结，无奈拖宕经年一时难以成篇，不如录出例为断想，仍用《媚俗讼》冠之，有贻大题小作之讥，或示蓄意兴讼事犹未已可也。

(木心：《媚俗讼》，《素履之往》，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66页)

◎是年，经陈丹青介绍，结识留美画家刘丹。

按：刘丹，一九五三年生于南京。一九八一年江苏省国画院研究生毕业，一九九三年移居美国。著有《刘丹水墨长卷》等。

◎是年，作诗《旗语》《帝俄的七月》《冬旅新英格兰》《湖畔诗人》《共和国七年葡萄月底》。

一九九三年 六十七岁

◎元月九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六十九讲“意象主义（二）”。

◎元月二十四日（年初二），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讲“存在主义（一）”。

◎二月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一讲“存在主义（二）”。

◎二月二十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二讲“萨特再谈”。

◎三月七日，应听课生再三恳请，本日起至九月十一日，以九堂课的半数时间讲述自己的文学创作。据《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本日为第一讲，谈《〈即兴判断〉代序》和《塔下读书处》。

返回八十年代，这份“课业”并不是听讲世界文学史，而是众人撺掇木心聊他自己的文章。初读他的书，谁都感到这个人与我辈熟悉的大陆文学，毫不相似，毫不相干。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初遇木心的人都愿知道他的写作的来历，以我们的浅陋无学，反倒没人起念，说：木心，讲讲世界文学史吧。

.....

一九九三年，文学史讲席进入第四个年头，话题渐入所谓现代文学。其时众人与老师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样一来，旧话重提，我们又要他谈谈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间，木心终于同意了，拟定前半堂课仍讲现代文学，后半堂课，则由大家任选一篇他的作品，听他夫子自道。查阅笔记，头一回讲述是三月七日，末一回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讲。之后，木心继续全时谈论现代文学，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后一课。（陈丹青：《〈木心谈木心〉后记》，《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11—213页）

◎三月二十一日，上课，上半堂课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三讲“萨特续谈”，下半堂课谈《九月初九》。

◎四月四日，上课，先讲完萨特，随后谈《S.巴哈的咳嗽曲》《〈散文一集〉序》《明天不散步了》。

◎四月十八日，上课，上半堂课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四讲“加缪及其他”，下半堂课谈《明天不散步了》《童年随之而去》。

◎五月九日，上课，先讲完存在主义，随后谈《哥伦比亚的倒影》。

◎五月十六日，上课，上半堂课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五讲“新小说（一）”，下半堂课继续谈《哥伦比亚的倒影》《末班车的乘客》。

◎六月，童明来访，受其所在的加州州立大学委托首次正式采访木心，访谈稿《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后收录于《鱼丽之宴》。

一九九三年八月（按：记忆有误，应为六月）的一天，我从美国西岸飞到纽约，兴冲冲前去拜访木心。他已经搬过好几次家，那时租居在杰克逊高地的一栋连体屋里，门口正对路口交叉处。我下午到达，他早就站在门前的楼梯上眺望，见我到了，快步下来。我们热烈拥抱。

木心兴奋时，眼里闪光；沉思时，眼睛会像午后的日光暗下来。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不停地谈话，大小话题，东西南北。

木心住的屋子呈横置的“山”字，中间的厨房兼餐厅较小，“山”字中间的一横短了下去。进了门，前面很小很小的一间算作客厅，一张桌，两把椅，右面墙上是红字体的王羲之《兰亭序》拓片；穿过通道，经中间的厨房兼餐厅，后面一间是卧室。我们一会儿在前厅，一会儿在中间的厨房，晚上在后面卧室就寝，他睡床上，我睡地铺，继续说话，直到睡着。到了第三天晚上，木心半开玩笑地说：“童明呀，你再不回洛杉矶，我要虚脱了。”

第二天傍晚，在街上散步，我向他重复我们谈话的一些亮点，木心突然说：“人还没有离开，就开始写回忆录了。”两人都不再说了，沉默。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一直在心里写回忆录，久了，反而不知如何落笔。

谈话平缓时如溪水，遇到大石头，水会转弯，语言旋转起舞，激荡出浪花。第三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坐在前面小厅里，话题进入平日不会涉及的险境，话语浓烈起来，氛围已经微醺。这时，街对面的树上一只不寻常的鸟开始鸣唱。木心打开门查看，我也看到了，是一只红胸鸟……

通常的模仿鸟无非是模仿两三种曲调，而这只红胸鸟可以鸣唱五六种曲调，居然有solo的独唱，还有duet的和声。是天才的羽衣歌手，还是天外之音？最不寻常的是，它叫得如醉如痴，一直激昂到凌晨三点，等到我们躺下了，它才转入低吟。梦里还能听到它。

木心说，我们的谈话触及了人类的险境，或许就触动另一个维度。这样解释有点神秘，有点暗恐，但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解释了。（童明：《代序》，《豹变》，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4—36页）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到的，第二天、第三天两个整天跟木心在一起，第四天的早上离开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差不多是从早上九点起来就谈，我们也没出门。木心早就准备了一些食品，如果缺什么，会打一个电话列一个食品单，叫别人买了送过来。我们就没有离开那个房子。有时候休息一下，接着聊，聊到晚上三、四点。我走的那一天，木心说：“你得走了，要不然我就虚脱了。”我当时还年轻。

谈得很多很多。我的问题的调查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到了第三天晚上九点多了，我说，不行，要谈“问题单”上这些事了。木心不愿意谈“正事”，他谈别的事的兴趣很大。

谈到的都是大问题，会谈到“文革”，谈到中国的历史上的人物。我去年写过一篇关于木心对联的文章，那里边就谈到了几个历史人物，他后来又加了几个字，把近代的历史和中国的古代历史接起来了。他后来给我的一个新版本的对联，历史的跨度又更长了。这只是我们在中间茶歇的时候谈到的。

会谈到生命，尤其是一个观点，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经常回避的一个问题，生和死是紧密相关的。他会谈到死亡。因为自然界的生命是包括死亡的。我也是从木心那儿学来的。以前自己读到西方的诗，也会谈到死，但不太理解。我还向他请教。他就用《圣经》里的话讲这个。当时拿起一个水果，这个水果是生，还是死？它既是生，又是死，自然界是包括死的。生死、宇宙。

谈到老子的《道德经》应该改一改了，因为现在的知识范围扩大了很多；会谈到时空；也会谈到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的五四。好像没有不谈的事。现在坐在这儿，多少有一点紧张，不可

能很全面地呈现当时讲了什么。（《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中童明的发言，2015年8月8日，首都图书馆）

其间木心还谈到如何写俳句和做对联。

其间木心谈到如何写俳句、做对联，自然提到他的这副对联。闲谈中他随手拿起一张纸头，添加几字，改成一个稍长的版本。所以，这副对联有一长一短两个版本。（童明：《张之洞中熊十力，齐如山外马一浮：从木心的一副对联说起》，《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7页）

访谈中童明提出要翻译木心的小说。同时商定将十六篇文章编为一本书，计划先出英文版，再出中文版。十六篇的篇目是：《SOS》《童年随之而去》《夏明珠》《空房》《芳芳No.4》《地下室手记》《西邻子》《一车十八人》《同车人的啜泣》《静静下午茶》《魏玛的早春》《圆光》《路工》《林肯中心的鼓声》《明天不散步了》《温莎墓园日记》。

◎六月十三日，因要回答童明的问题，无暇备课，就以《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为素材谈如何访谈。

今天是奇妙的一天。刘军来住了几天。他们学院让他来采访我，是公务，不是私事。正式、非正式地谈了很多。因为要写“答”，没有时间备课。所以今天就用这个访谈来讲——刘军译成我的短篇，出书，要用我的问答作序。（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33页）

◎六月十六日，《肉体是一部圣经：仿古情诗》刊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六月二十日，上课，先继续讲新小说，随后谈《遗狂篇》。

◎六月二十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六讲“新小说（二）”。

◎六月，《素履之往》由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篇目：《自序》，一辑《庖鱼及宾》《朱绂方来》《白马翰如》《巫纷若吉》《亨于西山》《翩翩不富》《十朋之龟》《贲于丘园》《丽泽兑乐》《与尔靡之》《困于葛藟》《舍车而徒》《向晦宴息》，二辑《一饮一啄》，三辑《亡文学者》《晚祷》《媚俗讼》。

◎八月，《寒砧断续》被收录于《崛起的山梁》，此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散文”卷二，楼肇明编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九月十一日，谈《素履之往》中的《自序》《庖鱼及宾》《朱绂方来》。刘丹来听课。

◎十月十日，在李斌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八讲“原样派、荒诞剧、垮掉的一代”。

◎十月二十四日，在殷梅家讲“世界文学史”第七十九讲“垮掉的一代再谈”。

◎十一月七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八十讲“垮掉的一代续谈”。

◎十一月二十一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八十一讲“黑色幽默”。

◎十二月五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八十二讲“魔幻现实主义（一）”。

◎十二月十九日，讲“世界文学史”第八十三讲“魔幻现实主义（二）”。

◎冬，写出《战后嘉年华》。

◎是年，取得美国绿卡。一度暂停散文写作，也不再画抽象石版画。

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这样就写了十年散文，之后，报刊和杂志上不再出现我的名字和作品，除了两三篇应时的悼文。（木心：《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7页）

一九九三年获得绿卡，他不必再上学，便扔开玩具，再没碰过“纯抽象”。他也不再写被他称为“粉墨登场”的意识流散文，虽然那批散文远远超过他早年的写作。[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44页]

◎是年，作诗《肉体是一部圣经：仿古情诗》《库兹明斯科一夜》《琴师和海鸥》《维斯瓦河边》《通

心粉》《我的体温》《渔村夜》《年轻是一种天谴》
《杰克逊高地》《在维谢尔基村》《槭Aceraceae》。

◎是年，《童年随之而去》被收录于《二十世纪旅
外华人散文百家》，杨际岚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
版。

◎是年，作画《那年战况》。

一九九四年 六十八岁

◎一月九日，在纽约陈丹青家中讲完《文学回忆录》中的最后一课。

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后记》，《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84页）

◎一月十六日，在女钢琴家孙韵家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向木心呈上金笔和金表志谢。作家钟阿城从洛杉矶赶往参加活动。纽约《世界日报》对此做了报道。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你终于

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后记》，《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92页）

本报纽约讯 作家木心在纽约主讲的“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五年，日前因木心将赴英伦作人文与自然之旅，而告一段落。

从一九八九年起，木心的“世界文学史”课程每年开讲九个月，每月两场，每场四小时。前后九十堂课中，不少人一课不缺。

该讲座于一月九日结束，十六日举行结业典礼，学员向木心呈上金笔和金表志谢。作家钟阿城亦自洛杉矶前来参与活动。

（《主讲世界文学史 五年不辍：木心将赴英伦 划上句点》，载1994年某期的纽约《世界日报》，见《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书后彩页，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六月六日，在刘丹的邀请和安排下与陈丹青启程造访英国，停留三周。期间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探访了莎士比亚故居。归国后草成《英伦夜谭》，手稿共九页，未完成。此行是木心唯一一次去到欧洲。

◎夏，童明着手翻译木心的部分作品。

◎九月，《肉体是一部圣经：仿古情诗》被收录于《八十二年诗选》，梅新、鸿鸿主编，现代诗季刊社出版。鸿鸿在该诗后的“编者按语”中说：

以古诗歌咏的旋律，刻写的却是日日生活的现实：从生活中，提炼出真挚绝美的情感。三段十行诗，写一名女子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段是纯爱飞行的速度，第二段写成为家妇后被全家忽视、蔑视的处境，第三段则往复重觅爱的环境与心境：异国的

衣饰寝具，被重新看见的灵魂与肉体。爱恨俱深，才知是无可取代的。音律到意象，体验与感怀，这是全年最深刻，因而也最美的一首情诗。（《八十二年诗选》，梅新、鸿鸿主编，台北：现代诗季刊社，1994年，103页）

◎十二月，回到中国，前后四十天。

◎是年，作诗《风筝们》《达累斯萨拉姆海港》《琥珀号》《布拉格》《以云为名的孩子》《论悲伤》《论命运》《论陶瓷》《论快乐》《论幸福》《普罗旺斯》《波兰》《奥古斯答》。

一九九五年 六十九岁

◎一月，借回国之际独自一人回到睽违五十多年的乌镇，夜宿某小旅馆。

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

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话——此之谓“方言”。

“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雪白雪白了。”

高吭清亮，中年妇女的嗓音，她从乌镇来。站上不会有人在乎这句话，故像是专向我报讯的。我已登车，看不见这个报讯人。

童年，若逢连朝纷纷大雪，宅后的空地一片纯白，月洞门外，亭台楼阁恍如银宫玉宇。此番万里归来，巧遇花飞六出，似乎是莫大荣宠，我品味着自己心里的喜悦和肯定。

车窗外，弥望桑地，树矮干粗，分枝处虬结成团，承着肥肥的白雪——浙江的养蚕业还是兴旺不衰。

到站，一下车便贪婪地东张西望。

在习惯的概念中，“故乡”，就是“最熟识的地方”，而目前我只知地名，对的，方言，没变，此外，一无是处。夜色初临，风雪交加，我是决意不寻访旧亲故友的，即使道途相遇，没有谁能认出我就是传闻中早已天亡的某某，这样，我便等于一个隐身人，享受到那种“已知彼而彼不知己”的优越感。

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这种事在古代是不会有的。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可以推想乌镇尚有亲戚在，小辈后裔在，好自为之，由他去吧，半个世纪以来，我始终保持这份世俗的明哲。（木心：《乌镇》，《中国时报》，1998年11月22日）

按：木心回乌镇后不久，曾给乌镇东栅居委会写去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乌镇东栅父老乡亲收”，署名“上海孙仰中寄”。随后，乌镇植材小学校友会会长徐家堤从木心在上海的表哥王松生处得知木心纽约的地址，由此取得联系。

本月，《林肯中心的鼓声》被收录于《雅人乐话》，为《大家随笔丛书》之一种，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出版。

◎五月二十四日，第一次给徐家堤回信，寄回个人信息表格两张。

◎七月十二日，给徐家堤写第二封信，其中说道：

六月廿二日之札照悉，多谢您附来的资料。故里音息，虽点滴，亦感亲切。……县志、镇志上有关我的履历，拜托您代为过目，只要文字无谬即可，不必寄来。……沈叔韬等老友，请谨此致候。若干年后，我还将到乌镇，届时定当约晤叙。

◎七月三十日，植材小学校友会会刊《通讯》第四十六期刊登徐家堤根据木心所寄资料及王松生、吴柏松、陆渠清、魏午堃等校友的回忆整理而成的《木心校友简介》，并注“未及送本人审阅”。

◎九月上旬，陈丹青夫妇到乌镇寻访木心故居，给木心带回两截雕花窗棂。

一九九五年秋我有归国行，忽然兴起，便从杭州搭车到桐乡，又从桐乡搭车去乌镇：破败萧条，古意淳淳，我一路寻到先生在东栅财神湾的旧宅与故园，果然如他所描述，杂草丛生，院墙倾坏，一进一进到深处，是当地一家乡镇铁工厂，燃着火，几个工人鬼一般劳作着。这就是《上海赋》《遗狂篇》与《九月初九》的作者当年生长的家园么？我伫立良久，四顾废园，临走从一处腐朽窗框掰下两截雕花木栏杆，包起来，带回纽约给先生。此后十年，那小小的雕花木栏放在先生书桌上，直到上周归国，又给包好了带回来。（陈丹青：《在乌镇》，见陈丹青2006年9月15日新浪博客）

◎九月二十一日，《一生常对水精盘：读张爱玲》刊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此文后收录于《同情中断录》，改题为《飘零的隐士》，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是年，三十三幅转印画为罗森克兰兹基金以二十万美金购藏，生活用度遂无后顾之忧。

◎是年，作诗《金色化离》《号声》《莱茵河》《香歌》《蚕歌》《KEY WEST》《奥地利》《复仇之前》《那人如是说》《陌生的国族》《春雷》《芹香子》。

◎是年，作画《诺曼底之夜》。

◎年底，名字被英国剑桥版《世界文化名人录》著录。

一九九六年 七十岁

◎二月十四日，给徐家堤写第三封信，其中写道：

我之所以与乌镇未尽因缘，是由于你们的热忱感动了我，打破了我秉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甘沉默，但还不足以扬眉吐气回馈故乡，仅只出明心迹，期之于后耳。你每信都提到陆渠清、吴柏松、魏午堃、钱履坤、沈铃（罗凡）、沈品年……你的做法，令我叹佩，引我记忆复萌。他们的音容笑貌，肤色步姿，一一宛然在目矣。虽属童年菑雨，俨然越洋新知。无奈我漂流海外，浪得虚名，离我的目标远之又远，旦夕伏案写作，孜孜不敢稍怠。归期未可预卜，还望诸位善自珍摄，幸得相见，乐何如之。

沈顺英，确是我家女佣。请代致意问好，感谢她曾照顾我的童年、少年，将来我回国，会去探望她的。

◎二月，《一生常对水精盘：读张爱玲》被收录于《作别张爱玲》，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出版。

◎三月五日，给徐家堤写第四封信，同时寄回八百元资助植材校友会《通讯》的编印。

◎是年，从杰克逊高地迁往皇后区森林小丘与黄秋虹一家同住，直至回国。

◎是年，开始筹备全美博物馆级巡回展。

一九九六年开始筹备全美博物馆级巡回展，经费浩大过程复杂，有关文字部分要求高臻峰顶，一字一句一标点，务必完美至善。理念修辞上的中西争执，我始终分寸不让，最后总是尊重艺术家的主见，所以虽然劳神苦思，还是心情愉快。那本由耶鲁出版的《木心画集》全球发行后，一直高居五星级，各博物馆及大书店都用玻璃柜置于显著地位，备极荣宠。（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是年，叶瑜荪以《孙牧心》为题，在《桐乡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中对木心的生平和文艺成就做了介绍。

◎是年，作诗《论物》《五月窗》《脚》《夏风中》《择路》《杜唐卡门》《泡沫》《晚声》《拉丁区》《咆哮》《中国的床帐I》《中国的床帐II》《草叶》《它们在下雪》《醍醐》《美味无神论》《是爱》《命运》《保加利亚》《WELWITSCHIA》《眉目》《佛芒海燕》《SOLITUDE》《另类欧罗巴》《五月街》《海风No.1》《海风No.2》《西西里》。

◎是年，作画《会走路的石头》。

一九九七年 七十一岁

◎三月，《寒砧断续》被收录于《未能忘情：台港暨海外学者散文》，陈子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是年，美国《北达科他文学季刊》（简称NDQ）春季号以首席版位发表了两篇由童明翻译的木心小说及十二题长篇《答客问》。NDQ的编辑在按语中说：“这一期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后来收到了木心的作品而变得特别了。”（童明辑译：《有朋自西方来：木心珍贵的文友们》，《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39页）

◎是年，与巫鸿有过一次长谈。

◎是年，作诗《印度》《蒙特里奥》《明人秋色》。

◎是年，作画《山水赋II》。

一九九八年 七十二岁

◎一月，散文《塔下读书处》刊发于上海《书城》杂志本年第一期。

◎五月，《巴珑》《会吾中》和《我纷纷的情欲》由台湾元尊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巴珑》篇目：《巴珑》《白夜非夜》《罗马停云》《东京淫祠》《伦敦街声》《我辈的雨》《夏末致Pushkin》《从薄伽丘的后园望去》《兰佩杜萨之赋》《彼得堡复名》《高斯耽误》《海岸阴谋》《雪掌》《明人秋色》《波斯湾之战》《雅诃撰》《在维谢尔基村》《指纹考》《波尔多的钟声》《索证者》《塞尔彭之奠》《道院背坡》《共和国七年葡萄月底》《槭Aceraceae》《萨比尼四季》《末度行吟》《五岛晚邮》《西西里》《洛阳伽蓝赋》《智利行》《门户上方的公羊头》《魏玛早春》《米德兰》《倒影之倒影》《夏夜的精灵》《维苏威馀烬录》《埃特鲁里亚庄园记》《会吾中》篇目：《同袍》《郁林》《籊籊》《载芟》《南有》《佼人》《贝锦》《黄鸟》《子覆》《七襄》《覃耜》《玉尔》《苕楚》《忼忼》《柔至》《康明》《繁霜》《肃肃》《有摽》《祁祁》《弄椒》《谷风》《采唐》《有裳》

《将谿》《焕焕》《西门》《彼黍》《负暄》《粲者》《子湑》《伐木》《棘心》《污潏》《执手》
《绿衣》《衡门》《野有》《关关》《木德》《黝黝》《其雨》《投之》《无罍》《彼采》《将骐》
《朝出》《且眷》《厥初》《瞻乌》《桃之》《汜彼》《逞飞》《七月》《桢桢》《曰归》《允荒》
《春申》《南田》《如响》《雾豹》《多蛄》《如英》《胡荽》《乌镇》《怀里》《载阳》《常棣》
《三捷》《斯恩》《无寄》《昔我》《趯趯》《三星》《笃公》《中露》《不如》《蟋蟀》《鸛鹑》
《维幡》《彤管》《恒骚》《匏有》《斯尤》《天骄》《三世》《白鸟》《佻人》《隰桑》《斯》《何草》
《如夷》《葛生》《西门》《溱洧》《载蜚》
《芴芴》《采薇》《谓尔》《椒聊》《终南》《既见》《他山》《鱼丽》《长睽》《有駜》《中谷》
《绵绵》《叔也》《有车》《溯风》《君门》《昔之》《芄芄》《击壤》《束薪》《駉駉》《扣槃》
《淇奥》《防有》《在怀》《丧乱》《鹿鸣》《有》
《遵云》《终识》《包休》《英玉》《入穀》《寿眉》《无侣》《骅骝》《反驹》《辖兮》《上天》
《鬻沸》《傅天》《变兮》《王事》《朝隰》《贪乱》《鸛鸣》《柳斯》《为猷》《棠棠》《淞江》
《醉止》《鱼在》《采菽》《蹇蹇》《权之》《日益》《方难》《嘒彼》《振鹭》《营营》《胡逝》
《壹者》《维昔》《人有》《瞻印》《白圭》《方虐》《不肖》《有客》《白度》《尊之》《屡盟》
《隳息》《憺兮》《桑扈》《白华》《捷捷》《采

绿》《心之》《倬彼》《大风》《为愿》《采葑》
《有杕》《缁衣》《终风》《日居》《江有》《翀
雉》《偃偃》《于征》《沔彼》《皎皎》《丘中》
《扞我》《凶矜》《渐渐》《有命》《旃旒》《上
权》《复屈》《雝雝》《丝衣》《如遗》《甫田》
《高沙》《昌兮》《鸿飞》《子衮》《仲门》《保
艾》《以濯》《如陵》《差池》《中林》《不我》
《芄兰》《如晦》《蒹葭》《有卷》《思乐》《其
雷》《汭彼》《子衿》《叔于》《伯氏》《因心》
《询尔》《帝谓》《穆穆》《南山》《不盈》《温
温》《荏染》《柔木》《于戏》《凤凤》《山有》
《俟我》《敝笱》《小戎》《驷》《岵逸》《委蛇》
《玼兮》《维鹄》《雨雨》《旨否》《蓼蓼》《夷
恠》《我龟》《中田》《者木》《有桃》《乐土》
《靓子》《鹁之》《子子》《我行》《大车》《有
狐》《崔崔》《体原》《是达》《瓜瓞》《国如》
《十亩》，外篇：《吾闻》《君命》《人异》《沧
浪》《有馈》《人之》《场师》《贵者》《余师》
《多术》《观水》《饥者》《道则》《为关》《子
好》《视弃》《与少》《斧斤》《钧是》《舞雩》
《挟山》《滕问》《醜赞》《子产》《眸子》《逢
渊》《吹响》《天下》《芴漠》《混沌》《仰之》
《明道》《将欲》《回曰》《美名》《色重》《其
苏》。

《我纷纷的情欲》篇目：一辑《我纷纷的情欲》
《地中海》《牛奶·羊皮书》《艾斯克特赛马纪要》
《巴黎俯眺》《茴香树》《FARO》《寄回波尔多》

《佐治亚州小镇之秋》《即景》《在雅尔塔》《俄国九月》《阿尔卑斯山的阳光面》《我与大卫》《南欧速写》《俄国纪事》《夜宿伯莱特公爵府邸有感》

《致H.海涅》《参徐照句》《点》《中古一景》《无鱼之羹》《咖啡评传》《爱斯基摩蒙难记》《致霍拉旭》《旷野一棵树》《某次夜谭的末了几句》《中古构图》《夏误》《阿里山之夜》《恋史》《古拉格轶事》《骰子论》《贡院秋思》《科隆之惊》

《HAROLD II》《春舫》《还值一个弥撒吗》《夜晚的臣妾》《论鱼子酱》《中古对话》《老桥》《醉史》

《在波恩》《纸骑士》《肉体是一部圣经》《风筝们》，二辑《一些波斯诗》《金发·佛罗伦萨人》《雨后韩波》，三辑《思绝》《论白夜》《论绝望》《旗语》《帝俄的七月》《冬旅纽英格兰》《湖畔诗人》

《库兹明斯科一夜》《琴师和海鸥》《维斯瓦河边》

《达累斯萨拉姆海港》《琥珀号》《英国》《布拉格》《以云为名的孩子》《论悲伤》《论命运》《论陶瓷》《论快乐》《论幸福》《论物》《后德里斯坦》《金色化离》《号声》《莱因河》《香歌》《蚕歌》《KEY WEST》《奥地利》《复仇之前》《五月窗》《脚》《夏风中》《择路》《杜唐卡门》《泡沫》《晚声》《拉丁区》《咆哮》《中国的床帐I》

《中国的床帐II》《草叶》《那人如是说》《它们在下雪》《醍醐》《美味无神论》《是爱》《命运》

《保加利亚》《WELWITSCHIA》《眉目》《陌生的国族》《佛芒海燕》《SOLITUDE》《另类欧罗巴》《印度》《蒙特里奥》《五月街》《普罗旺斯》《歌词》

《通心粉》《春雷》《芹香子》《我的体温》《渔村夜》《波兰》《年轻是一种天谴》《奥古斯答》《去罗卡拉索之前》《杰克逊高地》《海风No.1》《海风No.2》。附一九八八年版《西班牙三棵树》选篇：

《中世纪的第四天》《咕囔》《寄回哥本哈根》《祭叶芝》《赴亚当斯阁前夕》《北美淹留》《〈凡·高在阿尔〉观后》《夏夜的婚礼》《十四年前一些夜》

《泥天使》《我的主祷文》《FRACTURE》《甜刺猬》《末期童话》《涉及爱情的十个单行》《晚祷文》《乔乔》《如歌的木屑》《旋律遗弃》《论拥抱》《剑桥怀波赫士》《无忧虑的叙事诗（两首）》。

◎十月四日，作《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

◎十月，个人简介被收录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秦牧等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

同月，散文《昆德拉：精神世界的漂泊者》刊发于上海《书城》杂志本年第十期。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散文《乌镇》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连载。

◎冬，《乌镇》一文见报后，旅居台湾的乌镇人金其全将之寄给时任乌镇植材小学校友会会长徐家堤，徐家堤又将此文转送给时任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向宏。陈向宏读过该文后开始四处打听木心的消息。

按：陈向宏，一九六三年出生于乌镇。自一九九九年主持乌镇古镇旅游保护开发，曾任乌镇党委书记、乌镇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管委会主任，现为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是年，经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区策展人阿历克珊德拉·梦露的介绍，与美国中国水墨画收藏家弗里德·高登相识。

阿历克珊德拉·梦露，是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区策展人，她介绍我认识了木心。我在纽约见到木心的画，当场就买了两件，第二次去画廊，又买了三件。我向画廊请求安排一次和木心面对面的机会，那天木心带了翻译，彬彬有礼，他很会打扮。我仍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和他的见面，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显得非常友好。

（“木心先生乌镇追思会”上弗里德·高登的发言，《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6页）

在遇到木心先生之前，我已经收藏了他的五件作品，后来正式请求木心先生在纽约画廊认识。在中国当下，很多人追捧喜欢林风眠、徐悲鸿、吴冠中。这三位先生都去欧洲游学，受到西方影响。木心先生去了美国。我想要表达的是，林风眠、徐悲鸿、吴冠中，都是大师，但还是有些局限于传统的束缚，我认为木心没有受到这种局限。（“木心走了：木心读者北京追思会”上弗里德·高登的发言，《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3页）

◎是年，《海峡两岸》第十二期刊载卿桐的《木心：视创作有如修道》。

一九九九年 七十三岁

◎二月，散文《此前的上海人》刊发于上海《书城》杂志本年第二期。

◎八月，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章“美国华文文学（中）”第九节为“庄因、木心”，着重对木心散文创作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探讨。

◎十月，《马拉格计画》《同情中断录》《鱼丽之宴》分别由台湾翰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马拉格计画》篇目：上辑《路工》《两个朔拿梯那》《吉雨》《同车人的啜泣》《鱼和书》《空房》《虎》《九月初九》，下辑《竹秀》《卖翅膀的天使》《上海赋》《遗狂篇》《醉舟之覆：韩波逝世百年祭》《法兰西备忘录》《狭长雾围》《马拉格计画》。

《同情中断录》篇目：《童年随之而去》《第一个美国朋友》《草色》《战后嘉年华》《此岸的克利斯朵夫》《双重悲悼》《飘零的隐士》《上海在哪里》《乌镇》《同情中断录》。

《鱼丽之宴》篇目：《序》《江楼夜谈：答香港〈中报〉月刊记者问》《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雪夕酬酢：答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问》《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附录：《〈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纽约《中报》文艺副刊主办）、《有朋自西方来：木心珍贵的文友们》（童明辑译）。

◎是年，作画《预像》《艾格顿荒原》。

按：据陈丹青所述，本年起至二〇〇九年为木心转印画制作的第二个时期，总数逾两百幅。[陈丹青：《绘画的异端：写在木心美术馆落成之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50页]

二〇〇〇年 七十四岁

◎十月十八日，在纽约森林小丘家中就《狱中手稿》的相关问题接受童明访谈。

◎十一月十一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乌镇颁奖，陈向宏向王安忆打听木心，并通过王安忆与陈丹青取得联系，邀请木心回乌镇安度晚年。

按：陈丹青《木心逃走了：木心美术馆开馆典礼致辞》误作“元月”。

◎是年，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文，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被编入同一教材。

同年，应罗森克兰兹基金会（Rosenkranz Foundation）之请，从《狱中手稿》中选出五个短篇，由童明译成英文。

二〇〇一年 七十五岁

◎五月，陈子善向本年五月号《上海文学》“记忆·时间”栏目推荐木心的散文《上海赋（一）》，经金宇澄（责任编辑）编辑发表。《上海赋（一）》的内容除引言外，包括“过去的过去”（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版《哥伦比亚的倒影》时改为“从前的从前”）、“繁花巅峰期”“弄堂风光”“亭子间才情”。陈子善在“主持人的话”中说：

木心者，何许人也？即便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恐怕也感到很陌生吧。其实，他是享誉台港和美国华文文坛的著名散文家，只不过他一贯低调，专心绘画和作文，以至长期以来此间对他以艺术家的慧眼和心智，观察环境思索生命驰骋想象的隽永散文，几乎一无所知。

曾长期在上海居住，富于诗人气质的木心，可说是一位标准的“老上海”。他对这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堪与巴黎媲美的远东大都市情有独钟。他定居纽约后，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更对大洋彼岸的上海梦兹念兹，接连写下《从前的上海人》《上海在那里》等忆念上海的动人篇章。特别是这篇《上海赋》、以“三都”“二京”“一市”的联想起兴，铺陈当年上海的畸形繁华，展示当年上海的形形色色，对“迪昔辰光格上海”的都市文化风格和精神内涵的勾勒尤为精到。文字的幽默生动，细韧绵密，种种警辟微妙的思维和意象，使全文平添一层诱人的艺术魅力。

由于《上海赋》篇幅较长，本刊将分三期连载。（《上海文学》，2001年5月号，36页）

◎六月，陈丹青带着木心的书信前往乌镇与陈向宏相见。这之后陈向宏开始与木心通信，持续将近五年时间。

我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联系木心的途径。二〇〇一年的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我去参加，在现场碰到王安忆，因知道她在美国聂华苓国际写作中心待过，就问她认不认识木心，她说不曾谋面，但可以帮我介绍木心的学生陈丹青。于是我跟丹青联系，他二〇〇一年六月份回国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他提起在美国的木心年纪渐渐大起来了，他很担心其生活无人照料，如果能回到乌镇，是很好的。

这之后我开始跟木心通信，持续了将近五年，在信里头，他总是称我为“宏弟”，这期间我主要在做的，就是打消他的顾虑，请他不必担心我们有任何商业企图，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文化大家，应该受到家乡的礼遇。（陈向宏：《将先生请回乌镇》，《木心：告别与重逢》，为《生活月刊》第121期别册，张泉主编，2015年12月，35页）

本月，陈子善向本年六月号《上海文学》“记忆·时间”栏目推荐木心的散文《上海赋（二）》，经金宇澄（责任编辑）编辑发表。《上海赋（二）》的内容为“吃出名堂来”。陈子善在“主持人的话”中说：

本期续刊木心《上海赋》第五章“吃出名堂来”。文中追忆三四十年来上海的小吃，上海的京、粤、川、扬和本帮菜，上海的西餐和西点，乃至上海街头巷尾的阳春面和咸豆浆，同样如数家珍，引人遐思。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不可能不注重饮食文化，不可能不是全国乃至世界美食荟萃之地，香港是如此，上海更应

如此。木心先生九十年代初重返上海，还写过一篇《上海在那里》，对当时上海一些老字号菜馆的“中听中看不中吃”颇多批评。近十年过去了，今天上海的饮食文化是否已有长足的进步，是否足以与当年媲美？值得都市文化研究者留意。（《上海文学》，2001年6月号，34页）

◎七月，陈子善向本年七月号《上海文学》“记忆·时间”栏目推荐木心的散文《上海赋（三）》，经金宇澄（责任编辑）编辑发表。《上海赋（三）》的内容包括“只认衣衫不认人”和“后记”。陈子善在“主持人的话”中说：

木心的长文《上海赋》到本期连载结束了。在最后一章“只认衣衫不认人”中，木心追述十里洋场男女认知“人生如戏”，对“行头”“皮子”刻意追求的种种，从男士的长衫到女士的旗袍，描绘细致而风趣，从而为三十年代上海的服饰文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字纪录。在全文的结尾部分，木心又讨论上海的都市性格，虽未大加发挥，毕竟提出了“当年的上海，亦东西方文明之混血也，每多私生也”的观点，值得注意。（《上海文学》，2001年7月号，50页）

◎十月二日，由巫鸿和梦露策划，芝加哥大学大卫和阿尔弗雷德艺术博物馆（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与耶鲁大学美术馆（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共同组织，罗森克兰兹基金赞助的“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手稿”（The Art of Mu Xin: Landscape Paintings and Prison Notes）大型博物馆级全美巡回展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的作品包括三十三幅风景画和《狱中手稿》，引来媒体竞相报道。画展期间木心在亚当斯

学院住了一个星期。此后历芝加哥、夏威夷、纽约数处巡回展览。展览结束后，三十三幅画作被罗森克兰兹基金捐赠给了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

按：三十三幅风景画分别是《清筠凉川》《梦回西湖》《会稽春明》《石屋无恙》《飞泉澄波》《渤海晨兴》《金陵秋色》《辋川遗意》《玄峰塞天》《萧闲寻胜》《富阳曦明》《浦东月色》《素心云霞》《夏木蝉吟》《枯崖石窟》《环滁皆山》《秋山长风》《唐咏蜀道》《弱水半干》《雁来亭上》《净石山庄》《黄山夕曛》《黄河古源》《销融汉刻》《武夷茶岭》《池静石眠》《梅雨双塔》《孤山夜宴》《苏堤春阴》《榕荫午雷》《山阴古道》《魏晋高居》《纠缠卿云》。

木心是二十世纪最不寻常的艺术家之一。一九二七年生于中国，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起起伏伏，从抗日战争到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去世。一九八二年他来到纽约，一直居住至今。展出的三十三幅风景画均来自罗森克兰兹基金收藏，包括他七十年代在中国遭软禁期间创作的套画。这些画作以特殊的风格融合了东西方文学与艺术的敏感性。《狱中手稿》写于稍早“文革”期间他的单独禁闭。二者都展现了木心以理性生活战胜牢狱生涯的意志，他因此可以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伟大历史人物自如交流。

两位馆长，纽约日本协会会长阿历克珊德拉·梦露（Alexandra Munroe）与巫鸿（Wu Hung），芝加哥大学中国艺术历史专业的哈里·A.万德斯德彭（Harrie A. Vanderstappen）杰出贡献教授，设计并指导该项目。亚洲艺术馆长大卫·A.森萨博（David A. Sensabough）监管了在耶鲁的布置过程。

“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手稿”由芝加哥大学大卫和阿尔弗雷德艺术博物馆与耶鲁大学美术馆共同组织。罗森克兰兹基金

赞助了展出。（据耶鲁大学美术馆木心个展预告手册选页，木心故居纪念馆提供，邓天中译）

这个展览由我和Alexandre Munroe女士一起策划，展览的场合都是正式的美术馆，看的人也比较多。展览图录中的文章由四五位学者写成，包括历史学家史景迁，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谈木心。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说清楚木心，对于学者和学界，木心是一个问题。这次的画展也同时展览了他的《狱中手稿》，由木心作品的英译者，后任加州大学教授的童明做的笔译。（巫鸿：《木心本身即是艺术品》，《木心：告别与重逢》，为《生活月刊》第121期别册，张泉主编，2015年12月，46页）

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年，罗森克兰兹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联合举办《木心的艺术》巡回画展，在欧美艺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艺术》等报刊纷纷撰文评论。此次展出的三十三幅画作后由耶鲁大学博物馆（按：即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据木心提供给周乾康的简历，见本编年2010年6月28日木心给周乾康的回信。）

◎十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评论木心绘画和文学成就的专辑画册《木心的艺术》，好评不断，被列为“五星级”杰作。

◎十二月六日，耶鲁大学美术馆麦克内尔演讲厅（McNeil Lecture Hall）举办斯特林历史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History）江奈森·斯宾斯（Jonathan Spence）的讲座《木心的艺术：政治与社会背景》。

◎十二月九日，木心在耶鲁大学美术馆的画展结束。

◎是年，于某画廊与建筑家贝聿铭会面。

按：贝聿铭，一九一七年生于广州，祖籍苏州，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建筑师。木心在纽约期间与贝聿铭时有交往。据贝聿铭学生、木心美术馆设计师林兵回忆木心曾请贝聿铭在其工作室将他的一幅画作放大尺寸，而受贝聿铭嘱托完成此事的正是林兵。

◎是年，巫鸿作《读木心：一个没有乡愿的流亡者》，后收入巫鸿著《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岭南美术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五月出版。

◎是年，作画《生与死》《战争前夜》。

二〇〇二年 七十六岁

◎一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十一日，题为“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手稿”巡回展于芝加哥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二十四日当天，巫鸿、阿历克珊德拉·梦露分别围绕木心画展做了讲座。

木心，一九二七年生于中国，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起起伏伏，从抗日战争到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去世。一九八二年他来到纽约，一直居住至今。“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手稿”是这位当代中国作家兼画家的第一次主要画展，主要包括两类作品。木心七十年代后期在中国遭软禁期间创作了一套风景画，这些画作以特殊的风格融合了东西方文学与艺术的敏感性。他在稍早的“文革”期间的单独禁闭中写了《狱中手稿》。

这些作品中的细腻美感、苦行道德与智力精准度都展现了木心以理性生活战胜苦难与牢狱生涯的意志，他因此可以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伟大历史人物自如交流。

两位嘉宾馆长，巫鸿，芝加哥大学中国艺术历史专业的哈里·A.万德斯德彭杰出贡献教授，以及纽约日本协会会长阿历克珊德拉·梦露，设计并指导该项目。该展展现了木心的特殊历史地位，也通过对立的方式，比如“传统与现代”与“东方与西方”等呈现另一种探索当代亚洲艺术的途径。通过木心作品中观念、方法与主题的多样性，本展出将现代性作为全球性现象来探讨。（据芝加

哥大学艺术博物馆木心个展巡回海报之一，木心故居纪念馆提供，邓天中译)

◎二月十六日，芝加哥大学艺术博物馆讲解员理查德·波恩 (Richard Born) 与斯蒂芬尼·史密斯 (Stephanie Smith) 与公众讨论该馆永久收藏品中木心的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的对比。

◎二月二十四日，芝加哥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木心与冯梦波”特别巡回展。

◎六月，刘昌汉的《百年华人美术图像》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本书评述了李铁夫、潘玉良、张大千、常玉、林飞龙、贝聿铭、木心、陈丹青等一百位海外华人优秀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有关木心的这篇题为《素履之往》：

一位对于文化有心的艺术工作者定然不甘满足在固定的创作形式之中，对他而言艺术是探索的过程，不是结果。人们经常轻易地用“超越”一词形容艺术家的这份追求，其实他很难定义在单纯的超越上，其中还包括了割舍，并且往往是反复的，回绕的，作者在左冲右突中开辟道途，木心即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画家。一九二七年生，原名孙牧心，浙江桐乡乌镇人，毕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系，最后致力文学与水墨创作，这个途径是二十世纪许多中国画家共走的路，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人也是从西入中，这一路途包含了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与反刍，也成为使命感思虑的课题。在连年创作中木心的作品发表得不多，作品与作品总的面貌从具象、半具象到接近抽象可谓丰富多变，由于对于中西文化有深厚的底蕴，探求的心从未停歇过。纽约许多画家对木心十分尊崇，常以上课的心态定期与他聚首，这些画家们本身学有专精，共同的思辨对于彼此艺术内质的掌握常有正面的提升意义。

在数十年不停地探索创作中，木心思深而行勤，得以保留了可观的作品。从参酌民俗石刻拓印和陶艺织锦发展的村舍房宇风景画，这类题材吴冠中也常为之，表现的是流畅活泼的线色组合；木心则尽量让线色的作用内敛隐匿，以强调全幅图画的整体感觉，它不是不同乐器的起伏呼应，而是合响。吴冠中着眼艺术的醇度，木心却着意它的深度。另一类的作品木心先以玻璃水印墨渍，像屋漏痕般，于迷离朦胧中添置树石楼阁，随遇定形成为山水，常采宏观广袤的视点，广契的胸臆与传统渊源使作品融筹了荆、关、董、巨、范、李的雄奇博巍，于传承中上接中国画最辉煌的山水命脉，又兼具有一份偶得的轻松。他另外一类与前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品表现了静穆沈博、半抽象近似特效摄影的黑底巉石绵延迤迤，把所有树石等细节一概舍弃，统摄进一片空寂微茫之中，恰似苏轼的名句“挟飞仙以遨游”，蹑虚御风，俯瞰众山小。

木心的文章偏重思想举一反三的感悟，与美国思想家霍佛尔（Eric Hoffer）常有相似的洞烛人生的智慧观察。以他的画和文章相观照，画足森莽而有边际，文则在更大的时空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写意，向来是中国文人画家的大事，木心的画不在这方面作过多的徘徊，他更偏向探求技法来表述一己的心境——写心。观他的画像是能够听到艺术家心中沙沙、滔滔、淅淅、沥沥的感触，使人联想起宋人蒋捷“虞美人”中听雨的阶段，从红烛昏罗帐，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到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伴随绘画走过的有酒浓的轻狂，萧散的孤寂与沧桑的彻悟。他曾自述自己“继看破红尘之后也看破自然”，风景山水于他是缘物寄情心声的呢喃，一种无由而发的抒发。表面上技法、形式、内容虽然每有常变的外貌，内里仍有画家坚持的不变本质，艺术创作的吸引人处，往往就在这份变与不变的折冲上面。（刘昌汉：《素履之往》，《百年华人美术图像》，刘昌汉著，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84页）

◎是年，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搬迁了木心祖居旧址上的翻砂轴承厂，开始重新修造总面积三千平方米的木心花园。

这个时候木心觉得回乡定居的事情比较“靠谱”了，他样样都有设想，又画图又写字地跟我说明，巨细靡遗到楼梯的栏杆、室内的陈设，还有故居亭子里的那块碑怎么做。他是很认真又追求完美的人，图纸修修改改多次，花了很长时间，那幢小楼和花园终于有些模样了。（陈向宏：《将先生请回乌镇》，见《木心：告别与重逢》，为《生活月刊》第121期别册，张泉主编，2015年12，35页）

二〇〇三年 七十七岁

◎春，陈丹青携尹大为（笔名尹庆一）到乌镇探访孙家旧居。

二〇〇三年春，他（陈丹青）去乌镇接洽，邀我同往。那时去乌镇旅游的人远没现在这么多，木心故居缩在东大街上，一堵三人高的白墙，两扇黑旧铁门长年紧锁，走来走去的行人如不留心，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我们推开喑哑的大门，好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时值阳春三月，万木生发，园中却阴晦异常，杂草丛生，苍苔遍地，小楼半颓，间杂外间拖来的废弃小船与木料，老墙上残留着斑驳支离的红漆标语，砌了一半又敲掉的赤膊新墙，一切似乎像极了荒废已半个世纪的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据说“文革”时此地被征作为工厂，现刚清出。看不出原来住宅的格局，闻不到故人生活的气息，怎一个“乱”了得。只有园中残存的小楼上遗落的木刻纹饰，龙纹、花卉，依然挺健，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气与光耀。真不敢想象这就是才智独绝、心气高贵的木心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小院的一头有扇无门的小“门”，出门即是煌煌隆隆的高速公路，车来车往，好不喧闹，与小院的清寂、杂乱、落伍形成鲜明的反差。（尹大为：《木心先生三年祭》，《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4—55页）

◎本季，“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手稿”画展巡回至夏威夷檀香山艺术博物馆。

◎六月十日至九月七日，题为“记忆的风景：木心的艺术”（Landscape of Memory: The Art of Mu Xin）画展巡回至纽约亚洲协会展出。

本次展览由芝加哥大学的大卫与阿尔弗雷德艺术博物馆和耶鲁大学美术馆共同组织并发布。由阿历克珊德拉·梦露与巫鸿充当讲解。得到德尔斐金融集团与罗森克兰兹基金支持。（据此次巡回展的照片，木心故居纪念馆提供，邓天中译）

二〇〇四年 七十八岁

◎是年，作画《废谷》。

二〇〇五年 七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作家陈村写的《关于木心》，宣称读罢木心的文章“如遭雷击，不可能再忘记这个人的存在”（陈村《关于木心》，见《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1月14日）。

◎四月，在陈向宏多年的诚恳邀请下，决定回故乡安度晚年。十六日，启程回国做迁居前的准备，先到上海，陈丹青、王淑瑾、尹大为前往迎接。当晚由陈丹青安排在徐龙森家与陈村、孙甘露、王淑瑾、尹大为等聚会。

按：陈丹青《木心逃走了：木心美术馆开馆典礼致辞》误作“五月”。《[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8页]

他是来做些迁居前的准备，丹青师赶到上海，与我和太太同去浦东机场接机。车至机场苦等几小时，飞机终于着陆，我们忙奔上二楼俯瞰出口处内景。平日里丹青师谈笑风生、嬉笑怒骂，那日却神情肃穆，高度紧张。遥遥似乎见到了先生的身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一甩头，大步流星，直奔将下去。神秘、传奇的“神仙中人”木心先生，终于推着小车施施然踱出来了。他穿一钓鱼马甲，乍看似与平常老头无异。介绍，握手，他疲倦而欣喜，脸上是糯糯的微笑，或许是和生人少有接触，似乎总带着一丝小孩般纯真的羞怯。

当晚，他们下榻在一朋友的欧式别墅，我和作家陈村、孙甘露等诸位老师前去“朝圣”。再见木心先生，显然已精心打扮过，一身浅灰色粗细条纹西装，白色簇新的衬衫，琥珀领带，银戒，配上一头微卷的银发，让人眼前一亮。国中的长者，似没见过谁有如此风度。我们带去多本他的台版著作（当时还没大陆版），央他签名。他含笑摸出钢笔，欣然为我们一一签来。墨水经过长途颠簸，似乎郁结难驯，一笔下去，断断续续，似乎暗示着先生此刻复杂又跌宕的心境。其中有一本，应是“○五春”，他提笔写成了“五○春”，经我们指出，他察觉后笑而不改，照样递过来，足见先生的通透。我心里暗想，如果先生能活到二〇五〇年，那该多好啊！

先生说的沪语，是“老法”上海话。悦耳，生动，气度高贵。他妙语如珠，烟不离手，直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又笑得前仰后合。和他笔下的严肃文字迥然不同，没想到他是个“滑稽人”（沪语中指幽默的人）。说起笑话，张口即来，还能模仿各色人等的不同口气，节奏层层推进，把我们绕进去之后，突然又甩出一个短包袱，满堂粲然。他倒不似一般说笑话的人自己不笑，他边说，边自己也笑得投入，好像他也是头一回听到的听众一般。

我问先生，学写文章该看些什么书？他又摸出笔，裁了张纸条，缓缓写下几个俊逸疏阔的繁体字：“论语（言文对照）/地粮（纪德盛澄华译）。”写完，递给我。他悠悠地解释道：“白话文要写得好，必须精通文言。看外国译本要挑译者，译者不佳，神采全无。”（尹大为：《木心先生三年祭》，《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5—56页）

陈村电话通知，木心先生来上海，陈丹青约了晚上去徐龙森先生位于虹桥路的住处。丹青面色严峻，当晚正有他请辞清华教职一事的电视访问。木心先生衣饰雅致，神定气闲。说故论今，侃侃而谈。你不由得想，上海正是为他这等人准备的。（孙甘

露：《上海流水》，《上海 流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50页)

◎回乌镇期间实地勘察了已经开始建造的居所，亲自画了图纸，并取名“晚晴小筑”。

按：木心返美后通过书信仍与陈向宏保持密切交流，对“晚晴小筑”的图纸做了修改，对居所的布置、陈设、厅堂名等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

古有“晚晴亭”而未见有“晚晴小筑”，故仍具新意。区区垂暮侥幸，乌镇后来居上，皆“晚晴”可喻也。“小筑”乃屋主之谦词，意谓“造了一点小房子”。而屋名不可由寓者题，当由造屋者自命，方为得体。恕代庖。木谨识。（此为木心留给陈向宏的纸片。）

◎返美前一天，在陈丹青、陈向宏陪同下到杭州游览，期间与陈丹青、章学林等专程探访了林风眠故居。当天陈向宏在楼外楼为木心践行。

◎五月二日，给王淑瑾、尹大为寄信，两封，同时寄回王淑瑾《手工》一文的修改意见稿，其中说道：

你的第一批印稿，还很不成熟，路子欠正，故未作声，只对丹青说“我想题赠一句话：‘文学是一上来就要归真返璞的’，可以吗？”丹青想了想，叹道：“太重，她也不能懂。”这样就过去几年了。此番的新作，大有改观，脱去了时尚呀美眉呀的纠缠，而进入“他人”的境界，你面临极其宝贵的转折点。我所选出来的这个片段，是你的路，正路，蕴藉你自己的“风格”——祝贺你！

◎五月十日，给王淑瑾、尹大为寄台湾圆神版《西班牙三棵树》《温莎墓园》。

◎八月十日，给尹大为写信，至十二日寄出。其中肯定郭松棻对自己的评价，亦提及委托陈丹青处理国内的出版事宜：

那天我们走在四川路海宁路上，你几次说“郭松棻的评论写得好”，我听了很高兴，认为你有眼光，识货。（郭氏最近逝世，是中风，脑溢血，我很悲伤，我们有过一场美好的交往，我将静静地写一篇悼文，可能不止一篇吧。）他的“主体（主体+客体）”这一论断，既剽切又优美。我寄望由你来发挥个透彻，你不是说愿意为我做些事吧，那我就热切地恳请你做个大评论家。

.....

我已委托丹青作为国内出书的代理人，第一集是《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出书过程中请你和淑瑾帮帮丹青的忙。我相信你的智慧和才干所能起的作用。

眼迷糊，手无力，夏天真是灾难，上海如何，请多来信为盼。

◎九月八日，给尹大为写信，将近四千字。十月五日寄出。其中谈及本人小说在美国高校中受到关注，并对纽约散文座谈会上各家的发言做了回应：

我的小说在美国大学中作为教材运作时，教授和学生都是用世界性的观点来欣赏研究的，相与比较的是普鲁斯特、福楼拜、斯当达等等。将我摆在张爱玲、胡兰成一淘，就混乱了，她是那个时期中的比较杰出的作家，他是政客、报人、诡辩术士，不能称“异数”，她和他当时是红得很，流行得很，现在又被人津津乐道，哪里是异数呢——你要谈“异数”，就先要弄清什么是“异数”，如谈“上承XXX，下启XXX”，这还算“异数”么，这是个逻辑的错误。张、胡、陈、钟，在美学上与我无涉，若说我有“承先启后”的作用，那是先后茫茫，莫知所始莫知所终，而以东方西方相映

照，我宁是偏于西方的。美国的评论家亦持此见，笑着劝我移居到欧陆去。

这样也好，谬误既露，准确伊始。你一步步端正观点，营造架构，做学问，下功夫要真实，且举一例：你对散文座谈会的阅读还只是浅赏，郭的发言当然最好，而陈的“神智器识”一说，亦可再作深究。杨对《同车人的啜泣》的分析是剴切有见地的。林冷看出了“来自中世纪”的隐衷。梁恒说《明天不散步了》中有五十个意象。好，凭你的眼光，找出这五十个意象来，就可以作为你的论文中的一个“华彩乐段”（会引起读者各自去找心目中的意象，形成热潮）。生活在大陆，很容易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想方法中。所谓“宇宙观”不是一个高级思维，郭氏的宇宙观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的，观念先于存在。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表白过一己之宇宙观，只是在心目中排了一排程序：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要说在中国历史上，那末就文学家而言，是屈原、陶潜、曹雪芹。（说来话长，以后面谈吧。）

二〇〇六年 八十岁

◎一月，经陈丹青推介，《哥伦比亚的倒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篇目：上辑《九月初九》

《童年随之而去》《竹秀》《空房》《论美貌》《遗狂篇》《同车人的啜泣》《带根的流浪人》《两个朔拿梯那》《林肯中心的鼓声》《哥伦比亚的倒影》

《明天不散步了》，下辑《上海赋》（“从前的从前”“繁华巅峰期”“弄堂风光”“亭子间才情”“吃出名堂来”“只认衣衫不认人”）。书后附带一册《关于木心》，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中报》发起的“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发言文本。此为木心在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

◎一月四日，陈丹青到出版社验收样书。

终于等到主角登场了，这是摄人魂魄的时刻。新书发布会，过几天就要在静安庄亮相。小心翼翼翻阅，质检，丹青先生与出版社同事不自觉围成一团。封面印色正是“已凉未寒”，一贯素朴的美学。开本，纸张，装订，把玩良久。释然。刘瑞琳女士也笑了，松了一口气，说着，这道把关，幸好你在。丹青先生找到了奇文《上海赋》新近添写的一段文字，又叹不绝口——推动此书出版最力的这位“木心先生的学生”宣称，“阅读木心”，是“意料之外、之外”，是“情理之中、之中”。[曹凌志：《我所读到的木心

先生》，《书之旅：一个出版社20年的故事（1986—2006）》，王建周（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6页]

按：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曹凌志回忆，木心对书籍的校改、排版、装帧设计等均精益求精：

行首择字避免重复，这是细节中的细节，“假定两人曾住在这寺院中”“如若良一个人曾在这里”“要是梅先死”“如果良于梅死后殉了情”“倘系日本式的双双坠崖、跳火山”“除非良是遭人谋害”“要说良是因政治事件被逮捕”，《空房》里的七个假设，“又排列了一下”，真是essay的风格。

排版设计则可以称是苛求简约，木心先生给社内编辑的答话说，“本书的字体应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变化只在大小耳”，“切弗用此正楷（我反对手书正楷体印书）”，“请注意文字在页中的位置，摆坏了则前功尽弃”，“该集不用序跋，也好：我认同”。所以，出版社寄信推荐之开本和版式，“既疏朗，亲切，又会有书卷气，这也是爱书的读者所乐见的”，会博得老先生的夸奖：“极好，完全同意，编辑先生高明！”

文章更在不停地改，《昆德拉兄弟们》一文换了标题，收入手上这一本散文集，即今天读到的《带根的流浪人》；也欣然接受编校建议，繁体字版《哥伦比亚的倒影》和《明天不散步了》行文中出现过的惊叹号、问号都改为了逗号，一逗到底，说，“改得好，谢谢您”；回信又说，“来件收到，感德无任，谨就原信作答，如尚有疑点，请告丹青转我可也”。那么，当初就《上海赋》所提的一个编校问题——“老妪们端然坐定在竹椅上，好像与竹椅生来就是一体，剥蚕豆，以葱油炒之，折纸锭锡箔，祖宗忌辰焚化之，西娘家桃花缸（请确认？）收音机都是这样的。”——木心先生怎么作答呢？“潜台词是‘西凉界’‘桃花江’，老媪不解，讹言之。”哦，好玩，缠着木心迷的这个问题原来如此。[曹凌志：《我所读到的木心先生》，《书之旅：一个出版社20年的故事

(1986—2006)》，王建周（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7页]

◎一月五日，《南方周末》刊出学者陈子善、作家何立伟对《哥伦比亚的倒影》的评论文章。

木心先生有高远的抱负，他要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散文的界限，在散文创作中融入诗、小说、评论诸多因素，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文体。木心的散文实践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位文体家，在鲜明亮丽的文字背后，深邃的思想，形而上的思考汨汨而出。写散文于木心先生，就像是散步，“闲庭信步”，散步散远了，就成就了这部别具一格、气象万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陈子善：《姗姗来迟，毕竟还是来了》，《南方周末》，2006年1月5日）

木心的文章，字字句句，无不给人意外的喜悦。我把那些文章慢慢读完，叹一回气，如同见了高人，被他的识见同言语及人格所吸引，作声不得，唯有默然。（何立伟：《意外之人，意外之文》，《南方周末》，2006年1月5日）

◎一月七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全国书市上举行《哥伦比亚的倒影》发布会，陈丹青出席并做题为《我的师尊木心先生》的演讲，演讲稿后收入《退步集》（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按：有关《哥伦比亚的倒影》的销售情况，据陈丹青一月十六日在其新浪博客中透露：“出版社告诉我第一次印刷的一万本《哥伦比亚的倒影》已经被各地订货一空。”“《哥伦比亚的倒影》三天来都是三联书店销售排行榜的第一名。”

再按：刘瑞琳《他没有说话：木心美术馆开馆典礼致辞》误作“一月八号”。

◎一月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刊出陈丹青的《木心：一个无解的谜》。

◎五月九日，《北京日报》刊出赵鲲的《木心：当代文学的“天外来客”》。

◎六月，《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琼美卡随想录》篇目：第一辑《如意》《剑柄》《我友》《王者》《圆满》《心脏》《将醒》《呼唤》《休息》《除此》《无关》《烂去》《问谁》《败笔》《迟迟》《走了》《出魔》《笔挺》《缀之》《尖鞋》，第二辑《噓语》《俳句》《风言》，第三辑《上当》《但愿》《真的》《再说》《很好》《智蛙》《疯树》《不绝》《棉被》《步姿》《新呀》《荒年》《同在》《笑爬》《邪念》《放松》《某些》《认笨》《引喻》《怪想》《多累》《呆等》《卒岁》《后记》。

《温莎墓园日记》篇目：《序》《美国喜剧》《一车十八人》《夏明珠》《两个小人在打架》《SOS》《完美的女友》《七日之粮》《芳芳No.4》《魔轮》《月亮出来了》《第一个美国朋友》《寿衣》《静静下午茶》《五更转曲》《此岸的克利斯朵夫》《西邻子》《温莎墓园日记》。

◎八月，《中国图书评论》本年第八期刊出童明的《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木心风格的意

义》、赵鲲的《“安谧地一惊”：再读木心印象》、访谈《再谈木心先生：陈丹青答客问》。

◎九月，《即兴判断》《西班牙三棵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阅读木心成为年度读书热点，读书界甚至将本年称为“木心年”。

《即兴判断》篇目：上辑《游刃篇》《夏阑三简》《眸子青青》《圣安东尼再诱惑》《已凉未寒》《麦可和麦可》《寒砧断续》《寄白色平原》《晚来欲雪》《聊以卒岁》《普林斯顿的夏天》，下辑《路工》《吉雨》《鱼和书》《卖翅膀的天使》《醉舟之覆》《法兰西备忘录》《狭长雾围》。

《西班牙三棵树》篇目：《引》，一辑《中世纪的第四天》《咕嘎》《寄回哥本哈根》《祭叶芝》

《赴亚当斯阁前夕》《北美淹留》《〈凡·高在阿尔〉观后》《西岸人》《夕殿》《母与歌德言》《夏夜的婚礼》《春寒》《十四年前一些夜》《丙寅轶事》

《FRACTURE》《十八夜 晴》《泥天使》《面对面的隐士》《JJ》《斗牛士的袜子》《雪后》《论拥抱》

《旋律遗弃》《如歌的木屑》《涉及爱情的十个单行》《甜刺猬》《我的主祷文》《末期童话》《晚祷文》《托尔斯泰的奢侈品》《啊 米沙》《再访帕斯卡尔》《剑桥怀博尔赫斯》，二辑《艾华利好兄弟》

《啊，回纹针》《第二个滑铁卢》《南极·青草》《埃及·拉玛丹》《无忧虑的叙事诗》，三辑《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

《其八》《其九》《其十》《其十一》《其十二》

《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其十六》《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

本月，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春阳初次见面。

◎九月五日，据陈丹青新浪博客显示，海运公司货车运走归国物件。

◎九月八日下午四时，应故乡乌镇的盛情邀请，在陈丹青陪伴下踏上归国航班。黄秋虹、章学林送行。通过海运公司运回大小五十四件行李，包括古董家具和画作，其余大半赠送给在美的朋友和学生。

他其实心里很激动。我们坐着轮椅到飞机场的时候，他说：“走了，美国。”飞机到了北京，先要停一下。先生一直像小孩一样，飞机往下降落的时候他有点不耐烦，说飞机降落怎么这么慢啊，苍蝇一停就停住了。（《如何评价木心？如何阅读木心？》引陈丹青的话，《时代周报》，2011年12月29日）

◎九月九日，夜里近十一点到上海，住进衡山宾馆。

◎九月十日，在陈丹青、尹大为、王淑瑾陪同下游览上海。

◎九月十一日，由上海启程回乌镇，住进通安客栈。回乌镇定居后，除吃饭、睡觉和偶尔出门散步外，每天至少创作八小时。

一九八二年出国时没有想到会回故乡，倒是准备一去不复返的了。二十四年过去，乌镇（桐乡市）的贤达诸公的诚意感动了

我，我决定告别美国，带着文稿画件归去来兮，“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是野叟曝背，实为临老一搏，冀有所胜于以前。

（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今日之乌镇非昔日之乌镇矣，一代新人给予我创作艺术的足够的空间，所以我回来了。（沈秀红、孙飞翔：《木心先生六日在乌镇度中秋》，《嘉兴日报》，2006年10月7日）

回故乡是人情之常，自然而然，何况乌镇很符合我的美学判断。（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名仕》，2006年12月）

◎九月三十日，给桐乡市文联负责人叶瑜荪回信。

顷接大札，不胜忻悦，我此番归来，承桐乡市府礼遇，优渥备至，心怀感德，自当有以报效而终老故里矣。阁下为一时之隼彥，日后将有以教我也，待稍事养息后，再约会晤畅叙。

◎十月，《南方文坛》本年第五期刊出李静的《“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

◎十月五日，接受《名仕》杂志访谈。

◎十二月十五日，《鲁迅祭》刊载于《南方周末》。此为回国后唯一一次为大陆报刊写文章。

◎是年，作诗《格瓦斯》。

◎是年前后，童明与木心的文学代理人向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提交《空房》（An Empty Room）英译书稿，共十六篇。出版社很快通过决议，愿意出版，但只采纳其中的十三篇，不肯出《SOS》

《路工》《林肯中心的鼓声》三篇。经交涉无果，木心颇有些沉闷，但仍坚持己见。

二〇〇七年 八十一岁

◎一月，《素履之往》《我纷纷的情欲》《鱼丽之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素履之往》篇目：《白序》，一辑《庖鱼及宾》《朱绂方来》《白马翰如》《巫纷若吉》《亨于西山》《翩翩不富》《十朋之龟》《贲于丘园》《丽泽兑乐》《与尔靡之》《困于葛藟》《舍车而徒》《向晦宴息》，二辑《一饮一啄》，三辑《亡文学者》《晚祷》《媚俗讼》。

《我纷纷的情欲》篇目：一辑《我纷纷的情欲》《地中海》《牛奶·羊皮书》《艾斯克特赛马纪要》《巴黎俯眺》《茴香树》《FARO》《寄回波尔多》《佐治亚州小镇之秋》《即景》《在雅尔塔》《俄国九月》《阿尔卑斯山的阳光面》《大卫》《南欧速写》《俄国纪事》《夜宿伯莱特公爵府邸有感》《致H.海涅》《参徐照句》《点》《中古一景》《无鱼之奠》《咖啡评传》《爱斯基摩蒙难记》《致霍拉旭》《旷野一棵树》《某次夜谭的末了几句》《中古构图》《夏误》《阿里山之夜》《恋史》《古拉格轶事》《骰子论》《科隆之惊》《HAROLDII》《春舫》《还值一个弥撒吗》《夜晚的臣妾》《论鱼子酱》

《中古对话》《老桥》《醉史》《在波恩》《纸骑士》《肉体是一部圣经》《风筝们》，二辑《一些波斯诗》《金发·佛罗伦萨人》《雨后兰波》，三辑《思绝》《论白夜》《论绝望》《旗语》《帝俄的七月》《冬旅新英格兰》《湖畔诗人》《库兹明斯科一夜》《琴师和海鸥》《维斯瓦河边》《达累斯萨拉姆海港》《琥珀号》《英国》《布拉格》《以云为名的孩子》《论悲伤》《论命运》《论陶瓷》《论快乐》《论幸福》《论物》《叶绿素》《金色化离》《号声》《莱茵河》《香歌》《蚕歌》《KEY WEST》《奥地利》《复仇之前》《五月窗》《脚》《夏风中》《择路》《杜唐卡门》《泡沫》《晚声》《拉丁区》《咆哮》《中国的床帐I》《中国的床帐II》《草叶》《那人如是说》《它们在下雪》《醍醐》《美味无神论》《是爱》《命运》《保加利亚》《WELWITSCHIA》《眉目》《陌生的国族》《佛芒海燕》《SOLITUDE》《另类欧罗巴》《印度》《蒙特里奥》《五月街》《普罗旺斯》《歌词》《通心粉》《春雷》《芹香子》《我的体温》《渔村夜》《波兰》《年轻是一种天谴》《奥古斯答》《去罗卡拉索之前》《杰克逊高地》《海风No.1》《海风No.2》。

《鱼丽之宴》篇目：《江楼夜谈：答香港〈中报〉月刊记者问》《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雪夕酬酢：答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问》《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迟迟告白：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八年航程纪要》，附录：

《战后嘉年华》《有朋自西方来：木心珍贵的文友们》（童明辑译）。

◎二月二十二日，杭州朱绍平一家偕同海宁洪惠明来访，共进晚餐。席间谈及“九一一”事件后大型博物馆级全美巡回展的成功举办。

下午至乌镇，住通安客栈一三七房。四点三刻左右，拜访木心先生，木心先生住二楼一个套间，现在是暂时借住，其自己的住房，当地政府正在布置中。洪惠明陪我一同拜访。带上五册木心作品，请木心先生签名。木心先生送我另外三册，其中一册只剩一本，文洁问是否也送我，木心先生一口答应。为了不中断我们的谈话，木心先生让我先把书留下，等他签好名后再请小文送回来。洪惠明大胆求木心先生，能否也送他几本，先生竟也一口答应，搞得我好羡慕。洪不好意思多要，要了跟我一样的三册，木心先生要洪惠明留下姓名，便于签名。

谈话中，我跟木心先生谈及我的闲章“谁非过客，书是主人”时，木心先生建议我下次刻一枚椭圆形的闲章，内容就为“书长寿”。谈话间，不觉已过六点，我邀请木心先生能否一起吃晚餐。先生欣然答应。下楼前，我和洪惠明分别与木心先生合影留念。开了一瓶绍兴六年陈的黄酒。木心先生吃得不多，当我请教先生保健（先生虽已七十六岁，仍然清瘦矍铄）时，回答道：“吃饭六分饱。”人们常说是“七分饱”，而先生比常人还少一分，这也许就是至今精神的秘诀。但是后来谈到朱艺还在长身体时，他又笑着补充道：“吃饭六分饱（孩子要吃饱）。”吃饭过程中，有一件事，木心先生谈及时兴致很高。当我问及“九一一”发生时，先生应该尚在纽约时，先生说，他当时正在看电视，起先还以为是好莱坞的特技表演。过二十多天，他举办了个人画展，有三十三幅画展出，轰动全美。各大媒体，一片叫好。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如期举办，还是进行一番斗争。最后，木心先生决定如期进行。

木心先生说，根据一般心理学，最悲伤的人，一般经过二十天，也会得到初步恢复。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先生毅然决然做出了不改变展期的决定。事实证明，先生的决策是英明而正确的。吃饭结束后，我提议，朱朱、凯美、我们全家分别与木心先生合影留念。（朱绍平：《晤木心先生日记》，《梧桐影》总第十二期，夏春锦主编，梧桐阅社2018年8月印）

◎三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刊出《〈寿衣〉点评》（木心著、孙郁点评）、访谈《游走于世界的狂士：与孙郁谈木心的创作》。

本月，本年第三期《名作欣赏》刊出桐乡严僮伦的评论文章《木心意识流散文〈明天不散步了〉解读》。

◎三月二十四日，上海作家陈村、孔明珠等一行八人来访，经陈向宏安排与大家共进晚餐。

当天傍晚时分，在通安酒店，我们屏息静气等在接待大厅，花白头发的木心先生身着深蓝色西装，里面是蓝色条纹衬衫，脚步轻盈地走过来。关于那次拜见，我去翻看当时的日志，发现自己只记下几行字：“木心先生是一个儒雅、整洁、完美主义的老先生，他讲普通话，也会讲上海话，常有英文单词蹦出来，声音轻软妥帖。没聊多久，就发现他老人家很幽默。我说，我们见你很紧张。他说，你们紧张，我也紧张呀。”

因为事先被告知先生不爱被人拍照，再一见木心的风度，那气场之下，我们这些“狗仔”惯了的队员都不敢私自拿出相机来，我更是慌乱之中感觉气也透不过来，亦不知自己说过些什么话。同去的八〇后网友“小转铃”回来后写的那段帖子非常好，引在这里，权作延迟的现场转播：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乌镇见木心先生。木心走路很慢，面目清癯，瞳仁黑而大，深不见底，像两汪冰冻的潭水，潭上如蒙着一层薄烟。他注视着我的时候，仿佛掉进他眼睛里，心里会有点害怕，他笑起来的时候，顿觉如春江开冰般融暖。他穿一身深蓝色的西装，身形瘦削，慢慢地走，也有章法，仿佛一杆狼毫。听人讲话的时候安静仔细，自己讲话的时候温文尔雅，他讲，不必臣门如市，只愿臣心如水。

“木心先生烟瘾很大，或者是情绪不稳，短短半小时内已吸了六七支，烟头笔直地竖在烟缸里，和人也很像。有人说到请他写回忆录，他说，我也想写，只是每次去写，都觉得太累。说着，神情疲倦地伸指去把一个竖着的烟头推倒。

“看得出，是一个很自爱，有洁癖的人，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轻轻向下掸一下袖子，令人顿觉自己面目可憎，唐突佳人，不配坐在他的身边。

“木心先生美丽阴柔，像一个老派的大家闺秀——不是老克勒，是大家闺秀，我等的祖母一类。看到这样的人，再想到其作品中对美近乎病态的热爱，想到的比喻是王尔德。这些是人间美的化身，美的儿子，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本身就是目的，相比之下，那些作品有也好，没有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都不重要。”（孔明珠：《去乌镇见木心先生》，《爱木心：〈梧桐影〉特辑》，夏春锦主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28—29页）

◎四月十八日，严僮伦来访，聊其所作之《木心意识流散文〈明天不散步了〉解读》。

◎五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偕几位编辑第一次到访乌镇，在陈丹青的引荐下拜会木心。

二〇〇七年五月，陈丹青引荐我和几位出版社同事第一次到乌镇，拜访木心先生。跟先生一起晚饭后，我和同事坐在月光下的石桥上，惊叹见到天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先生说到他和陈丹青在纽约第一次长谈后，他用“好悬啊”三个字来表达幸亏人生相遇。[刘瑞琳：《他没有说话：木心美术馆开馆典礼致辞》，《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6页]

◎七月，《读书》本年第七期刊出孙郁的《木心之旅》。

◎十一月五日，《无锡日报》某记者以读者身份来访。

◎深秋，诗人仲青首次来访。

◎是年，《哈了一下没有成佛》刊于《视野》第十六期。

二〇〇八年 八十二岁

◎年初，陈丹青来访，选了八幅木心的转印画带到北京，寻求展出。

按：这八幅画一直放在陈丹青家里，未能展出，现存木心美术馆。

◎二月，刘瑞琳偕几位编辑第二次到乌镇拜会木心，住在晚晴小筑。谈话中木心提起想写一本《论读者》，还想做一本《雪句》给年轻读者做情人节的礼物。

二〇〇八年二月，我和几位出版社同事第二次来到乌镇，拜见木心先生。

这次见面，我们已出版前八种先生著作，多本新书整齐排在先生客厅壁炉边的柜子上。我们住先生家两天，第一天晚饭中先生说，一直想写《论读者》，“天地君亲师”之外，还有作者与读者这一层关系。第二天早上，告诉我们，他已经开始写起来了。还想着如何做一本《雪句》，给年轻读者做情人节的礼物。

第二天晚饭后，先生领我们进画室，第一次看到他的画，我忍不住冒失地问：如此精微，先生是如何画出来的？先生笑而不语。[刘瑞琳：《他没有说话：木心美术馆开馆典礼致辞》，《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6—37页]

本月，《文景》本年一、二月合刊刊出许志强的《论木心》。

◎五月，上海书评人顾文豪来访。

◎五月十七日，与陈巨源在乌镇重逢。

按：可参见陈巨源《与一代奇才木心的交往》，见《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九月，《巴珑》《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巴珑》篇目：《巴珑》《白夜非夜》《罗马停云》《东京淫祠》《伦敦街声》《我辈的雨》《夏末致Pushkin》《从薄伽丘的后园望去》《兰佩杜萨之赋》《圣彼得堡复名》《我劝高斯》《海岸阴谋》《雪掌》《明人秋色》《波斯湾之战》《雅词撰》《在维谢尔基村》《指纹考》《波尔多的钟声》《索证者》《塞尔彭之奠》《道院背坡》《共和国七年葡萄月底》《槭Aceraceae》《萨比尼四季》《末度行吟》《五岛晚邮》《西西里》《洛阳伽蓝赋》《智利行》《门户上方的公羊头》《魏玛早春》《夏夜的精灵》《维苏威余烬录》《埃特鲁里亚庄园记》《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篇目：一辑《汗斯酒店》《窥视和劫掠》《第六年呀》《诸圣瞻礼节》《荷兰画派》《汗斯·奥特逊》《老梨树》，二辑《艾伦》《小神殿》《黎巴嫩》《匈牙利》《快乐的伤兵》《尼罗河》《开罗》《那末玫瑰是一个例外》

《福迦拉什城堡的夜猎》《入埃及记》，三辑《锦绣前程》《夜糖》《预约》《沙萨》《莫斯科之北》
《屠格涅夫》《雪橇事件之后》《在保加利亚》《兹城·勒城》《我的农事诗》，四辑《贝壳放逐法》《生日》《黑海》《普里茨道院》《沙漠之德》《两种职业》《欧鳊》《巫女》《海》《望着苏门答腊海岸》
《两瓶敏托夫卡》《威尔斯口音》《大回忆》《吉普赛学者》，五辑《夏症》《与米什莱谈海》《两月天堂》《哈巴谷书考》《北方的浓雾》《卖艺的背教者》《梅德捷斯村》《奥温先生那边》《六百万马克》，六辑《战争第一夜》《一九一四》《波兰晚餐》《华沙四日》《OK》《Captain》《锡耶纳》《中尉的祈祷》《生命》《斯维纳蒙台》《白阑干》《柏林留言》，七辑：《〈田野报〉的读者》《立陶宛公使馆》《瑞士》《偌大的花圈》《赛拉比吉号》《西班牙的蔼列斯》《绿河口》《SOFIA》《罗马无假期》《伦敦》《RENAISSANCE》《BULGARIA》
《〈厨房史〉的读者》《储蓄俱乐部会员》《丹·伯克小馆》《都灵》《山茱萸农场》，附录。

◎九月下旬，桐乡画家戴卫中来访。

他由另一小伙子搀着左手慢慢进来，我心一紧，人老先老脚呀，他真的老了，他穿着很普通的灰黑的衣服，但很整洁，初看如常见的在家老人一样，但他坐下时和坐下后架势显示了他的儒雅风范，趁他微笑地打量我时，我恭敬递上印有我几幅画的小页，他看了看，似乎立即反应：“喔！C君办公桌后的屏风是你画的吧！”我大惊，这老人真厉害！他在完全不知我的任何情况下，竟然凭这几幅小小的印刷画面就断定某处的某画出自我的手，而这

画页与那画并不相同，只是同属传统画范围，但学传统的人也很多呀！我只好点头承认，他亦点了一下头，不知是表示肯定我的“成绩”还是其他意思。然后，他和蔼地望着我，缓缓而认真地说：“搞艺术的，重在创新，要有自己的面貌。”这是我知的老生常谈，但出自他口自然并非泛泛之言。我如实回答先生：“我并非不知道绘画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现在的情况是，许多精力用在他处，画画只是养家糊口的来源，而且许多人是冲着这传统画法来买我画的，我如改变画风，一定会断了生计。我并不认为我现在是在搞艺术，仅是谋生而已。”他望着我听着，一时不语，像在思考。（戴卫中：《“欢迎你再来！”》，《桐溪书声：〈梧桐影〉文选》，夏春锦主编，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282—283页）

◎十月，仲青来访。

本月，《云雀叫了一整天》《诗经演》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云雀叫了一整天》篇目：甲辑《大心情》《火车中的情诗》《哭》《格瓦斯》《哈理逊的回忆》《女优的肖像》《贵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伏尔加》《巴黎六条新闻》《伊斯坦堡》《论诱惑》《永井荷风的日本国》《爪哇国》《谢肉节的早晨》《时间囊》《多罗德娅》《惠特曼》《帆船颂》《论悲伤》《论德国》《象征关》《道路的记忆》《古希腊》《蒸汽时代》《而我辈也曾有过青春》《安息吧，仇敌们》《如偈》《梦中赛马》《知与爱》《德国》《卡夫卡的旧笔记》《佩特拉克》《宽容的夜色》《知堂诗素录》《路菜》《好吃》《欧陆小子在抬头》《假的》《从前慢》《辛亥革

命》《风吹作响的板扉》《爱尔兰》《修船的声音》
《克里斯港旧居》《河边楼》《春汗》《素描旅者》
《拥楫》《白香日注》《谑庵片简》《天慵生语》
《香奁新咏》《京师五月》《北京秋》《城和桥》
《杨子九记》《西湖》《少年朝食》《单衣》《伯律
珂斯的演说》《甲行日注》《甲行日注又》《明季乡
试》《加拿大魁北克有一家餐厅》《慕尼黑市政府广
场有好餐馆》《我与德国》《西班牙人》《我至今犹
在等候》《浮世绘》《清嘉录一》《清嘉录二》
《春》《水仙》《普希金的别调》《我》《跟秋天的
落叶一样多》《一九〇一年》《韩家潭》《取人篇》
《肤色颂》《人香》《抱背篇》《跟踪者》《夜詠》
《叶赛宁》《五月》《天意人工》《卢梭》《失去的
雾围》《农家》《色论》《浣花溪归》《夏日山居》
《灯塔中的画家》《波斯王卡斯宾》《荷兰》《面
包》《寂寞》《唯音乐如故》《Parma》《二十世纪的
最后一天》《巴黎—法兰克福》，乙辑，《后
记》。

《诗经演》篇目：《同袍》《郁林》《籊籊》
《载芣》《南有》《佼人》《贝锦》《黄鸟》《子
覆》《七襄》《覃耜》《玉尔》《芼楚》《忼忼》
《柔至》《康明》《繁霜》《肃肃》《有摽》《祁
祁》《弄椒》《谷风》《采芣》《有裳》《将谿》
《焕焕》《西门》《彼黍》《负暄》《粲者》《子
湑》《伐木》《棘心》《污浣》《执手》《绿衣》
《衡门》《野有》《关关》《木德》《黝黝》《其
雨》《投之》《无罍》《彼采》《将骐》《朝出》

《旦眷》《厥初》《瞻乌》《桃之》《汜彼》《逞
飞》《七月》《桢桢》《曰归》《允荒》《春申》
《南田》《如响》《雾豹》《多謁》《如英》《胡
菱》《乌镇》《怀里》《载阳》《常棣》《三捷》
《斯恩》《无寄》《昔我》《趯趯》《三星》《笱
公》《中露》《不如》《蟋蟀》《鸛鹑》《维惓》
《彤管》《恒骚》《匏有》《斯尤》《天骄》《三
世》《白鸟》《佻人》《隰桑》《斯》《何草》《如
夷》《葛生》《西门》《溱洧》《载蜚》《玼玼》
《采薇》《谓尔》《椒聊》《终南》《既见》《他
山》《鱼丽》《长睭》《有》《中谷》《绵绵》《叔
也》《有车》《溯风》《君门》《昔之》《芄芃》
《击壤》《束薪》《駉駉》《扣槃》《淇奥》《防
有》《在怀》《丧乱》《鹿鸣》《有》《遵云》《终
识》《魚杰》《英玉》《入穀》《寿眉》《无侶》
《骅骝》《反驹》《辖兮》《上天》《鬻沸》《傳
天》《变兮》《王事》《朝》《贪乱》《鳩鸣》《柳
斯》《为猷》《棠棠》《淞江》《醉止》《鱼在》
《采菽》《蹢躅》《权之》《日益》《方难》《嘒
彼》《振鹭》《营营》《胡逝》《壹者》《维昔》
《人有》《瞻卬》《白圭》《方虐》《不肖》《有
客》《白度》《尊之》《屡盟》《隳息》《憯兮》
《桑扈》《白华》《捷捷》《采芣》《心之》《倬
彼》《大风》《为愿》《采芣》《有杕》《緇衣》
《终风》《日居》《江有》《猗猗》《偃偃》《于
征》《沔彼》《皎皎》《丘中》《扪我》《凶矜》
《渐渐》《有命》《旂旐》《上权》《复屈》《雝

《雝》《丝衣》《如遗》《甫田》《高沙》《昌兮》
《鸿飞》《子褒》《仲门》《保艾》《以濯》《如陵》
《差池》《中林》《不我》《芄兰》《如晦》
《蒹葭》《有卷》《思乐》《其雷》《洄彼》《子衿》
《叔于》《伯氏》《因心》《询尔》《帝谓》
《穆穆》《南山》《不盈》《温温》《荏染》《柔木》
《于戏》《凤凰》《山有》《俟我》《敝笱》
《小戎》《驷》《岵逸》《委蛇》《玼兮》《维鹄》
《雨雨》《旨否》《蓼蓼》《夷怏》《我龟》《中田》
《者木》《有桃》《乐土》《覲子》《鹁之》
《子子》《我行》《大车》《有狐》《崔崔》《体原》
《是达》《瓜瓞》《国如》《十亩》，外篇：
《吾闻》《君命》《人异》《沧浪》《有馈》《人之》
《场师》《贵者》《余师》《多术》《观水》
《饥者》《道则》《为关》《子好》《视弃》《与少》
《斧斤》《钧是》《舞雩》《挟山》《滕问》
《赞》《子产》《眸子》《逢渊》《吹响》《天下》
《芴漠》《混沌》《仰之》《明道》《将欲》《回曰》
《美名》《色重》《其苏》《注后记》。

本月，孙郁、李静编的《读木心》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此书时，会随着作者一起重读木心先生的作品。一种莫名的诗学烈度，让人总想停下来，与谁说说话，说说这些文字惊起的思绪，说说曾经潜隐心底轻盈无告几已忘怀致命重要的一切，那无以名之的一切。然而未能，唯有静默——静默地唤醒内心的瀚海，那是人在孤独之中，与自我的相遇。

也许正是木心作品浩瀚而陌生的自我对话性质，使批评界审慎地沉默，使读者们不息地争议。我们认为此种争议是十分有益的现象——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疆界正向本质与精微之域拓展，而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却获得了汉语写作者和读者异常广泛的关切。

本书无意标榜“客观”，而在表呈相契却未必相识的人们对一颗诗性心灵的惊奇与理解。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我们对这位“文学鲁滨逊”的诗学建树，怀抱深切的体认，并且相信：公正的批评，绝非对卓异的创造无动于衷，相反，它理应参与她的命运，并对之奉上毫无保留的热忱。（《读木心·编后记》，《读木心》，孙郁、李静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93页）

◎十一月一日，给乌镇地方文史研究者周乾康回信，答复所问：

来信敬悉，关于《后汉书》下半原本是在乌镇发现此一说，我是见及于纽约中文报端的。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不过我认为此说是有一定的可靠性的。

二〇〇九年 八十三岁

◎年初，外甥王伟专程从北京来探亲，带来一张仅存的全家福。

按：此照约摄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地点为杭州西湖三潭印月。

◎二月九日，木心身体不适，陈向宏首次邀请桐乡名中医徐树民前来为之诊病。赠徐树民著作集一函八册，为之题词签名。

木心先生出来了，他招呼我在大茶几南边朝北坐下，他自己隔茶几朝南对面坐下。寒暄过后，他问我要红茶还是绿茶，我要了绿茶。过了一会，小代砌了二杯茶端来了。他对我的到来表示高兴，我们喝着茶，一面闲谈。我说了木心先生“学贯中西，素所景仰”的话，他谦逊着说：“我不懂医，是小学生。”接着木心先生邀我到靠壁桌子旁的朝北的椅子上坐了，他也在我右手一面坐定。我看他步履沉稳，显得气定神闲。我给他左右手分别按脉之后，看过舌苔，问过饮食起居的大概情况，定方如下：

“八秩大年，精神矍铄，此必有过人者。诊脉尺偏弱，冬令四末欠温，脾肾之虚显然。先拟温补脾肾，养血舒络，当归四逆汤合还少丹：全当归十二克，川桂枝三克，北细辛三克，杭白芍十二克，白通草三克，炙甘草三克，净莼肉十克，淮山药十五克，细生地十二克，绵杜仲十二克，淮牛膝十克，补骨脂十克。五剂。”

处方写好后，重新坐到茶几边吃茶。我对着木心先生，已没有了初来时的拘束。那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天气晴朗，连日阴霾一扫而空。木心先生已八十多岁，与之交谈，没有大人物的架子，却充满青年人的机智，偶杂以诙谐幽默，令人解颐。问籍贯，则自称“希腊人”。他面容清癯，但精神很好，这时我脑际不觉浮现出王世贞形容李时珍的那几句话：“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徐树民：《我第一次见木心先生》，《桐溪书声：〈梧桐影〉文选》，夏春锦主编，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268—269页）

◎三月六日，桐乡钱宜东、嘉兴市图书馆范笑我、《美术报》编辑谢海一行来访。

那是一个初春的午后，木心穿着一件宽松的衣服，戴着帽子，很有派头地说：“有人说我的作品忧郁，我说，忧郁后面是快乐。能发现快乐吗？今天不发现，明天、后天一定能发现。”还说：“在美国，我的绘画和文学已开了局面，得了收获，但以我的志愿而言，还只是小焉者，是故我将在美国做不到的事，转到中国来做。”那天，是我记者生涯中最闭气的一天，木心习惯不拍照、不录音、不签名，我的所有要求都被拒绝，直到临走时，我还说：“我没有看过你的原作，可以看看你的画吗？”他说：“房子太小，不方便。”木心对我说：“你笔记上记录的，不要去发表。将来找时间做个专访，请你来看画。”我说：“好。什么时候？”木心说：“到时候联系，我写信给你。”（谢海：《这个真文人真的走了》，《美术报》，2011年12月31日）

◎三月九日，近日大便闭结，深以为苦。请徐树民前来诊病，徐树民为之拟增水行舟法：

炒白术三十克，全当归十二克，黑元参十二克，细生地十二克，麦门冬十二克，生首乌十二克，肉苁蓉十二克，大麻仁十二

克，怀牛膝十二克，广陈皮六克，炒苏子十二克，炒桃仁十二克，潞党参十二克，桔梗六克。

◎三月十八日，给安徽读者刘向阳回信，其中说道：

您的评文写得好，观照有所深，体会有所切，气度有所大。贺贺。

希望您再写，成一集专著而出版。

读者的信、的文，是作者的“文学黄丝带”。

◎三月十九日，身体不适，请徐树民前来诊病，期间与之闲谈屈原、杜甫。

◎四月三日，身体不适，请徐树民前来诊病。

◎四月九日，因担心书信遗失，致信刘向阳。

◎四月二十日，给刘向阳回信，谢其赠茶：

多谢赐茶

欣慰奚如

余志茶

独钟清清

亟盼来信

以解悬念

◎春夏之交，上海独立摄影师郑阳首次来访。

先生也喜爱摄影，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在各国留影的很多照片，他说摄影最重要的是“构图、光线、细节”，以及“要像哲学又

不是哲学，要像诗又不是诗”。我给诗人拍过一些黑白肖像，他喜欢，而最喜欢的，还是那双手的照片。诗人说：“你把肖像拍成和这双手一样，就可以了。”以后我与先生每次见面，都会带上相机，为先生拍摄。先生告诉过我：“以前是国外的摄影师为我拍摄，现在让你给我拍摄，你要超过他们呀。”而在得知我的上海工作室依据诗集《巴珑》而起名为“巴珑艺术”，先生亲笔为我题了字，这是他赠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熟悉先生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幽默的人，与人聊天，笑话可以说几十个，读者胡贝和我提过，有次他与先生聊天，笑得从沙发上跌落下来，先生说 he 沉船了啊。多有意思的话。我还听黄帆说，有次聊到我，先生说是那个哈利·波特吧。原因是我戴着一副圆眼睛。

从二〇〇九年 to 二〇一一年，我每年两三次去乌镇，先生喜安静，我也不想太多打扰到他。平时先生基本不出门，只在家中写作、绘画，属于一位艺术上的隐士，生活则由两位青年管家代威与杨绍波照顾。……先生教了代威绘画，现在先生已故，而绘画手艺由代威得到传承，是我们读者很高兴见到的事情。（郑阳：《忆木心先生》，《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7页）

◎五月，《爱默生家的恶客》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篇目：一辑《圆光》《草色》《你还在这里》《烟蒂》《末班车的乘客》《七克》《街头三女人》《马拉格计划》，二辑《大西洋赌城之夜》《恒河·莲花·姐妹》《爱默生家的恶客》，三辑《韦思明》《大宋母仪》，附录《诛梟记》。

◎八月二十六日，徐宗帅偕同美国朋友受潘其銮之托，前往乌镇拜访木心，不遇。

◎九月十二日，患呃逆，请徐树民前来诊病。徐树民嘱咐如中药无效，可服参。

◎十月十三日，致电徐树民，说服参后果然见效，准备一整个冬天均服参。

◎年底，读者赵国君在北京组织了两场木心诗歌朗诵会。

◎是年，在与童明联系时提议将中文版短篇循环体小说集命名为《豹变》（按：此书由童明编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两人达成共识，认为《豹变》与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在结构原则上不谋而合。

二〇一〇年 八十四岁

◎一月一日，身体不适，请徐树民前来诊病。徐树民为之处膏方：

高年矍铄逾恒，自是松柏之姿。夜尿较多，肾气未免不足。酌投膏方，以助闭藏：红参、西洋参、杭白芍、净萸肉、当归身、茯神、熟枣仁、枸杞子各一百克，细生地、淮山药各一百二十克，炒白术二百克，补骨脂六十克，远志、五味子、炙甘草三十克，另阿胶、冰糖各二百五十克。

◎六月二十八日，给周乾康回电子邮件，附简历一份：

木心，原名孙牧心，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生，自小读私塾，接受严格家教。十七岁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后就学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一九四九年，木心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一年，历任全国性展览美术设计工作，一九八〇年，任上海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同年，木心的画作获日本神奈川县春季美术大展首奖。

一九八二年，木心移居纽约。一九八三年，在纽约林肯中心国家画廊举办水墨画展，一九八四年，在哈佛大学亚当斯阁举办水墨画展及木心绘画收藏仪式。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年，罗森克兰兹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联合举办“木心的艺术”巡回画展，在欧美艺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艺术》等报刊纷纷撰文评论。此次展出的三十三幅画作后由耶鲁大

学博物馆收藏。二〇〇三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评论木心绘画和文学成就的专辑画册，好评不断，被列为“五星级”杰作。

木心在文学领域亦成就斐然。虽然其早期作品都毁于“文革”，他到海外后又发奋创作，在欧美和港台的华文刊物发表大量文章，由此声名鹊起。台湾圆神、远流等出版社先后出版其作品十二集。木心在纽约还曾为中国艺术家和学者开办“世界文学史讲座”长达五年，深受颂扬，二〇〇六年，木心回故乡乌镇定居。迄今大陆已经出版的木心作品计有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即兴判断》《素履之往》；诗集《巴珑》《伪所罗门书》《诗经演》《云雀叫了一整天》《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问答录《鱼丽之宴》；《爱默生家的恶客》（按：散文集）等十多种。其时北京三联书店售书企划打出醒目标题“二〇〇六年是木心年”。

罗森克兰兹先生曾引用布克哈特一八六〇年描述“文艺复兴式人物”的话，借以称赞木心先生：“当这种高度自我实现的意愿与强健而丰沛的天赋结合，并精通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各种要素，一个‘全方位的人’，一个通达世界精神的人（homouniversale）应运而生……”木心，是这样一位世界性的艺术家。

◎八月，《木心画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八月三十日，读者匡文兵来访。

◎是年夏，童明来访，带来《空房》清样。

后来，木心的健康每况愈下，我建议他让一步。……二〇一〇年夏，我去乌镇，带去清样。木心双手接过，显然很兴奋：“来来来，让我看看这些混血的孩子。”翻看一阵之后，木心缓缓说了一句：“创作是父性的，翻译是母性的。”我心里一热。（童明：

《代序》，《豹变》，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2—33页)

◎九月，理想国在北京举办第一届文化沙龙，拟请木心前往参加活动，木心起先答应，后因故终未成行。

二〇一〇年九月，我们在北京办第一届理想国文化沙龙。跟活动策划人梁文道商量敦请木心先生从乌镇来北京，与读者见面。先生一度答应。但最后出于身体原因，没能成行。[刘瑞琳：《他没有说话：木心美术馆开馆典礼致辞》，《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7页]

本月，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第二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编第二节“旅外华人现代汉语散文”中对木心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简要论述。

◎十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曹凌志来访，商量新作品集出版事宜，精神状态很好，还打算出自己的照片集。

◎十月三十日，答豆瓣网友问。

◎秋，身体出现明显而急骤的衰弱。

明显而急骤的衰弱，始于二〇一〇年秋，先生虽无触目的病象，但已极度衰老，形销骨立。他瘦伶伶盘踞着他的座椅，默然不动，不再如过去那样悉心打理自己；勉力启唇，出声轻哑，惟目光灵动潮润，如孩子般来回仰看我们。稍有起坐走动，是必须两位侍护的青年，小代、小杨，左右搀扶了。[陈丹青：《守护

与送别：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上篇）》，《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50—151页]

◎十二月，经陈丹青牵线，接受美国独立电影制片导演弗朗西斯科·贝罗和蒂姆·斯丹伯格为其录制纪录片，前后相处十天。据两位导演回忆：

我们曾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幸运地见到木心并采访了他，他在我心中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有幸见过木心的人都曾被感染，而对于大多数没有见过他的人来说，他的作品传达的感染力是同样强烈的。事实上他养成了的那种低调，给他带来了一种令他舒服的距离，因为他坚信福楼拜的信条：呈示艺术，隐藏艺术家。在我们亲眼见到木心之前，我们曾听说他不一定会那么耐心，但我们从未感觉到这些，他很生动、爽朗，在各种话题中跳跃，并机智地与我们说笑。

他自由地从东西方文学和艺术传统中举例，在对话中穿梭于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谈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木心的脸几乎没有皱纹，他的眼神明亮又开阔，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年龄或他的那些遭遇给他刻下的东西。是的，他会同我们讲起他的过去，但他真正想同我们说的是他依然在创作。对木心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这样告诉我们，是对得起少年时他对艺术所做的承诺。在历经了六七十年代的牢狱和之后远走美国初期的拮据，他千万里回到中国，依然怀着热情继续写、继续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他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在阴影和逆境中对待生活，他向我们展示了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么比空谈更重要。（弗朗西斯科·贝罗、蒂姆·斯丹伯格为“木心先生乌镇追思会”写来的信，《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7—28页）

本月，收藏家弗里德·高登来访。

本月，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初安民与小说家骆以军来访，协商在台湾出版《木心文集》事宜。

本月，杨泽来访。

◎十二月二十九日，匡文兵再次来访。

◎是年，童明来访，带来由其翻译的散文体小说集《空房》样稿。

二〇一一年 八十五岁

◎四月，某日郑阳来访，最后一次接受其摄影。

◎五月三日，答豆瓣网友问。

◎五月十九日，身体不适，最后一次接受徐树民诊病，临别时赠其一册《木心画集》。

自从二〇〇九年二月九日为木心诊病以来，我一共为木心看病八次。第一次见面，是那年的元宵节。虽然木心先生年事已高，但除了脾肾之虚外，并无大恙。所以所开方子多以滋补为主。同年年底，木心多次打嗝，于是来电咨询。我嘱咐他多服红参，果然见效。不久又打电话来，笑着说要服一个冬天。先生喜爱屈原，喜爱杜甫，从内在来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在为木心诊病之余，也与他交流古典诗词，并对其古诗词的造诣颇为叹服。木心先生因心肺衰竭过世。我也认为，先生身体内虚，属于老熟。（朱梁峰、陈苏：《木心最后的日子》，《嘉兴日报》，2006年10月7日）

◎五月，童明翻译的小说集《空房》在美国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共十三篇。目录为：《童年随之而去》《夏明珠》《空房》《芳芳No.4》《地下室手记》《西邻子》《一车十八人》《静静下午茶》《同车人的啜泣》《魏玛早春》《圆光》《明天不散步了》《温莎墓园日记》《译后记》。

◎七月，陈向宏面告美术馆方案年内将启动，在陈丹青、林兵等陪同下前往西栅探看场地，选定美术馆馆址。

按：美术馆原本打算建在乌镇东栅晚晴小筑北面，陈向宏为此专门买了二十亩地，后因木心觉得不理想，改建在西栅元宝湖畔。

我们因为美术馆选址的问题也纠结过。因为木心在世，他住的房子后面不好动工。看着他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心里就很着急，应该先做美术馆的设计方案，还是先选址。

我想到西栅的大剧院边上那块地不错，就和丹青推着轮椅，陪着木心去让他瞧瞧。他跟我说：“向宏啊，就在这个地方建美术馆。”我说：“先生，那就离您东栅的故居太远了。”说不要紧，这正呼应了他给故居题的那个堂匾：卧东怀西。卧东，是指他的故居在东栅，怀西，指的是西栅；还有一层意思，他是东方的，但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又来自西方，而他文学艺术的成就是世界性的。

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可能我死后也葬在那个美术馆里面？”我回答他可以。他还说土葬是不可以了，骨灰应该没问题。那天他很开心，少有的开心。（陈向宏：《将先生请回乌镇》，《木心：告别与重逢》，为《生活月刊》第121期别册，张泉主编，2015年12月，36—37页）

本月，童明来访。

◎八月，带病接见两位读者。

◎九月，两次会见林兵和冈本博，就美术馆的设计进行了沟通。给两人看了自己的画作，谈了自己早年上海和美国的经历。亦谈及贝聿铭。

二〇一一年的九月，我们曾两次拜会木心，与他就美术馆的设计进行了沟通。木心没有提出具体的设计要求，然而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期待。先生给我们看了他的画作，谈及了早年在上海和美国的经历，谈及了他的好友、我们的导师贝聿铭先生，他希望我们放开手设计，“吓他一跳”。（林兵：《木心美术馆》，《建筑学报》，2016年第12期，41页）

◎十月，阿历克珊德拉·梦露、弗里德·高登来访。

◎十月下旬，在李春阳夫妇陪同下第一次入住桐乡第一人民医院，本意是医治白内障，体检时发现得的是“房室传导阻滞二度I型病”。院方下病危通知，迅即转往心脏专科。经医治，各项数据迅速回升，复检趋近正常，吵着回家。回家后渐能起坐饮食，谈笑如故。

◎十月、十一月间，先后两次与建筑师林兵和冈本博沟通木心美术馆的设想，陈丹青、陈向宏在侧。

◎十一月八日，开始说胡话，陈向宏安排医生前来诊视，得出结论：肺部感染，导致脑缺氧，脏器功能失效、衰竭。

◎十一月十五日，经劝说入住桐乡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十二楼十一号病房。

◎十一月十六日，陈丹青、黄素宁夫妇赶到桐乡陪护，陈丹青受林兵委托将美术馆设计稿带给木心审阅。

十一月十六日黄昏，我与内人从杭州机场赶到桐乡医院，直趋先生床前。没想到他抬脸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海盗呢！他们走了吗？”

我本能发笑，同时心神纷乱：先生谵妄了！来路上关于对应先生病重的仓促想象，当下失效：现在他也成了我不认识的人。

“打走了！全部打走了！”我们俯向他，高声应答，如骗小孩，同时我迅速镇定自己，预备接手这骤然陌生的经验。他靠靠好，神情将信将疑：“哦，原来这样……”

今天，上午，先生又开始与我絮絮说话，是昔年对谈时的熟悉目光，忽然，“你是谁？”我永难忘记那一瞬。

“我是丹青啊！”我冲他吼叫，因这声叫而发急，另一念同时到位：完了，先生要死了……他微微一愣，神色转而舒缓。我仍不能确定他是否认出。片刻，如他交代自以为要紧的意思时，悠然转用浙沪口音的普通话，平静而清楚地说：

“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陈丹青：《守护与送别：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上）》，《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49—150页]

幸运的是，当先生第二次住院时，林兵委托我将设计稿带给先生看，这是大礼物，是先生期待多年的事。大家知道，先生中年长期从事设计，懂行，很挑剔。可是他老病后，意识不清楚了，甚至不认识我。第二天他认出了，我就把设计图给他看，像哄小孩一样，我说，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看了很久，说，我看见一顶桥。我说你再看看，他说：很好看。我说：这顶桥跟你什么关系？他说：什么关系？是美术馆吗？我说，这就是木心美术馆。他凝神看了很久，慢慢慢慢想起来：这就是他想象的那个美术馆。他说：哦，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木心先生乌镇追思会》，《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5页）

◎十一月十七日，陈丹青为木心写素描数张。

◎十一月十九日，读者樊小纯请三位上海的医师到桐乡为木心会诊，各事心脏、呼吸、神经科。会诊结论不容乐观。

◎十一月二十九日，陈丹青再次赶到桐乡，停留三天。王伟、黄帆、仲青、代威、杨绍波、黄秋虹等陪护。

◎十二月一日，与陈丹青最后一次交谈。中午，签署遗嘱委托陈丹青和陈向宏代理遗稿和美术馆诸事宜，同时与陈向宏共同委托陈丹青出任美术馆馆长。

期间我与向宏经历了艰难的故事：先生必须完成后事的嘱托，签署文件。入院前，他的手书遗嘱笔迹颤抖，才几行字，未及写完。现在作难的是：他几时清醒？我不想描述详细的经过，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画，“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沾染印泥——先生从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哭着，这才明白自己积久的压抑。[陈丹青：《守护与送别：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上）》，《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60—161页]

◎十二月五日，转到二楼重症病房，生命靠输液维持。

◎十二月六日，心律和血压一度急骤下降，经短暂抢救，数据恢复。之后呼吸完全依赖机器。

◎十二月月初，杭州的一位呼吸科资深大夫前来诊视，结论如出一辙。病重期间，十余位从纽约、北

京、湖南、湖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自发赶来的读者到医院守护，直至木心去世。

◎十二月十五日，陈丹青回到北京，开写讣告。

◎十二月十六日，荣获《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五十位“年度魅力人物”之一，陈丹青在北京代为领奖。

◎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时，病逝于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享年八十四周岁。下午，由海内外二十余位知名文艺界人士组成的木心先生治丧委员会对外发表讣告。

木心先生讣告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时，诗人、文学家、画家木心先生在故乡乌镇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木心，本名孙璞，字仰中（按：木心字玉山，仰中为其少年时曾用名，而非字），一九二七年生于浙江乌镇，自幼迷恋绘画与写作。一九四八年毕业（按：应为肄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后任教上海浦东高桥中学（按：应为上海市育民中学，位于上海高桥）五年。五十至七十年代，任职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按：木心于一九七八年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职），参与人民大会堂及历届广交会设计工作。画余写作诗、小说、剧作、散文、随笔、杂记、文论，自订二十二册，“文革”初全部抄没。“文革”中被非法监禁期间，秘密写作，成狱中手稿六十六页。出狱后，继续作画。一九八二年远赴纽约，重续文学生涯。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台湾陆续出版木心文集共十二种。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为旅居纽约的文艺爱好者开讲“世界文学史”，为期五年。二〇〇三年（按：应是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木心个人画展在耶鲁大学美术

馆、纽约亚洲协会、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巡回。二〇〇六年，木心文学系列首度在大陆出版，始获本土读者认知。同年，应故乡乌镇的盛情邀请，回国定居，时年七十九岁（按：系周岁）。二〇一〇年（按：应是二〇一一年五月），木心散文体小说集《空房》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年底，纽约独立电影制片导演赴乌镇为木心先生录制纪录片。二〇一一年秋，因肺部感染入桐乡第一人民医院，经乌镇当地领导妥善安排，竭力救治。木心先生没有眷属子女，病重期间，青年读者十余人自纽约、北京、湖南、湖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自行来到桐乡医院守护，直至先生终告不治。木心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在桐乡殡仪馆举行。同日下午，于乌镇西栅昭明书院举行木心先生追思会。先生灵堂，设于乌镇东栅木心故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开放给前来祭悼的各界人士。谨此讣闻。

木心先生治丧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木心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

陈向宏 浙江桐乡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瑞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王 韦 华润总公司高级国际商务师，木心先生外甥

童 明 美国加州大学文学史教授

巫 鸿 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

阿历克珊德拉·梦露 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部主任

大卫·森萨博 耶鲁大学美术馆馆长

林 兵 OLI建筑设计事务所“木心美术馆”设计师

冈本博 OLI建筑设计事务所“木心美术馆”设计师

刘丹 画家

陈丹青 画家

陈村 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孙甘露 作家

小宝 作家，评论家

牛陇菲 音乐学家，国学家

梁文道 香港媒体人，评论家，作家

初安民 台湾出版人

杨泽 诗人，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主编

蔡康永 台湾媒体人

骆以军 台湾作家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

李春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静 《北京日报》高级编辑，文艺评论家

陈子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史教授

赵国君 中国律师观察网总编

弗朗西斯科·贝罗 纽约独立制片电影导演

蒂姆·斯丹伯格 纽约独立制片电影导演

代威 木心晚年的侍护青年

杨绍波 木心晚年的侍护青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至九点四十分，木心遗体告别仪式在桐乡殡仪馆举行。同日下午三点至七点一刻，木心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乌镇西栅昭明书院举行追思会。其灵堂设于乌镇东栅木心生前住所晚晴小筑，本日起向前来祭悼的各界人士开放。

二〇一二年

◎七月，台版《木心作品集》（十三册）由台湾 INK 印刻文学陆续出版。包括：

《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巴珑》
《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云雀叫了一整天》《诗经演》《琼美卡随想录》《即兴判断》《素履之往》《哥伦比亚的倒影》《爱默生家的恶客》《鱼丽之宴》《温莎墓园日记》。

二〇一三年

◎一月，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月，刘瑞琳主编的《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月，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第一一三期推出“木心纪念辑”。

◎十月，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由台湾INK印刻文学出版。

◎十二月十四日，由《新周刊》杂志主办、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乌镇·二〇一三中国年度新锐榜”颁奖礼在乌镇举行，《文学回忆录》荣获年度图书奖。陈丹青率领所有参与整理《文学回忆录》的理想国编辑出席颁奖礼并领奖。此行，理想国编辑在乌镇首次开始整理木心遗稿。

授奖词：

一部大书思接古今，文洽中外，慧融哲史，是文学嘉谈，更是艺术教养。让卡夫卡与林黛玉相遇，请老子与耶稣同席；列国伟大文艺家，如同作者家中常客，历来不朽思想者，恰是先生座上良朋。四十万字《文学回忆录》，复活一个语睿心长的木心，

接续“民国”最后的智者风范。为时代注入涓涓细语，替浅阅读的新媒体环境加上深深辞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是年，由童明翻译的《SOS》发表于纽约《布鲁克林铁轨》杂志。同年十月，该文获得Pushcart文学奖提名。

二〇一四年

◎一月，桐乡市梧桐阅社编的《梧桐影》第五期“木心纪念专辑”出刊。

◎二月，刘瑞琳主编的《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五月二十五日，木心故居纪念馆举行开馆典礼，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坐落于乌镇东栅财神湾一八六号，由生平馆、绘画馆、文学馆组成，展出木心生前的照片、画作、手稿和遗物。

二〇一五年

◎二月，刘瑞琳主编的《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月十八日，木心诗作《从前慢》经青年音乐人刘胡轶谱曲，作为歌曲类节目登上二〇一五年央视春晚。歌曲由歌手刘欢演唱，小提琴家吕思清和钢琴家郎朗伴奏。

◎八月，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的《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月，李劫著《木心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九月，童明选编的《木心诗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夏春锦主编、梧桐阅社编的《爱木心：〈梧桐影〉特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十五日，木心美术馆举行开馆典礼，陈丹青出任馆长。木心美术馆坐落于乌镇西栅，总占地面积六千七百平方米，由纽约OLI事务所冈本博、林兵设计督造，由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巨匠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施工，全程历时四年；馆内设计与布展，由OLI设计师法比安主持，为期一年半。木心美术馆是在桐乡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致力于纪念和展示木心的毕生心血与美学遗产，设五座永久性专馆，长期陈列木心作品，由绘画馆、文学馆、狱中手稿馆及影像厅组成。另有一个阶梯图书馆和两个特展馆，特展馆将不定期推出对木心构成重要影响的世界性艺术家年度特展。

本次开馆还特意安排了《尼采与木心》和《林风眠与木心》两个特展。其中《尼采与木心》特展经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平协助交涉，得到德国尼采基金会、瑙姆堡尼采文献档案中心、魏玛古典基金会、歌德席勒档案馆、尼采学院、魏玛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的共同支持，提供尼采手稿四份、十九世纪原版著作二十一件、尼采肖像八件、死亡面模一件以供展览。此为尼采文献与文物首次来亚洲国家展示。展览日期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日。十五日晚还举行了题为《我不是人，我是炸药》的尼采情景朗诵会，由魏玛尼采学院院长鲁迪格·施密特·格雷帕伊导演，德国演员保罗·恩克、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丁建华主演，上海音乐学院教师谢亚双子钢琴伴奏。

《林风眠与木心》特展得到上海中国画院支持，借出林风眠十件原作，与木心五件画作及《双重悲悼》原稿同堂展示，以此缅怀这对师生的绘事与行

谊。展览日期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〇一六年

◎二月十四日，木心美术馆于阶梯图书馆举行《木心先生诞辰八十九周年纪念音乐会》。参与本次音乐会表演的音乐家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高平、四川音乐学院声乐二系副教授张怡、长笛演奏家翁斯贝、法国音乐家朱力安、上海音乐学院教师谢亚双子。其中高平钢琴伴奏，由张怡演唱了高平作曲的木心诗作三首《湖畔诗人》《论拥抱》《旋律遗弃》。

◎十月二十一日，木心美术馆举行二〇一六年度特展《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展出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苏州昆曲博物馆、嘉兴市图书馆等机构借出的老戏服、汤显祖画像、朱生豪手稿等。此外还有伦敦大英图书馆提供的大量历史图像和BBC广播公司以莎士比亚为主题制作的大型专题影像。展览时间从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晚还于乌镇国乐剧院举行了《莎士比亚戏文朗诵会》，由演员濮存昕导演并领衔，由央视新闻主播李梓萌主持，演员宋春丽、任志宏、陈小艺、胡军、罗巍、王文洁、徐涛、师春玲、赵岭分别朗诵了莎士比亚名剧的经典片段。演出结束后，在木心美术馆阶梯图书馆举行“我的莎士比亚和汤

显祖”主题对话，由《南方周末》副主编方阳主持，演员濮存昕、越剧演员茅威涛、清华大学教授沈林、木心美术馆馆长陈丹青分享了各自的心得。

◎十二月二十日，木心美术馆年度特展《〈圣经〉版本展》对外开放。

◎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美术馆于乌镇大剧院举行《木心音乐首演》，以此纪念木心逝世五周年。此次音乐会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高平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副教授陈卫平合作演出，其中包括木心原稿《未题》以及经高平编译与再创作的钢琴曲《未题》、钢琴与大提琴曲《叙事曲一号》。

如 偈

木心

艺海如宦海
沉浮五十年
荣辱万事过
贵贱一身兼
我亦飘零久
移樽美利坚
避秦重振笔
抖擞三百篇
问君胡能尔
向笑终无言

楼高清入骨
山远淡失巔
人道天连水
我意水接天
肝胆忽相照
钟鼎永传衍
会当饮美酒
顾盼若神仙
被服纨与素
轡辘致而坚
窥户多魑魅
幕重岂容见
晚晴风光好
大梦觉犹眠
每忆儿时景
莲叶何田田

【注释】

[1] 即P85—86提到的《哈姆莱特泛论》《奥菲司精义》。

[2] 此文最早发在纽约的《美洲华侨时报》。

附录

自制年表一

中國歲月

1927年-1935年	烏鎮	9岁	
1936年	紹興	10岁	
1938年	嘉興	12岁	
1943年	烏鎮	16岁	
1943年秋	嘉興	"	
1944年春	杭州	17岁	
1945年初-48年夏	上海	19岁-21岁	美孚
1948年秋	上海		
1949年初	杭州	22岁	金沙港
1949年5月-7月	文工團	"	溫州
1950年初-8月	杭州	24岁	省立杭高
1950年夏-冬	莫干山	"	
1951年初-8月	上海	25岁	江陰
1951年秋-1956年7月	上海	30岁	高橋南民中學
1956年7月-12月	"	"	第二市所
1957年初-12月	"	"	设计展覽會
1958年秋-冬	北京	32岁	全國農展
1959年春-秋	"	33岁	全國工業展
1960年-1962年	上海	36岁	美術模型廠
1963年-1965年	"	39岁	廣告公司
1966年-1968年		40-42岁	模型廠
1968年7月-12月	"	"	郵安分局
1969年1月-1970年7月	"	44岁	在廠勞改
1970年8月-11月	"	"	在廠勞改
1970年12月-71年9月		45岁	在地毯廠"

1970年¹⁰月-71年²月 上海 46岁 在绣品厂当钳工
1972年3月-72年6月 " 在本厂防虫同防组
1972年6月-1979年底 " 53岁 在本厂当改
1980年初-81年秋 " 56岁 在苏美结绳协会
1981年-1982年7月 " 67岁 在苏美结绳协会
1982年8月下旬 离开中国

自制年表二

1927年 - 35年	在乌镇	一五九岁	} 十年
1935年 - 36年	在虹桥	十岁	
1937年 - 38年	在绍兴	十二岁	} 十年
1939年	在乌镇	十三岁	
1940年	在嘉兴	十四岁	
1941年	在乌镇	十五岁	
1942年秋	在嘉兴	十六岁	
1943年春 - 45年底	在杭州	十七岁	} 十年
1946年初	进上海美专	十九岁	
1948年9月	到台子	廿二岁	
1949年初	回杭州	廿三岁	
1949年5月 - 7月	参加文工团	"	
" 年8月			} 十年
1950年	杭州皮市巷	廿四岁	
" 年初 - 8月底	浙江省三杭高	"	
" 年9月 - 12月	莫干山	"	
1951年1月 - 8月	上海江湾	廿五岁	
1951年秋 - 1956年7月	高桥音民中学	三十岁	} 十年
1956年7月 - 12月	第二看守所	"	
1957年	上海设计展览会	三十一岁	
1958年秋 - 冬	北京农展	三十二岁	
1959年春 - 秋	北京工、农展	三十三岁	
1960年 - 62年	上海集邮模型厂	三十三岁	} 十年
1963年 - 65年	上海外贸、广告、郑州	三十九岁	
1966年初 - 5月	重入上煤厂	四十岁	
" 年6月			
1968年7月 - 12月	上海静安分局看守所	四十二岁	

日文简历

木 心

杭州 絵画 研究社 社長
 上海市 工艺美术品 展览会 總設計師
 上海市 工艺美术家 協会 秘書長
 上海市 交通大学 美術 理論 教授
 期刊 紙 〈美比生活〉 編集 主任

略 歴

中国 浙江人 に 生れた
 上海 美術学校 卒業

- 1980 神奈川県 美術家 協会 主催 に 第21 回 県展 (公募展) に 招待 作家 として 出品。
 水墨画 6点 へ 金賞 と 授賞。 更に 日本 美術家 協会 に 招待 作家 として 選ばれる。
- 1981 香港 の 期刊 紙 〈中環〉 の 表紙 に 作品 が 掲載 される。 又 同誌 に 〈木心の 作品 選〉 として、
 インタビュー 記事 〈木心 先生 訪問 記〉 が 紹介 される。
- 1982 渡米。 現代 美術 の 動向 を 探る 旅。
- 1983 第47 回 神奈川県 展 に 招待 作家 として 出品。
 不透明 水彩 を 用いた 水彩画 2点 へ。
 日本 芸術 新聞 社賞 と 授賞。
 同年 9月、10月。 水彩画 9点 へ。 〈I.M.A. 展〉
 (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モダン・アート 協会 主催 に 対) に
 選ばれる。 同展は、10月、東京、横浜 を 巡回 し、
 開催 された。
- 1984 〈中国 時報〉 アメリカ 版。 香港 の 月刊 紙 〈芸術家〉
 台湾 の 雑誌 〈芸術家〉 に、 木心 の 作品 が 紹介
 され、 更に それ 以外 一様に、 彼の 独特 な 作風 は、
 世界 の 美術 の 動向 の 中で 特異 な 所 に 位置 して いる。
 高く 評価 している。

代跋 追寻那个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木心是谁？木心有小诗《我》：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木心还有俳句：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木心，就是那个生前、死后，似乎都在一片迷离的大雪之中的人。

当年美国电影人拍摄的纪录片，木心行走在大雪之中的孙家花园的画面，想必留给许多人深刻的印象。是的，木心与雪，就是那么切合，所谓纷纷飘下，更静，更大……后来偶遇主人离去的孙家花园，也曾细细思量，那一场乌镇的雪，呈现了什么？退隐了什么？

事到如今，想要追寻木心其人，也只有到那遗存下来的文字符号当中了。木心的遗稿，再三论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分明隔着代沟，却又是忘年交，相隔百年千年，可以一见如故。确实如此，想要从那么多的文字符号之中，再来拼成一个近似完整的故人木心，有这么一份痴心痴情的人，想必也有不少了吧？其中的痴，引一句古人的话：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木心再三说过，他坚信福楼拜的信条：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关于艺术家与艺术的关系，木心最欣赏的哲学家尼采曾在《艺术的背后》一文中说道：“无论艺术家幕后、背后的工作是如何艰辛，但他呈现的艺术作品应当给人这种印象，这是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一个标志，当人们通过艺术品来设想艺术家时，一定要使人们把艺术家想象成一个在艺术上充满力感的人，由于这种力感，他从容不迫、举重若轻。”是的，艺术家在艺术中所呈现出来的，有时候与其人惊人的一致，有时候却会决然相反，仿写一句木心似的话：举重若轻，轻也就是轻给人家看看而已。

再说木心，也不是一个绝口不谈自己的人，《木心谈木心》则是与友人谈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其中就说：写写虚的，写实的；写写实的，弄虚了。艺术就是在虚与实、真与幻之中存在。木心不写回忆录，或者说只有一部曾经想写终于没有写出来的回忆录，在《海峡传声》一文里回忆当初想写的《瓷国回忆录》，传记性，应归小说类。其实已经写成的诸如《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战后嘉年华》之类，也应如是观。

其实，木心本人也是极其喜欢读艺术家的回忆录、传记之类的，比如尼采，喜欢读其自传《瞧！这个人》，也喜欢丹尼尔·哈列维的《尼采传》。据《战后嘉年华》中的回忆：“杭州旧书店多多，多到每天只要我出去逛街，总可以选一捆，坐黄包车回来，最嗜读的是‘欧洲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没有料到许多故

事是好事家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我却件件信以为真，如诵家谱，尤其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特别使我入迷着魔。”当年的木心，就是在这些亦真亦幻的“轶事”当中学习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的，作油画，学钢琴……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木心靠在窗栏上凝望慢流的河水，还想起那些轶事、传记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不幸，也还是幸。”不知后来的木心，是否也是如此看待自己？

木心与童明《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之中就说：“艺术家最初是选择家，他选择了艺术，却不等于艺术选择了他，所以必得具备殉难的精神。浩劫中多的是死殉者，那是可同情可尊敬的，而我选择的是‘生殉’——在绝望中求永生。”木心在与李宗陶对话时也说：“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这里提及一种精神，以及精神的伟大力量，也是木心在与许多人的对话之中再三提及的，平常还在思想死，到了危难之中则偏偏不想死了，一死了之，还是容易，向死的机会多，却要去挺过来，也只有挺了过来，方才不辜负艺术的教养。

所以说，木心，就是这么一位以不死殉道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追求，最终在他自己的身上汇聚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了一个全方位的人。木心八十四岁时，给乌镇的周乾康先生的一份简历中提及，罗森克兰兹先生曾引用布克哈特描述“文艺复兴式人物”的

话，借以称赞木心：“当这种高度自我实现的意愿与强健而丰沛的天赋结合，并精通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各种要素，一个‘全方位的人’，一个通达世界精神的人应运而生……”是的，木心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精神的艺术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这种定位，也将会越来越清晰起来。

二〇〇一年，内地的《上海文学》连载了木心的《上海赋》，陈子善先生在当年五月号的《上海文学》上介绍：“木心者，何许人也？即便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恐怕也感到很陌生吧。其实，他是享誉台港和美国华文文坛的著名散文家，只不过他一贯低调，专心绘画和作文，以至长期以来此间对他以艺术家的慧眼和心智，观察环境思索生命驰骋想象的隽永散文，几乎一无所知。”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学的鲁滨逊”，直到读书界所谓木心年的二〇〇六年，内地的许多报刊都在争论这一形象，争论似乎还在持续下去。

同样也是二〇〇一年，“木心的艺术：风景画与狱中手稿”大型博物馆级全美巡回展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美术馆隆重开幕，预告手册上是这么介绍木心的：“木心是二十世纪最不寻常的艺术家之一。一九二七年生于中国，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起起伏伏……《狱中手稿》写于稍早‘文革’期间他的单独禁闭。二者都展现了木心以理性生活战胜牢狱生涯的意志，他因此可以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伟大历史人物自如交流。”这里呈现的是一个以艺术以及理性

生活战胜牢狱生涯的斗士形象，这也许是西方人更愿意接受的。

木心逝世之后，为木心录制纪录片的两位美国导演在乌镇的追思会上回忆木心：“他在我们心中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有幸见过木心的人都曾被感染，而对于大多数没有见过他的人来说，他的作品传达的感染力是同样强烈的。事实上他养成了的那种低调，给他带来了一种令他舒服的距离，……木心的脸几乎没有皱纹，他的眼神明亮又开阔，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年龄或他的那些遭遇给他刻下的东西。是的，他会同我们讲起他的过去，但他真正想同我们说的是他依然在创作。对木心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这样告诉我们，是对得起少年时他对艺术所做的承诺。在历经了六七十年代的牢狱和之后远走美国初期的拮据，他千万里回到中国，依然怀着热情继续写、继续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他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在阴影和逆境中对待生活，他向我们展示了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么比空谈更重要。”同样是西方人，在这两位曾经与木心朝夕相处十多天的导演看来，无论其人、其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无论过去、现在，都在继续写、继续画，所以方才成就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

诚如一千个读者眼里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看木心，都会有不同的认识。此处且摘录几则木心故乡人的记述。孔明珠《去乌镇见木心先

生》：“木心先生美丽阴柔，像一个老派的大家闺秀——不是老克勒，是大家闺秀，我等的祖母一类。看到这样的人，再想到其作品中对美近乎病态的热爱，想到的比喻是王尔德。这些是人间美的化身，美的儿子，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本身就是目的，相比之下，那些作品有也好，没有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都不重要。”戴卫中《“欢迎你再来！”》：“他穿着很普通的灰黑的衣服，但很整洁，初看如常见的在家老人一样，但他坐下时和坐下后架势显示了他的儒雅风范。”徐树民《我第一次见木心先生》：“他面容清癯，但精神很好，这时我脑际不觉浮现出王世贞形容李时珍的那几句话：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后来徐树民先生还说，从内在来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些回忆，也许都是管窥锥指，各有一得，然而他们最为关切的不是木心其文其画，而是其人，有时候甚至认为只要有其人的存在，就是好了；至于其文其画，有或没有，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其人其画就是因为其人的存在，而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术家需要适度的隐藏，从而呈现其艺术。然后真正要去懂得其艺术，还是要去懂得艺术家其人本身。在木心生前，就有木心的朋友介绍其人，如陈英德《也是画家木心》、巫鸿《读木心：一个没有乡愿的流亡者》；还有媒体人的访谈，如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曾进《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在木心去世后，回忆木心

的文字也就更多的了，如王伟《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与《在天国再相聚言欢：追忆舅舅木心与姐夫郑儒铎的交往》、曹立伟《木心片断追记》与《回忆木心》，以及沈罗凡《怀念孙牧心》、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秦维宪《木心的人生境界》，等等。木心曾与台湾的读者林慧宜通信说：“二十年后，你写《木心评传》。”可见，木心还是希望他的读者、观众，能够知晓其人，懂得其人的。

或许曾经有过想为木心写上一部传记的木心的读者、观众也是极多，只是光有一份冲动，还是不够的。以文字符号拼出那个远去的故人，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呢。然而还是会有人，一直在坚持。比如这部《木心先生编年事辑》的编撰者夏春锦兄，他曾经说：“随着读者对木心作品逐渐深入的探究，对其传奇的一生自然也会产生深度了解的欲望。这既是出于同情心与好奇心，也是理所固然，因为，理解的深度与广度，离不开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准确翔实的资料，于是成为首要的条件。事实上，木心一生际遇与他的作品，尤其是与他内心历程的关系，比一般文学家来得更其紧密、幽邃、深沉。”是的，探寻木心传奇的一生，不只是因为好奇，更是因为同情。同情之了解，正带着温情与敬意。

春锦兄追寻那个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读木心、写木心，都是在木心去世以后，而编撰这部书，也是近几年里的坚持。我佩服春锦兄的坚持，知晓这部看似举重若轻的小书背后的艰辛，每一片文字符号的得

来都不容易，至于考证其中的虚实则更不容易，焊接得恰到好处，“那焊疤尤美”则更是难上加难。作为这部书的最早读者，我看着他从几千字到几万字，再到十几万字，由衷地感到高兴。高兴的是，一册在手，或可弥补作为木心的老乡，却不能与之成为忘年交的遗憾，透过纷飞如雪的文字符号，亦可与这位可亲可敬的故乡老人，一见如故了。

张天杰

自跋

—

在介绍《木心先生编年事辑》的编撰之前，我得先说说我是怎么一步步走近木心的。这就得从头说起。

其实，起初的时候，我对木心并无甚感觉，曾多次在书店里，拿起他的书翻过几页后又放下了。一方面固然能感觉到他文风的与众不同，但其现代主义倾向的表达，令我读起来颇感吃力；另一方面，当时的媒体对木心颇有些吹捧，我向来冥顽不灵，对被热捧的人和书内心总不免有些抗拒，要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致当他在世时，我没有想过要去见他一面；当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时，我亦麻木地没有去送他一程。这就是我对木心最初的态度。

之所以会多次拿起他的书，无非因为他是桐乡籍的前辈作家，而且那时就生活在离市区不远的乌镇。

到桐乡后的很长一段时日，我的阅读视野就局限于地方，凡是与此有关的书人与书事，我都有进一步了解的欲望，其中自然就包括颇为耀眼的木心。这可能是与我的初来乍到有关，独在异乡为异客，不免会自觉地寻求一种认同感，想要在内心建构起一个文化的故乡。

也正因此，当我参与创办的读书民刊《梧桐影》编至第五期时，与其他几位编委一合计，决定要为已经去世两周年的乡先贤木心做一期纪念专辑。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专辑，当时的定位是旨在推介木心，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木心。既然如此，那就有必要在专辑中呈现一下木心的生平履历，对作家的身世如果一无所知，就作品谈作品我认为是肤浅的。

也许凡事皆有定数。起初我是请另一位编委来做这件事的，但由于他当时工作颇忙，在专辑临近截稿之际犹迟迟未能动手，无奈之下我只得临时替补，自己来完成。这首先给了我一次在短时间内硬着头皮翻阅（不是通读）一遍木心已出大陆版作品集的机会，既是带着目的的阅读，就难免有需要细读之处，也就不时会有会心处。而最先令我感怀的则是那些相对写实的篇章。

赶在杂志排版之前，我整理出了万余字的编年资料，为节省版面，删来减去，最后登出的就是那篇八千字的《木心编年纪要（初稿）》。这个纪要如今看来，尽管错漏不堪，却引发了我对木心本人的兴趣。

待杂志顺利出刊后，我又对“纪要”进行了增补，至今已持续四年多的时间，这才有了今日的模样。

二

木心素来推崇福楼拜的“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之论，但笔者认为“知人论世”古有定论，基于深化研究的必要，整理其生平行迹应是题中之义。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木心的一份“自制年表”》一文中做过简要的论述，因当时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现转录如下：

木心出国前的人生经历，读者、论者，至今所知甚少，已知的零星故事，或者不确实，或者不确定。随着读者对木心作品逐渐深入的探究，对其传奇的一生自然也会发生深度了解的欲望。这既是出于同情心与好奇心，也是理所固然，因为，理解的深度与广度，离不开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准确翔实的资料，于是成为首要的条件。事实上，木心一生际遇与他的作品、尤其是与他内心历程的关系，比一般文学家来得更其紧密、幽邃、深沉。

这一认识，随着我对木心作品的深入阅读，变得愈加坚定起来。后来我才得知，最早发现木心这一秘密的是台湾学者郑明嫄。她说在木心的散文中，“总是流露出极度的个人色彩，强烈而鲜明的‘我’随处可见”，但他又“建筑了一些堡垒，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潜藏进去”^[1]。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有意的“潜藏”，了解木心的生平际遇及其当时的思想状况，就变得尤其重要。

其实这个问题在木心的其他文体中也普遍存在。比如我们在解读他那些带有鲜明自传性质的小说时，如何区分虚构与非虚构，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可从木心自己的表述中看得出来：

我觉得人只有一生是很寒伧的，如果能二生三生同时进行那该多好，于是兴起“分身”“化身”的欲望，便以写小说来满足这种欲望。我偏好以“第一人称”经营小说，就在于那些“我”可由我仲裁、做主，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某些读者和编辑以为小说中的“我”便是作者本人，那就相信袋子是真的，当袋子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了。[\[2\]](#)

当我们在理解木心的有些诗作时，也无法绕开对创作背景的了解。比如他那首《小镇上的艺术家》，如果没有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木心彼时的人生处境，就很难深入理解其文字背后隐藏的深意。

笔者坦言，木心的不少著作至今无法读懂，但因为整理其生平履历，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走近木心的切入口。

三

可以说，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四年多来，笔者孜孜以求，每次遇见新出现的史料，总是不厌其烦地在第一时间补入。而这往往又是一个需要耐得住性子的考辨过程，只有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才有可能接近事实。

在编撰过程中有幸得到众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陈丹青、陈子善、王奕、王伟、张天杰、曹立伟、邓天中、叶瑜荪、韦泱、周立民、尹大为、高玉林、周乾康、徐自豪等先生，或提供线索和资料，或指点行文和体例，多有受益，在此一并致谢。其中又要特别感谢陈丹青先生和谢泳先生百忙之中为这本小书作序。其实，我现在所做的只是在个人从事木心生平研究漫漫长途迈出的一小步，如要做成年谱，将有更长的路要走。

笔者清醒地看到，目前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实在只是冰山之一角。一方面，木心美术馆中还有大量的木心手稿有待整理面世；另一方面，相关知情人尚抱着一种或维护或观望的缄默态度。个人以为这些都不利于木心研究的推进。

本书乃业余之作，因条件有限，加之才疏学浅，取舍之间定多疏谬，故以“事辑”名义先行面世，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期待方家及相关知情人士能够站出来不吝指正，以便今后能持续完善。

二〇一七年六月初稿

二〇二一年二月春节定稿

【注释】

[1] 郑明娸：《木心论》，《现代散文纵横论》，郑明娸著，台北：长安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8年再版，81页。

[2] 童明、木心：《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1页。

1949-1992

王刚
——
著



路遥 年谱

我渴望投入沉重

王安忆 × 梁鸿 × 厚夫 × 冯仑 诚挚推荐

中国文学版图上一个孤独的身影记录

他用文字令我们相信：人生可以平凡，但不会平庸
阅读路遥，就是阅读自己；路遥已远，路遥仍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

作者：王刚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2-01

ISBN：97872011662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路遥和他的文学时代](#)

[凡 例](#)

[| | 1949年（己丑） 出生](#)

[| | 1950年（丙寅） 1岁](#)

[| | 1951年（辛卯） 2岁](#)

[| | 1952年（壬辰） 3岁](#)

[| | 1953年（癸巳） 4岁](#)

[| | 1954年（甲午） 5岁](#)

[| | 1955年（乙未） 6岁](#)

[| | 1956年（丙申） 7岁](#)

[| | 1957年（丁酉） 8岁](#)

[| | 1958年（戊戌） 9岁](#)

[| | 1959年（己亥） 10岁](#)

[| | 1960年（庚子） 11岁](#)

[| | 1961年（辛丑） 12岁](#)

[| | 1962年（壬寅） 13岁](#)

[| | 1963年（癸卯） 14岁](#)

[| | 1964年（甲辰） 15岁](#)

[| | 1965年（乙巳） 16岁](#)

[| | 1966年（丙午） 17岁](#)

[| | 1967年（丁未） 18岁](#)

[| | 1968年（戊申） 19岁](#)

[| | 1969年（己酉） 20岁](#)

[| | 1970年（庚戌） 21岁](#)

	1971年 (辛亥)	22岁
	1972年 (壬子)	23岁
	1973年 (癸丑)	24岁
	1974年 (甲寅)	25岁
	1975年 (乙卯)	26岁
	1976年 (丙辰)	27岁
	1977年 (丁巳)	28岁
	1978年 (戊午)	29岁
	1979年 (己未)	30岁
	1980年 (庚申)	31岁
	1981年 (辛酉)	32岁
	1982年 (壬戌)	33岁
	1983年 (癸亥)	34岁
	1984年 (甲子)	35岁
	1985年 (乙丑)	36岁
	1986年 (丙寅)	37岁
	1987年 (丁卯)	38岁
	1988年 (戊辰)	39岁
	1989年 (己巳)	40岁
	1990年 (庚午)	41岁
	1991年 (辛未)	42岁
	1992年 (壬申)	逝世

附录1: 1993—2019年 逝后

附录2: 路遥自传

参考文献

后记

谨以此书献给路遥先生及他生活过的黄土地

序言 路遥和他的文学时代

1992年11月17日，敏感、自卑、贫病缠身的路遥病逝了。

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是那个时代文坛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的作品被广泛传阅、研究至今，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文坛重镇——陕西文学的标签之一。他短暂的一生硕果累累，但其生前却几乎遭遇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幸：苦难的童年、饥饿的青少年、不顺利的学业、不顺心的生活、贫病交加……加之个人的英年早逝以及未上山的父母、未成年的女儿……他的一生，比他的作品更加传奇。

当然，一位作家的日常生活不能简单地与其文学活动相关联，但是像路遥这样一生中充满断层、传奇、争议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必然与日常生活状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为路遥的清涧老乡，我与路遥之间也曾有过一段特别的缘分。2007年，我在榆林市文联《陕北》杂志编辑部获得了一份“编辑”的差事，单位安排我暂住市文联二楼办公室十一号，一住就是三年。三年中，

路遥常常被人谈起。其中当然有特别的缘由。1983年夏秋之际，路遥带着电影《人生》的剧组在榆林选景，选完景后，路遥在榆林小住过一段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当时，路遥就住在市文联二楼十一号。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也留下了一系列颇具榆林地方特色的词汇，“毛乌素大沙漠”“古长城”“防护林”“治沙”“文化馆”……据路遥生前好友、榆林市群艺馆的朱合作回忆，路遥打鼾的声音特别大，从市文联大门一进来就能听见路遥的呼噜声。他每天早上九点多起床，十一二点吃饭，然后开始创作，一写就是一整天。《你怎么也想不到》完稿后，路遥便离开了榆林，也离开了他夜以继日工作过的市文联二楼办公室十一号。

我自小就对路遥充满敬意，加之特别的缘分，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向这位同乡前辈致敬，就成为我的一个夙愿。2011年春节后，我初步确定了本书的写作构想，开始收集整理与路遥相关的公开与非公开的资料与档案，同时翻阅了大量年谱与传记类书籍，希望以此完成自我训练，为写作《路遥年谱》积蓄力量。

在写作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下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以编著其生平事迹的方式，尝试理解那个文学语境中的路遥、陕北文化中的路遥，以及人世间最平凡的路遥……我期待《路遥年谱》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加丰满、真实、多层面、全角度的路遥。可以说，这是我写作《路遥年谱》的初衷。今天，《路遥年谱》即将付梓，我期待这本拙著能为读者了解这位陕北“大

百科全书式”作家提供更多、更新的角度，甚至可以为路遥研究者理解路遥的文学资源、创作态度和文学观念提供更丰富的参照。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了社会主义形态下文艺由“一体化”格局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但或许是由于该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并未对路遥的两部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展开论述，而只在书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列出了作品的发表年代与出处。而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大研究成果之一，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第13章第4节专门讨论了路遥的《人生》，而对《平凡的世界》的论述却只有寥寥数言。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可谓经典，但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论述却都不约而同着墨甚少。

进入新世纪，一些研究者隐约感觉到，“对路遥的研究可能会重新激活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些路径”（杨庆祥语），基于这一点，从2007年开始，路遥进入了程光炜教授主持的“重返80年代”，时至今日，程光炜、赵学勇、梁向阳、杨晓帆等人的阶段性成果足以说明，“路遥研究”确实是一个鲜活的、丰富的、广阔的文学世界与历史世界，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研究价值与意义。

今天，我们回望路遥，便会发现现实主义没有过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永远不会过时，甚至，正如路遥曾经所言，“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路遥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一个

独立的、科学的、超前的文学形式，甚至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难、自强不息，这是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路遥的人格魅力与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给予所有卑微人物以勇气和光亮，并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路遥的一生为我们所展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路遥逝世多年之后，其作品愈发为无数读者所欢迎的原因之一。

路遥曾在给蔡葵的一封信中谈道：“对作家来说，所谓现实，同时也就是未来，也就是历史，因此必须有更具深度的思考，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有价值的劳动。”阅读路遥，要在大时代中发现他细微的生活。只有发现这些现实的“日常”，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作家本身，理解在时代的留白处那个更广阔的“路遥”空间，更加直观地发现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

写作本书的时候，笔者常常惊叹于路遥对这个世界“初恋般的热情”和他那“宗教般的意志”，他如此热爱着这个世界，爱着他爱的人，却又无力对抗这个世界。他是文坛上真正的苦行僧。无数次阅读路遥，沿着路遥曾经踏过的足迹前行，让我有了一次次与路遥跨越时空的交流，这无疑成为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学习、自我审视的过程。

感谢路遥的同学、同事、朋友，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如果没有他们的帮

助，很可能就失去了这些重要文献。感谢那些热爱路遥的读者和研究路遥的学者们，正是他们使得这本小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为这个“平凡的世界”创下不凡文学成就的路遥。如今，审视路遥留下的这份遗产，我们不难发现，路遥坚守着的现实主义阵地——正是我们民族精神家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路遥用生命恪守的这块精神阵地，使与他所属的时代保持了一种紧张而良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今天，乃至未来都意义重大。

本书难免存在错误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批评。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于刚' (Yu Ga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于西安

凡 例

一、本年谱记事所用年月，按公历纪年，其他纪年辅之。事迹系日确切的，置于日下；仅知某月某旬，置于某月某旬下；仅知季节或年份的，置于季下或本年内；至于“初春”“夏”等节令时间，按事迹前后结合当年时历归入相应的时间位。

二、谱主创作与著述均按写作时间为序，写作时间不详者，按照发表时间为序；一些作品只有年份，无月、日者，均记于本年内；一些没有正式发表或面世的作品（歌剧、诗歌、演讲、书信等），经考证，按照时间顺序均在书中一一说明。

三、本年谱引用谱主及他人的作品、书信以及相关资料，用（）随文注出作者与篇名；其他材料说明，以脚注形式交代；重要交游人物，以脚注形式加以介绍，一般交游人物，随文列出其身份、与谱主的关系等信息。

四、本年谱全面、简明地记载了谱主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展现了他及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状况。力求系统、真实、客观、准确、公正地反映出谱主一生的主

要生活事件、行径轨迹、文学创作、事业以及他不平凡的心路历程。从他逝世至2019年期间，有关谱主著作版本及与他相关的研究文论大量出版、发表，这是他“人生”的延续，也是社会对他的认可与怀想。这些也被记录到谱主的“人生”轨迹里。因此，本书在年谱后面，加入了“逝后（1993—2019）”部分。

五、为了给读者、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本年谱将谱主著作中的相关作品与研究、追忆谱主的主要作品也做了交代，部分附有内容提要 and 必要的写作背景说明，理论则摘录原文的主要论点，以便了解。与谱主有关书信内容与时间也做了简单交代与摘录，以供参考。编纂过程中引用书刊（报）资料较多，未能一一列出，谨向师友、同仁致谢。

六、本年谱对谱主的作品中个别文字，不规范者，在注释中仍保持原貌，以示尊重；由于新资料的发现，本年谱对之前《年谱》及《纪事》有误之处做了订正。

|| 1949年（己丑） 出生

7月2至19日 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做主题发言。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及其所属协会。郭沫若任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

7月23日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会后，柳青到秦皇岛创作长篇小说《铜墙铁壁》。

9月25日 《文艺报》创刊。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2月 柳青完成《铜墙铁壁》初稿。

本年 柳青^[1]、杜鹏程^[2]、王汶石^[3]、李若冰^[4]、胡采^[5]、魏钢焰^[6]等一批来自延安的作家到达西安。他们的创作既在精神上具有相似的品质^[7]，又在创作上各具特色，可谓“百花齐放”。本年 柳青33岁，杜鹏程29岁，王汶石28岁，李若冰13岁，贺抒玉^[8]11岁，闻频^[9]1岁，曹谷溪^[10]、李天芳^[11]8岁，陈忠实7岁，邹志安^[12]2岁，郑文华^[13]生。

12月2日（农历己丑年十月十三日）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乳

名卫儿，后依乳名起名王卫国，路遥是他的笔名。

祖父王再朝，育有三子，老大王玉德，老二王玉宽，老三王玉成，均为农民。1940年，王再朝积极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14]，举家“南迁”^[15]至邻县延川境内距离县城七点五公里的郭家沟。

生父王玉宽，一生勤俭，为人厚道，曾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生产队长）。1947年，王玉宽从延川县返回清涧县老家成亲。生母马芝兰，绥德县田庄乡麻地沟村人，距王家堡约二十五公里。马氏身材高大，从小爱唱民歌小曲，15岁嫁给王玉宽，18岁生路遥，一生勤俭持家，为人善良温和。她先后生育九个孩子，活了五男三女，路遥系长子。分别是：大妹王荷（小名“荷”，1951年生，二十多岁的时候因摔伤于1975年病故）；大弟王卫军（小名叫“刘”，1953年生，1970年参军，1974年转业后分配至陕西省结核病医院，1985年调动至延安地区工商局，1997年病故）；二弟王天云（小名“四锤”，1956年生，1972年到延川大伯家，现生活在延川县）；三弟王天乐（小名“猴蛮”，1959年生，生前为《陕西日报》记者，2007年病故）；二妹王萍（小名“新芳”，1962年生，在世）；三妹王英（小名“新利”，1966年生，在世），四弟王天笑（小名“九娃”，1968年生，2016年病故）。另，据路遥二弟王天云讲，他母亲在1952年曾生养过一个男孩，大约在他三岁的时候夭折了。

路遥在王家堡村生活到8岁，于1957年初冬，被生父过继给在延川县生活的大伯王玉德为子。

路遥的养父王玉德，农民，一生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协助父亲主持家道，“南迁”后一直留守在延川；养母李桂英，清涧县赵家沟村人，是一位勤劳、善良、慈祥的农家妇女。

【注释】

[1]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著有《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

[2] 杜鹏程（1929—1991），陕西韩城人，当代作家。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延安抗大、鲁迅师范学校学员。曾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代表作有《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等。

[3] 王汶石（1921—1999），山西荣河（今万荣）人，当代作家。1949年后历任《群众文艺》《西北文艺》副主编，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秘书长、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著有中篇小说《黑凤》、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歌剧《战友》、评论集《亦云集》。

[4] 李若冰（1926—2005），笔名沙驼铃，陕西泾阳人，当代作家、“石油文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旅途集》等散文集。

[5] 胡采（1913—2003），原名沈承立，河北蠡县人，当代文学评论家。1938年后历任山西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西线》《西线文艺》主编，延安《大众习作》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组组长，《群众文艺》主编，西北文联副秘书长，《西北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专职副主席兼《延河》《小说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等。

[6] 魏钢焰（1922—1995）曾用名魏开城，祖籍山西繁峙，生于太原。当代诗人、散文家。曾任《延河》副主编。

[7] 李继凯在《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导言》中曾以“白杨树派”作家方阵，描述这一作家群体，认为他们以“白杨树”精神作为终身的追求目标。“白杨树派”作家阵容的形成，有力促进了陕西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蓬勃发展，为陕西文学重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李天芳、程海等为代表的陕西第二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使陕西文学第一代作家与第二代有了真正的“代际传承”的关系。

[8] 贺抒玉（1928—2019），原名贺鸿钧，女，陕西米脂人。参加筹备创办《延河》，始任小说组组长。著有延安文艺回忆录《青春 footprint》、短篇小说《女友》《琴姐》，散文集《女友集》《琴姐集》《命运变奏曲》等。

[9] 闻频（1940—），河南扶沟人，曾任《延河》月刊诗歌编辑，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诗集《秋风的歌》《红罌粟》《闻频抒情诗选》。

[10] 曹谷溪（1941—），陕西清涧人，诗人。历任《山花》文艺报主编，延安地区文艺创研室副主任，《延安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延安文学》主编、编审。与路遥交往甚密。

[11] 李天芳（1941—），女，陕西西安人。与晓雷合著有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

[12] 邹志安（1946—1993），陕西礼泉人，其作品《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分获第7、8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3] 郑文华（1949—），笔名方星，任《延河》杂志社编辑、编审，著有散文、摄影集《作家路遥》《作家陈忠实》，作品《路遥

的生与死》获陕西报刊优秀作品奖。

[1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困难局面，从1938年，特别是1941年开始，发起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并实行了移民计划，鼓励人多地少的农民去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垦荒地，以应对边区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短缺的窘境。为了做好移民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别于1940年3月、1941年4月、1942年2月、1942年12月、1943年3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优待难民办法》《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安置难民的通令》和《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等多部政策性法规，制定了富有针对性的移民政策（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15] “南迁”，陕北人俗称“滚南老山”，就是向榆林南边的延安地区迁移，寻找土地肥沃的村庄安家落户。境内移民是陕甘宁边区移民的三大来源之一，如从地少人多的绥德分区迁入地多人少的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的移民，1942年约为1483人，1943年约为4961人。从县域看，移民规模最大的当属延安县。如1937年，延安的人口为7703户，33705人，1942年增加到16446户，64292人。全县5年新增8473户，其中8009户是移民，占新增户的91.6%；新增人口31587人，其中29704人是移民，占新增人口的94.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所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

|| 1950年（丙寅） 1岁

1月 柳青去共青团中央，写《铜墙铁壁》的第二稿和第三稿，至1951年3月脱稿。

4月10日 延安《群众报》创刊；7月1日改称为《延安报》。

5月10日 陕甘宁边区文协召开创作座谈会。

8月20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成分。

9月20日 陕西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

9月21日 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柯仲平任主席。

10月5日 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西北文艺》创刊号出版，成为西北地区文学艺术运动的指导性刊物。该刊出刊28期，于1953年2月停刊。

11月 李若冰由西北文联至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

冬 全国各新解放区开始陆续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1月2日（农历己丑年十一月十三） 满月。

11月22日（农历庚寅年十月十三） 头昏。[\[1\]](#)

本年居清涧县王家堡村。清涧县位于榆林市最南端，无定河下游，东濒黄河，西、南两面与延安市子长、延川接壤，北面与绥德、子洲为邻。清涧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旧时有“全秦要户”之称。

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民族交往频繁，战乱频仍，长期处于边关战事拉锯之地。陕西学者肖云儒在《路遥的意识世界》中认为，陕北地区是“以原生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游牧文化驳杂多样性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战争的破坏，交通的不便，使陕北逐渐成为封闭和落后的地区，“不发达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造就了文化的朴素性和保守性”，除个别人口集中的城镇外，其他区域“基本属于大众化、贫民化文化类型，且其传承性大于变异性，自守性大于开放性，保守性大于创新性”。^[2]从生理遗传基因来看，路遥的身体里可能奔淌着北方少数民族祖先的血液。路遥那黑色发亮的肌肤，匈奴式的圆脸与络腮胡须，似乎是延续北方少数民族血脉的标志与特征。

《魂断人生——路遥论》的作者宗元在其著作中说：“路遥面孔黝黑，一脸络腮大胡，两耳内各有一缕长毛逸出……路遥自称‘北狄后人’，长相颇有匈奴遗风。他饭食简单，厌恶鱼肉……不爱逛名山大川，常去沙漠荒原。”^[3]

路遥生前曾经委托陕北同乡冯东旭为他刻治两枚闲章，其中一枚闲章的内容是“北狄后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路遥对北方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情感认同。

【注释】

[1] 从出生开始，直到12岁生日都叫过晬，13岁开始，叫过生日。满一周岁时，过的第一个生日叫头晬。头晬和满月形式基本一样，若第一个晬吃油糕，则直到12虚岁过晬时年年要吃糕，寓意“年年高”。12虚岁时称完晬儿（亦称圆晬儿），民间讲究小孩魂全了，可以安然无恙地生长，因此要解锁，仪式颇为隆重。从13岁开始，也就不太讲究，只是生日时忌食剩饭，家里也不来客人，只有家里人自己吃长饴饽（寓意长命），条件好的家庭还要吃炸油糕。

[2] 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第73页。

[3] 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 1951年（辛卯） 2岁

1月4日 史铁生^[1]出生。

3月3日 柳青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

3月26日 林达出生。

4月 柳青应冯文彬、蒋南翔邀请，参加《中国青年报》的创刊工作。后在《中国青年报》任编委和文艺副刊主编。期间，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

春 王汶石作为西北文学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鲜慰问团，回国后，创作了四幕歌剧《战友》，深得好评。该剧由《剧本》月刊发表，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6至8月 文艺界展开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的批评。柳青参加批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与会者还有严文井、黄钢、瞿白音、韦君宜、吴祖光等。

9月底 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10至12月 柳青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

本年 居清涧县王家堡村。

王家堡村地处清涧县北端，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建村，其时居住王姓，故得名，沿用至今。

这是一块气候干燥、荒寒且贫瘠的土地。文学评论家赵学勇说：“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看，陕北高原背依甘宁蒙古沙漠，高耸的秦岭与浊浪滔天的黄河、渭河，阻挡了中原文化向这里的进一步延伸。”^[2]历史上这里受儒家思想影响甚微，是所谓“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空白之地。在这里，历史主义的史诗意识，道德主义的生活追求和神秘主义的文化倾向普遍存在。“陕北这块土地上，中华民族的主题文化和次生文化、异质文化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混交林带，构成了一种全息性与流失性相结合的特异色彩。”^[3]陕北的本源文化里既有农耕文化，又有草原的游牧文化，经过发展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文学评论家李继凯说：“陕北高原属草原文化过渡地带，人种与文化均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民勤稼穡，俗尚鬼神，民性粗豪，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娱神娱己的秧歌等等，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其内涵的生命文化精神对陕北作家很有影响。”^[4]

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有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这块革命的圣地，黄土文化又一次受到外来影响，形成以黄土文化为根基而又区别于它的“延安文化”。黄土文化在这里是一种兼有农耕文化与牧猎文化的综合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对立性的特点，有着“开放与守旧、怯懦与勇敢、畏缩与进取”等对立而统一的文化模式。因而，陕北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童年期的尚古印迹。由于屡受外

来文化的影响，陕北文化又呈现出驳杂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1927年10月，清涧起义爆发，这是西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清涧，在高杰村镇袁家沟村生活、战斗了十九个昼夜，并在此发表了著名的《东征宣言》，写下了著名的辞章——《沁园春·雪》。

面对苍茫壮阔的陕北，作家陈忠实曾写下这样的话：“陕北自古就是一块古老神奇的地方，每座山、每道沟、每个村庄，每走一步都有如诗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挖掘这些深层次的艺术宝藏，无疑是对这块土地最好的回报。”^[5]特定的人文地理条件产生特定的文化果实。

路遥的母亲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会唱秧歌、道情，是王家堡村里有名的民间歌手。本家“五叔”性格开朗、喜欢说“古朝”，路遥童年深受这种原生态音乐和民间文化熏陶，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扮演了路遥最早的“艺术老师”。陕北文化就给予了路遥最初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生活与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年内大妹王荷出生。因为王荷的出生，路遥被奶奶接去抚育。

【注释】

[1] 史铁生（1951—2010），北京人，文学家。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病情转为尿毒症，终至透析。

[2] 赵学勇：《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3] 吕静：《陕北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3页。

[4]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导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5] 王世雄、王存峰主编：《题词》，《陕北地名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952年（壬辰） 3岁

3月15日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月刊《陕西文艺》在西安创刊。

3月16日 贾平凹出生。

3月19日 全国文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并组织有关创作。

3月 西安市文联主办的《工人文艺》更名为《长安》。该刊1960年9月停刊，1980年1月复刊。1985年1月易名为《文学时代》。1986年1月恢复为《长安》，1989年停刊。

5月23日 全国文联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文艺座谈会。

9月1日 柳青在长安县挂职，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

11月 《人民文学》11月号刊发了李若冰的《陕西札记》。

12月底 柳青在长安县王曲区皇甫乡认识《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二人从此成了朋友。

本年 海波^[1]

生于延川县。

本年 居清涧县王家堡村。

路遥从小与苦难相伴。20世纪50年代的陕北，战争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战争带来的创伤一时不能消尽，加上自然环境险恶，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乐观，贫困和饥饿的问题普遍存在。路遥曾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说：“……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路遥扎根在这片贫瘠、苍凉、浑厚的黄土地上，他一生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围绕着这片土地，陕北期间的生活经验，决定了他日后创作与生活的方向。

路遥在成长时期严重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资，与其说苦难伴随着他一生，不如说对苦难的感受与体验形成了路遥式特有的性格。在路遥身上，除了有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更多是一种对贫困生活的认识、体验，再认识、再体验，一步步形成了路遥式的性格与他的文学创作。单从某一方面论述路遥式性格的形成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少年时的经历或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这种伤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一种创作的源泉与驱动力。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借孙少平说出了对苦难的理解：“人活着，就得随时苦难。……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对有着强大智慧的生命来说，一切苦难都是可以战胜的，也是可以转化和超越的。苦难是人重要的财富。李星、李国平等人在《路

遥评传》中曾说，路遥早期的苦难大多是环境给予的，后来的苦难是主动向生活索取的。

年内 母亲生了一男孩，大约在三岁时夭折。

【注释】

[1] 海波（1952—），生于延川县马家河乡李家河村。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曾任延川县剧团编剧、青海省文学期刊《现代人》编辑、西安电影制片厂宣传处干事、短片部总编辑等。著有长篇小说《高原落日》等4部、长篇纪实文学《我所认识的路遥》，曾获“庄重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系路遥延川的同乡、同学。

|| 1953年（癸巳） 4岁

1月11日 《人民日报》转载周扬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3月6日 柳青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开始定居皇甫，住在常宁宫，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

夏 杜鹏程九易其稿，完成了《保卫延安》的创作。作品被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 李若冰前往西北石油管理局酒泉大队，任副大队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作家。

9月23日至10月6日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计581人。“文联”定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会议的西北地区代表有柯仲平等50余人。

秋 王汶石深入渭南、咸阳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很多语言朴素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短篇小说，受到广泛好评。

本年 居清涧县王家堡村。

年内 路遥发高烧四十度，第一次体验死亡。路遥回忆：“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

度。我年轻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里去死——我肯定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较量，路遥奇迹般地活了，“巫婆”更加“著名”了，成了路遥的“保锁”^[1]人——类似西方的教母。“巫婆”肯定没有想到，她“保锁”的这个小男孩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追忆过这些特殊的经历与体验。路遥成长时期的首要要求并不是要多么“优越”的生活，而是简单地“活着”。必须先“活着”，“活着”就意味着要开始劳动，要创造财富。只有“活着”才能“像土地一样奉献”，才能“像牛一样耕耘”。

年内 爷爷王再朝病逝，胞弟“刘”（王卫军）出生。之后，奶奶在王家堡村独居，因弟妹的相继出生，路遥被奶奶抚育的时日较多。

【注释】

[1] “保锁”是陕北的一种乡俗。过去小孩难存活，请巫神、阴阳先生或多子女者，给未满十二周岁的孩子过百岁时穿衣一件，每逢生日时颈项戴“锁儿”（多以红线充代），意可保其长大成人佩戴锁线，称为保锁。路遥出生的年代，陕北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幼儿得病无

法医治，夭折的很多，由此民间有保锁的风俗，属于“俗尚鬼神，而信祈祷”。巫婆、神汉自称能下阴间查夜招魂，梦中追捉病者的失魂。若巧遇病好了，就认为其为“灵神神”，主家大加酬谢；若病危或死亡，则认为此人“阳寿尽了”。路遥三四岁时，民间仍保留着“请神医”的习惯。保锁时，要举行仪式，拿出栓缰绳栓在炕头狮或灯柱上，再在灶君前放一碗米，供起神灵的排位，点香焚裱，口里念“众家神灵一声请，家宅六神紧侍应，早受香火晚收灯……”然后念一篇祝文，言明保锁孩子的姓名、保锁原因等。等过了12岁晬（俗称圆晬或完晬），这一天又要举行仪式，和保锁时形式相似。路遥从小就是在这样民风浓郁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 1954年（甲午） 5岁

春 柳青开始了《创业史》的写作；最初的设想是写三部。

3月30日 陕西省文教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出通知，改组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

6月 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月 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撤销。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原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负责联系原大区各省市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北作家协会筹委会召开扩大会，研究成立分会事宜。

11月8日 在西安市东木头市公字2号原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院的大会议室，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宣告成立，马健翎任分会主席；柳青、郑伯奇、胡采任副主席；秘书长由王汶石、戈壁舟、李古北、余念、杜鹏程五位驻会作家轮流担任，任期一年，首任是王汶石。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标志着陕西省文学队伍的大集结。

冬 柳青完成《创业史》第一部初稿。

本年 居清涧县王家堡村。

路遥出生后的几年，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出生，生活更加窘迫。路遥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童年。

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 1955年（乙未） 6岁

9月 柳青开始大规模修改《创业史》第一部，着手写第二稿。

11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作家、艺术家们，到农村中去》，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

本年 居清涧县王家堡村。

年内 奶奶搬至延川县大伯王玉德处居住。路遥自小跟着奶奶长大，对“奶奶”有着很深的情感基础，为他后来去延川生活埋下了“伏笔”。

路遥后来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平一家三代同堂时瘫在炕头上“老奶奶”形象的刻画，可以感受到家庭温暖的情感力量。《路遥传》作者厚夫说：“这种温暖的情感最初是来自于奶奶那里。”

|| 1956年（丙申） 7岁

1月26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创作委员会，柳青、郑伯奇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

2月18日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组织、辅导和指导陕西省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培训农村、厂矿业余文艺骨干，帮助群众加工提高文艺作品质量，从事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2月27日至3月6日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通过《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工作纲要》的决议。柳青出席会议，并当选主席团成员。

3月15至30日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月，王汶石短篇小说《风雪之夜》发表在《文学月刊》，后被《人民文学》转载。

4月10日 文学月刊《延河》创刊。发表有王汶石的《少年突击手》、柳青的《王家父子》等。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5月13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集专业作家制定1956—1962年创作规划。

5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文学界、科学界人士，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6月8日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柯仲平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马健翎任副主席。

6月30日 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经验，指出合作化运动应向着高级形式发展。

6月 贺敬之的《回延安》刊于《延河》1956年第6期。

8月4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邀请从北京来西北参观的冯至、钟敬文、张恨水、朱光潜等作家、学者与西安文艺界及刊物编辑座谈。

8月 延川中学建立，招收3个初中班，招生180人，因本县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只有115名，于是从绥德考区调拨65名，曹谷溪就是其中的一名。

9月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更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本年 居清涧县王家堡村。

年内 路遥与村上的一群大孩子在山上砍柴，身体失去重心，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落，跌到山脚下深沟里的一个草窝里，两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水窑”。路遥保住了性命，总算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这样回忆第二次死亡体验：“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时，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烧，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

面就是深不可测的山水窖。”这是路遥幼年时第二次体验死亡。路遥母亲马芝兰曾对清涧籍作家朱合作这样说：“我家路遥七八岁上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掣在硷畔上，掣下美美一掣。俊得人贵贱不能烧。”可见，路遥从小就能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年内 胞弟四锤（王天云）出生。

|| 1957年（丁酉） 8岁

1月 《延河》1957年第一期刊发了张贤亮的诗歌《大风歌》。

本月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成立编辑组，编辑出版《群众艺术》。1960年《群众艺术》停刊。

2月14日 元宵节夜，《延河》请有关单位和作者联欢。

2月 《延河》1957年第2期发表了王愚的评论文章《让我们感受时代的精神》。

3月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二稿完成。

4月25日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人文杂志》在西安创刊。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7月24日 《延河》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张贤亮的《大风歌》，柯仲平、郑伯奇、胡采、王汶石等人到会发言。

7月 《收获》杂志在上海创刊。

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28日 西安文学界集会，声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柳青、郑伯奇等人到会发言。

8月 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发表于《延河》8月号。

春 被家人送到王家堡小学上学。

12月 移居至延川县郭家沟村，开始与养父母一起生活。

上学不到一年的路遥，由于家境贫困，学业被迫中断。弟妹们相继出生，家庭维持十分艰难。

大爹（大伯父）王玉德没有儿女，大妈李桂英生下的孩子存不住。任何人在没有自己的孩子时，都可以得到一个法定的继承者。路遥的伯父母也不例外。过继的儿子虽不是亲生的，但也是在相近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出来的，生活方式不致太远。从这方面讲，路遥及大弟“刘”、二弟“四锤”自是最可能担任儿子的人物了。

陕北人有“长子不顶门”的讲究，王玉德本想过继刚出生不久的“四锤”。从领养角度来讲，过继的儿子年龄要小，这样便于养育。路遥父母坚持要把卫儿送去给老大“顶门”，目的是要让路遥在延川上学。

关于路遥过继“顶门”的事，路遥母亲晚年回忆：“我哥（路遥大爹王玉德——引者注）心好，可跟前一直没有个男孩。养是养了三个，月子里就没有了。我家人多，家里又穷。路遥九岁（虚岁）时，我就有了四个娃娃了，一满抚养不了。头几年，路遥的奶奶去了他大伯家。后来，他大伯想要个小子，我们就把路遥给了他。咱农村有个讲究，亲兄弟之间，要顶门一

般都是老大顶哩。把路遥给了人以后，我心里可后悔结实了。我家路遥从小可精哩。”（朱合作《在王家堡路遥家中》）

路遥回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床被子，完全是叫花子状态。我七岁（周岁——引者注）的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七岁步行去延川的路，成为路遥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往事，直至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他仍清晰地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往事：“我小时把罪受尽了。九岁（虚岁——引者注）那年，因我家穷，弟妹又多，父亲便把我领到延川的伯父家。我和我父亲走到清涧城时，正是早晨，那时我早就饿了，父亲使用一毛钱给我买了一碗油茶，我抓住碗头也没抬就喝光了，再抬头看父亲，我父亲还站在我眼前。于是，我就对父亲说：‘爸，你咋不喝？’我父亲说：‘我不想喝。’其实，并不是父亲不想喝。我知道父亲的口袋里再连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唉……”（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到了大爹家，路遥的父亲住了两天后，在一个清晨悄悄地走了。多年以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时，才真实地流露出他当时的真实感受：“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

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七岁，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

过继者有一定的义务，当然也有一定的权利。路遥从清涧到延川大爹家，他的义务是要成为大爹的“儿子”，要为大爹大妈养老送终；他的权利就是要有饭吃，要在延川上学。到延川大爹家后，不但有饭吃，还能上学，对于一个正处于渴望成长阶段的少年路遥来说，这一切他太需要了！

当时，路遥的奶奶也在大爹家生活，路遥能很快适应养父母家的生活，奶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路遥胞弟王天乐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尽管养母非常喜欢这个侄儿，时不时给卫儿用仅有的粮食做点可口的饭菜，但他还是感到有些孤寂，好在奶奶也住在伯父家里，使他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每天晚上，他总是搂着奶奶睡觉。在养母的眼里小路遥又懂事又听话。”

路遥生前好友曹谷溪先生在一篇访谈中谈道：“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

有穿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 1958年（戊戌） 9岁

1月 《延河》重组编委会，由柯仲平、柳青、郑伯奇、杜鹏程、王汶石、戈壁舟、魏钢焰、王丕祥、安旗、贺鸿钧、胡采十一人组成新的编委会。胡采任主编。

3月13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与市文联召集文艺界作家、评论家、编辑和业余作者，召开座谈会，柳青、郑伯奇、杜鹏程等人与会发言。

3月 《延河》1958年第3期发表了茹志鹃的处女作小说《百合花》。

4月 《延河》1958年第4期发表了柳青短篇小说《咬透铁锹》，后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狠透铁》。

5月14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创办歌颂“大跃进”生活的诗歌墙报《街头诗窗》。

7月27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集西安地区作家、文艺理论工作者、青年作家，座谈关于作家与群众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出席会议并讲话。

8月21日 《延河》召开扩大的编委会，明确提出刊物要以面对陕西群众，反映本地区生活斗争为中心，以发表小说、特写为主，作品要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会上，杜鹏程提出二分之一的编辑人员应经常下到生活中去，在深入生活、组织稿件的同

时，兼顾发行工作。此后，这一建议被作为一项工作制度确立下来，《延河》编辑人员每年都有一段时间，需要深入实际生活的工作。

8月 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由东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 新延安大学成立，校址在延安市的杨家岭。

10月1日 中共延安县委机关报《延安县报》创刊。1960年10月停刊。

10月8日 陕西省和西安市文化部门举行支持工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地、田间、兵营，为工农兵服务。同时，在劳动中体验生活，改造自己。

本年 杜鹏程至苏联和东欧等国访问，创作《大跃进的消息在国外——国外旅行散记》《访童布罗夫斯卡》《我看见了列宁》等散文，发表小说《一个平常的女人》《铁路工地的深夜》《夜走灵官峡》《延安人》和《第一天》。

同年 王汶石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同年 根据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延川县中小学教育开始出现偏重政治思想教育，忽视文化课教学的趋势。

同年 延川县开展“教育革命”，学校师生投入“大跃进”运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课堂教学时间受到干扰，对教材采取“砍、补、换、并”。

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定出台，户籍管理制度产生，限制农村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迥然有别，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实现农村“支配结构”的重要环节。这个制度的出台与发展，逐渐产生了一个农村与城

市之间的“交叉地带”，这为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路遥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与现实反思。在当代文学史上，路遥较早意识并提出了“交叉地带”这个词，也是较早地围绕此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路遥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中说：“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丰富多彩，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值得去表现。”

本年 居延川县郭家沟村。

延川历史悠久，有许多先民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足迹，传说黄河乾坤湾曾是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地方，禹村曾是史前治水英雄大禹暂住过的地方。春秋时期，延川是戎狄频繁活动的区域，重耳母又是翟（西戎八国之一，今陕北北部地区）之狐氏女，所以此地也是重耳的母邦之地。重耳早年为躲避仇人追杀，“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重耳从延川一带渡河到子长县重耳川一代避难。

陕北有“文出两川，武看三边”的说法，这“两川”其中的一川就是指的延川。县志记载，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本科状元为延川人李郃。这也是陕北古代唯一的“文状元”。

春 插入郭家沟村大队的马家店四年制小学上一年级。

报名时，大爹^[1]、大妈 找到老师刘正安。刘老师考了路遥几个笔画多的字，会认，也能写对，又出了两道算术题，路遥傻眼了。刘老师解释说，加法就是添上，减法就是去掉，路遥理解了。刘老师破例让路

遥成为插班生，直接上第二学期的课。（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

给路遥注册学籍时，刘老师说“王卫儿”是个小名，得起个官名。于是大爹王玉德便央求刘老师给路遥起了官名：“王卫国”——寓意将来保家卫国。

当时延川县实行的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制。小学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初小开设语文、算术、体育、唱歌、美术、劳动。从1957年开始，延川县农村小学高小增设农业常识课。

8月 升入马家店小学二年级。

【注释】

[1] 陕北清涧一带称伯母为“大妈”，称伯父为“大爹”。

|| 1959年（己亥）10岁

3月2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培养青年作者的问题。

4月 《创业史》第一部以《稻地风波》为题开始在《延河》1959年第4期连载。8月，改题为《创业史》，至11月号，全部连载完。时年，柳青43岁。

5月 《延河》编辑部编的“延河文学丛书”《短篇小说选》由东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杜鹏程的《记一位年青的朋友》、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茹志鹃的《百合花》等收入其中。

5至6月 柳青到陕北躲病。期间对《咬透铁锹》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改。

同月 延川中学始设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有在校学生950名，编16个教学班，其中高中班1个。曹谷溪继续在延川中学完成高中学业，于1962年毕业。

9月 柳青在皇甫村再次修改《咬透铁锹》，扩展到五万多字，更名为《狠透铁》。

10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计长篇小说15种，中篇小说5种，短篇小说集9种，剧本11种，儿童文学5种，诗集13种，散文集5种。其中，柳青的《铜墙铁壁》被列入其中并再版。

11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文化工作会议，柳青、柯仲平、胡采、杜鹏程和王汶石等人赴京参会。

同月 柳青小说集《狼透铁》由陕西东风文艺出版社作为单行本出版。印刷之前，柳青反复叮咛编辑，无论如何不能省略掉《狼透铁》书名下的“一九五七年纪事”这几个字。

同月 《创业史》第一部在《收获》杂志1959年第6期发表。

本年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同年 王丕祥开始担任《延河》主编，贺鸿钧、王绳武任副主编，至1966年停刊。

同年 延川县教改的中心任务是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此，本县中小学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活动增多。

同年 陈忠实初中毕业于西安市第16中学。

同年 杜鹏程创作了大量散文、杂感和短论，如《天安门》《回忆在波兰度过的日子》《略论话剧〈保卫延安〉》《谈〈风雪夜〉——给王汶石同志的一封信》《培养工人中的业余作者》等；发表了短篇小说《严峻而光辉的里程》，调查报告《沙漠中的革命》。庐山会议后，杜开始承受政治压力。

春 在马家店四年制小学上二年级。

8月 升入马家店四年制小学三年级。

“在读小学期间，路遥最怕上美术课，由于没有画画用的纸和水彩笔，束手无策，只能呆呆地坐着，看着同学们画画。有时，也找个借口离开教室。后来，老师给他纸，借同学画笔快速画完。轮到上音乐课，路遥就很高兴。他不仅和同学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

还占优势。他嗓门大，胆子大，学得快，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少年时候的路遥最喜欢信天游，或苍凉、或悲怨、或缠绵、或高亢，这些婉转动听的歌，悄悄地培育着少年路遥心里的文学种子，使之在以后的岁月中，得以健全地发芽、抽枝、开花、结果，升华为路遥作品的诗魂与风骨。”（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

有人把陕北民歌比作一件远古的器物，它带着泥土的痕迹、爱情的痕迹、山和水的痕迹，也带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痕迹。在陕北的陕北人或走出陕北的陕北人，每每唱着陕北民歌就想起到了陕北这块厚土，想起了儿时的一些事情。因此，儿时喜欢唱陕北民歌的路遥，在他后来的主要作品中多处提到或引用了陕北民歌，在表达出陕北人热爱故土的同时，也表达出了陕北文化的发展变迁史。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曾说：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可以说，路遥的成长与陕北浓厚的民间文化气息和丰沃的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关于陕北文化，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论述：“陕北，山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狂、古朴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于是，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1]

路遥出生于农村，在农村生活并读完小学，农村中的娱乐方式是民歌和故事，长时期生活于农村的路

遥耳濡目染，必然会受到民间故事、民歌乃至民间是非观念的影响，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1\]](#) 贾平凹：《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134页。

|| 1960年（庚子） 11岁

3月9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陕西十年来的文学工作经验”工作会。

3月11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组织陕西19位业余作者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延河》组织西北国棉一厂和咸阳陵昭村的80多位工农业余作者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双百”方针的论述。

4月 《延河》从1960年4期始开辟“新人集”专栏，提供新作者写新人新事新作品。

5月 《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6月24日至26日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上，苏共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7月22日至8月13日 第三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柳青、柯仲平、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陕西文艺界代表出席会议。柳青在会上发言《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柯仲平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杜鹏程当选全国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8月19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讨论检查《延河》。

8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除《思想战线》《陕西日报》和《西安日报》外，其他报刊自9月1日起，停刊检查。《延河》可继续出刊，但需要同时进行全面检查。

8月 为了达到机关党委提出的“机关干部到1965年达到大学文化水平”的要求，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决定业务干部学习中国文学史一年（1960年8月至1961年8月）。

10月 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一章开始在《延河》10月号连载。

12月19日 《延河》编辑部召开小说座谈会。

本年 杜鹏程创作小说《瀚海新歌》《年轻的工程师》，创作谈《日记摘录》《学习毛泽东思想》等，出版散文集《速写集》。

春 在马家店小学上三年级。

延川县教改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为中心，让中小学生大量参加农业劳动。延川县的伯父母想把路遥培养成一把劳动的好手，不想让路遥多上学。伯父母打算等路遥小学毕业，就从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希望他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8月 升入马家店小学上四年级。

物质的贫困、亲情的缺失使年幼的路遥格外敏感，自尊心格外地强，从而形成了他内向忧郁的性格、倔强刚毅的气质，塑造了他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同村伙伴刘凤梅^[1]回忆：“小时候路遥聪颖而淘气，常常和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

架，总不认输。”（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

路遥操着清涧口音，本村的孩子藐称他为“外路脑子”（方言，指外地人），甚至有大男孩公开骂他“为儿货”（方言，同“顶门”）等，路遥被各种恶俗的言语攻击。路遥无法控制住情感，和这些男孩打到了一起。厚夫在《路遥传》中说：“有一次，路遥并把一个男孩的头打破，直到大人们走过时，才把他们拉开。这次打架，给郭家沟村的孩子们上了一课，这个‘外路脑子’心‘残火’（方言，指厉害）着哩。这次打架，也让卫儿打出名声，村里小孩再也不敢公开欺负他了。”

12月1日（农历庚子年十月十三）圆晬日。路遥12虚岁，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所以圆晬的形式也比较简单。12虚岁开锁，路遥的养父母须赠“保锁人”一套衣服及一些钱币，至此保锁结束。此后，13虚岁、25虚岁、37虚岁、49虚岁……为“本命年”，民间讲究腰系红带，这一年避免在丧事上见棺材、去世的人。

【注释】

[1] 刘凤梅（1947—），女，陕西省延川县人，路遥同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出版有小说集《春夜静悄悄》《月是故乡明》，长篇小说《大地》，长篇传记文学《走近李焕政》《平民书记》《三秦赤子》，报告文学集《高原，星光灿烂》《守望黄土地》《黄土魂》。与他人合著有《谢子长》《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等。

|| 1961年（辛丑） 12岁

1月16日 《延河》改为文艺刊物，仍以文学为主，增加音乐、美术、戏剧等内容。

同月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二、三章在《延河》1961年第1期连载。

2月28日 《延河》召开座谈会，讨论短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问题。后杜鹏程题为《关于情节》的会议发言发表于《延河》4—5月合刊。

4月4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双百”方针。

4月12日 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完成有史以来的首次太空飞行，使人类实现了千百年来登天旅行的梦想。路遥以来创作的小说《人生》主人公名字高加林就是根据加加林而来。

5月24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诗人柯仲平落户长安县搞创作。

5月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四、五章在《延河》4—5月合刊连载。

7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双百”方针。

10月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六、七章在《延河》10月号连载。

11月13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写中间人物”座谈会，胡采主持会议。

同年 杜鹏程出版小说集《年轻的朋友》。

同年 陈忠实与同学组织文学社“摸门小组”，创办文学墙报《新芽》。

春 在马家店小学上四年级。

7月 在郭家沟村小学读完了四年制的初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延川县的城关小学读高小。

8月 在延川县城关小学上五年级。

据路遥同学、作家海波回忆：“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记不确切，但不会超过一百八十名。这些学生又能分为两种：一是县级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农民的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记不确切，但可以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只有一个男生宿舍，一条土炕最多能睡十个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延川县城关小学位于县城的堂坡上，四年级以下全是县城干部和城镇市民子弟，穿戴用具远非农村学

生可比。五、六年级经过全县统考，招收城关公社范围内的部分农村学生。住校、上灶，要交小米、白面、杂面，家庭困难的学生，交不起米面，就在家里蒸一些菜叶加麸糠的干粮，带到学校里热一下吃，这类学生被称为“半灶生”。路遥即为半灶生。

1959至1961年期间，是国家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土地贫瘠的陕北农村，人民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路遥在饥饿的残酷折磨中发奋学习。上高小时，作为“半灶生”，他每天把家里蒸成菜叶加麦糠的干粮放在伙房里加热，开饭钟一响，必须尽快赶到笼前，抢先取出干粮，否则，别的学生一旦动手，他的干粮便会散成一团，只能用筷子往碗里拨拉。

那个年代，路遥挣扎在饥饿与死亡之间。从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曾经与饥饿、死神奋力抗争的人身上那种超强的毅力。路遥曾谈到这段生活：“我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了一九六一的饥饿状态，这必须要你自己体验过什么叫‘饥饿’……你必须要自己有这种亲身体验，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把他移植过来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和别人不一样。”（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那个时期，大妈几乎每逢集就进城，她常常挎个篮子，篮子里不是红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上几毛钱，赶紧跑到城关小学送给儿子，她晓得路遥用钱处多。每过节令，大妈总是用自己舍不得吃的荞面包成饺子拿到县城熟人家里煮熟，叫来儿子吃。因为怕儿

子受累，耽误学习，她有时在“半灶生”回家取干粮的前一天，就步行约五公里路把用糠菜蒸成的“干粮”送到儿子手里。（厚夫《路遥传》）

11月20日（农历辛丑年十月十三） 圆完晬（12虚岁）以后的第一个生日。

按照清涧的乡俗，生日当天忌食捞饭和饺子。这一年为路遥的本命年，一般家庭过生日在前一天下午吃一顿长面或饸饹，生日早上吃一顿好饭即可。

|| 1962年（壬寅）13岁

1月 《江姐》（《红岩》选载）在《延河》1962年第1期刊登。

3月2日 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

4月19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报告会，柳青在会上发言并提出要进“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

4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令全国有关单位贯彻执行。

5月22日 首届电影“百花奖”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5月23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各省市文艺界都举行了纪念会、报告会或座谈会。全国主要刊物都发表了社论。

6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讨论和执行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调整文艺工作方面的各种关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

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

7月28日至8月4日 李建彤^[1]的长篇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在《工人日报》连载。

8月2至16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中间状态人物的描写。

9月24至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时，会议还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毛泽东提出“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11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西安地区部分业余作者座谈会，解决业余作者阅读和创作的问题，会上柳青、王汶石、魏钢焰、王宗元、余念等人作了辅导发言。

本年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署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美协、音协和剧协行政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批判柯仲平的长诗《刘志丹》。

同年 杜鹏程完成《太平年》初稿，其中涉及贺龙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重大问题”，手稿被抄。直到1980年，杜鹏程才开始重新修改此稿。

同年 王汶石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回国后被任为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

同年 陈忠实高中毕业，成为回乡知青，在西蒋村触及小学当民办教师。

同年 延川县教学改革委员会成立，各公社成立教改领导小组，以缩短学制，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进行教学改革。在课堂

教学中采用少而精、启发式、学以致用原则。因连年自然灾害，延川县23所小学停办，2426名学生辍学。

同年 延川县委油印曹谷溪诗习作100余首，其中有些诗作被《群众文艺》刊载。

春 在延川县城关小学读五年级。

“在城关小学时，路遥是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给同学起绰号，二是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编出的顺口溜事出有由来，夸张无止境，能笑得人‘肚子疼’。这可能是他最早的‘创作’尝试。”（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秋 升入高小六年级。

“（路遥）十二三岁这一年，因为一件小事，路遥与养母闹了别扭，养母骂了他几句，他赌气跑了，并扬言要回清涧老家。天黑了，仍然不见路遥回来，养母急了，赶忙外出寻找。在村子的不远处，养母发现路遥独坐在一块圆形的石盘上，手里抓一把小石头，往河里仍，嘴里还数着数。养母问：‘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路遥撅起小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坏毛病！’”（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

【注释】

[1] 李建彤（1919—2005），曾用名韩玉芝，笔名秋心、秋茵，中国共产党先烈、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

地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的弟媳，著有小说《刘志丹》。

|| 1963年（癸卯）14岁

3月24至3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和《陕西日报》社联合召开报告文学座谈会，胡采、杜鹏程、魏钢焰、李若冰等参会。魏钢焰传达北京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情况。会后，20余位作家和业余作者赴农村采访。

5月24日 铜川矿务局职工业余创作座谈会召开，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和《延河》编辑部派人参会。

6月 严家炎的论文《关于梁生宝》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针对严家炎的文章，柳青在《延河》1963年第8期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8月10日 西安文学界召开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侵略大会，柯仲平主持会议。

9月2日 文化部发出（63）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

6月至10月 杜鹏程、魏钢焰、李若冰等作家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临潼行者公社社教试点工作。

12月18至20日 《创业史》责任编辑王维玲^[1]到皇甫村与柳青长谈。

本年 杜鹏程在《延河》四月号发表散文《海与焰火》，七月号发表报告文学《英雄的三年——记洵阴县长沙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陈忠根同志》，下半年到陕西南部农村参加“社教”。

本年 延川县学校锐减62所，并将20所公办初级小学转为民办，并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办学方针。教学教改内容增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实践活动。中学教育实行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春 在延川县城关小学读六年级。

“到了1963年春，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为了不中断儿子的学业，大妈拄着打狗棍跑到延长县一带的村庄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孩子上学——因为延长县在延川西南方向，那里没有儿子的熟人，他丢不起人。当然，讨饭是青黄不接时陕北农村人的普遍行为。”（厚夫《路遥传》）

7月 高小毕业。大伯把上山的劳动工具放在路遥的面前，无可奈何地说：“中学就别上了，回来受苦吧！”路遥明白家中的光景，更理解伯父的心情，但生性好强的路遥则要求进一次考场，他要向村人证明即便不上中学，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结果，在全县一千多名考生录取一百名左右的严酷竞争中，路遥金榜题名。消息传来，在郭家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此时，路遥被更加强烈的求学欲望鼓荡着。

夏 自1957年后第一次回到清涧。路遥曾与央视版《平凡的世界》电视剧导演潘欣欣谈起过此事：“初小毕业，夏收前放假我才第一次回家。回王家堡，进了门妈见了我也没说啥，农村人不会表达个啥感情，我

也屁股没沾炕沿就到村里找那几年没见的小朋友们去了。快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进门就问：妈，吃啥？妈说给我包了饺子。我挺奇怪，麦子还没收哪来的面粉包饺子？农村娃都知道这。妈说，我试着用杂面包的。说着引我到灶台边，她掀开大锅盖让我看，全是蒸气，妈吹吹蒸气，用大勺一搅才发现，哪有啥饺子，早成了一锅面菜糊糊。妈傻了眼，一下子趴到灶台上大哭起来……”（潘欣欣《忆路遥》）

9月 进入延川中学^[2] 初中1966级乙班。

在大队书记刘俊宽等人的热情帮助下，路遥背着借来的二斗黑豆向学校报到。谁知当天下午路遥又返回了村，哭着对刘俊宽说：“学校已经不收我了！”刘俊宽曾在县上工作过几年，与中学校长杜永福熟悉，于是拔腿就到延川中学，找到杜校长，将路遥的情况做了介绍，并希望能给予照顾。杜校长也十分爱才，当即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破例将路遥收进学校。路遥这才走进了延川中学的大门。

后来，路遥曾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描写到类似的场景，而其中一段心理描写或可看作路遥当年心里的写照。小说中马建强带着父老乡亲们的一片厚爱，背着“百家姓粮”进城上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正是这贫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

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注释】

[1] 王维玲（1932—），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科长、主任、编委、副总编辑，著有《话说红岩》《岁月传真》等。王维玲作为《创业史》的责任编辑，后又发现了路遥的《人生》等作品，对路遥的创作影响较大。

[2] 延川中学坐落在县城的南山坡上，校舍非常简陋，几排古老的平房与窑洞分别作为教室与宿舍。66级乙班的班主任是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老师，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从1962年开始，延川县重新实行校长责任制。校长主持校委会，下设教导处、总务处，教导处下设教研组，同时建有学生会组织。

|| 1964年（甲辰）15岁

1月 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在1964年《收获》第1期发表，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3月3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召集西安市及附近地区工矿铁路业余作者传达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讨论如何更好地执行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进一步壮大工业战线业余作者队伍。

5月 《毛主席语录》出版。

7月2日 中宣部召开文联和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穿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所做的第二个批示，文联又开始整风运动。

8月至9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当时在全国展开争论的周谷城的美学观点及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柯仲平主持会议，柳青、郑伯奇、王汶石、杜鹏程等作家，《延河》编辑，以及陕西高校青年教师、青年作者等出席会议。

10月20日 柯仲平逝世，终年62岁。

11月13至16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连续召开座谈会，批判“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

12月4至5日 韩森寨、郭家滩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工人业余作者批判“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延河》部分编辑参加会议。

1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文章。

12月28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再次召开批判“写中间人物”文学主张的会议。

本年 文化部发出（64）文群密字291号补充通知，要求“就地燃毁”《保卫延安》一书，杜鹏程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全年仅在《延河》2月号发表短诗《致巴拿马》。

本年 在延川中学读初中。

路遥所在的班级是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县城干部与职工子弟，在鲜明的对比中，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与屈辱感撞击着他的心灵。最为可怕的还是来自饥饿的压迫，学校饭菜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他自然只能吃丙级饭，黑窝头、稀饭、酸菜^[1]。他交不起每月五六元的伙食费，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对路遥来说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因为贫困，经常面临断炊的危机，他饿得头昏眼花，好心的同学总是帮着路遥。有时班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回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记起来。”

【注释】

[1] 延川与清涧的饮食习俗大致一样，所谓的酸菜在陕北地区极为普遍，就是蔬菜咸制，一般多以白菜、萝卜、胡萝卜、茄子、豆

角、辣椒、茺荑、韭菜和大葱等作为原料。一般在秋季腌制，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夏之际主任看不下去，会把自己的饭票给路遥一些。这些关心与援助，使路遥敏感的神经陷于孤独与忧郁之中，同时也更激发了路遥超越对手的倔强与渴望，以此来捍卫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这些帮助使他倍感温暖，又使他感到孤独。

|| 1965年（乙巳） 16岁

1月4日至7日，苏联作家代表团弗缅科、克绍科夫、艾德林来访，王汶石陪同，柳青接见。

2月23日 周扬召集文艺界相关人士，布置贯彻“二十三条”。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

2月25日 《延河》召开编委会，柳青在会上发言，认为只要方向对，就是社会主义的；有缺点错误，不要紧张。《延河》是社会主义的刊物。

2月26至27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专业创作会议，胡采主持，李若冰、柳青等出席并发言。

3月2至4日 《延河》召集西安地区业余作者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开展业余创作，歌颂伟大时代，歌颂新英雄人物。

4月30日 《延河》编辑部派人参加榆林地区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

5月下旬 柳青到延安，开始中断一年多的《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

10月18日 柳青完成《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初稿。同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马健翎逝世。

11月10日 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12月5日《陕西日报》转载。

12月12日 邓拓署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前线》发表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11月29日至12月17日 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京召开。周扬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

12月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陕西省业余作家代表团赴京参会。曹谷溪为代表团成员之一。

本年 继续在延川中学读初中。

路遥生前好友海波曾这样描述路遥在延川中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到延川中学后，这种自发的创作冲动得到了鼓励。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在五星红旗下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使他文名大振，成了全校的‘明星’。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整个初中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难最难熬的一段经历。面对贫穷、饥饿、歧视，路遥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了抗争与奋起。路遥不仅在精神上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还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作为人的本质

力量。路遥忍受饥饿也要争取学习上的好成绩，中学期间，路遥一直是好学、上进的好学生，还表现出对于文学和政治强烈的兴趣。县城唯一的图书馆成了路遥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里不仅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更饱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等大量苏联翻译小说。

除了图书以外，看电影是路遥当时最奢侈的一个梦想。厚夫在《路遥传》中说：“那时，看场电影绝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整个延川县城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一毛钱……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在电影是大众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的当时，一部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县里每放映一部电影，就很快成为城里孩子议论的焦点。这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许多农村孩子也吸引过去了，这是好胜心极强的王卫国所无法接受的。他也尝试着通过“爬下水沟”的方法来观看电影，但是都没有得逞。”多年以后的1991年6月10日，路遥在演讲中还回忆起了自己当年为看电影“爬下水沟”的一幕。

|| 1966年（丙午） 17岁

1月9日 《人民日报》刊载《欧阳海之歌》节选，加“编者按”：“这是一本好小说。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革命化，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1月27日至2月5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陕西地区工农业余青年作者学习会，传达贯彻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精神。柳青、魏钢焰、胡采等人出席会议并做报告。

2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 《延河》召开扩大编委会，讨论培养作者，面向农村。

2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

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同时发表新华社通讯，介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厂矿和连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情况。

2月 林彪和江青发表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1979年5月，中央正式通知撤销《纪要》。

3月23日 柳青在《陕西日报》发表《革命理想和革命意志的化身》。

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号召批判“文艺黑线”。

4月 《文艺报》发表文章《“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

5月8日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随后《人民日报》转载该文。

5月10日 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5月11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行声讨邓拓集会，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变笔杆为枪杆，向邓拓开火，搞掉黑线，捣毁‘三家村’黑店”。

5月14日 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

5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

5月中旬 延川县“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5月25日 中共中央延川县委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5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分会正常业务活动停止，投入运动；李若冰被任命为组长，负责领导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化大革命”。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5日 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进驻延川中学、永坪中学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18日 延川县副县长马存李率工作组进驻延川中学，县委宣传部干部白益生率工作组进驻永平中学，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历时两个月。

7月1日 《红旗》重新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中，提出所谓“文艺黑线”，公开点名周扬。

7月12日 为了集中力量检查刊物，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自1966年8月起《延河》停止出刊。

7月18日 延川中学初中班放假，高中班和全体教师留校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21日起，延川县举办中小学教师集训会。10月9日结束，历时83天。会议期间，参加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县文化单位及学生代表共计达813人。（《延川县志“文化大革命”纪略》）

8月上旬 延川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5日 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8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大串连开始。截至年底，毛泽东同志共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和其他群众。

8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谈话，要求保护姚雪垠，称赞其《李自成（第一部）》写得不错。

9月16日 国务院农业检查组来延川检查工作。

10月 延川县组织起100个（2000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11月28日 江青召开文艺界大会并发表讲话，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点名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彭真等人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本年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改名为“陕西省文化馆”。

同年 柳青、杜鹏程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受到冲击，“靠边站”。

6月 初中部毕业，参加中专考试，被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1] 录取。

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路遥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返回了延川中学。由于路遥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加上文采出色，他很快成为班内“文革”小组成员。对于这场运动，路遥是热爱的，和全国许多青年一样投入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中。此时，路遥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得以突显，他带头写大字报，揭发当权派，写了许多派性文章。

“文革”之前，后来很多成为作家的人在中学学习阶段就已经显露出对于文学的爱好和写作的才情。陶正回忆说：“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命题作文一挥而就，应时应景的墙报稿节日诗更是信手拈来。”（陶正《自由的土地》）

11月上旬 随延川中学红卫兵徒步到北京串联。

1966年10月，延川中学10名学生（7男3女）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自绣了一面红旗，徒步去北京串联。据路遥在城关小学、延川中学同级同学吴江所言，路遥在他们之后（1966年10月），沿着相同的路

线去了北京。吴江所走的路线为“延川县城→延水关（延川县境内的黄河渡口）→永和（山西省）→交口→太原→石家庄（河北）→北京。”（安本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以“延川时代”为中心》）

11月10日 串联到北京，与同学一起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路遥初中同学梁世祥回忆：“当时每一个班是五个人，我们班里派了王卫国我们五个人到北京，我们是第七次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在城楼上呢，底下是车，汽车拉上红卫兵往过走，当时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就是人民万岁，人们都觉得很激动，王卫国（路遥）提议就说，咱脱离黑字红卫兵，成立一个红四造反联军。”

据196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的《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报道，10日上午10点，毛泽东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下午3点，被接见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乘着辆卡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11日，有1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排列在横穿天安门广场的东西长达二十六里的长道上，下午2点30分，毛泽东坐在敞篷车上，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缓缓行驶接见。由此可知，路遥被接见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1月10日下午。

初冬 从北京串联返回延川。

在万丈豪情的革命鼓舞下，路遥成为狂热的红卫兵的一分子，自觉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

路遥生前好友海波回忆：“路遥最初的自命题写作是一份‘宣言’。他刚从外地串连回来，独自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为‘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宣言’就是为此而写。写得很长，用了两整张白纸；写得‘气势磅礴’，看了让人亢奋。其中的两句话最为抢眼：‘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他很欣赏这两句话，一度将‘冲天笑’作为自己的化名。”（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后来，他又据此分别给三个胞弟起了官名——二弟叫王天云，三弟叫王天乐，四弟叫王天笑。

冬 从北京串联回来不久，由于出众的组织能力，路遥成为他所在的班级——延川中学初中1966级乙班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领导者。他以“王天笑”的名字，在延川县各机关的墙壁上张贴着充满革命豪情的大字报，他的文学才能得到了最早的施展与发挥。同学吴江回忆：“延川中学教师、学生分裂成两大派别，路遥率领的‘井冈山’成为‘红四野’的骨干力量。”路遥初中同学刘明升回忆：“路遥就是我们红四野^[2]的军长。那时候路遥十七八岁，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标题就叫个《秀延河畔，烽烟滚滚》，他写的那些文章——像那一篇文章的话，那时候整个震动了全县。”

【注释】

^[1]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创建于1951年，前身是西北石油专科学校，1963年为西安石油学院中专部。从1951年到1965年，学校毕业生由石油部向全国各石油单位统一分配。该校现为陕西省教育厅直属的全日制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2] 延川中学“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

|| 1967年（丁未） 18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2月17日 《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

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3月6日 延川县文教局召开中小学教师平反会，为1966年教师集训会上错批错斗的70名文教工作者彻底平反。

3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4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派编的《文学战地》创刊，出刊56期后改为报纸形式。第1期刊发《柳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柳青的“哲学”》等文章。

5月25至28日 《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44），《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1951），《关

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1963年、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两个批示》。

5月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

5至6月 北京、上海举行集会，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期间《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在首都舞台上演。5月31日，《人民日报》就此会演以《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为题发表社论。6月18日，再次报道会演情况，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7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联合起来向文艺黑线总后台及其代理人发起总攻》。

7月18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7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以选举的方式成立“斗批改委员会”。

8月5日 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批判大会。

8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在中共长安县委调查十五天后，完成调查报告《柳青在长安的十四年》。

9月 杜鹏程进“黑帮队”。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0月22日 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

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11月6日 《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14日 发动群众“拦车”，阻止安塞县造反派抓延川县委副书记霍学礼回县批斗。

“延川县造反派内部有‘放车派’与‘拦车派’两派。王卫国是‘拦车’派，拦住安塞县造反派不让抓人。王卫国冲锋在先，他发动群众‘拦车’，最后迫使安塞县造反派没有得逞。在他这派红卫兵组织的人们看来，王卫国‘大智大勇、敢作敢为’，于是推举他为本阵营的学生领袖。”另一派是由延川中学高六六级、高六七级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延川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司令员由高六六级娄新文担任。（厚夫《路遥传》）

本年 在武斗当中，路遥与“红四野”的其他负责人共同商议：决不搞对谁都“造反有理”，对县里的好干部要一保到底！这是他造反的底线。在他的带领下，“红四野”骨干分子对延川县委书记张史杰采取“农管”，实则将张史杰辗转送至延长老家。因此，“红四野”派被视为了“保皇派”。

|| 1968年（戊申）19岁

5月23日 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和阐释了“三突出”口号：“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

5月25日 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6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推迟到1968年6月开始进行分配。

6月12日 中央要求宣传毛泽东形象时避免形式主义。

7月 中共中央发表了“七·三”“七·二四”公告之后，经过解放军驻延安支“左”部队周旋，延川县两派群众组织相继解散武装队，交回武器，武斗风终于停止。（《延川县志·大事记》）

7月28日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此后“工宣队”相继进入其他单位。

9月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化组成立。

10月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40队进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时期。

11月4日，延川中学召开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大会，路遥家在农村，为返乡知青。（《陕西省延川中学校志·大事志》）

11月22日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干部下放劳动。

11月 陕西省举行学习革命样板戏调演大会。

12月22日 《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2月底 北京学生郭路生（诗人食指）在奔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的列车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12月 26814名北京知识青年带着行李箱、铺盖卷，插队落户到延安地区除吴起、子长的12个县，1600个生产大队。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劳动志》记载：“从1969年开始，一共有27211名北京知青分为4个批次来到陕北高原的1600多个大队，插队落户，从事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劳动。”

同年 陕西省文化馆改名“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

同年 延川县文化馆油印刊物《革命文化》创刊。

夏 路遥与“红四野”成员“流亡”到西安。大部队租住西安市东郊韩森寨的东方红旅馆，路遥与“红四野”的核心人员在西门内的勤俭旅馆租住。

9月15日 被推任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举行，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和《延川县革命委员会通告》。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4个办事机构。军代表马志亭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路遥作为群众代表，被推任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时设副主任九人。

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曾与同事晓雷聊天的时候，说想写“文化大革命”，书名就叫《十年》，写一百万字，把上至中央的斗争与下至基层群众的斗争，把城市的斗争和农村的斗争，穿插交织起来，写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判断和剖析。（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

冬 路遥回到刘家圪崂大队参加打坝修水利。

年底 延川县革委会在县城井滩广场隆重举行“延川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欢送“老三届”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路遥作为革委会副主任，带头下乡，回到刘家圪崂大队，打坝修水利。回到农村的路遥被编入农田基建队，从事强度极大的打坝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时期的一条特殊的道路。

|| 1969年（己酉） 20岁

1月23日 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延川县插队落户。^[1]延川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高中及清华园中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其中有史铁生、林达、林虹、陶正、孙立哲、邢仪等人。

史铁生回忆：“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是才子，说他的诗、文都做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史铁生《悼路遥》）

3月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知识青年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和县、社干部20多人的知识青年安置工作汇报团赴京汇报工作，3月29日返回。

7至9月 文化部及文联工作人员到“五七”干校及部队农场参加劳动。

8月20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直属文化、新闻系统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开幕。

9月30日《红旗（第十期）》发表文章，提出“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口号。

9月 延川县清队工作全面展开。（《延川县志·“文化大革命”纪略》）

12月27日 陕西省革委会宣布，原文化局、中国作家协会、剧协、音协、美协等单位的领导和干部下放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及部队农场劳动改造。

本年 曹谷溪被调到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通讯组工作，开始是通讯组的干事，后来成了组长。

春 返乡，回到郭家沟养父母家中。

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作为知识青年被安排回到原生产队，随后与其他返乡青年学生一同被组织在农田基建队中，成了一名农民，住郭家沟养父母家中。路遥没有想到他倾注了满腔热血的政治运动，突然向他露出了残酷的一面，他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路遥从梦境中醒来，怀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回到了养育他的郭家沟。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鄙视和冷落这位失意的青年，用温暖的手接纳了心灵受到创伤的路遥。这段时间是路遥人生的一个低谷阶段。他开始对这场“运动”进行痛苦的反思。在这次运动中，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也有生活信心的动摇。

路遥返回郭家沟时，生产队正在打坝，返乡学生都被组织在农田基建队中。打坝最重最累的活儿就是挖土，陕北的冬天，地冻得像铁壳一样，镢头下去往往只能挖个白印，挖不了几下，震的人虎口流血。同

村刘凤梅回忆：“路遥每天都坚持在半崖上挖土，很卖力。那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但是歇息的时候却是十分愉快的，在一起谈文学、谈历史，谈人生、谈时政，常常从远古谈到现实生活，从国际谈到国内。大多数时候是路遥讲，我们听。他的博闻强识，让我们大为钦佩。”（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

养父王玉德在郭家沟是有口皆碑的好人，经常“说大事，了小事”，在村里威望极高。路遥回村后，村里人怎能让他长期干重体力活？刘家圪崂大队领导们思前想后，想到一个让路遥到县城拉大粪记全勤的办法。这份工作就是去挖县城里公厕的大粪，用畜力车拉到村里。这一幕就是路遥后来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干过的工作。路遥就像小说中的高加林一样，忍受大粪臭味的熏烤，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县文化馆阅览室里翻阅报纸，以此了解一下国际国内的形势。拉大粪时间不长，又进入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为了能在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王玉德费了不少周折。路遥回村以后，大家看到从事纯体力劳动对于路遥来说不是长久之计。关键的时候，王玉德的拜识^[2]们顶着压力，不怕承担政治风险，决定让路遥到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没过多久，又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延川县志·人物志》记载：“1969年返乡劳动，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曾任过一年半民办教师，后在县宣传队担任编创员。”

夏 诗作《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发表在学校墙报，后收入诗集《延安山花》。

暑期，县上集中全体教师开会，组织者要求每个公社出一期墙报。路遥的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发表在学校的墙报。这首诗并没有打动别人的心，却打动了他自己的心。之后，路遥拜访了曹谷溪。与曹谷溪相识后，《我老汉走着就想跑》经曹谷溪抄写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村口的黑板报发表。路遥与曹谷溪的结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改变。

10月6日 提交入党申请书。

路遥在“中国百货公司陕西省延川县公司”字样的稿纸上，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路遥生前同事张艳茜曾在其著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中收录了路遥的入党申请书：

我叫王卫国。现年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出身：学生。

原籍：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现住延川城关公社郭家沟村。

9岁（虚岁）到延川为大爹过继。从小在家玩耍。

9—13岁在马家店小学初小上学（郝振富、刘凤梅可证明）。

13—20岁在延川中学上学（薛延清可证明）。现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11月16日 在延川县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村主任郭庭俊和村教师马文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对他政治上的肯定，竭力为他创造条件，提供政治上的拓展空间。

冬 路遥想参军，由村里到公社很顺利，但是到了县里在政审时被打下来了。原因是有人告发路遥，说他与“武斗”时一件人命案子有关，有人还想告他进监狱。这样，他的参军梦就此破灭了。

海波回忆：有一次，路遥穿着破棉袄，头上扎着一条旧羊肚子手巾，急匆匆地赶到他的村子里找他。路遥找到他时，告诉说出大事了，倒霉了——有人诬告自己与武斗时一宗大案有关。王卫国简略地说明情况后，从怀里掏出一份材料郑重地交给海波，并告诉海波：如果自己被抓了，要海波想办法把这份材料递到延安地区军事管制小组。他家是外来户，在延川没有亲戚，只有一些朋友，所以只能靠朋友了。看到海波紧张的样子，王卫国安慰说：“我肯定没事，如果真的有事，写这些能起什么作用？”王卫国告别海波后，又一次折回来，要走那份材料。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就不信他们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注释】

[1] 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各个县的生产大队劳动，闲暇时间读书成为主要的业余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路遥生活的文化环境。图书多是知青们从北京带来后互相借阅。这些散落民间的大量书籍正好给知青们提供了充分阅读的机会。在时代发生巨变之时，知青们失去了求学进入科班训练走上文学之路的机会，却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获得了另外一种文学才能形成的空间。知青王晓建回忆：“在延安读什么都没人干涉，从《中国通史简编》到《斯大林时代》，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可以达到‘雪夜闭门读禁书’的至乐境界。”路遥的成长除了自身的天赋外，自然离不开与知青的交往。这些北京来的知青多数是清华、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有的比路遥大好几岁，路遥听说他们谁读书多，有见识，就去请教，彻夜长谈。后来证明，与北京知青的交往，对路遥的成长影响很大。

[2] 男子厚交，设立香案，跪拜天地，按年龄称兄道弟，称为“拈香”；女子结拜俗称拜干姊妹。

|| 1970年（庚戌）21岁

1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撤销。柳青、杜鹏程等人进入干校，参加劳动改造。

2月25日 延川县革委会召开“一打三反”誓师动员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尽快掀起大检举、大清理、大批判高潮，打一场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人民战争”。

3月25日 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商业、教育、卫生单位。（《延川县志·大事记》）

3月 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加强知青工作领导的九条措施。

4月 柳青几次犯病，被抢救。到9月，共抢救十余次。

5月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指导，认真总结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好经验，认真解决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坚决给予打击。

6月1日 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及文化局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局机关设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出版组。

6月17日 陕西省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议，讨论安排普及样板戏工作。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8月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成立文教局革命领导小组。

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随后开展了“批修整风”运动。

10月15日 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高等学校开始招生试点，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办法，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42万人。

10月 为纪念抗美援朝二十周年，《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五部复映影片，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本月 延川县文教局成立“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2月 延川县革委会向王卫国宣布：奉上级指示，令他停职反省，交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经公检法军事管制组复查，延川县“武斗中致命案”与王卫国无关，此案了结，就此免除了路遥的一场冤狱之灾。（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炎中涅槃——关于路遥与申易的回忆》）

3月 结束一年多的民办教师工作，参加县革命委员会“农村通讯员”培训，后被借调到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进行路线教育。

与路遥一同进驻的还有位叫林虹（化名）的女知青。在这期间，两人关系密切起来，慢慢发展成了恋爱关系。有一段时间，林虹返回插队的楼河村里办事，她和路遥就鸿雁传书。一个多月，林虹给路遥写了8封长信，平均4天一封，那些缠缠绵绵的情书给了路遥爱情的滋养。那时，路遥铁了心，一生只爱这个“林妹妹”。林虹在某方面“改造”了路遥，改造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路遥的一生：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时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大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专爱……（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关于这段初恋，路遥曾和作家高建群谈到此事：“在一个多雪的冬天，文艺队排练完节目后，他怎么陪着她回她的小屋。‘踏着吱吱呀呀的积雪，我的手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她的手，我有些胆怯，怕她责怪我，谁知，她反而用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高建群《扶路遥上山》）

多年以后，路遥与同事晓雷说，他想写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题目就叫《生命树》，写他的家乡黄土沟壑里的一棵老槐树，树下发生着几对青年男女的膨胀着的幸福和浓缩着的苦难，那是黄土高原上的亚当和夏娃的历史，凝聚着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沉淀和亿万斯年的黄土堆积……这也是路遥对早夭的妹妹和初恋的祭奠。（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

夏 延川县革委会党校组织人参观榆林地区学大寨先进县吴堡县，党校校长白光明与老师黄殿武，借口路遥能做记录，就带上他到吴堡参观。路遥在吴堡县黄河铁桥上步行，联想到“车过南京桥”；在榆林城边钻进沙柳丛，产生《塞上柳》的灵感。于是，他在榆林招待所里一气呵成，创作了诗歌《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厚夫《路遥传》）

年底 进入文教局成立的“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编剧；与陶正合作创作了歌剧《蟠龙坝》。

本年 据路遥回忆，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战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

年底 调入县革命委员会通讯组参加培训。曹谷溪非常赏识路遥的才气，说服了当时延川县的政工组组长与城关公社的领导，以培训“农村通讯员”的形式，将路遥调入县革命委员会通讯组培训一年时间。

|| 1971年（辛亥） 22岁

2月19日 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确定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144—155 万人。招工对象包括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4月28日 贾平凹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上学。

4月 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改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7月1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内迁职工家属安置问题的有关规定》。

8月30日 西安市文化局举办西安市工农兵文艺创作学习班。

夏 柳青开始写《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

9月13日 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在出逃过程中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坠机身亡。

10月 全国开始“批林整风”运动。

12月6日 中共延川县委派出首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34名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分别进驻51个大队和3个居民点，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时称路线教育），为期4个月。（《延川县志·大事记》）

春 将招工指标让与林虹，后与林虹感情遇挫。

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路遥与林虹都去报名参加招工，根据招工条件，指标有限，两人只能走一个，林虹因为体检不合格，县上决定把路遥送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最后，路遥把自己当工人的指标让给林虹，又通过几个朋友周旋，事情成功了。正式招工通知下来后，林虹按捺不住兴奋，把自己招工的事情告诉路遥。路遥一连说了几个“好”：“招上了，这次工作地点好，工种好。”

林虹当上工人的第一个月，工资全部寄给了路遥，让他买香烟抽。第二个月又寄去一条“宝城”牌纸烟。不知什么原因，慢慢地由一月一封信减少到三月一封信，再后来一封信也没有了。此事对路遥感情伤害很大。苦恼中的路遥，屋漏又遇连阴雨，浑身长出许多疮，折磨得他两个月不能行走。后来，一封来自内蒙古要与路遥断交的信刺痛了他的心。林虹当了工人后对路遥的爱“举棋不定”，便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那位女友不经林虹同意，便代写了断交信寄给路遥。那次，路遥哭了，哭得肝胆俱裂。之后，林虹便与一位支工的解放军开始了恋情。（阳坡《路遥在恋爱的日子里》）

史铁生曾在文章中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

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晚春 首次以“路遥”为笔名发表作品，该作品《车过南京桥》刊载于延川县文化馆白军民主编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

路遥拿着一首《车过南京桥》的诗找到延川县文化馆准备投稿，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延川县永坪中学任教的诗人闻频，由于文艺创作成绩突出，被县里抽到“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创作。他见证了“路遥”笔名的诞生。闻频看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他被路遥的才情打动了，连声夸赞写得好。这首诗作者署名“纓依红”。闻频说：“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念，好记……你另想个别的名字怎样？”男青年说：“好。”他接过诗稿，略加思索后断然写下“路遥”二字。闻频说：“好！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路遥”这个笔名从此就诞生了。

《车过南京桥》在延川县文化馆白军民主编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1]上发表了。发表后，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转载了这首诗。遗憾的是，这首诗并没有被路遥生前亲自选定的《路遥文集》收入。但它是路遥自觉文学创作的开始。从1971年起，路遥确定目标，他在劳动之余要从事创作文学。时至今日，路遥的同龄人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叶辛、铁凝、王安忆、张抗抗、阿城、残雪、方方、池莉、李锐、张炜等数十个知名作家，他们都是在“文

革”时期自觉进入文学创作，并成为一直活跃在新时期文坛的作家。

4月 应延川中学学生梁宝林邀请，创作了一首《迎五一》的诗朗诵，开头是这样写的：“火红的五月啊，来了！来了！从东海之滨到长城脚下，从黑龙江边到喜马拉雅，多少颗红心在一起跳动，多少双眼睛在眺望着宝塔……”

5月 进入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

一年的“农村通讯员”期满以后，在曹谷溪帮助下，路遥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身份，进入了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当时县通讯组的正式成员包括曹谷溪、刘维华、石焕南。通讯组的主要任务是向报纸和广播站提供新闻稿件。

6月 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跟随曹谷溪学采访、照相。

在此期间，路遥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和发挥。曹谷溪要去黄河畔采风，带了路遥。他背一个海鸥照相机，路遥背一个黄挎包上面写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两个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没铃，没闸，没后车架。一个骑车握把，一个坐前梁。那是一次十分富有浪漫色彩的活动。他们站在黄河畔的石崖上，背倚山石嶙峋的山峰，俯望滔滔不息的黄河，对人生和未来充满自信和向往。谷溪让路遥在一块石崖上站定，自己对好了焦距，把照相机放在对面一块石头

上，自己快步走到路遥跟前，相机一闪，自动拍摄了一张二人合照。这张充满笑容的合照，是路遥一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张，既记录了当时瞬间的生活画面，又见证了俩人的友谊。“文革”时期，青年男女均以穿军装，戴军帽，穿胶鞋为美，路遥也不例外。从路遥留下的照片资料来看，路遥服装多以军装为主，这也印证了那个“崇武”时代的特征。

7月 陪同来延川采访“赤脚医生孙立哲”的李小巴^[2]

。

当年延川流行一句顺口溜：抽烟要抽大前门，找朋友要找北京人儿。“北京知青”的到来，路遥的人生向度从此与北京知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恋爱、婚姻及其家庭走向。据作家李小巴说，路遥曾表示，“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当时，李小巴听了十分诧异，“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

本月 与林达相识。林达是清华附中的北京知青，在延川关庄公社任妇联主任，后调到通讯组。当林达知道林虹和路遥分手后，就主动写信安慰路遥，并劝他振作起来去干一番大事业。在这封信的最后，林达还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请问我能否与你合作？”为了给这对青年男女提供机会，曹谷溪专门把只有自己才能进入的照相暗室，提供给路遥与林达。就这样，路遥与林达在一间“照相暗室”里，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恋爱。不久，林达就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陕西日报》。

当时，曹谷溪热衷于文学创作，创作活动也成了通讯组的业务。曹谷溪不但“指点”路遥创作，还在生活、感情方面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支持和鼓励，其中包括修复失恋留下的创伤和重新恋爱。

8月13日 在《延安通讯》^[3]上发表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随后，写信告诉刘凤梅：“我的第一首诗在《延安通讯》发表了，你可以看看。”

9月28日 在《延安通讯》上发表诗歌《塞上柳》。

9月 参与编辑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

延安群众性的诗歌运动高涨，在此背景下，时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副组长的曹谷溪组织白军民、路遥等人，共同编辑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期间，路遥还创作过几首歌词中，如《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后收入《革命歌曲》。

10月5日 在部队当兵的樊俊成^[4]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与路遥谈“林彪事件”。之后一个月，樊俊成收到路遥的回信，路遥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和见解。（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冬 刘凤梅回忆：“但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别的原因，路遥思想压力很大，心境很不好，这年冬天，我回到家，见他穿一身白衣服，腰上还勒着白腰带。在陕北，是没有人冬天穿白衣服的，遂不解地问：‘为什

么这身打扮？’他说：‘我在为自己戴孝。’我见他情绪十分不好，便说了一些开导的话，他说：‘放心，生活不会打倒我，除非心脏停止跳动。’”（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路遥的“戴孝”行为是与自己的过去告别，这场“青春游戏”该结束了。

本年 路遥与林达相恋，林达专门去了林虹工作的城市，林虹已做了军代表的妻子。她与林虹躺在一张床上，同盖一床被子，她把自己与路遥相爱的事告诉了林虹，林虹听后哭了，整整一夜都不停地落泪。

林达离开林虹工作的城市，又回到父母寓居的福建宁德地区^[5]，向母亲报告了她与路遥的相爱，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要她讲讲路遥是怎样一个人，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路遥的才华、勤奋、刻苦、毅力……末了，母亲问林达：“你讲的都是路遥的优点，路遥有什么缺点呢？”林达一时语塞。母亲说：“你不知道他的所有缺点，就说明你并不很了解他，你们的事缓一缓为好。你先得冷静下来，拉开距离之后看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当你愿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点，那个人才能成为你的生活伴侣……”林达遵从了母亲的意见。探亲回来后，她果然与路遥拉开距离，好久不再进那个冲洗照片的暗室。

旧梦刚刚过去，新梦刚刚开始。那段时间，路遥痛哭流涕地对谷溪说：“林达不和我好了……”在谷溪面前，这是他第二次流泪，像一个受伤的孩子。谷溪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林达不是会突然变卦的人。”于是，谷溪又找来林达，说：“你妈的话很好，

但并不是不同意你谈。我对路遥说了，路遥也同意你妈的话。那你以后就继续了解路遥，爱情的大厦也要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不能是空中楼阁……”谷溪的一番话，挽救了路遥和林达的爱情。林达表示愿意继续了解路遥。

【注释】

[1] 1972年《群众艺术》复刊更名为《工农兵文艺》，改为月刊。1973年，《工农兵文艺》改名《群众艺术》内部发行，1975年《群众艺术》在省内发行。1980年《群众艺术》恢复全国发行，1984年1月13日更名为《百花》。

[2] 李小巴（1937—），笔名李知。山东郓城人。中共党员。1956年毕业于石油部工业计划经济学校计划系。历任西北地质局、陕西省地质局地质勘探队干部。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小说集《戈壁红柳》，中篇小说《峰巅》《正是早晨》，另外发表《他永远活着》《论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背弃趋向》《论小说的潜内容及其匮乏》等诗歌、小说、评论文章数十篇。中篇小说《啊，故土》获1983年《当代》中篇小说奖。

[3] 1950年7月1日《延安报》创刊，1958年10月1日改刊为《延安日报》，1961年3月9日恢复为《延安报》，1967年停刊。停刊期间，先后出版了《红色电讯》《今日延安》《农业学大寨》和《延安通讯》等非正式报刊。1979年4月10日复刊，叶剑英亲笔题写了报名“延安报”。

[4] 樊俊成，延安文管所研究员、延安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路遥延川同乡。

[5] 林达父母原在全国侨办工作，父亲是归国华侨，曾任廖承志秘书。“文革”开始后，林达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下放到福建老家。

|| 1972年（壬子） 23岁

1月5日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召开革命故事创作座谈会，来自全省各地市的51名故事作者和故事员总结交流了创作经验并进行示范讲述。

2月 陕西省各高等院校开始进行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3月11日 陕西省文艺创作调演大会开幕，4月14日大会闭幕。

春 柳青完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5月 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出版。

同月 柳青得到“解放”，随后，带着定稿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到了北京，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

8月14日 高玉宝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文艺创作不能凭空编造假人假事》。

8月 陕西师范大学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的招生办法。路遥同乡刘凤梅被推选上了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其上大学期间经常与路遥通信。

9月 曹谷溪创办延川县县级文艺小报《山花》。[\[1\]](#)

11月6日 陕西省创立文艺创作研究室，陆续调入原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被下放劳动的干部、作家和编辑。

本年 陈忠实担任毛西公社卫生院院长，在《西安日报》发表作品《配合问题》《雨中》等。

1月23日 写作《促拍满路花新镇》。其中结尾两句：“路远任重，无意去争风。李白桃再红，总要凋零，不及雪里青松。”

2月14日 与林达一同回到郭家沟看望养父养母。

2月15日 与林达一同到刘家沟看曹谷溪。

曹谷溪找大队把知青住过的窑洞收拾打扫了两孔，安顿他们分别住下，这一住就是八天。按照民间的习俗，陕北人正月出行一般家人鸣炮送行，忌单日出门、双日回家，路遥和林达都属于知识青年，也就不讲究传统习俗。到了曹谷溪家中，他一日三餐给路遥、林达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吃羊肉圪坨^[2]。

2月23日 与林达、曹谷溪一同回到延川县城。

春 回清涧老家给生病的母亲输血。

5月 参与组建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

路遥与曹谷溪、军民、闻频等人组建业余文艺创作小团体——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曹谷溪主编的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修订本）》共收录52 首诗歌，交付于延川县印刷厂进行铅字印刷，更名为《延安山花》，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名义内部发行，共116页，刊诗52首。

《延安山花》收录的路遥作品包括：《南湖的船——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车过南京桥》、《灯》（路遥与曹谷溪共同创作）、《走进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当年的“八路”延安来》（路遥与曹谷溪共同创作）、《塞上柳》。路遥曾这样评价《延安山花》：“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路遥《土地的寻觅》）

本月与曹谷溪、闻频、陶正等共同编辑精选的41首诗歌，以《延安山花》为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路遥诗歌六首，非陕北题材的《南湖的船——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车过南京桥》没有被收入。

8月2日《陕西日报》刊登延安地区革委会文教局、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此文中对作者点名表扬的只有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了三大革命运动。”路遥的名字在《陕西日报》出现，使他再次成为延川县的“名人”。

8月20日 七场歌剧《第九支队》完稿，该剧本由闻频执笔。

9月1日 诗歌《老汉一辈子爱唱歌》刊登于“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宣传队”的文艺铅印报纸《山花》创刊号。

10月1日 与闻频共同创作的大型歌剧《第九支队》在延川县演出。

同日 与曹谷溪共同创作的诗歌《赞歌唱给毛主席》刊于《山花》第3期。

秋 与张兴祥、陶正一起被调到延川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

当时延川文艺宣传队的创作员属于脱产搞创作，路遥每月工资18元。期间，路遥创作了很多诗歌，同时，他并不停留在一种文学形式的探索上，开始尝试着写叙事诗、散文与小说。

11月1日 叙事诗《桦树皮书包》发表于《山花》第5期。

12月16日 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刊于延川《山花》第7期。

本年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辑的《山丹丹花开》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路遥的三首诗作：《车过南京桥》《塞上柳》以及《当年的“小八路”回延安》（与曹谷溪合作）。选本同时还收入了梅绍静的

《庄严的时刻在今天》、肖重声的《军代表》等多人作品。

【注释】

[1] 《山花》杂志与路遥创作关系甚密，其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包括其早期创作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多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基石》《伏胜红旗》等。史铁生曾在路遥身后回忆，其初次见到路遥作品便是在《山花》。

[2] 陕北圪坨是用荞面制作的，属于陕北的一种富饭，离不开羊肉汤，汤里有什么好配料都可放，如黄花，木耳、豆腐、栗子等。圪坨煮熟，干盛半碗，浇羊肉汤，称之为“羊腥圪坨”。吃剩的，下一顿炒熟吃更香，俗云“圪坨热三遍，拿肉都不换”。陕北民歌里有“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紧跟上。”荞面性凉，羊肉性热，二者同吃，是最佳的饮食搭档。陕北民歌里常用比喻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

|| 1973年（癸丑）24岁

3月10日 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5月 文艺刊物《朝霞》在上海创刊。

6月8日 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来西安和延安访问。
6月9日晚，一行人观看了延安举办的文艺晚会。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离开延安。

6月 延川县发布了全国各大学招生的消息。

7月 《陕西文艺》创刊号出版，主要任职人员均为原《延河》人员。

8月 贾平凹与大学同学冯有源合作的故事《一双袜子》刊登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责任编辑是费秉勋。这是贾平凹真正的处女作，从《一双袜子》开始，他一直沿用贾平凹这个笔名。

夏 柳青修改《铜墙铁壁》。

9月13日 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召开全省第二次革命故事经验交流会。

本年 杜鹏程从干校调入陕西文艺研究室，但创作依然受限。

本年 陈忠实担任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编写村史《灞河怒潮》，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

1月16日 诗歌《老锻工》刊于《山花》第9期。

2月20—28日 受邀参加陕西省小说、“三史”（家史、村史、厂史）和连环画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会上第一次见到柳青。

2月27日下午，柳青讲话。这是柳青“文革”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讲话内容后刊于1979年《延河》第6期上，题为《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次座谈会，也是一次改稿会，会议持续了一周。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人多次到会做了辅导讲话。陈忠实也受邀参会。

2月 给刘凤梅去信索要高考资料，准备考大学。刘凤梅给路遥邮寄了一摞学习资料。

5月23日 短篇小说《基石》刊登于《山花》第15期。

6月 在延川县参加了延川县文教局招生办公室组织的大专院校学员选拔“文化考察”考试。

7月3日 向刘家圪崂大队递上了《入学申请书》。（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大队党支部：

为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提高专业知识，做又红又专的革命

战士，特向组织申请报考入学。

如果党让我入学，就决心在学校为革命努力奋发学习，争取优异成绩；如果党让我继续留在农村，就一定安心扎根农村，为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而不懈地奋斗。作为党的一员，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亲爱的党，在留与走的问题上，党怎样安排，我就按党的安排办，而且要办好。

附自传一份。

王路遥

1973.7.3

7月5日 延川县刘家圪崂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召开会议，讨论路遥报考入学问题。（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1973年7月5日晚上，我刘家圪崂大队全体社员讨论了王路遥同志报考入学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

王路遥同志返乡以来，认真刻苦地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敢于和阶级敌人做斗争。热爱集体，爱护公共财产，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勇于自我批评在劳动中能吃苦，不怕苦，不怕累，从不叫苦，锻炼的很好。

所以全体社员一致推荐王路遥报考大学。大队支部、革委会根据全体动员的讨论意见，研究决定推荐王路遥同志参加报考。

刘家圪崂大队党支部革委会

1973.7.5

7月10日 延川县城关公社与刘家圪崂大队在路遥的《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并盖上了大红公章。（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路遥在《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的“你对上大学的认识和态度”一栏里写道：

社会主义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又红又专的人才的学校。工农兵上大学是国家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的胜利。如果革命事业和党需要自己上大学，就决心在学校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为我们的国家争气，为我们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争取政治思想和事业知识双丰收，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如果党需要自己继续留在农村，就安心农村、扎根山区。为改变这里的面貌而苦干、实干一辈子。

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另外，在“本人志愿学习的学校和专业”一栏里写下：

- 1.北京大学哲学系
- 2.西北大学中文系
- 3.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同月 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发表于《陕西文艺》[\[1\]](#)创刊号。

7月16日 短篇小说《代理队长》刊于《山花》第15期。

7月24—25日 在延川县延川中学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本次考试考生近1000多名，北京知青占了很大的比例。按照规定，试卷不署名，只写编号。路遥试卷编号为“133”。

考试试卷由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安排审阅。路遥的语文政治试卷所写的批判文章标题是《我从实践中获得了真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天才论”》。这篇批判文章提供的“靶子”同样是一封信，以写给“远方的朋友”的书信体结构作为撰写批判文章的“靶子”。文章中，虽然充满了当时常用的大批判术语，而且引经据典摘录毛主席语录，但行文中，路遥主要叙述的是自他返乡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初始阶段的过程。

在理化试卷的卷面上，路遥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7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阅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

路遥“干部档案袋”中的“1973年高等院校招生文化考查成绩登记表”，记录了这次考试的成绩：语政83分；数学22分；理化30分；平均45分。

8月1日 被选送北京师范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未果。

时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均在延川招生。延川县文教局的工作人员把路遥发表的作品呈上，北师大招生老师开始十分满意，可是提到审查简历时却直摇头，因为造反派在当时是个大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招生人员了解到情况后，也坚决不要，说：“我们学校是培养教师的，路遥应该上综合大学。就这样，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均公开拒绝录取路遥。因为路遥上学的问题，林达直接向县委反映，时任县革委会主任的申易^[2]给予路遥大力的支持和扶植。之后，申易找他的堂弟申沛昌，详细介绍了路遥情况，希望延安大学能收下路遥。

8月20日 被延安大学录取。

经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研究，在路遥的《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上盖上了红印章并签署“同意上延安大学”。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走出了他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为此，延川县委和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尤其是时任县委书记的申易。延川县文教局长领着招办干部，带上一叠《山花》杂志，与延安大学招生的同志恳谈，延安大学也有顾虑。后来延川县委书记申易三次乘专车出入延安大学。最终，延安大学中文系的申沛昌向中文系主要领导郭玉宝和学校领导张逊斌作了报告，建议录取路遥到中文系上学。这样，路遥才被录取到延安大学中文系。

9月1日 《前程多辉煌》（歌词）刊于《山花》第21期。

9月5日 陕西省文化局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地（市）县专业和业余作者150余人出席了会议。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到会讲话，鱼讯做了报告。

9月7日 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路遥大学同学王志强回忆：“1973年8月，我们接到延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通知要求新生于9月下旬某日报到。然而不几天，学校又发来电报，说中文系有紧急任务，要我们提前于9月1日报到。那时我们都急切地按时报了到，领到的‘紧急任务’便是诗集《延安颂》的编辑工作。当时省上要求延大中文系出版歌颂延安的诗集，我们中73级全班同学参加了选编工作。王路遥同学比我们迟报到一个星期。”（王志强《路遥的大学生活》）

路遥的另一位同学白正明回忆：“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的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全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的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王路遥同学。”（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

当时，申沛昌任延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路遥进校不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他钻进阅览室，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全部的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

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路遥曾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

路遥上学期间，林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当时每月挣38元钱，除了自己的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外，大部分无私地支援给了她的恋人。林达当时在延川县委通讯组工作，是曹谷溪手下的一位“笔杆子”，属于人才，无论在领导还是群众中都有很好的口碑，以她的才气和表现，上大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礼服，吃“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加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人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

10月 开始参与诗歌集《延安颂》^[3]的编辑工作。

据路遥的大学同学王志强回忆：“我们中73级全班同学参加了选编工作。王路遥同学比我们迟报道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录取‘政审’上有争议。到校后，他迅速和我们一起进入校图书馆和资料室，搜集有关歌颂延安和毛主席的诗歌、诗词。路遥翻阅资

料很投入，且速度快，质量高。在讨论定稿的过程中，他的见解独到，选篇准确，在我们搜集到的千余首诗作中，他推荐的曹谷溪《撅头歌》顺利入选，随之他受到老师的关注。”（王志强《路遥的大学生活》）

11月30日《人民日报》第4版《繁荣群众革命文艺创作 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一文中提到了延川的文艺创作：

据新华社西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陕西省延川县积极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现在，全县十五个公社都有了业余创作小组。近两年来，业余文艺作者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配合中心工作，创作了六千多件诗歌、新秧歌词、小说、报告文学、革命故事、歌剧、歌曲和美术作品等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其中，有一百多件已在地方报纸和省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去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这个县工农兵作者的诗集《延安山花》，受到读者的欢迎。

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在领导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中，十分重视对业余作者进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教育，使他们自觉地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农村的文艺阵地。有一段时间，业余作者们发现有的坏人利用秧歌词宣扬封、资、修毒素来腐蚀群众，他们就纷纷拿起笔来，大力创作革命的文艺作品，同阶级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个县的业余文艺作者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开展文艺创作活动。

延川县采用开经验交流会、带徒弟等办法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文艺创作骨干。县里还办了不定期出版的小报《山花》，为业余

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全县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的繁荣，不仅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对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也起了推动作用。

11月 诗歌《歌儿伴着车轮飞》（与曹谷溪合作）发表于《陕西文艺》1973年11月号（总第3期）。同期还发表了陈忠实的《接班以后》、邹志安的《流水欢歌》，这是两人在《陕西文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本月 延安大学中文系七三级进行了班干部的正式选举，路遥全票当选为班长。

12月 参加延安大学“庆祝元旦文艺晚会”。学校举行“庆祝元旦文艺晚会”，要求各个班级都要出演节目。路遥延大同学王志强回忆：延大当年只设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系，四个系各招了一个班。学校下达演出任务，各班迅速行动准备节目。中文系是学校当时唯一的文科班。接到任务后，先找到一首女声独唱的歌谱——《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刘成章作词，王健民作曲），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王广彦用钢版刻印出来，然而女同学却没人敢承担独唱演出，张子刚承担了《回延安》的男声独唱，但演出时间太短。情急之下，时任班长的路遥毅然决定：“自己创作歌曲，全班同学集体演唱。”于是他找来白正明和许卫卫两位同学，开始创作。经过半周的艰苦创作，朗诵词和歌词写了出来——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征求同学意见后，路遥拿上底稿，亲自找他认识的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组歌”共分四部分，

分别谱了四首曲。第一部分：《我们生活在杨家岭》；第二部分：《抗大的旗帜永鲜红》；第三部分：《延水朗朗星满天》；第四部分：《青春的火焰多灿烂》。“组歌”的最后署名是“延大中文系集体作词，丁永光作曲”；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实际上“组歌”由路遥执笔主创。（王志强《我们生活在杨家岭》）

本月 歌曲《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收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歌曲选（第六集）》。该曲由路遥作词、朱加农作曲，歌词全文如下：

清格朗朗（的）流水（哎呀）幸福渠里来，渠水欢腾浪花
开。哟。喝一口渠水心里甜哟，激情（哟）滚滚（哟）满胸怀。

清格朗朗（的）流水（哎呀）幸福渠里来，渠水欢腾浪花
开。哟。幸福不忘引水人哟，毛主席的恩情（哟）传万代！毛主席的恩情传万代。

当年大生产，红旗迎风摆，毛主席挥镢头和我们把渠开。镢
头劈开千重山，幸福渠水哟滚滚来，滚滚来。

幸福渠水来，红花遍地开，延安精神谱新篇，处处有大寨。
幸福渠水流不断，毛主席的光辉照心怀，毛主席的光辉照心怀，
照心怀。

本年 就读延安大学中文系。大学恢复招生不久，校园里的纪律比较宽松：允许抽烟，允许打瞌睡，允许学生因为觉得老师讲得不怎么样而离课。所以有时候，上课铃响了，同学们纷纷去上课，路遥就猫着腰，怀揣着书从教室楼下一晃一晃地走出校门，或许是钻到杨家岭哪个理想的旮旯，或许是到校门前菜地

埂下的延河滩，一直看书到开饭前返回。有时候，老师在讲台上正讲着课，他趴在桌上漫不经心地听着听着，就会发出熟睡的鼾声。讲义发下来，同桌给他放进抽屉，他不仅不整理不阅读，急用时，抓出来捏成一团就跑进厕所……（王志强《路遥的大学生活》）

【注释】

[1] 《陕西文艺》，即《延河》在“文革”期间的改刊版，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创刊号还同期刊发了陈忠实的散文《水库情深》。

[2] 申易（1923—2011），陕西榆林人，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任延川县委书记期间，申易非常重视知青工作，当时，从延川县知青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代表，如赤脚医生孙立哲等人。1973年，申易力荐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3] （《〈延安颂〉后记》）中曾对该诗集内容做过简要概括：“诗集分两组，一组是通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歌颂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实践；一组着重从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角度，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延安精神。”

|| 1974年（甲寅） 25岁

1月10日 陈忠实到延安市南泥湾“五七”干校报到，以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到延安南泥湾学习锻炼，为该校第八期学员。6月底学习结束，陈忠实在南泥湾五七干校桃宝峪写成短篇小说《高家兄弟》，刊发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9月出刊）。（邢小利《陈忠实集外集·陈忠实年谱初编》）

1月18日 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1月24至25日 江青等人未经中央允许，在北京召开驻京部队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5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6月 西北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编的《陕西文学新作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9日 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李若冰在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并兼任中共礼泉县委副书记职务。

8月 北京插队知青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建成本县第一口沼气池。

9月 《理想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理想之歌》全诗共4节，540行，3758个字。四位作者全是1972年入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陶正（陕北延川县插队知青）、高红十（陕北延安南泥湾插队知青）、张祥茂（内蒙古丰镇县插队知青）、于卓（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知青）。

10月22日 北京市慰问知识青年代表团来延安慰问。

2月10日 《今日毛乌素》刊于延川《山花》第27期。

2月 主编班级油印诗集《烈火熊熊》出版。《烈火熊熊》收录了全班同学的43首诗，其中包括路遥与张子刚、许卫卫、白正明三人合作的230多行的诗歌《烈火熊熊》及路遥的诗歌《爆破手》。（王志强《路遥的大学生活》）

3月 《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增订再版。增订再版的《延安山花》增加了新诗九首，其中署名为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是九首中的一首。增订本的《延安山花》共收录路遥作品七首（含与曹谷溪合作创作的两首）。《延安山花》经重新装帧设计，放开开本，还增加了彩色插页，并通过香港三联书店向国外发行。《延安山花》包括第一版，先后进行过三次印刷，国内发行28.8万册。日本学者安本实来延安搜集有关路遥的研究资料时，曾对曹谷溪说：“他最早知道曹谷溪与路遥的名字是1974年，那时的日本，除了能看到几个样板戏剧本以外，还能看到的就是诗集《延安山花》。”

春 应上级安排，与大学同学徐来见到延川打前站联系，辅导农村学习中央文件。

6月8日 《工农兵奋勇打先锋》（歌词）刊于《山花》第31期。

6月 在西安西大街的省文化局招待所，参加陕西省文化局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柳青、陈忠实等参会。

“我和路遥都是与会代表。会议在西安市西大街省文化局招待所举行，代表们也都住在招待所的几排平房和处于后院的唯一的一座二层楼房里。一日晚上，经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的常曾刚介绍，认识了路遥。第一次见面，竟向我谈了许多有关他自己的创作构想，还极力向我推荐他刚刚读罢并非常倾心的一部名为《红字》的长篇小说，说它‘很深刻，非常动人’，建议我一定要读一读。”（党永庵《我记忆中的路遥》）

7月 与金谷合写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红卫兵之歌》，发表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4期。

全诗分为六节，包括鹰击长空、洪流滚滚、峥嵘岁月、阳光灿烂、红旗在前、青春似火，长达580行，该诗为红卫兵高唱赞歌，其气魄可与名重一时的《理想之歌》相媲美。

8月16日 由路遥作词、张秦祥作曲的一版《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收入由西安市碑林区文化馆编的《碑林新歌选·1》。

9月 散文《银花灿灿》刊于1974年《陕西文艺》第5期。

10月下旬 赴西安参加《陕西文艺》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开始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路遥结识了在西安仪表厂工作的陕北籍青年诗人申晓，结识了曾在黄陵插队后参军入伍的北京知青叶咏梅，还结识了正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上学的青年作家白描，以及正在秦岭深处一家工厂的青年诗人叶延滨。

12月中旬 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学工半个月，元旦前返校。

冬 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协助小说组看稿。当时的《陕西文艺》编辑部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接受文学的基本训练与熏陶，培养提高青年作者的写作水平。

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回忆：“我下放在秦岭深处的汉中，当时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作为《陕西文艺》的实习生，翻过崇山峻岭来组稿。在三天时间里看了我的一部长篇初稿《居娣》，要选摘几章给杂志。说这几年来没有人写长篇，杂志刚办，挺需要。我说我是不能发表文章之人，写这部东西只是多年苍白乏味生活的一种自娱，从来没有想到要发表它。他为此说了很多仗义的话，很是激愤。我当时想，他到底还年轻，又写诗，才有这样可爱的纯直。后来才知

道，二十刚出头的路遥已经见过大的风雨，为我说的许多话其实是他自己在坎坷中的人生体味，便生出几分敬重。”（肖云儒《路遥记忆》）

本年 就读延安大学中文系。路遥在大二期间，多次邀请省内有影响的作家与诗人给全班做报告，以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在那个知识匮乏的特殊年代里，延安大学中文系七三级同学在班长路遥的精心组织下，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文学盛宴。

|| 1975年（乙卯） 26岁

1月8至10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月21日 陕西省革委会文教办批复省文化局，同意出版发行《群众艺术》。

5月16日 陕西省第三次革命故事创作调研会在延安举行。

7月 毛泽东同志在两次谈话中谈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认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9月 贾平凹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三年，他在各类报刊发表纯文学作品25篇。经过有关文艺部门的竭力争取，经过出版社编辑邢良俊等人的努力疏通，贾平凹没有回到他的商洛山区，留在了西安市，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工作，职务是助理编辑。时年23岁，每月工资三十九块半。（孙见喜《鬼才贾平凹》）

12月 《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署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学批判组”。从此，全国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本年 陈忠实被任命为公社副书记，发表短篇小说《公社书记》、特写《铁锁——农村生活速写》。

同年 曹谷溪被调到延安地区委员会通讯组而离开延川。

2月12日 林达与好友邢仪^[1]、吴伯梅在延川路遥养父母家过年。

邢仪回忆：“1975年大年初二，我和吴伯梅来这里过年，路遥、林达和我们坐在炕上玩扑克，老人忙前忙后，为我们摆了一炕席的吃食，满窑都是我们四个人的笑闹声，那时这个家里多有生气、多开心啊……”（白描《为路遥母亲画像》）

2月 散文《灯火闪闪》刊于1975年《陕西文艺》第1期。

5月 主编的革命诗集《延安颂》完稿。

夏 赴《榆林报》报社，进行写作实习。

“中文系组织我班教学实习，分两个组，任课老师带领多数同学南下宝鸡秦川机床厂，路遥与同学张子刚等7人小组北上榆林报社，进行写作实习。他一边采写稿件，一边参加社会活动，他还组成7人男声小合唱团，在榆林参加演出；期间，去吴堡采访，主编了《吴堡新民歌选》。”（王志强《同窗轶事祭路遥》）

7月13日 与赴榆林实习的同学合影留念。

7月 去延安革命纪念馆与刘凤梅见面。此时，刘凤梅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分回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

8月 与林达赴福建。“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校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是用文学家的激情，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申沛昌《十五年后忆路遥》）

10月1日 以实习生身份参加《陕西文艺》编辑部举行的国庆会餐。李若冰到会，与青年作者恳谈：“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主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

10月 散文《不冻结的土地》刊于1975年《陕西文艺》第5期。

11月12—23日 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在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召开的全省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组织统一改稿。王汶石、陈忠实、李小巴等人分别做报告。据参会的王蓬回忆：“后来成为‘陕军’主力的作家几乎都参加了那次会议。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京夫、李凤杰、晓雷等有上百人。”“路遥当时正在延安大学读书，工农兵大学生开门办学，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当见习编辑。我因为已经读过他写的《优胜红旗》，知道他，况且他现在又当编辑，在我心中有种神圣感。”（王蓬《初识路遥》）

清涧籍作家朱合作回忆：“1975年11月中旬省上召开了一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已经开始好几天了，当时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路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竟还没有来。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在全省的文学作者队伍中，数一数二的就是陈忠实和路遥。因此路遥的迟到，自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路遥终于来了。于是，我便跑去看路遥。路遥站在楼道里，身上穿着一件黄大衣。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穿棉袄，他说他没棉袄。那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大都是只有棉袄，没有大衣，可路遥却是只有大衣没棉袄，有一点特别。因此，多少年后，我都能回忆起那个穿着黄大衣，站在楼道里的路遥来。”（朱合作《本色路遥》）

12月回到学校不久接到《陕西文艺》董墨（董得理）的信件，说陕北的吴堡县被树为学大寨先进县，《陕西文艺》将派他和作家李小巴（李知）一起去吴堡采访，他们想约路遥一起去，因为路遥之前和延大中文系同学到吴堡搜集过民歌。路遥当即回信，说在吴堡见。在吴堡会面以后便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董墨和李小巴建议路遥，把吴堡川口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写一篇散文。短短两天时间，路遥就拿出了初稿，董墨和李小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第二天下午，路遥就拿出了修改稿，他们看了十分满意。二人回到西安后，分别写了一些段落，连同路遥写的那部分，组合成一篇三万多字的访问式散文《吴堡行》，刊登在《陕西文艺》1976年第1期上。后来，这篇散文被北

京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刊载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

董墨回忆：“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部让他到关中和陕北去组稿，四年后，他还根据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写了几篇散文。”（董墨《灿烂而短促地闪耀——痛悼路遥》）

本年 在《陕西文艺》编辑部担任见习编辑。《陕西文艺》编辑部为文学新人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此举既为刊物版面服务，又为陕西文学新人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机制。

“路遥在编辑部实习期间，最作难的是星期天，没地方吃饭。招待所有食堂，但饭菜贵，又不合他口味。我们局机关食堂还可以，饭菜也不算太贵，另外，我经常有些误餐补助。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就叫他到我局里来吃饭，一般都是一人一个菜，两个馒头，再加一块粗粮发糕。有一次，我的细粮饭票用完了，买了四块发糕。路遥吃了几口说：‘怎么还甜甜的，比老家的发糕好吃。’我说：‘好什么？是人家放了些糖精，你肚子饿了，吃什么都是香的。’”（王作人《难忘路遥》）

【注释】

[1] 邢仪（1951—），生于北京，1969年延安插队。邢仪在离开陕北的数十年间，曾多次回陕北写生，1997年专程为已故作家路遥的

母亲画像。

|| 1976年（丙辰） 27岁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1月 《诗刊》《人民文学》复刊。

3月下旬 《舞蹈》《人民戏剧》《美术》《人民电影》《人民音乐》相继复刊。

4月5日 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写下大量怀念周恩来的诗歌。

7月6日 朱德逝世。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四人帮”被粉碎。

本年 陈忠实发表小说《无畏》。[\[1\]](#)

小说《接班以后》被改编成电影《渭水新歌》，于1977年在全国放映。

1月 周恩来逝世后，路遥作为班长，组织全班捐款，扯黑布做黑纱，每个同学都戴纱三天。

2月 散文《吴堡行》刊于1976年《陕西文艺》第1期。

本月 《延安颂》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4月 短篇小说《父子俩》刊于1976年《陕西文艺》第2期。

初夏 经过认真准备，用了四节课的时间，给同学做了题为《浅谈散文创作》的讲座。

“写作材料的积累就像做豆腐一样，富人家里的黑豆一瓮一瓮，满满当当，豆腐做出一锅又一锅；穷人家里的黑豆一升一升地量，空空荡荡，豆腐只做一锅豆子倒没了，就又要出去找……”据同学王志强回忆，路遥讲座时，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和几门大炮，用几门大炮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一架飞机的形象比喻，阐述“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特点。（王志强《路遥的大学生活》）

5月29日 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二队，参加北京知青丁爱笛与延川姑娘张海娥婚礼。

陈幼民回忆：“我跑去凑热闹，又见到了路遥，还有他的夫人——北京知青林达。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要尽地主之谊，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兴致颇高，谈笑风生，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自告奋勇地写对联，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陈幼民《忆路遥》）

7月17日 照毕业留念照。

7月 在毕业生登记和鉴定表“自我思想总结”一栏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学习：

三年来，自己对各项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通过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教育革命和开门办学，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这个出身好，但少年时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的人，又紧紧地投靠在了人民的怀抱，一步步明白了自己肩负着阶级的重担，力争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进行决裂，为共产主义大目标尽力作战。在正确的思想认识指导下，自己专业学习的态度也基本上是端正的，也是刻苦的。三年收获不少，但也深感不足，主要是对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还抓得不够紧。有决心在今后的生活上进步。认真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旧事物无情的掘墓人，做新事物勇敢的开拓者，跟着党和毛主席，永远革命，永远前进。

8月2日 毕业时，延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在路遥的毕业档案里写下鉴定，其中一条认为其“生活较散漫”。

8月 大学毕业。因为文学成绩突出，学校准备安排路遥留校任教；后被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担任文学编辑。

9月8日 应延川县“知青办”之邀主编《山花朵朵》。

9月10日 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电话立即从延川返回到西安。

9月13日 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正式给陕西省文化局发去《关于延安大学应届毕业生王路遥同志分配问

题的复函》，同意分配路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9月中下旬 路遥正式进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担任小说组初审编辑。当时的《陕西文艺》编辑部仍在东木头市172号。

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布时，路遥正在延安组稿，恰遇已调回咸阳的闻频。他与闻频赶到延安城东关的曹谷溪家里，向曹谷溪报告这一特大喜讯。他敲开曹谷溪的家门，激动地叉开两臂，有力地举过头顶，挥动着拳头吼叫着：“谷溪，人民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情绪激动的曹谷溪拿出一瓶白酒，与这两位“老战友”一同庆贺。平日里路遥不大喝酒，但那天晚上与曹谷溪和闻频却喝干了一瓶酒。（厚夫《路遥传》）

12月30日 给海波写信，问及海波近况。

【注释】

[1] “四人帮”被打倒后，陈忠实曾因此小说接受审查。

|| 1977年（丁巳） 28岁

1月 《陕西文艺》改为月刊。本年度共出了12期，其中10月、11月为合刊。

4月5日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召开“工业学大庆”音乐、曲艺、故事创作座谈会，107名工农兵业余文艺作者和部分专业作者参加了会议。会后组织了“工业学大庆”音乐会。

5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三突出”》一文。

6月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月，贾平凹的第一本著作《兵娃》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7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同月 柳青由北京返回西安，仍住在长安县韦曲干休所里，继续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

同月 《延河》月刊恢复刊名，王丕祥仍担任主编，至1984年。

8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会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9月13日 杜鹏程在《陕西日报》发表《难忘的关怀——回忆毛主席接见知识分子的一次盛会》。《人民文学》九月号也同期发表该文。

10月31日 陕西省委召开的全省文艺创作会议在西安开幕。会议历时13天，约1300人出席开幕式，其中会议代表572名。柳青为本次会议代表，但因病未能参会，抱病学习会议文件、简报后，完成《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一文。该文后刊于《延河》第12期，同期刊出的文章还有王汶石的《继续努力写好英雄》、杜鹏程的《漫谈深入群众》和李若冰的《作家战士》。

10月 柳青下肢严重浮肿，又一次住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同月 《延河》10、11月合刊刊出杜鹏程的小说《历史的脚步声》、邹志安的小说《杨柳青》，陈忠实的散文《雹灾之后》等。

11月20日 《人民日报》邀请文艺界人士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1月 《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

同月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12月28日 《人民文学》邀请在京文学工作者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月2日 《延河》编辑部邀请作家、文艺工作者举行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愤怒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到会的有胡采、王汶石、杜鹏程、常增刚、李若冰、畅广元、董乃斌、费秉勋、程海、邹志安、王晓新等。会议由《延河》负责人王丕祥主持。

12月14日 贾平凹完成短篇小说《满月儿》。

12月 杜鹏程修订整理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其中包含短篇小说集《年青的朋友》（1962

年出版)、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1958年出版两辑)。其中《年青的朋友》收入《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十一篇短篇小说。

1月 与曹谷溪合作创作《难忘的24小时——追忆周总理1973年在延安》，刊于《陕西文艺》1977年第1期。这篇纪实散文深情地回忆了周总理1973年6月回延安的情景，散文发表后，引来诸多赞誉。

3月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省短篇小说座谈会，陈忠实、贾平凹、王蓬、京夫、莫伸、李凤杰、徐岳、邹志安、王晓新等人也到会座谈。

4月6日 给海波复信，谈到自己工作很忙，创作暂时被中断。“你在那里还觉得不错，那就行了，反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还是要自己严要求自己，不要虚度光阴，只要努力，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希望你能写封长信告诉我农村目前的真实情况。”

8月30日 给海波复信。希望海波写一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而不是赶时势，要研究生活，反映生活本质，然后得出结论。“揪出‘四人帮’人心大快，首先是认识到这是思想上解放了人民，你在农村时间长，请朴朴实实地写一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要赶时势，胡凑一篇，以‘繁荣文艺创作’。要研究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以前关于创作上的一些框框完全可以打破，从研究生活起，然后得出结论。”

11月11日 于西安完成《不会作诗的人》。

12月4日 给海波写信。

12月16日 省故事调讲会在汉中召开，去汉中组稿，与王蓬畅谈。

据王蓬回忆：“路遥那时已大学毕业，正式调进了已经恢复的《延河》编辑部，来汉中组稿，在会上找我。我与路遥已经见过面，有过交往，就很自然地接触较多。

也就是那次，路遥对我说，上次去省城开会，他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再一看模样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就有种天然的同情和好感，就本能地想帮一把。他说他家在比陕南农村更贫穷更严酷的陕北农村，曾经连我那种带补丁的裤子也穿不上，饿饭更是常有的事。

尽管他没有讲更详尽的情景，我顿时感到拉近了距离，有了一种天然相通的东西。我对他支持帮助我作品上《延河》有了种透彻的理解。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富于同情心。善良和宽厚绝对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那绝对是一个人血缘环境、生活经历形成的，融进骨髓里的东西。”（王蓬《初识路遥》）

|| 1978年（戊午） 29岁

1月 莫伸的小说《窗口》发表。后获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月至3月 《延河》连载《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第14至17章。

2月 《延河》刊出《迎接百花争艳的春天》，《延河》《群众艺术》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3月 贾平凹的小说《满月儿》刊登于《上海文艺》1978年第3期。这是他在礼泉县写社史时积累的素材，两个主人公就是烽火大队农技站的一对姐妹。

3月28日至4月5日 《延河》编辑部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胡采发言，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西北大学付庚生、陕西师范大学李玉岐做了专题发言。

4月3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成立，筹备小组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胡采任组长。

4月 文化部举行万人大会，为“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

5月1日 《延河》编辑部邀请部分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50多人，分别就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西安分会生活，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5月6日 柳青由西安动身去北京治病。

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人民日报》转载，全国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 柳青小说《狠透铁——一九五七年纪事》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版发行。

5月27日至6月5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乌兰夫代表中央到会讲话，会议由张光年、冯牧主持，茅盾致开幕词，郭沫若发表书面发言，周扬、巴金、夏衍等出席大会并讲话。

6月13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柳青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在北京、西安先后举行追悼会。

7月15日 《文艺报》正式复刊。

7月 陈忠实申请调动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

8月11日 《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8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9月 《文艺报》召开会议讨论《班主任》《伤痕》等短篇小说。

9月16日至23日 《延河》编辑部召开文艺评论工作者座谈会，展开有关《伤痕》题材、人物以及悲剧问题的讨论。《延河》负责人王丕祥主持，胡采、王文石、杜鹏程与会发言。

10月2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行会议通过发展新会员。

10月26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10月 《延河》十月号开始连载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下卷）遗稿，至1979年3月号结束。

同月 陈忠实调入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任副馆长。同时，在《西安晚报》发表报告文学《忠诚》。

11月15日 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印发中央宣传部《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意见（草案）》，要求认真组织全体文艺工作者学习、讨论和试行。

11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光年的文章《驳“文艺黑线”论》一文。

12月5日 《文艺报》《文学评论》在京召开座谈会，突出要重新评价作品和作者，为错批作品、作者平反，其中包括杜鹏程及其长篇小说《保卫延安》。

12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为胡采、柯仲平、马健翎、石鲁等人平反，并决定恢复柯仲平“革命烈士”称号，将其骨灰移回烈士陵园。

12月18至22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12月20日 胡采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郑伯奇、王文石、杜鹏程、傅庚生任副主席，李若冰任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丕祥任《延河》杂志主编。

12月25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举行座谈会，为杜鹏程及其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平反。

12月 陈忠实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南北寨》。

同月 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 文联各协会成立专案复查小组，对1957年至1958年间被错划为“右派”的文艺工作者给予重新评价。

1月25日 与林达在延川举行了婚礼。路遥的婚房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林达的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就是他们所有的新婚家当。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描述爱情：“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

林达的好友邢仪回忆：“林达是我的中学同学，一同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路遥是本地回乡青年，后来因为《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著名。他们恋爱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林达路遥终于结婚了，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号。由于路遥在县里的知名度，轰动了上百人来送礼。那几天，布置洞房的，筹备婚宴的，出出进进，真个忙乎。婚礼约定在晚六点举行，人们陆陆续续来了，宣传部的贺陞站在门口招呼着。路遥来了，林达拖了半小时才到，她穿着件紫红色的棉袄罩衫，翻出浅色的内衣领子，李彦、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馆的张仁钟担任司仪，两位新人坐在事先布置好的讲台前。先由县文化教育局局长赵如彬给两位新

人佩戴红花。贺陞代表宣传部讲话，李世旺（海波——引者注）代表来宾发言，最后是路遥代表林达讲话。有人提议：路遥唱歌林达作诗。路遥穿着件略肥大的新蓝布制服，头发是刚刚理的，有些土气，但精神焕发。林达和路遥站在一起，显得脸色苍白，他们坐在众人面前挺不自在。简单走了这么几个过场，便开始进入宴席，新郎新娘给各桌斟酒，一个小时以后有人开始走了。经多方筹备，多日操办的婚礼就这么没有悬念地结束了。”（邢仪：《知青·陕北 速写集》）

本月 短篇小说《不会作诗的人》刊于《延河》1978年第1期。

2月 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开始在《延河》连载，路遥担任责任编辑。

路遥曾问过柳青，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却把创作放在关中平原？柳青说：“原因非常复杂，我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该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

3月15至25日 参加《延河》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是《延河》复刊后召开的首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人员有胡采、王汶石、杜鹏程、余念、贺抒玉、董得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王蓬、京夫、莫伸、李凤杰、徐岳、邹志安、王晓新等专业作家、评论家及骨干作者。3月20日，柳青躺在病床上，做了一次题为《生活是创作的基础》的录音讲话。《延河》1978年第5期刊出短篇小说座谈会会议纪要《探讨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柳青的《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6月为悼念柳青，写作《柳青的遗产》一文。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当中，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无疑对路遥的小说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都出生在陕北这块辽阔的黄土高原，成名于西安，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他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路遥把柳青称为“我的文学教父”。在路遥心目中，柳青是他在做人和创作上的可见、可触、可亲、可爱的楷模，是他的精神导师。路遥曾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写道：“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路遥曾多次提到，在其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中，翻阅《创业史》的次数是最多的，从中不难看出路遥对《创业史》的重视。

9月完成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初稿于西安。

《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写的是在“文革”“武斗”期间，被造反派“关押”的县委书记马

延雄，为了避免两派大规模“武斗”而勇敢献身的故事，它是路遥有在“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得心应手。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的抒情路子，而是“着眼点就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这说明路遥对文艺政策走向的认识和基本判断，不能不说它具有思维的前瞻性。

12月18日 参加袁银波的婚礼。据袁银波回忆：“省中国作家协会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就连平时极少在这种场合露面的路遥也不例外。”（袁银波《相识在〈延河〉编辑部》）袁银波因是十平方米的陋室作新房，屋子里一贫如洗，感到很是没有面子，路遥安慰他：“不能和人家比，咱农村娃，在城里安个家，可真是不容易！”

冬 煤气中毒。后被编辑部同事及时发现并抢救，才幸免于难。路遥晚上写东西睡得太晚，天快亮时觉得头晕，想爬起来，竟不由自主地滚到床下。人虽然爬到门口，却无力站起来开门，也喊不出声来，就那么晕了过去。大家后来仔细检查，原来是这间斗室的烟囱铁锈堵了炉子，导致中毒。

|| 1979年（己未）30岁

1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为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及作者杜鹏程平反，恢复名誉。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于15日联合召集座谈会，宣布省委决定，为作家杜鹏程平反、恢复名誉。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负责人胡采作了《为〈保卫延安〉平反昭雪》的讲话。杜鹏程作了《为战士歌唱，为英雄树碑》的发言。

1月25日 作家、戏剧家郑伯奇（1895—1979）病逝。

1月29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1月 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名农民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开始了“大包干”。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由此开始新的变革。

同月 《收获》《民间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创作》《大众电影》《曲艺》先后复刊。

同月 由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编印的内部交流文艺刊物《山丹丹》创刊。

2月1日 柳青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在《人民日报》发表。

2月6至13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讨论了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小说创作的种种问题，例如文艺与生活的问题、悲剧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两结合”创作方法问题等等。茅盾、周扬、陈荒煤、冯牧、严文井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2月 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文。同月，《海瑞罢官》重新上演。

3月26日 1987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陕西有两篇获奖作品，一篇是贾平凹的《满月儿》，另一篇是莫伸的《窗口》。这是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为鲁迅文学奖前身。

4月 文学刊物《花城》在广州创刊。同月，《读书》杂志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署名李洪林。随即《读书》杂志声名大噪，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刊物。

5月7日 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提出：“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

5月24至29日 《延河》编辑部召集了小说、诗歌作者六十余人，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式和有关文艺理论和创作的一些问题。

5月29日至6月8日 “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着重讨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6月3日 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发表于《陕西日报》，随即先后被《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转载，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6月 《花城》（双月刊）创刊，该杂志由广东花城出版社主办。

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在北京创刊。本月，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丁长上任记》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七期。

10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了首期读书会，至12月25日结束，吸收会员，提倡以自觉读书为主，兼顾创作，以达到提高创作水平、出人才、出作品的目的，参加者有陈忠实、京夫、王蓬等10人。

10月30日—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辞：“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茅盾致开幕词，周扬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会议还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成就。杜鹏程出席会议并当选文联委员。

10月 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11月 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杜鹏程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2月 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在《红岩》杂志第2期，后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本年 《延河》杂志以新的面目出现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现实主义的研讨和对当时文学形式的分析，给作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本年 曹谷溪从延安报社调入地区创作研究室，开始编办《延安文学》；闻频从咸阳国棉一厂调到《延河》编辑部任诗歌编辑，与路遥成为同事；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集《早晨的歌》《山地笔记》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月 短篇小说《在新生活面前》刊于《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

2月21至27日 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在西安市和平门外的胜利饭店召开，代表共有83人。王汶石、杜鹏程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胡采做了题为《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书记李尔重接见全体代表，并发表了讲话。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理事29名以及王汶石、王丕祥、王绳武、杜鹏程、李若冰、胡采、张光、贺鸿钧、黄悌、寇效信、傅庚生、韩起祥、魏钢焰共13名常务理事。理事会选举胡采为主席。王汶石、傅庚生、杜鹏程、李若冰为副主席，秘书长由李若冰兼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后，机构设置办公室、会务工作室（后改名为创作联络部）、专业作家创作组和1977年7月原在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时即已恢复原刊名的《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

（《陕西省作家协会1954—1993年纪事》）

4月至5月 在西安完成小说《夏》。

5月23日 诗歌《今日毛乌素》刊于《山花》。

8月 完成小说《青松与小红花》于延安。

10月 短篇小说《夏》发表于《延河》1979年第10期。同期刊发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七爷》。

11月7日 给曹谷溪写信。

谷溪：

近好。

本来想给你挂个电话，但不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唱给彭老总的歌》一诗，经过我的一番努力，终于在12月号上用了，现已发稿。诗的挤压太大，很难挤上去，我通过主编室协调了一下，提前发了（本来安排在明年第一季度）。

天乐的事不知办得怎样，我极愿意知道较详细的情况。在去延安的时间上有一个在家乡分粮的问题。去延安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生活的安排能不能维生等等。以及能否较便利地出来，希望你把详细一点的情况告诉我一下。这是拜托于你，是极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你调动的情况怎样？也同样想知道的详细一些。

小蕾和闻频^[1]都不在，估计半个月以后他们都就回来了，你若抽出空，可来一趟西安。敬礼！

路遥

7/1111月9日 女儿路远出生。

女儿的名字——路远，取自路遥与程远（林达笔名）名字中的各一个字，以此来纪念他们的爱情。路

远是路遥的唯一孩子。很多年后，长大成人的路远改名为“路茗茗”，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出生于紧挨着作协大院的古旧的楼里。一两岁时开始在作协大院里生活。在作协附近的兴中小学读书，在26中上了半学期后，爸爸就去世了。妈妈是北京知青，随妈妈到了北京。妈妈下乡插队认识了父亲。”（心梦岭《寻找路遥女儿》）

12月4日 给海波复信。

波同志：

你好。

接你信后，碰巧尔雄开会来西安，走了一趟我这里，我当即就把你的问题提了出来。据他说，这次实在无法，因你不在“杠杠”里边。不过他答应在今后为你的事努力，请你以后多与他联系，我只要有机会，一定全力以赴帮助你，这点请你放心。

今有两事需要告诉你。第一件：我那不成器的弟弟四锤，经过一番相当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县农机局施工队上班了（新成立的，当然是交钱挣工分，现在永坪公社），他开推土机。据说农机局局长就是冯致胜，请你通过艳阳给她爸做点工作，请多关照他，不要中途打发了。（可对艳阳说，再让艳阳对她爸说：我认为她爸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我本人很佩服他；或者我对他希望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不必为过去的派性而影响——这点不一定明说。我出去一直说冯致胜的好话。）具体怎样做，视情况而定，你认为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做为好，由你看，相信你会在这个问题上（如出了麻烦）会起一点作用的。你是精人。

这一切太庸俗了，可为了生存，现实社会往往把人逼得在某些事上无耻起来。这是社会的悲剧，你自己也许体会更深。

第二件：我们这里鸡蛋已到一元钱五个的光景。想延川总会便宜一些，这是我的孩子的每天必需品，如你能设法再买一点捎来（当然越快越好），十分感谢。如有困难，也就算了。

刊物我每期都寄上，有时我不在，误了一期，也请你原谅。

请你给我回信。

（明年学习班我会给你争取的）

路遥

1979年12月4日

【注释】

[\[1\]](#) 小蕾，即晓雷。晓雷与闻频都是《延河》编辑，也是路遥与谷溪的共同朋友。晓雷早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工作，闻频早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川工作，两人均在新时期之初调入《延河》编辑部担任编辑。

|| 1980年（庚申） 31岁

1月 《延河》1980年第1期刊出10篇短篇小说，京夫的《手杖》、朱定的《娜达莎》、黄建国的《苦》、王蓬的《猎熊记》、李小巴的《正是早晨》、张虹的《野梅子》等。路遥担任王蓬的小说《猎熊记》等文章的责任编辑。其中，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本月 延安地区文联内部刊物《山丹丹》更名为《延安文学》。

4月9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二期读书会开始举办，参加读书的青年作家有14人。

5月 《中国青年》刊登了读者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6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

6月 张映文的短篇小说《扶我上战马的人》在《延河》1980年第6期发表，后获得全国首届儿童文学奖。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

10月7至13日 《延河》编辑部在户县召开小说、散文新作者座谈会，听取新作者们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和意见，对他们在生活、创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辅导性的意见。

11月9至13日 《延河》编辑部在临潼召开诗歌座谈会，王丕祥主持会议，老中青年诗作者二十余人参加，玉果、沙陵、毛漪、商子秦出席会议。

11月10日至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

12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笔耕”文学研究组，由胡采任顾问，王愚、肖云儒、蒙万夫任组长的“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旨在繁荣陕西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工作，促进文艺创作发展。成员包括刘建军、蒙万夫、薛瑞生、费秉勋、畅广元、肖云儒、胡义成、姚虹、李健民、文致和、陈贤仲、王愚、李星。

本年 贾平凹调离陕西人民出版社至西安市文联《长安》编辑部，并解决妻女的西安户口及工作，在文友张敏的帮助下，在北郊方新村租了两间房屋，这就是后来贾氏文中的静虚村。这一年，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集《野火集》《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同年 陈忠实《立身篇》获得首届“飞天”文学奖。

1月6日 出差坐飞机返回西安，给海波写信：“我元月六号回的西安，此次出去，走了不少地方，武汉、坐船下长江、上庐山、到武昌等，厦门完了，到上海，然后坐飞机回来，共有一月左右。”

1月17日 给海波复信。信中希望海波能多帮助下四锤，并且鼓励海波“不断完善自己的生活观”。

2月1日 给曹谷溪写信，谈及为弟弟天乐要招工指标一事。

谷溪：

来信已收读。关于我们之间那些扯淡事最好不费口舌了。你归根结底大概不会相信我是个魔鬼（由我和你的一贯关系为例）。请相信，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的时候，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正如人们各有各的生活风格。的确我对人的爱，有些时候是一种严酷的爱，主要是想通过这种爱增强被爱者本来的抵抗力，因为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知道，生活道路上的千辛万苦总得自己去克服。当然，如果在我看来我应当做的事一点也不会少，甚至比人们所想的还会多。我相信你会正确看待我的生活观的，我的历史对你是坦白的，并且将来会继续证明我自己的一切。

关于给史洁^[1]写信要招工指标一事，请你从我的角度考虑一下，的确有些难处。主要是离得远，不摸各方面情况，我怕弄不好会坏事，因为我和这个人的关系终究不是父子关系。当然，我要在延安，我就会拐弯抹角想办法向他提出的，可我过了春节无论如何走不脱，主要是孩子现在无法安置，我母亲一走，林达又没本事，娃娃也小，没办法离开。另外，我有点怕张史洁，因为我不知道你安的那个人是怎样向他提出的，你一直没有给我解释这件事，史洁在接受这个人的时候态度怎样？我不知道他心里是否怨我给他找了麻烦，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再马上写信问他要指标，会不会火上加油，弄得更糟糕呢？因为我以后还要和他打交道，我怕我在他心目中成了个厚脸皮的无赖。由于以上原因，我觉得在这事上神经有点脆弱你不知道。我和他交往的方式与你不同，我们之间的交往都掩饰自己，尽量都表现出一种在公众事务

中应该高尚的面目。因此，太过的行为在我们之间是极不合适的。我因之当时将此事全权交与你和他周旋，因为我觉得，你和他的交往不同，他可能习惯你这样提出问题，而不习惯我提出。请你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太了解张史洁这个人了，也太了解我们之间的微妙了。我最肯定，要是我直接提出（相隔时间这么短），他就会认为我是粗鲁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他面前提问题的方式，他根本不习惯这样。而你不同了，他敢和你坦率地做这种勾当。你不知道！他暗示要我依他为模特儿塑造一个高大的县委书记形象，他是不愿意让我直接看到他的这些不美气的做法的。因此，他就是愿意帮我的忙，也总是在我面前闪烁其词，这就是他为什么愿意接受你这个中间人了。谷溪，我的判断没错，请你全权设法解释这事吧，因为这中间反正存在着我，张史洁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是这一点，他原来就不会帮我忙的！不知道你是否充分理解了我以上所谈的这些。我不是怕负责任，因为是为我的亲弟弟办事嘛！我主要考虑怎样办更合适一些。

给冯庄的刊物及信会立即寄出。

另外，关于给你们写文章的事情请缓后一步，因为我最近正在写。

再说，我目前的这些文章你这个极端分子恐怕也不会满意的。目前政治局势变动很大，请你谨慎一些。我给张弢^[2]写了一信，也提及你和他都要有所注意，如你去甘泉，想必他已经转达你了。

请你随时来信，告诉我情况。我以紧急的心情期待着你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所创造的任何奇迹。

深致亲切的敬意！

路遥

2月22日 给曹谷溪写信，再次谈及弟弟天乐的工作问题。

谷溪：

新年好。

上次写给你的信，想必年前已经收读了。你也不回信，不知道近况如何。关于明年招工一事，看来大概只招收吃国库粮的，农村户口是否没有指标？详细情况我不太了解，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个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

我深知道在这种背景下安排我们的事情会有多大的难处。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不在延安，不能很好有效的和你一块儿为这些事奔波。我信任你，但我深知这些事的困难。你只尽你的努力办吧，即使弄不成，这也没有什么。我知道，即就有一点成效，你也会是花费了很大工夫才达到的，因为我知道办这些事的“真情”。我当然希望听到好消息，同时又觉一切都很暗淡。

还有一件事，我只想告诉你一下。你给我的一封信，被我弟弟偷看了，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妈说：“不知为什么，曹谷溪好像和我哥恼了！”我妈马上急得要昏死过去（这是一个严重神经质的母亲），她说“这是她害的”，接着说了她和你“诉过一次苦”的事，说她实际上也没什么，当时只是想家和情绪不好，想对别人说说，心里好受一些，说这事是她的“毛病”，对我父亲他也是这样，想不到这下“咋把事情弄坏了！”说“曹谷溪和你哥恼

了，肯定再不管天乐的事了！”说“她把我们兄弟害了”等等，头在墙上直碰。事情闹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使我十分痛心。我了解我母亲，她和你母亲不太一样，比较任性，从小时候起就爱感情用事，我大妹妹死后，神经挫伤严重，经常为一些小事就精神紊乱。这把听得不知如何是好，除斥责我弟弟以外，只好尽量安慰她，告诉她我和你的关系不会因这事就断绝的，天乐的事他也不会不管，并且假拟了一封你给我的友好的信，给她读了一遍，才算把这事稍微平息了。她执意要我找你解释，我硬是劝说才算罢休，我怕她见你后，精神肯定要错乱的。

为这些事，我是极其烦恼的，一般家庭事很容易酿成重大悲剧。在这纷乱情况下，我除过尽力解决好以外，总还得要干事的。你可能又说我“残忍”了，不，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是应该考虑他们负的责任是诸方面的。请你相信，我对母亲在内心上和形式上的孝敬并不比你差。但同时，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妻子的关怀是欠缺的，你比她享的福多，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你对妻子的爱就是不深的，而她也并没就过“非人”的生活。也请你这样理解我吧！

这事从此我不再和你谈了，正像俗话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的近况如何？最近写什么了吗？我认为，既然你到了文创室，那么就意味着你要把今后的事业放在文学创作上，因此你的意识及其活动的主要基点应放在写作上。大量的写，碰破脑袋地写，不管能不能发表。应该具有高目标，而不要追求红火一时，这个出发点对于搞大事业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是准备长期忍受默默无闻的。去年正式刊物发了四万字的东西，今年打算最少起码不少于这个数字。我手头有十万字的稿子，等孩子一有着落，就准备修改陆续发出去。目前我正在写我的第二个中篇，共十章，已写完三个章节，最近因安咐孩子，暂停下来了，已寄出几个短篇，第一个信息已回来，就是你们所攻

击的“买票”，贵报《山花》月刊准备用。这是今年飞回来的第一只“信鸽”。我打算天暖后，见机再回一趟延安，我在这个城市的创作情绪时常是最好的，到时我们再一起逛荡吧！

请你给我回信，并转告张弢的近况。

关于目前的政治气候，想必你已从公开及私下里弄清了内涵。

祝你及全家康安！

路遥

22/2

3月4日 给曹谷溪写信。

谷溪：

不知什么原因，你老是不给我回信。春节过后已一段时间，天乐他们的事不知有何安排，请你无论如何告诉我情况。我觉得先要找个事干，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先能较为理想地安排一下，不知你有何打算。老实说，这是有求你，也是很麻烦你的事，我因此特别小心，生怕把你碰磕了。这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我在内心里祈求你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对待我的事，能像张弢一样。你要知道，任何事，求人总是难畅的。如果我在延安的话，我是绝不会麻烦你的。当然，延安还有许多熟人，但比较来比较去，你还是我最信任的人，因此不管怎样，我还得依靠你。你也许还记得，我对你的不论什么事都是尽力而为的，所以总希望你对我也一样。不管怎样，你告诉我你的打算，好让我判断一下。你知道，一个穷人家的二十大几的人掉在空里闲待着，这是很令人焦急的。我一直相信你总有办法把事情办妥当的，因为我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3月17—23日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召开创作、评论工作座谈会。

与会作家、编辑、评论家共计60余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讲话，联系当前的文艺创作实际，讨论了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和坚持“双百”方针的重要性。据一同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作家张虹回忆，会上路遥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情绪非常亢奋。

4月12至13日 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在西安写作《病危中的柳青》。

4月28日 给刘凤梅复信。

信中建议刘凤梅多阅读苏联和西欧的古典名著，认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另外，信中还提及：“我最近也在深入研究我国文学的传统和现状，极不满足有些‘国粹’，想尽力冲破，在文学表现上走自己的路。这当然妨碍我很快去‘出名’。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观念束缚并不比思想上、政治上小，极需要一些有勇气的人去打破，开创新的境界。愿我们都努力，以期为社会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4月底 《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编辑部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

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可不可以来？”《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后投出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另一家刊物，第二次被退回。两年来，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一一被退回。当路遥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终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

4月 李怀坝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谈小说〈夏〉》，刊于《延河》1980年第2期。这是关于路遥创作的第一篇评论文章。

5月1日 路遥写信给《当代》编辑刘茵^[3]，诚恳而详细地阐释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乃至写作中的苦恼。可以说，这封信是路遥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系统的创作阐释：

尊敬的刘茵同志：

您好！

您写给我的信收到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他的作品和人格都使人钦佩）这样关怀一个年轻人的作品，使我深受感动……

这篇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引者注）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其中的许多情节都是那时生活中真实发生的。

“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关于那段生活，三言两语简直说不清楚，有机会我向您详细讲述。现在只好告诉您一些一般的情况：我当时和我所有同龄人一样（十五六岁），怀着天真而又庄严的感情参加了这场可怕的革命。我是一个几辈子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边冲冲杀杀，一边又觉得被冲击

的人并不都坏，但慑于当时的革命威力，只好硬着头皮革命下去。后来一些坏人从一般性折磨县委第一书记，发展到准备在肉体上消灭他。这是一位很忠诚的老同志，在县上干了许多好事，全县的老百姓都保他。在这时我们一些农村来的学生由于受自己的农民家长的影响，也开始非常同情县委书记。于是我们就和县上一些当时被称为“老保”的干部联合在一起（我曾是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之一），在1967年公开表态保县委书记（他现任延安市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大全国代表）。这样反而加快了那些坏人想消灭他的步伐。我们这些保他的人为了他的生命，也为了让农民站到我们这一派来，就把县委书记偷运出县城交给了农民。农民们便这个村转到那个村把他藏了起来。当时县委书记为了不让两派因为他而发生武斗，哭着哀求让保他的人让他继续留在城里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哪怕斗死他，他也愿意。他说他不能背离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跟了一辈子毛主席。后来我们就用绑架的形式，强硬地把他弄到了农村。他还几次试图从农村回城里去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但都被另一派和农民“关”了起来。这样县上两派就开始武斗，陕北上至军分区，下至各公社的枪支弹药全被抢光了，并且军队也分成两派，整整打了一年。后中央发了7·24布告才平息下来，是全国武斗最持久的地区。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暴烈的时候，包括我们县委书记在内的许许多多陕北老干部，为了群众的利益，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这是老区干部最辉煌的品质），许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都是带着迷惑不解的心情死在最初的风暴之中。当然，也有投靠一派、指挥武斗、出卖灵魂等等这样的干部。我自己的组织里也充斥着坏人，一切都颠倒、混乱！尤其是文化落后山区简直全部变成了“武化革命”。

.....由于打倒了“四人帮”，许多政治问题都逐渐明朗，“文化大革命”初的那段疯狂生活又出现在我眼前，关于过去的种种思考使我内心充满了想要把它表现出来的焦躁，于是就写了那个中篇

小说。由于一切都是经历过的、熟悉的，写得很快，往往白天黑夜激动得浑身发抖，有时都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出声来。

我在这篇小说中主要的着眼点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我觉得，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的道德、美好的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即使是完全写阴暗的东西，也应该看得见作家美好心灵之光的投射（比如鲁迅）。不管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多么曲折和复杂，以上人类所具有的精神和品质总是占主导地位的。否则，人类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更何况，我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厚朴品质加上过去几十年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使得生活中马延雄（县委书记）和具有马延雄式精神的人大量产生和存在，他们就是天塌地陷，也仍然保持着革命的赤子之心。当然，他们不是大政治家，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先知圣人，他们只是一般的党的基层干部，既有党性觉悟，也有农民的朴素哲学。我在写他时（包括写其他类型的角色），想尽量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同的人在这十年不同的岁月里，认识、思想都有差别。我尽量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那个特定时间（在武斗夺权之时），和特定的地点（在陕北山区）。文章是粗线条的，主要考虑当时的生活气氛和节奏，用这种手法比较协调。

这篇作品目前这个样子并不理想，缺陷和不足都很明显。今后如有机会和条件，我想用较大一点的作品来反映这一段生活，这是现在我的想法。

这篇作品最好以中篇小说发表为好。因为这不是写一个具体的真事，我是把我了解的许多作品构思的要求虚构的；这不像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样的长篇报告。基本按历史事件和真实写成，并不虚构。

另外，因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区的生活，如按报告文学发，多事的人必然会从作品里寻找生活中的真实的原型，这样怕惹麻

烦。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最好能按中篇小说发……

尊敬的刘茵同志，我各方面的修养和准备都很差，极希望您和编辑部同志经常给我帮助和指导。我在内心十分感激《当代》编辑部，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发作品是很困难的。遇不到热心的编辑，往往看也不看就退回来了。这篇作品写成后，曾给几家大刊物寄过，但都被退回来。当××杂志也是这个态度以后，我就让那位不太熟悉的同志转给你们。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

我已对若冰和鸿钧转达您对他们的问候，他们让我回信时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

深致敬意！

（如有什么事，请再联系）

路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同日 给曹谷溪写信。

谷溪同志：

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五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给予很高评价，秦兆阳同志（《当代》主编）给予了热情肯定。另外，《山花》第四期已发那个短篇；《雨花》已通知用《青松与小红花》；河南《奔流》也可能用一篇一万多字的

小说；《延河》第六期要发一篇特写，叫《病危中的柳青》。今年已经差不多要有十来万字的东西先后问世了。这是我多年不屈不挠追求的结果。现手头正在搞第二部中篇，已经写了三分之二。

我将要用我的劳动成果来回答我的朋友和敌人们。

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

我不知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没有，我总希望你能努力，争取做出一点事业出来。除过该交的朋友，少交往，少结识，埋头读点书，写点东西，归根结底，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还不是吃好、穿好、逛好，而应该以辉煌的成绩留在历史上为荣。

前一段听说延安怎样对待你等等，这一半要怨这些人，另一半也是你不太检点造成的。世事不是谁能一铲子铲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必须把自己和社会生活摆向适应的位置，这样可能集中力量搞点事，否则，光这些扯淡事就把生命浪费完了。

天乐来了信，谈了一下他的情况，看来是很苦的，我很难受，把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抛在一个自谋自食境地，实在不是滋味。我是希望你想些办法的。你也不给我写信，告诉这倒究应该怎么办，你自己又办了些什么，前途怎样等等。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怎样都无法改变这个人的处境，你能不能再活动一下，行吗？

我7、8、9三个月为创作假，将来延安，我要一鼓作气，再写出一些作品来。

你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请你来信告诉我。

紧紧握手！

5月初 路遥应邀去北京《当代》编辑部修改小说。出发前，向负责《延河》发行的袁银波借了三百元钱。“他说，借300块，别告诉别人，编辑部啥时候要我啥时候还。临走，他叮嘱说：‘留神一下《当代》，新刊物出来给我留下，我有篇东西可能要发表在那上面。’果然不久，《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发表了……一个月后，路遥还了三百元钱，那便是他《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稿费……”（袁银波《相识在〈延河〉编辑部》）

到北京后，他在责任编辑刘茵的带领下，去了秦兆阳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当代》主编。刘茵后来回忆：路遥见到秦兆阳后非常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秦兆阳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1956年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他出任《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也就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上任不久后就看到的稿件，路遥的确是幸运的。路遥在秦兆阳的指导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二十来天，小说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厚夫《路遥传》）

在北京改稿期间，向韩石山约稿，韩给了路遥两个小说：《一顿饭》《社会基础》，后经路遥编辑，分别刊发于当年《延河》第8期、第10期。

路遥去世后，韩石山回忆：“1980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里学习，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和我的同学们组稿。当时他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朴实，强壮，谦恭，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了。”（韩石山《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

路遥从北京改稿（《惊心动魄的一幕》）回来，给李小巴说，为了删改作品中的某些情节，他几乎和孟伟哉吵起来。同室的一位也是来改稿的外地作家劝他说：“算了，改改吧，在《当代》上发作品可不容易呢。”路遥说：“我宁可不发！”聊天中，路遥给李小巴说，孟伟哉还让他（路遥）重新起个笔名，说北京已经有个王路遥了。路遥却坚持用自己的笔名。

5月24日 在北京改稿。给曹谷溪写信。

谷溪：

你好。

我于5月初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那个中篇小说已20来天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现在6万多，估计在《当代》第三期发（6月发稿，9月出刊）。此稿秦兆阳同志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给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家里约见了，给了我许多鼓励……

天乐的事不知近期有无变化，我心里一直很着急，不知事情将来会不会办得合适一些。我已经（给）张弢写过信，让他协助你努力一下，我可能7月份来延安，到时咱们一块再想想办法。

我目前在创作上的想法很多，这些事解决不好，心志是静不下来，请你在可能的情况下助兄弟一臂之力吧。在延安剩下的朋友之中，你和张弢是我唯一可以依赖的了。你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但世界上也有许多对有办法的人的限制，坚冰不知能否打破。相信只要有钱眼大个洞，你就能钻进去。

我可能本月底或6月初返回西安，到时想看见你给我的回信。

此信你可叫天乐看看，我不单另给他写信了，让他写信给家里，告诉我的近期情况。

深致敬意！

朋友 路遥

24/5 于北京

5月30日 路遥改稿后离京时，给《当代》副主编孟伟哉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小说的修改情况：“您和刘茵同志谈过意见后，我又把稿件整理了一遍。我想了一下，觉得农民场面结束后，是应该很快跳到礼堂门口的。您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我把以后的那两节（现已合成一节）调整到农民场面的前面去了；农民场面一节重写了一遍。现在已经从农民场面的结束直接过渡到了礼堂门口上。至于您提出删去的那些内容，我用这种办法保留了下来。主要考虑到：一、如果没这个内容，马延雄回城的理由、必要性以及他对这个行动的思想动机将给读者交代不清楚，会留下一些漏洞

（主要通过马延雄和柳秉奎的谈话说清楚这些）。
二、这些都是马延雄和柳秉奎两个重要人物的细节描写，尤其是马延雄雨中挣扎一节。整个文章密度大一些，好不容易有这么个空子抒情性的描写了一下。

“现在这样处理，您提出的意见解决了，也保留了那一节。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对，请您再看，如不行，我再改。

“您和刘茵同志提出的其他意见，我都尽力按你们说的解决了。我自己文字功力很差，有些疏漏和错字请编辑部的同志给予纠正……”（厚夫《路遥传》）

6月初 因为四弟王天乐工作的事回到延安，当时的王天乐在延安城揽工背石头。路遥回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关街的地区招待所——延安饭店后，他开始四处寻找这位仅见过三次面、没说过几句话的三弟。后来，终于在一处工地上找到了这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亲兄弟，并把他带回旅馆。

据王天乐回忆：“见面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个人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全部构思。当时，这个小说叫《沉浮》，后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同志修改成《人生》。

通过这次对话，我们超越了兄弟之情，完全是知己和朋友。他彻底了解我，我也完全地知道了他的创业历程，包括隐私。”（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路遥一心想帮这个他钟爱的弟弟，希望弟妹中学历最高、最有前途、最有思想的王天乐跳出“农门”。

6月26日 出席诗歌编辑座谈会，《延河》《长安》《绿原》的编辑出席了会议。

同月 特写《病危中的柳青》刊于《延河》1980年第6期。文章对柳青忠于理想，忠于艺术，于病危中仍然坚持《创业史》创作的精神作了细致的描写：“他一边喘息着，一边向口里喷着药剂，吞着药丸，一边统帅着《创业史》里各种阶级、各种类型的人在他为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喧嚣地前进着。……在这个不到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现在到处摆着维持和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械：立在床头角里的大氧气瓶，像一颗小型导弹一般矗立；床下是一个汽车轮胎，里面装的也是氧气。”“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地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路遥《病危中的柳青》）

7月10至20日 在太白县参加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本次会议是《延河》编辑部恢复以来第一次组织老、中、青作家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除路遥外，胡采、陈忠实、贾平凹、王蓬、

京夫、邹志安、王晓新、蒋金彦、肖云儒、李星、蒙万夫等作家与评论家二十余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历时10天，对每位作者的创作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王蓬认为这“对陕西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时任《陕西日报》记者的肖云儒评论：“这是一次深入到艺术创作过程去指导创作的会，领导创作就要这样切实的领导。”

7月15日《惊心动魄的一幕》刊于《当代》1980年第3期。后在秦兆阳的推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1979年—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这是新时期陕西作家第一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小说描写“文革”时期“一月风暴”后，两派群众组织夺权斗争的重大事件，满怀激情地塑造了马延雄这个为了群众利益而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这篇小说写于1978年，和当时汹涌澎湃的“伤痕文学”潮流格格不入，这部小说的发表，使路遥这个默默耕耘的文学青年初露头角，开始为新时期文坛所瞩目。

7月29日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漫谈会。《文艺报》编辑部为了解各地反映农村生活创作情况，派人来陕西调研，为此，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农村题材创作漫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王晓新、蒋金彦、韦昕、王愚等，《延河》主编王丕祥主持，《文艺报》雷达学出席了会议。

7月 短篇小说《青松与小红花》刊于《雨花》1980年第7期。

8月 短篇小说《匆匆过客》刊于《山花》1980年第4期。

9月 短篇小说《卖猪》刊于《鸭绿江》1980年第9期；本月，于陕北完成《冬天的花朵》。

10月30日 给史小溪复信。谈及史小溪投稿事宜，并鼓励其继续努力。

10月 于西安完成小说《姐姐》。

同月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三期读书会，参会的中青年作家共15人。据参加读书会的作家张虹回忆，路遥阴沉着脸，一副难受的样子。路遥对她说：“我是从比这儿还底层的地方出来的，起点太低。我要改变命运，要成就大事，就得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甚至牺牲。这牺牲包括常人的欢乐和友谊。干大事就顾不得小节。谁做我的朋友，谁就得原谅我，接受我……”后来，张虹从读书班的同期同学中了解到，路遥正在经受“文革”问题的焦虑。（张虹《微笑的遗失》）

秋 王天乐在张史杰等人的帮助下，以延安县冯庄公社刘庄大队的农村户口，被招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当采煤工人。此后，路遥先后又把他调到《延安报》《陕西日报》当记者。王天乐命运的改变是路遥不懈努力的结果，王天乐在改变命运后，又不

断在生活上与精神上全力帮助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原型就是王天乐；路遥去世前创作的六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第一句话便是“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可见，路遥与王天乐之间超越了兄弟之情，他们完全是知己，他们彼此了解。

12月3日 给史小溪复信，就其来稿给出具体意见，并建议其选择自己擅长的形式写作。

12月 小说《冬天的花朵》刊于《袞雪》^[4]1980年第2期。

同月“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宗旨是团结西安地区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开展创作评论、研究活动。“笔耕”文学研究组聘请胡采为顾问，选举王愚任组长，肖云儒、蒙万夫为副组长，成员是：刘建军、费秉勋、李星等人。

冬 于西安写作《在困难的日子里》。

本年 完成小说《月夜静悄悄》。

【注释】

^[1] 史杰，即张史杰，原延川县委书记。

^[2] 张弢，路遥好友，时任延安地区甘泉县文化局局长，1984年后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副厂长。

^[3] 刘茵（1935—2015），编辑家。时任《当代》编辑，后任《当代》编委、《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等职。

[4] 《袞雪》，汉中市文学杂志，创刊于1980年8月，时年共出两期，第2期于12月出版。

|| 1981年（辛酉） 32岁

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后展开了第一次学术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专题讨论。同月，《延河》1981年第1期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其中有莫伸的《雪花飘飘》、路遥的《姐姐》、王晓新的《邻居琐事》、邹志安的《喜悦》、陈忠实的《尤代表轶事》、王蓬的《银秀嫂》、贾平凹的《病人》、李天芳的《我们学校的焦大》以及京夫的《深山明月》。这期青年作家短篇小说专号，以整齐的阵容，推出了陕西文学创作第二梯队的领军人物。这期专号标志着陕西第二代作家崭露头角、集体走向中国文坛。

1月 西安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新时代》杂志在西安创刊。

2月20日 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发表在《当代》第1期上，后经作者做了较大改动，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芙蓉镇》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2月 《延河》1981年第2期推出“陕西中年作家小说专辑”，刊出李小巴的《冯鉴先生》、蒋金彦的《秦中吟》、徐岳的《藏在心底的画》、峭石的《母女情》、赵熙的《东去的流水》。

3月5日 西安市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联合召开茶话会，座谈如何办好本年的文学讲座。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胡采，市文联副主席杨公愚，市总工会副主席

葛瑜，陕西师大马家骏、高海夫，西北大学石昭贤、蒙万夫、张华，作家毛锜、贾平凹、晓雷等出席会议。

3月14日 病危中的茅盾先生，在口述了给中共中央请求在他去世之后追认为中共党员的信之后，又口述了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3月27日 茅盾去世。遵茅盾先生遗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以先生的名字命名，设立茅盾文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奖励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优秀长篇小说。奖项依靠茅盾25万捐款的利息运作。随即，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茅盾文学奖评选小组。第一届初选小组的人是丁玲、艾青、冯至、冯牧、张光年、谢永旺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古华的《芙蓉镇》等6部作品获奖，据第一届评选的老评论家蔡葵回忆，关于评选的规则问题，参加评选的评委在开始时就向主持工作的评委会副主任张光年提出来，“他当即并未回答，说先让我想一想，过后，他讲了几条意见，大意是：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取得了一致的共识。”

3月 《延河》1981年第3期发表曾镇南评论文章《向现实的深处开掘——读〈延河〉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同期还开辟了《大学生小说选》，刊出四篇小说。

4月 西安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时代》创刊，1985年更名为《西部电影》。

本月 《延河》从1981年第4期开始开设“处女地”专栏，专为青年作者的成长提供园地。

5月23日 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授奖大会在杭州举行，电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获最佳故事片奖。

5月 大型文艺刊物《小说界》在上海创刊。同月，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本月 《延河》编辑部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全省参会小说作者三十余人，《延河》主编王丕祥主持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胡采、副主席王汶石、李若冰参加了会议。

6月27日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不仅总结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6月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7月 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在《十月》第4至5期连载，后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8月3日 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邓小平7月17日同中宣部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会上，胡耀邦作重要讲话。胡乔木作题为《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长篇讲话。

8月 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合著的《论柳青的艺术观》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上旬 省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三期读书会。叶广苓、马林帆、王蓬等人参会。

11月12至24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现代文学学会、《延河》编辑部联合发起了“《创业史》及农村题材创作学术研讨会”，有8个省、市的评论家以及学者50余人出席了会议，联系当时农村题材创作的实际，深化作家

对于柳青的认识。《延河》1982年1月号刊登《深入农村 勤奋耕耘——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

本年 贾平凹调任《长安》杂志编辑，负责陕西之外的全国来稿。

1月12日 给海波复信。路遥在信中谈到自己爱所有的亲朋，但因为事太多，不能一一周全。因为路遥母亲在西安，恳请海波弄点软米，想在春节期间做点油糕。

1月 短篇小说《姐姐》刊载于《延河》1981年第1期推出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

同月 李星的《艰苦的探索之路——谈路遥的创作》一文，在《文艺报》1981年第17期刊发。

3月16日 给张兴元写信。信中说小说《世道》已读，准备在《延河》重点稿刊发，商谈就小说人物某些地方做出修改并邀请张到西安来改稿。

3月28日 给张兴元复3月25日来信。谈改稿事项。

同日 给“商丘地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写信，希望宣传部能同意张兴元来《延河》编辑部修改小说。

春 写作《在困难的日子》于西安。

4月中旬 “笔耕组”组织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

4月 李炳银的评论《不要忘了这一幕：谈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于《陕西日

报》。

同月 樊高林写的《读〈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1981年第2期刊发。

同月 《延河》1981年第4期刊发沙平文章《各有千秋，各有深意——评〈姐姐〉与〈银秀嫂〉》。

5月16日 给海波复信。信中提到收到红枣与稿子；稿子不成熟，退回。另，谈及最近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1961年：在困难中》，《当代》主编秦兆阳来信首肯，初步决定要在《当代》发表，可能到年底了。信末，路遥说到自己非常忙，许多事情交叉进行，每天只能有三四个钟头睡觉。

5月17日 给海波复信中又补：“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今天收到通知，已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我二十三号动身去北京领奖（二十五号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因忙，就写这几句。”

5月23日 动身赴北京领奖。

5月25日 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

据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委王维玲回忆，他发现有一部陕西青年作者路遥写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对于列入选目中的作者和作品，他大都比较熟悉，或有一些印象，但对路遥和他的作品是完全陌生的。由于王维玲对陕西文学界的特殊感情，王维玲回忆“我首先读了这部作品，读过之后，我为

路遥高兴，也为陕西文学界高兴，我确信这是一部有特色、有水平的作品。”王维玲认为路遥的第一个中篇，尽管作品还有稚嫩之处，但最终还是被评上了。在发奖会上，他特别留意路遥，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显得十分健壮。当时路遥的知名度还不够高，再加上他总是坐在后排，一脸淳朴憨厚相，不了解他，不与他接触，谁也感觉不到他的艺术气质和才华。在这次发奖会上，他有些孤独，有些寂寞。在座谈会上，面对那些潇洒自如，侃侃而谈的知名中青年作者，路遥显得很沉默，大小会上，一言不发，专注地听每一位获奖作者的发言。路遥的专注表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次王维玲把路遥约到休息厅，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谈。王维玲认为路遥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才气的青年，一个聪明绝顶又很有潜力的青年，一个自尊心、上进心都很强的青年。”我由衷地喜欢上了他，发自内心地敬佩他，甚至有点儿偏爱，这年路遥刚刚三十一岁，从此我们两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在这次会上，王维玲得知路遥准备写一部关于城市与农村“交叉地带”的中篇小说。经过长谈，王维玲与路遥初步敲定了这部小说，有了最初的约稿。（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路遥回忆，参加《惊心动魄的一幕》颁奖活动后，他刚刚回到下榻的房间，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你是谁？你没有事的话，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线那头传过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一位熟悉的老朋友！”说话的人穿着一件红风衣，在马路对面的电话亭等他。路遥自称扔下电话，疯了一样跑

下楼。横穿马路而过。”我奇怪汽车为什么没有轧着我！”^[1]（高建群《扶路遥上山》）

6月18日 赴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后回来给张兴元复信，告张兴元小说《世道》一稿已发《延河》七月号小说头条位置，并勉励张继续努力。

6月25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西安举行茶话会，表彰近年陕西36篇（部）文学作品获奖。此次会议共安排三名获奖代表发言，路遥也在其中，他作了《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的发言。这次发言是路遥在陕西全省的重要文学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发言。

6月 短篇小说《月夜静悄悄》（又名《月下》）刊于《上海文学》1981 年第6期。

初夏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组织的游华山活动，与同事一同爬华山、看日出。

7月6日 给海波复信。谈海波小说《芳芳》内涵不深，送终审被刷下来。近日准备去陕北，先到甘泉。

7月10日 开始休创作假，四个月。

期间，路遥在劲挺的陪同下进行了两次采访。一次是在杨家岭后沟二号工地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虽距延安城不远，但几乎与世隔绝，连条公路也没有，一派鸡鸣狗叫。另外一次去的是杨家湾，采访的是杨家湾小学，校长姓党，人很精干。据劲挺回忆，路遥采访得很细，主要问的是学校管理问题，教师教学中的困难等等。他说，准备写个小学教师。

7月15日 《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编的《文学简讯》总第11期上刊发。

7月 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中篇小说《人生》^[2]。
路遥选甘泉县招待所实施创作计划，其核心原因是好友张弢任甘泉县文化局局长，他找到甘泉县县长吕少敏同志，安顿好路遥的住宿与吃饭问题。就这样，路遥投入到中篇小说《人生》创作的最后冲刺阶段。

路遥在甘泉用了21个昼夜创作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的初稿：“我一生中度过的美好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白描回忆：“1981年夏，你在甘泉招待所写作《人生》时，我在延安大学妻子那里度假。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

饼。你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已使你手臂痛得难以抬起。你说你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咬紧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十三万字的《人生》，你二十多天就完稿。”（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

完成《人生》的初稿后，路遥便赴榆林。在榆林佳县白云山抽了一签，签名叫“鹤鸣九霄”，是出大名之意。回西安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念给弟弟王天乐。路遥读完小说后，流下了热泪：“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回到西安，林达读到《人生》原稿时也流下了热泪。

路遥谈《人生》时说：“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晚上，写德顺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

路遥后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披露过他创作《人生》的情形：“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

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8月 出席延安地区短篇小说讨论会。

9月12日 在西安给海波写信。路遥在信中说：“我是就我知道的和认识到的对你毫无保留。”“有话请来信，寄上刊物一本。”

9月19日 与张志杰、韩亨林在榆林地区招待所长谈。

路遥从延安来到榆林，住在榆林地区招待所，韩亨林和同学张志杰一起去看他。路遥拿出自己的中篇小说《生活的乐章》，请他们提意见。那天，三个人彻夜长谈。路遥的作息一直不规律，透支着身体，这也为他日后生病埋下隐患。“路遥当时说自己为了这个小说写了三年，但这不是他最终的目标，他还会构思更宏大的作品。”这部中篇小说就是1982年轰动全国的《人生》。（马蕊、刘予涵《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韩亨林眼中的路遥》）

9月21日 王维玲收到路遥的信。（《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甚至有点不安，觉得愧对您一片好心。以前的短篇，我自己都不很满意，因此不敢给您寄来，不过，在所有的约稿中，我对您的约稿看得最重，已经使我有点恐惧，我生怕不能使您满意，因此，每写出一篇，犹豫半天，还是不敢寄来。我现在给您谈谈我的中篇，这个中篇是您在

北京给我谈后，促我写的，初稿已完，约十三万多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当然，这样的作品若能和读者见面，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探讨的东西并不一定会使一些同志接受。我写的是青年题材。我先给您打个招呼，等稿完后，我就直接寄给您。”

本月 短篇小说《冬天的花朵》，经修改，更名为《风雪腊梅》刊于《鸭绿江》1981年第9期。

10月17日 王维玲收到路遥的回信。（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您的信鼓舞和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度。现在我把这部稿子寄上，请您过目。这部作品我思考了两年，去年我想写，但准备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写完了。……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试图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都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光面的，也有投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相互的折射。问题还在于写什么，关键是怎么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的灵魂不能破碎。已经谈得太多了，也不一定正确，只是自己的一些认识，不对处，请您批评。至于这部作品本身，您会判断的。我等着您的意见。”

王维玲回忆：

“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很快就把《人生》初稿读完了。我又请编辑室的许岱、南云瑞看了这部书稿。他们与我一样，同样

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读完这部书稿的。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次讨论。现在回忆起当年那种对作者的真挚的感情和对作品炽热的激情，还感奋不已。大家一致认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调整一下，结尾较弱，如能对全稿再作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把结尾推上去，则这又会是路遥一部喜人之作。我满怀信心地给路遥写了封回信（引者注——见1981年11月11日），我写给路遥的许多封信，都没有留下底稿，独独留下了这封信的底稿，为什么？至今我也说不清楚。这封信给路遥很大鼓舞和信心，使《人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又上一层楼。”

10月30日 参加《文艺报》来陕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

10月31日 给海波写信。谈及读书班与稿子事情。

11月8日 给海波复信。就海波来稿给予指导，并鼓励其“走一条有出息的生活道路”，“合理地生活，合理地做人”。

11月11日 王维玲给路遥复信。（《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路遥同志：

近来好！我和编辑室的同志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把你的中篇读完了。你文字好，十分流畅，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让我们一读起来就放不下。虽然我生活在城市，对今天的农村生活变化不很了解，但读你的作品时，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全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让我关心事件的发展，关心人物的命运，为你笔下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一时兴奋，一时赞

叹，一时惋惜，一时愤慨，我的心，我的情，完全被你左右了。读完你的作品，让我对你的创作更加注目和关心，对你的文学才华更加充满信心。我相信，你今后一定还能写出更为喜人的，同时也是惊人的作品，我期望着，等待着！《生活的乐章》（即《人生》——引者注）出版以后，会在文学界和青年读者中引起重视和反响。就我们看到的近似你这样题材的作品，还没有一部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为使你的作品更加完美，我们讨论了一下，有几点想法提供给你参考。①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加林、巧珍、巧玲等不同的人物都应对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行动与结果，挫折与命运，追求与现实做一次理智的回顾与反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过去，总结自己，总结旁人走过的道路，给人以较深刻的启示和感受，让人读后思之不尽，联想翩翩。现在的结尾较肤浅，加林一进村，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让给他，并且对他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感情，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一切都是巧珍的安排，让自己的妹妹填补感情上的遗憾。巧珍会这么做吗？！读过后感到很不自然。加林对巧珍的内疚和自我谴责；与黄亚萍一段交往和所作所为，以及最后的反省和悔恨都还应再往上推一推。现实生活给予他这么重的惩罚，他应有所觉醒，有所认识，现在稿子发掘还不深，弱而无力。而缠绵的感情又显得多余，读者读到最后，想到的是加林和巧珍如何对自己、对生活做出评价，而不是其他！

②关于巧珍。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应该贯彻始终。桥头断交，她显得比加林更真实更感人，描写人物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显示人物的高尚和光彩。在她回村以后，可以写她感情上的痛苦，但不应过多、过重，现在把她写得不能自拔，过了。她是个感情无比丰富的女性，同时又是一个理智的女性，两个方面都应显示出这个人物的光彩，现在对她的理智的一面展示不够，发掘不深，人物的血肉就显得不够丰满。她决定嫁给马栓，从不爱到爱，是她从理性的思索到感性的变化结果，要准确表现出人物的感情转变。巧珍与加林不同之处，她是一个爱情专

一的青年，但同时她也是一个自尊自爱，又实际，又理智的青年，要在最后的篇幅里，将这两方面充实丰满起来。

③关于马栓，对他的性格描写还不够统一，他出场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很会投机钻营，滑头滑脑的人，但在结尾和巧珍成亲时，又是一个朴朴实实，讲究实际，心地善良的青年农民形象。前后要统一，还是把他写得朴实可爱一点好。

④关于加林，总的说来，写得很好，但有几个关键转折之处，还显得有些表面，发掘不深。他对巧珍是有感情的，为了与亚萍好，扔掉巧珍，他事前用尽心思，作了各种准备，没想到在大桥，仅三言两语，巧珍就明白了，那么轻易解决，这时他应感到意外，感到震惊，事后他应感到痛苦、感到不安！而且这种内疚的心情，应该越来越强烈，直到从省城回来，知道将要把他遣返回乡的冷酷现实不可改变，知道巧珍嫁给马栓，想到他与亚萍的关系不可能继续，他的失望悔恨，惋惜痛苦的心情应更强烈，他去找亚萍，告诉亚萍他心里真正爱的还是巧珍，这应是他不断反省，发自内心的话！这才符合人物当时处境，才能造成悲剧气氛。现在的稿子无论气氛，还是环境，无论加林，还是他周围的人物，写得都不够充分，不够强烈。小说中，围绕加林与巧珍，加林与亚萍的爱情描写上，有重复的地方，也有刺眼的东西。还是含蓄一些更好，可适当做些修改。

⑤德顺爷爷写得实在可爱，但他与加林的父亲到县里找加林说理，为巧珍抱不平描写又过于简单，分量不够，应再深一点、重一点才好。

以上意见提供给你参考，想好后，修改起来也很便利。总的来说，不伤筋、不动骨，也没大工程，只是加强加深，加浓加细，弥补一些漏洞，使人物的发展更加顺理成章，合理可信。

关于下一步有两种考虑：一是你到我社来改，有一个星期时间足够了。二是先把稿子给刊物上发表，广泛听听意见之后再动手修改，之后再出书。我个人倾向第一种方案。现在情况你也知

道，常常围绕作品中个别人物，个别情节，争论不休，使整个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受到伤害。

我想，发表的作品和出书的作品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好。不知我的这些想法，你以为如何？

祝好！

王维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王维玲回忆：

“很快我就收到路遥的回信，信中写道：‘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感谢您认真看了我的稿子，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同意您的安排。我想来出版社，在你们的具体指导下改这部稿子，因为我刚从这部作品中出来，大有‘身在庐山’之感。我现在就开始思考你们的意见。您接我的信后，可尽快给丕祥和鸿钧写信。估计他们会让我来的。’我与丕祥、鸿钧是老朋友了，他们当时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和《延河》杂志的工作，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对青年作者一直持热情扶持的态度。果不出我所料，我的信发出不久，路遥就来京了。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秋 中篇小说《人生》先后在西安、咸阳修改。1991年10月26日，路遥在延川回忆当年的情形：“二十一天把初稿写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背上这个稿子到陕北转了一圈，认真地把这篇稿子重新审视了一遍。回到西安后，又待了半个月，又赶到咸阳，用了十几天时间，把这个稿子又搞了一稿。这就是第二稿，定稿。”（路遥《在延川各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深秋 赴延安出差并出席延安文艺界举行的欢送甘肃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晚宴。

12月8日 《姐姐》获得《延河》文学月刊短篇小说评奖。该奖由《延河》文学月刊，针对1980年10月—1981年9月期间发表的作品颁发，同期获奖的还有王晓新的《诗圣阎大头》、莫伸的《雪花飘飘》、邹志安的《喜悦》、陈忠实的《尤代表轶事》、王蓬的《银秀嫂》、贺抒玉的《琴姐》、余君亮的《村愁》。

12月30日 收到秦兆阳来信《致路遥同志》。

12月 完成小说《痛苦》于北京。

同月 到北京改稿。路遥到京后的第二天，就去找王维玲谈自己的修改思考。二十多年后，王维玲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仍赞不绝口：“事实上这个上午他谈的这些构想，几乎没有一条是原封不动地采纳我们的建议，但他谈的这些，又与我们的建议和想法那么吻合。听他讲时，我连连叫好；听完之后，我击掌叫绝。路遥的悟性极高，不但善解人意，而且能从别人的意见、建议之中抓住要点和本质，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血肉，融化到小说中去，他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一个艺术细胞十分活跃，天赋条件再好不过的人。我从事文学编辑几十年，最喜欢与路遥这样的作者合作，这种合作，随时能让我看到从作家身上爆发出来的创作性的火花；这样的创作性，让我激动，让我兴奋，让我痴迷，让我看到信心，看到希望，看到

成功，对一个编辑来说，再没有比这高兴的事，这是一种难得的美的享受。”

“中国青年出版社把路遥安排在出版社大院内一间高大明亮的客房改稿。这间客房本来是专门接待老作家的，配有写字台、沙发、席梦思床和木地板，是当时最好的条件。路遥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全身心地投入作品的修改工作。期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作品改完抄好。中国青年出版社熟悉他的朋友，都非常感动与敬佩。”“修改后的《人生》很理想，我很快就定稿发排了。……当时这部小说的名字叫《生活的乐章》，我们都觉得不理想，但一时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约定信件联系。”（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同月 白描的《论路遥的小说创作》在《延河》1981年第12期刊发。

冬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完稿于西安。

本年 小说《风雪腊梅》获得《鸭绿江》年度“作品奖”；《惊心动魄的一幕》获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成了陕西第一个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作家。

【注释】

[1] 此处穿红风衣的人当指路遥的初恋女友林虹。

[2] 小说《人生》是出版后的名字，初名为《生活的乐章》，后经过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与路遥协商后改为《人生》，后文对此有详叙。

|| 1982年（壬戌）33岁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2月10至13日“笔耕”文艺研究组在西北大学召开“贾平凹近作研讨会”。贾平凹在会上概括地介绍了他对创作的追求，他说，他将力求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他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种境界，即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单纯“出世”。

2月21至28日《延河》编辑部在西安召开“青年业余创作座谈会”，首次在刊物发表作品的39位作者参加会议，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等做了发言。《延河》5月号刊登《壮大作者队伍繁荣文学创作——《延河》编辑部召开青年业余作者创作者座谈会》。

2月 李若冰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6月8至11日《延河》编辑部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

8月1日《上海文学》在专栏“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中刊登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通信。由此，开始了文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热评。

8月 李凤杰^[1]中篇小说《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在全国获奖。

9月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谈新时期三大任务。

10月7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的第一期短篇小说讲习班开学，胡采在开学典礼上做发言《既已开始，就坚持做出成绩来！——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的短篇小说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后刊于《延河》1983年第4期。讲习班每周讲课一次，12月下旬结束。

10月7至12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和商洛地区文化局、商县文化局联合主办京夫作品讨论会。胡采、王丕祥、董得理参加。

12月18日 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行。《许茂和他的儿女们》等六部长篇小说获奖。

本年 陕西省中国作家协会、“笔耕组”和《延河》编辑部召开会议，对贾平凹、京夫的创作分别给予专题研讨。

本年 陈忠实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乡村》收录了19个短篇，主要描写发生在“乡村”这块沃土上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有作者对于历史深沉、厚重的反思，也有对现实富有生气的描绘。

1月6日 给王维玲去信，商讨关于小说《人生》的名字。

“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南云瑞转给我一封路遥的来信，信里写道：‘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问号。有点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点相似，但内涵不一样。……我和南云瑞一起讨论了路遥的来

信，他提出的书名，虽然切题，但套用《你到底要什么？》太明显了。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我一直鼓励路遥写《人生》下部，并且要他尽快上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干下去。我的这些考虑也全都写进信里。”（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1月11日 给海波复信。告知海波自己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回来，今年有望出版两部中短篇小说集。

1月31日 王维玲收到路遥的来信。路遥在信中感谢王维玲为小说命名《人生》。

您的信已收读，想到自己进步微小，愧对您的关怀，深感内疚，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情，一切都有待今后的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能提高一点。关于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当然一切都会很艰难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作品的最后”（大意），因此这部作品的下部如果写不好，将是很严重的，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我会随时和您通气，并取得您的指导。上半年看来不行，因为我要带班。

这几天我的小孩得肺炎住院，大年三十到现在感情非常痛苦，就先写这些，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写信给我。

王维玲回忆：“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我们想在出书前先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上作重点稿推出。我想到了《收获》杂志。但不知路遥的想法如何？我把我的想法写信给路遥，同时，我在信中又一次提起《人生》下部的写作，希望他尽快上手。”（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之后，王维玲把小说《人生》转到了上海的《收获》编辑部。

2月6日 参加《延河》文学月刊短篇小说颁奖会，并代表获奖作者发言。

3月6日 给海波写信。告知海波的稿件在《延河》六月号“处女地”栏目发表，并同期配发一篇一千字的短评。信中谈到从五月号（实际工作从现在起）已负责小说散文组的发稿工作；7月到10月底是创作假。

3月25日 秦兆阳《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一文刊于《中国青年报》。

秦兆阳对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于个人命运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是非分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他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致造成牺牲的人，所以他带着全身的重伤，极端艰苦地连夜赶路，把自己送到坏人手上……”；“朴素自然，写得很有真实感，能够捕捉生活里感动人的事物”；“别具匠心的结构，生动的语

言……”秦兆阳的充分肯定，《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路遥凭此小说第一次被全国文学界所瞩目。

4月2日 给王维玲复信。（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也使我对所要进行的工作更具有信心，同时也增加了责任感；仅仅为了您的关怀和好意，我也应该把一切做得更好一些。对于我来说，各方面的素养很不够，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精神紧张，但又不敢操之过急。不断提高只能在不断地创作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您的支持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关于《人生》的处理我很满意，您总是考虑得很周到，唯一不安的是我的作品不值得您这样操心，这绝不是自谦。为此，我很感激您。

我上半年一直忙于发稿，一切写作方面的计划，只能在下半年开始，如果搞专业，条件将会好一些，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生活，研究艺术，光处于盲目的写作状态是不行的，面对一个题材要反复地思考，这是我的习惯。我今后的工作进展，随时都会告诉您的。但我不愿经常无谓地打扰您。

4月 《东拉西扯谈创作》，刊于《文学简讯》1982年第2期。

5月4日 给史小溪复信。告知其《鸡的轶事》已发表于《延河》七月号。

5月6日 从西安出发去延安。

5月8日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延安举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胡采亲自率领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赴会。期间，路遥与公刘等人游清凉山并留影纪念。

5月10日 在延安剧院看历史文献片《延安散记》。

5月15日 写《十年——写给〈山花〉》于延安。路遥在文中谈道：“十年前，在混乱的日子里，在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的小县城，几个从不同生活道路上走在一起的人，竟然办起了一张文学小报，取名为《山花》。……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十年是漫长的。十年是短暂的。我愿于再一个十年之后，和亲爱的《山花》相会在一个新的年代里。愿那时《山花》，更加丰彩，我自己也不辜负它的栽培之情。”

5月23日 在陕西文艺界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大会上作《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财产》发言，后收入《五月的杨家岭》一书。

5月25日 中篇小说《人生》刊于《收获》1982年第3期；文末编辑注明了此稿是由《青年文学》供稿，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人生》以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事业、爱情为线索，将城市与农村、社会与家庭、忏悔与责难、爱

与恨，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了一幅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同时，路遥把农村青年及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在这部小说里，路遥把新旧交替时期农村青年高加林贡献给了当代文坛。

路遥曾说过：“通过塑造人物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是主观感情色彩相对强烈的作家，他学习柳青，因而他的小说也具有哲理性、抒情性、议论性的特点。

《人生》的题词中引用了柳青关于人生道路的议论：“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据陈忠实回忆：“在这次会上（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延安举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引者注），得知路遥的《人生》发表。会后从延安回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文化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这部在路遥创作道路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里程碑的作品之后，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陈忠实《摧毁与新生》）

同月《当代》杂志主编何启治来西安代表《当代》专门为路遥颁发“《当代》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证书。

6月《人生》发表后，文艺界好评如潮，激起了广大读者强烈反响。

“小说《人生》发表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取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7月11日于西安写《面对着新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文中路遥曾谈到自己创作《人生》的

初衷：

我每次到北京，总爱在首都新建不久的立体交叉桥上徘徊良久。复杂的交叉道路，繁忙的车辆行人：不断地聚会，不断地分散；有规则中的无规则，无规则中的有规则；这一切组成了一副多么纷繁复杂的图景。

立体交叉桥，几乎象征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

.....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里长大；又从这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一地带，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与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可歌的，可泣的，可爱的，可憎的，可喜的，可悲的人和事物都有。我们不应该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只有反映出了生活中真实的（不是虚假的！）矛盾冲突，艺术作品的生命才会有不死的根！

7月 短篇小说《痛苦》刊于《青海湖》1982年第7期。

同月 开始休创作假。

8月17日 收到文学评论家阎纲的来信，被要求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近期以来，很

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在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展现。从《人生》立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你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磨炼之中……归根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年轻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宣传《人生》多么好，多么适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劳而无用。（阎纲《致路遥》）

8月21日 给阎纲复信。谈到小说《人生》是要反映“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其次是要在“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同时也向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一份不成熟的作业。路遥还在信中谈道：“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

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由此产生出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冲突等。他们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

8月23日 给王维玲写信。（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人生》得以顺利和叫人满意的方式发表，全靠您的真诚和费心费力的工作造成的。现在这部小说得到注意和一些好评，我是首先要感谢您的。实际上，这部小说我终于能写完，最先正是您促进的。因为写作的人，尤其是大量耗费精力的作品，作者在动笔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自己劳动的结果的出路。因为我深感您是可靠的、信任我的，我才能既有信心，又心平气静地写完了初稿。现在的结果和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完全一样。您总是那么真诚和热忱，对别人的劳动格外地关怀，尤其是对我，这些都成了一种压力，我意识到我只能更严肃地工作，往日时不时出现的随便态度现在不敢轻易出现了。

南云瑞不断地向我转达了您的一些意见，尤其关于《人生》下部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反复思考和有一定的时间给予各方面的东西的判断。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物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

鉴于这种状况，我需要认真思考，这当然需要时间，请您准许我有这个考虑的时间，我想您会谅解我的。我自己在一方面都应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这肯定是您希望我的。本来，如果去年完成上部后，立即上马搞下部，我敢说它能够完成它，并且现在大概就会拿出初稿来了。但当时我要专心搞好本职工作。八月一日已正式宣布让我搞专业，这部作品一下子中间隔了一年，各方面的衔接怎能一下子完成呢？但所有这一切苦处只能向您诉说。我为失去这段黄金般的工作时间（最佳状态）常忍不住眼睛发潮，因为要造成一种极佳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多么地难啊！

我现在打算冬天去陕北，去搞什么？是《人生》下部还是其他？我现在还不清楚，要到那里后根据情况再说。

另外，我还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下部难度很大，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完整的，那么究竟有无必要搞下部？这都应该是考虑的重要问题。当然，这方案，我愿意听从您的意见。

我也有另外的长篇构思，这当然需要做许多准备才可开工。

《人生》书稿听南云瑞来信说征订数为十二万册，叫我大吃一惊，我原来根本不敢想上十万册。不知最后确定的印数为多少？您估计什么时候能出书？请您告诉我一下。另外，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也请告诉我。

又及：《人生》目前的情况是：我个人收到五六十封读者来信了，还继续有；几乎有七八个电视台和我联系要改电视剧，许多读者寄来了他们改编的影、视本。我不“触电”。评论方面：除《中国青年报》外，《文汇报》已有作品介绍；陕报准备发两千字（算是破格）的文章；《文论报》创刊号将发阎纲和我的通讯；《文艺报》听说已发了文章。另外，曾镇南、白桦等同志都表示想写文章。西安多数同志对这作品有较高评价。还有个有趣现象：一般说，似乎这部作品文学界不同观点的两方都能接受——这是未料到的。

8月至9月 休创作假。

9月3至11日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地区部分青年作家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青年作家共27人，陕西与会者还有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王蓬、赵熙、梅绍静等十人。会后作协领导及各省青年作家前往延安参观访问，路遥也一同前往。

9月17至19日 陪同全国著名作家游览延安后，路遥邀请时为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的贾平凹、西安市《长安》月刊编辑和谷与《延安报》编辑高建群等人到延川，参加延川县委、县政府举办的“纪念《山花》创刊十周年座谈会”。

会议期间，路遥领着贾平凹在自己生活过的延川城故地重游。贾平凹在《延川城记》中写道：“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校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漫坡直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漫坡了，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以此再推想，由永坪镇到黄河是一百四十里，由延川城到黄河是五十里，是不是这座城原是一只窄窄的船，急急要奔赴黄河，拐来拐去行了九十里，突然在这里搁浅，才变成了这般模样呢？……可以设想：每一个生人来到这里，每一个生人都会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城，一个不易忘记的城。我也

有此同感，才写下此文存念，时值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初夜。”

9月28日 蔡翔完成《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第四稿，后发表于1983年第1期《上海文学》。

10月4日 给刘凤梅复信。提醒刘凤梅认真细致地读些外国文学作品。信中路遥认为“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观念束缚并不比思想上、政治上小，极需要一些有勇气的人去打破，开创新的境界。”

10月7日 《文汇报》集中刊登了关于小说《人生》的一组评论：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邱明正《赞巧珍》。

同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的第一期短篇小说讲习班开班。

10月 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刊于《当代》1982年第5期。《在困难的日子里》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的学校生活：“1961年，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上唯一的一所高中——县立中学。”主人公马建强可以说是路遥中学时期的化影，正如路遥所说：“作品主人公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

同月 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初稿完成于甘泉。

同月 《面对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刊于1982年《中篇小说选刊》第5期。

同月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五期读书班开班，此次参加读书班的青年作者有叶广苓、文兰等10余人。

11月 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12月初 《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十三万册。

王维玲回忆：“《人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正式出版，第一版印了十三万册，上市不久就脱销，第二版印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印了七千二百册，总印数二十五万七千二百册。我把《人生》出版后北京文学界、新闻界的评价，以及青年读者对这本书的反映，写信告诉了路遥。这期间我知道路遥新写一个中篇，我向他约稿，建议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这封信发出后不久，王维玲收到了路遥的回信：

很高兴收读了您的信。您告诉了我有关《人生》的一些反映，这使我心里踏实了不少。当然这部作品我自己心中也是有数的。使我愉快的是，它首先拥有了广泛的读者。这和各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收获》发表后，《中篇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都转载了。这是几家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另外，《文摘报》《文艺报》和上海的几家报纸的评论和介绍，都起了很大作用。

评论家的意见当然应该重视，但对作家来说，主要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只要大家看，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安慰。今天接北京广播电台来信，说他们要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播出这篇小说，可惜陕西听不到。就我知道，还会有些评论出来。

我新写的中篇还是个很不像样的初稿，这部小说我极不满意，我羞于拿给《青年文学》。是否有勇气寄给您看看，等我改完再说吧（我不久就着手搞这个令人头痛的东西）。

我明年计划较广泛地到生活中去，一方面写中篇，一方面准备长篇的素材。创作走到这一步，需要更大的力量和耐心走下一步。我自己已到了‘紧要的几步’了。使我踏实和有信心的是背后站着一两位年长的朋友为我鼓劲。我也希望您在我失败的时候能宽恕我。

据王维玲回忆：收到这封信后，我立时给路遥回信。我还是希望他考虑《人生》下部的写作，我告诉他，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进入第二部创作时，就曾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变动。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若进入《人生》下部的写作，极有可能在下部的构思和创作上，对生活的开掘和延伸上，艺术描写和艺术处理上，都可能出新创新，再一次让人们惊讶和赞叹。我还告诉他，《青年文学》组织了一组《人生》评论，首篇是唐达成的。我又一次提到他新写的中篇小说，我说，《人生》出版后，读者更加关心和重视你的新作，希望寄给我看看，争取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12月15日 给王维玲复信。（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感谢您在百忙中给我写信，首先给您解释一下，我新写完的这篇作品，我自己很不满意，加之快七万字了，我不好意思寄给您，您将来会知道我说的是实话。《青年文学》我一定要写稿的，否则我对不起这个刊物对我的关心。从主观上说，我想写一篇问心无愧的稿子给这个刊物，但总力不从心，请相信我下一步如果写出较满意的稿子，我一定寄上。《青年文学》信誉很高，作品是有质量的，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我自己也很为此高兴，因为我对你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2月 在西安写下《这束淡弱的折光——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我仍然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每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小生活天地里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路遥《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同月 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改于西安、咸阳。

同月 由《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组长的职位转为陕西省作家协会正式驻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

下半年 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的第一期短篇小说讲习班上做文学演讲《东拉西扯谈创作》，这

篇演讲后刊于1983年《文学简讯》第2期。

本年《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得1982年度《当代》文学中篇小说奖。

【注释】

[1] 李凤杰，陕西省岐山县人，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宝鸡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针眼里逃出的生命》《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 1983年（癸亥）34岁

1月 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在《青年文学》第1期，后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4月27至29日 “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研讨会。

4月 延泽民的长篇小说《无定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陕北土地革命的画卷。本月，李若冰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文物厅厅长、党组书记。

5月5日至11日 由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组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在西安外语学院举行。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单位的四十多位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道路及其作品的思想倾向、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5月10日 白桦在1983年5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谈到路遥的作品“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结，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地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

5月 海波短篇小说《欺骗》发表在《延河》第5期。

6月6至8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纪念柳青逝世五周年创作座谈会。

6月 西北五省区中国作家协会与西影厂在西安召开大西北科学与文艺座谈会；8月，新疆伊宁召开了有西北五省区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参加的西部文艺研讨会；9月，甘肃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天水召开了“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同时，西北各省区的文艺类刊物也纷纷易名：《新疆文学》改为《中国西部文学》，西影厂的《电影新时代》改为《西部电影》，《西安美术学院院刊》改为《西部美术》；而《绿风》《绿洲》《伊犁河》《青海湖》《朔方》《阳关》《小说评论》等杂志也都设置了各类“西部”栏目，1986年在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西部文学研究所。

8月10日 中国文联在北京举行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和部署学习《邓小平文选》。会议要求各地文联及协会联系文艺界实际，努力纠正文艺领域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8月 陶正的《女子们——〈田园交响诗〉之一》刊于《当代》1983年第4期。

同月 胡采的《胡采文学评论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二届二次理事会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决议。之后，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便召开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了52位理事，组成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章程并选举胡采任主席，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王丕祥任副主席。

9月13日 《人民日报》刊载综述文章《〈文艺报〉等报刊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同月 贾平凹的散文《商州初录》发表在《钟山》第5期。

10月 《延河》开辟小说专号。

同月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内部刊物《陕西文学界》创刊号编辑出版。

11月10日 中国文联召开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讨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12月 陕西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在西安开幕，会议讨论通过了省文联章程（草案），选举了省文联二届委员会，主席胡采，副主席方杰、关鹤岩、鱼讯、杜鹏程、王汶石、林丰、黄俊耀、方济众。

本年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及“笔耕组”开展一系列活动。

1月23日 工资由58.5元调整为66元。

1月25日 给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复信，其中谈到有关《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的创作：

我知道我的这两篇作品尽管读者给予了很大的热情，但官方与批评界的态度有一定保留，因为这两篇作品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冲击一些东西的，似乎显示了一些非主流的倾向，因此恐怕有些领导同志不太习惯。关键问题是我没有直接迎合一种需要。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说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宽阔，需要一些勇气去冲击，而不管自己和自己作品在眼前的命运如何。几年来，我一直寂寞而痛苦地在想追求一些东西。知音是有的，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对您是感激的，因为您第一个正经八百地评论了我的作品。

另外，《在困难的日子里》一稿《当代》压了一年才勉强发表，听说编辑部意见很分歧，有同志说我写了“饥饿文学”，我不理解。他们没有看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写一种精神上的“温饱”。发表出来，读者并没被这种“饥饿”吓倒。这篇作品《中篇选刊》今年二期将转载，安徽电视台已开拍电视。关于《人生》，是我三年苦熬的一篇作品，现关于高加林这个人物正在争论，您

不知看没看《上海文学》今年一期的那篇评论？这是站在一种哲学高度来评价人物的。

1月《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包括唐挚的《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荫安的《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的《人生的一面镜子》等；《作品与争鸣》在1983年第1、2期上刊登“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包括席扬《门外谈〈人生〉》、谢宏《评〈人生〉中的高加林》、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2月28日 王维玲收到路遥的复信。（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自《人生》发表后，我的日子很不安宁，不能深入地研究生活和艺术中的一些难题。尽管主观上力避，但有些事还是回避不了，我希望过一段能好一点。

关于写作，目前的状况给我提出了高要求，但不可能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需要认真的准备和摸索，而最根本的是要保持心理上的一种宁静感，不能把《人生》当作包袱。

这部作品光今年元月份就发表了十来篇评论，看来还可能要讨论下去，就目前来看，评论界基本是公正的。作品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再说，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青年文学》所发三篇评论都看了，唐挚的文章写得很好。

我一直想给《青年文学》搞个差不多的作品，但老是弄不好，人往往是这样，太看重什么事，精神就紧张，反而搞不好，

您就不必再提说这件事了，我实际上在心里一直当作一个重要任务。一旦搞出一个差不多的作品，一定寄上求正，因为我和你们的这种关系，请您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3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座谈会，胡采、王丕祥、王绳武、董得理、畅广元、王愚、李星等20余位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到会。座谈会邀请路遥出席并共同参与讨论。

3月15至20日 出席《延河》编辑部在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召开的第二次小说、诗歌新作者座谈会，发表讲话《漫谈小说创作——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全省各地六十多位新作者与会，出席者多为近一年来首次发表作品的作者。

3月16日 路遥在发言中谈道：“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

3月28日 《东拉西扯谈创作（一）》刊于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编发的《文学简讯》（1983年第2期；总第19期）。

3月 《人生》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名列第四。

王维玲记得，在评委会上，主持评审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冯牧说：“现在青年作者，学柳青的不少，

但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路遥。”冯牧认为，路遥学习柳青，已非一日，不是表面上的模仿、套用，而是深入到作品中去，逐章推敲，从结构设计到情节安排，从人物刻画到细节运用，从描写角度到语言运用，由表及里，方方面面的学习、领会、研究、消化。

同月 在北京写下《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谈道：“当得到一种社会荣誉时，自己内心总是很惭愧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荣誉面前感到深深的惭愧。正因为如此，我在惭愧中不由得深深地沉思。”

本月 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当代纪事》收入短篇小说六篇，中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的副标题均采用××××年纪事的方式，《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纪事》。“史诗”的宏大叙事不只是向前辈柳青（《恨透铁》——1957年纪事）学习致敬，而是路遥的一种自觉意识的创作，采用史家笔法，用“编年史”的方式翔实而准确地记录见证了最真实的时代。

4月9日 在上海写纪念柳青的文章《柳青的遗产》：

……柳青是这样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

那么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褶皱。

.....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

.....

柳青的创作活动告诉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出息的。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尽量使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和认识的那个小天地里。

.....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4月 在上海修改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同月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转载于《中篇小说》1983年第2期。

6月 《柳青的遗产》刊于《延河》1983年第6期。

8月1日 正式离开《延河》编辑部，成为专业作家。

8月3日 与延川县委书记申易陪同前来采访“赤脚医生孙立哲”的李小巴去新胜古大队。当日与李小巴同住新胜古大队。

8月中旬 赴延川与剧组共同筹备电影《人生》。

在吴天明导演的率领下，西安电影制片厂《人生》摄制组，进驻延川县城。在《人生》正式开拍之前，导演带着主创人员一度北上去陕北体验生活，让剧组人员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陕北农村住了一段时间，导演认为主要演员“像”了，于是让剧组人员搬回了县城，住进了招待所。期间，路遥随剧组在延川生活二十余天。

8月20日 给李炳银复信。给李炳银的信中，表示会认真思考《人生》的创作。

炳银兄：

你好！

前后两信件及您的稿件均收读，因这两天忙于搬家，迟回了几天信，请原谅。

我八月一日开始已正式离开编辑部……您的稿件我交值班室的副主任贺抒玉同志，她说一定妥善处理……

关于《人生》，您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看来您是认真读了，我十分感谢。其中许多意见是极好的，我会认真思考您的意见的。这部作品不管成功与否，得失如何，我无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也想带来一些东西。主题和人物是复杂的，也是多义的。我总觉得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似乎不好说话？作为我自己来说，没什么奢求，我只是较愉快地完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以后时间多了，但创作最需要的是一种心理因素，最近的日子这个因素欠佳，因此很难动笔写什么。您一直热心地关怀着我的创作，望今后仍能给予支持。

致敬意！

路遥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

8月25日 《使作品更深刻更宽广些》刊载于《文学报》1983年第25期。

8月 在榆林文联二楼11号房间写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

同月 《要有真情实感——读〈剪鞋样〉》刊于《长安》1983年第8期。

9月11至16日 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后，在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路遥当选为理事会理事。

10月 电影《人生》在陕北米脂县、宁夏银川拍摄。

导演吴天明在陕北米脂县拍摄《人生》期间，广西厂三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到陕北为他们的第一部电影选景，拄着拐杖找到吴天明，希望能借点钱，吴天明借了2000元给他们，还把剧组的一辆吉普车协调给他们，这3个年轻人就是陈凯歌、张艺谋和何平，筹拍的电影是《黄土地》。（余楠《世界上最赤诚的那个中国导演去了》）

在拍摄电影《人生》外景时，吴天明突然得知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时年，吴天明44岁，是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之后带着《人生》剧组在

银川拍摄，当时路遥也在剧组，据吴天明回忆，有一天晚上他与路遥聊天，问路遥，这个（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咋当？当时西影厂有一千七八百人，连家属六七千人。路遥说：“这好当得很，你就回去一个月不要说话，你晚上拍戏，进棚拍内景嘛，上午睡觉，下午各个部门开会，给你汇报工作，然后晚上拍戏，你一句话不要讲。”后来吴天明说回去以后就按路遥说的那么做了，晚上在棚里头拍戏，上午睡觉，然后下午就开会，一个车间一个部分。

10月 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刊于《小说界》1983年中篇小说专辑。

11月30日 给申沛昌复信。表示申沛昌是“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并就当时申的处境，劝慰其“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申沛昌《十五年后忆路遥》）

11月 《延河》11月号刊登《了解青年写好青年——西安市文艺评论组召开青年题材创作座谈会》。

12月27至29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了陕西中青年作家近年发表的三十多部中篇小说研讨会，其中有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陈忠实的《康家小院》，贾平凹的《二月杏》《小月前本》等。

12月 《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收入《五月的杨家岭》一书，该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 张钟龄改编，颜宝臻绘的连环画版《人生》
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 1984年（甲子）35岁

1月3日 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长篇讲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总结了两年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的主要内容和实质。2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胡乔木的署名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月 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在《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发表，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4月 陕西省延安文艺学会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选举李若冰为会长。

同月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举办短篇小说讲习班，有27名青年作者参加。

5月16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有5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著名作家望远坚关于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思考的讲话，题目是《小说创作的第二步》。

7月16至25日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同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等单位共同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省内外200余人与会。

8月1日 《延河》编辑部邀请部分诗作者、评论工作者在西安召开诗歌座谈会。《延河》10月号刊出李国平的文章《诗歌要起飞》，对诗歌创作座谈会进行了报道。

8月 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刊于《十月》1984年第4期，后获得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9月 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在《当代》第5、6期连载，后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会议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

12月 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贺词。张光年做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长篇报告。

1月14日 出席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组织召开的笔会，与张贤亮相识。

“我是在由陕西中国作家协会在西安举办的笔会上认识路遥的。可是路遥好像出席不多，出席时也是一脸愁云，很少说话。西安笔会还安排我在‘人民剧院’讲了一次‘创作谈’。……我一人在台上舞之蹈之高谈阔论后，陕西中国作家协会请我吃饭，路遥也在座，仍然很少说话。但吃完了饭他非常诚恳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说是他家离饭店不远。我记得他家就在陕西中国作家协会院内的宿舍楼里，连建筑面积也就70多平方米的样子。当年人人家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路遥的家更是简单得近乎简陋。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后他给我冲了杯茶，用一个乌蒙蒙的玻璃杯。我突然发现好像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

蒙的，连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当时在座的还有王愚，我记得从他家出来走到街上我对王愚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时陈忠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常被人谈起，后来才知道忠实那时常住在乡下。我们西北作家和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因而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这是我和路遥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张贤亮《未死已知万事空》）

2月5日 《看评剧〈人生〉》刊于《西安晚报》
1984年2月5日第3版。

2月 王愚写作的评论《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刊于《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1期。

3月5日 吴天明召开了1984年度创作会议，邀请了包括钟惦斐、郑洞天在内的一批专家到西影厂来研讨。座谈会上，钟惦斐看了《人生》以后很激动，他说，像陕北包着白羊肚手巾的这种老农，披着羊皮袄，拿着放羊铲的形象，不比拿破仑不威武，他还说西影厂，应该开掘西影厂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题材，这可被称为“中国的西部片。”他还建议西影厂，如果确定了创作方向，就朝着这个方向，打出西影厂自己的特点来。

3月初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

据陈忠实回忆：“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整个文学创作，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那个时候刚刚引进的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是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他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这句比喻久久不忘。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3月22至27日 出席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议讨论如何开创陕西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局面，胡采、王汶石、杜鹏程、王丕祥、李若冰等人也出席了会议并发言。

4月 《对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几点认识》刊于《陕西文学界》1984年第2期。本月，《你怎么也想不到》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双月刊《文学家》创刊号；完成短篇小说《生活咏叹调》于西安。《生活咏叹调》（三题）包括《小镇上》《杏树下》《医院里》。

同月 应邀在陕西师范大学做报告。刘路回忆：“当他讲到《人生》的创作经过时，他对学生们说，在《人生》的创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你们刘路老师的极为宝贵的支持，他把自己很多非常好的素材借给了我，可以说，高加林的形象，是我和他共同创造的。我借他的这笔债，怕永远也还不了啦！当时我坐在台下，真是感动极了！望着学生们向我投来的眼光，我连忙站起来说，不用还了，不用还了！”（刘路《坦诚的朋友》）

6月7日 完成《东拉西扯谈创作（二）》。

6月 《延河》6月号刊出《生活呼唤着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纪要》。

7月3日 电影《人生》在京试映后，文化部电影局《电影通讯》编辑室与《中国青年报》社邀请首都文艺界、电影界部分领导、专家及大学生代表座谈了它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并探讨了如何使影片通过适当修改更趋完美的问题。

7月 短篇小说《生活咏叹调》刊于《长安》1984年第7期。

8月30日 《西安晚报》刊发文章《第一部西部片〈人生〉将在本市、榆林首映》。

8月31日 中国新闻社西安8月31日电：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人生》即将在北京、西安、贵阳等市上映。

9月10日 给时任延安地区文艺创作室主任杨明春写信。谈及筹备延安文联事宜。

9月25日 陕西省首届文艺创作开拓奖在西安举行颁奖大会。路遥获陕西省文联颁发的“陕西文艺创作开拓奖”荣誉奖，“笔耕组”和《延河》获知音奖。

9月下旬 出席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作者座谈会。“九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邀请专程来贵阳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鲍昌和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青年作家路遥同我省部分作者座谈。两位作家就当前的改革和文学创作现状的问题做了发言。”^[1]

9月 《人生》在全国公开放映。

陈忠实说：“陈行之^[2]（陈泽顺——引者注）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路遥、贾平凹等都上过

这个专辑，我也在幸运者之列。”（陈忠实《难以化解的灼痛——读陈行之新作〈危险的移动〉》）

实际上，路遥只在《文学家》的创刊号上刊发过一个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并没有上过“陕西作家专辑”栏目。《文学家》主编陈泽顺说：“我在主编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的时候，曾经开辟“陕西中青年作家研究”的专栏，去找路遥，希望他支持。他翻阅着我的计划方案，脸上似乎有一种责备的神情。他支持我开这个专栏，但是不主张把自己列入其中。他当时态度之坚决，让我感到很惊讶。”（陈行之《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

本月与时任《延安报》总编辑、作家银笙商量王天乐从煤矿调到《延安报》的事宜。最终，敲定于当年秋将王天乐调入《延安报》社。

10月4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六期读书班开班。

10月上旬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主席团根据改革形势需要，宣布对《延河》实行补贴承包。后经过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主席团决定由白描承包，并任命白描为《延河》主编。

10月19日 《解放日报》报道，电影《人生》将第一次代表我国参加奥斯卡金像奖比赛，电影《人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影片。

10月 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刊于《钟山》1984年第5期。

11月24日 《延河》召开了座谈会，主编白描宣布了《延河》的办刊方针与有关措施，同时宣布新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名单，路遥为编委会成员。

11月30日 路遥给时任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的老师申沛昌写了一封亲笔信，提及：“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但“诸种复杂局面”是什么？他并没有点明。

12月2日 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吴天明赴美国参加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该厂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获得“1984年东西方中心电影奖”。这次电影节上，还放映了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

12月21日 陕西省文化文物厅举行颁奖大会，奖励在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奖的西影厂新片《没有航标的河流》，同时对影片《人生》摄制组也进行了奖励。

12月28日 陈忠实等十余名作家以陕西作家代表的身份出发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路遥请假，未参加此次代表大会。

12月 在西安答《延河》编辑部问，后成文《答〈延河〉编辑部问》发表。

在这次对话中，路遥曾谈到自己“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了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斯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拉》、夏绿蒂的《简·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同时，路遥也述及了自己对《延河》的特殊感情：“《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本月 马慧改编，高廷智、张省莉绘的《人生》连环画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本年 确定长篇小说《走向大世界》的基本框架，计划创作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三部书分别取名为《黄土》《黑金》和《大世界》。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创作《平凡的世界》做了详细的描述：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

.....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过程。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

.....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

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

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有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本年 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持的《人生》广播剧播出。上海话剧团把《人生》改编成话剧，并进行公演。

【注释】

[1] 1984年第12期《山花》杂志刊载了此次座谈会情况。该杂志并非曹谷溪所办《山花》，而是由贵州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半月刊），创刊于1950年。

[2] 陈泽顺（1951—），又名陈行之。1969年到陕北插队，当工人，读大学，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等。

|| 1985年（乙丑）36岁

1月6日 新的一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月 《小说评论》在陕西创刊，同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成立了理论批评委员会。《小说评论》第1期刊出胡采《让评论和创作同步前进——代发刊词》，阎纲《无题附录的祝贺》，蒙万夫《田野上庄重而深沉的希望之歌——评中篇小说〈初夏〉》，王汶石、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白桦《一九八四年若干中篇小说争鸣述评》，肖云儒《第二次征服〈人生〉——从小说到电影》，陈孝英《关于文学批评的随想》等作品。

2月 阿城的中篇小说《孩子王》刊于《人民文学》第2期；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刊于《上海文学》第2期。

3月 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刊于《人民文学》第3期。

同月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发表在《中国作家》第2期。同期发表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5月22至25日 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西安召开。如何估计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态势，肯定自己的特色，坚持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在成绩中查找不足和差距，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不断地吸取生活营养、艺术营养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超越，在冷静的反思中追求更高的创作境界，实现

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新繁荣，构成了这次会议的总主题。

5月 国际青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主办“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揭开了“85美术运动”的序幕。随后，“85新潮”开始兴起，影响波及整个文艺领域，包括文学界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小说，陈东东、王寅、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歌群体；音乐界瞿小松、陈其刚、谭盾等人的先锋音乐；电影界陈凯歌、滕文骥、何平等人的探索电影。

同月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在《文学评论》第5期。

同月 和谷的《市长张铁民》在《延河》1985年5、6期发表，后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

6月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残雪的小说《山上的小屋》刊于《人民文学》第6期。

7月6日 《文艺报》发表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由此，中国大陆开始兴起“寻根”和“文化热”并在随后的两年中达到高潮，海内外普遍将此视作继“五四”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同期，各大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寻根文学”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等。

7月 王愚的《王愚文学评论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5日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10月中旬 《延河》《小说批评》联合召开王安忆、韩少功、叶蔚林、莫应丰等具有寻根意识作品的小说讨论会。

12月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刘心武的《钟鼓楼》三部长篇小说获奖。据参加评选工作的吴秉杰讲：“在北京西山评委会第一次集中讨论的十天中，刘白羽让人捎来了自己的三点意见，他提出茅盾奖不能照顾题材，当然也不考虑其他因素，要全凭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评奖。”

本年 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文论集《平凹论文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 何西来的文学理论专著《新时期文学思潮论》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年 白描任《延河》主编，闻频、晓雷任副主编。

1月15日 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

1月29日 给时任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厅长、青海省《现代人》杂志主编孟伟哉写信，推荐海波到《现代人》当编辑。不久，海波就被借调到青海省文化厅的《现代人》编辑部。

2月20日 农历乙丑年正月初一，于西安写《〈路遥小说选〉自序》：

“我将自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品挑拣出一部分，编成了这本选集。通过这本书，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我十来年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弯弯曲曲的爬蜒痕迹。这些作品都没什么改动，保持着初发表时的面目。之所以这样，并非这些作品没有可修改之处，而是我常常没有能力这样做。我感到，如果在总体上不能复原当初创作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即使后来想弥补作品的某些缺憾，也往往等于疤上补疤，因此也就放弃了这种应该而且必需的努力。”

3月5日 因文学创作成就突出，受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表彰。

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在省政府会议室召开大会，表彰了一批改革开放以来有突出成就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其中文学创作方面有青年作家路遥、贾平凹、李凤杰，每人给予晋升两级工资的嘉奖，省长李庆伟亲自颁发了奖状。为此，《陕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人民需要名家》。

3月31日 短篇小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发表于《西安晚报》。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文革”前后生活的鲜明对比，歌颂了党在新时期的农村政策。

4月4日 丁玲到西安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座谈会，并讲话，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扎根在人们的土地上》。当晚，协会陕西分会在人民大厦宴请丁玲；次日，丁玲在肖云儒等人的陪同下回到延安。

4月5日 在延安宾馆参加延安地委招待丁玲的宴会。据肖云儒回忆：丁玲来延安后，延安地委在延安宾馆设宴招待，丁玲听说路遥在延安写长篇小说，一定要见见路遥。但谁也联系不到他。后来通过路遥弟弟联系到路遥，路遥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宴会上，丁玲叫路遥坐在自己的旁边，和他密谈文学，赞赏有加。当晚11点后，路遥突然闯进肖云儒房间，对肖云儒说：“你跑了一天，很累，不管怎么累，你要认真听完我今晚这个长故事，感觉一下，判断一下，你是文艺

评论家，文学直觉很好，你一定要帮这次忙！”肖云儒在路遥脸上读到一种进入创作境界以后的痴迷、亢奋与热切的神情，决定听路遥倾吐下去。路遥讲一群从黄土地深处走出来的青年人，讲他们青春的悲欢、步履的艰难，讲他们中间有的从农村中学生成为煤矿工人，有的后来成为航天专家……这个春夜里，路遥的话多且长，一直讲到凌晨两点多。肖云儒在后来的回忆中称：“那时，才开始动笔，种子在春气中萌动，顶得他的心田不能安宁，整个精神处在临产前的骚动中。”（肖云儒《文始文终记路遥》）

4月21至24日 在咸阳出席陕西省中国作家协会三届二次（扩大）理事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清左破旧，促进陕西省文学更加繁荣”。通过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本次会上，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等四位理事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路遥分管长篇小说创作。他如沐春风，彻底摆脱了高悬在头顶的那块“原罪”般的“大石头”。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办公室的两位同志赶赴陕北，在路遥出生地清涧、成长地延川以及曾经就读的延安大学走访调查。

4月 《路遥谈创作》刊于《文学评论家》1985第2期。

5月14日 写信给海波。谈到宝鸡文创室主任蒋金彦的中篇小说《儿女经》，恳请海波在杂志上刊发。

5月18日 给王维玲写信。（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很长时间未和您联系了。这两年诸事纷纭，一言难尽，有机会见面再说吧。目前，我自己的情况还可以。省委已任命我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前不久分会理事会上，又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副主席。说起来很悲哀，作为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我不应该给您说这些，但对我这两年的情况而言，最起码可以起到一点正视听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情况给您谈一下，因为您一直是我最有力的帮助者。

《人生》这部作品，提高了我的知名度。这两年我一直为一部规模较大的作品做准备工作，我痛苦的是：我按我的想法写呢？还是按一种“要求”写呢？或者二者兼之呢？后两种状态不可能使我具备创作所需要的激情，前一种状况显然还要遭受无穷的麻烦，对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文学追求极其艰难。当然，一切还取决于我自己，我一直在寻找勇气。年龄稍大一点，顾虑就会多一些，我想我还是可能战胜自己的。

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分来，我当然还会先交给您，让您帮我判断。

我不久又去陕北补充素材，如果没有意外，我下半年可能可以动笔，估计写起来很艰难，在时间上也会拖得很长，有一点长处是，我还能沉住气。

我几年中大部分时间躲在家读长篇，（计划读一百五十部），很少外出，如来北京，再去看您。祝您愉快。

5月23日 电影《人生》获得第八届大众电影最佳故事片奖。

全国影协在成都召开“双奖”（金鸡奖、百花奖）颁奖大会。西影厂拍摄的故事片《人生》获第八届大

众电影最佳故事片奖，吴玉芳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作曲许友夫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活动期间，在四川大学有一场电影《人生》的公开放映，谢晋、吴天明等赶了过去。台下聚集了约一万两千多人，都等着看片子。突降暴雨。按理说，这时人该散了，没想到一个人都没走，都要看吴天明的《人生》。这部根据路遥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让学生们兴奋不已，电影放完后竟有人自发喊起“电影万岁”“《人生》万岁”，甚至还有人大喊“吴天明万岁”。当时，61岁的谢晋在台上对学生们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电影节，再伟大的电影节也不过如此。吴天明在台上没有说话。《人生》是他的转折点，在以导演身份获得肯定与赞誉的同年，他执掌西安电影制片厂，拉开了电影传奇时代的序幕。（颜亮、李昶伟《铿锵年代：吴天明与西影厂的那些年》）

6月《答〈延河〉编辑部问》刊于《延河》1985年第3期。在这个访谈中，路遥直接回答了他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

同月《东拉西扯谈创作（二）》刊于《陕西文学界》1985年第3期。李星撰写的专门研究路遥创作审美特点的评论《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刊于《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7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提交关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四人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给陕西省委宣传部的审批报告》，报告指出：在今年四月举办的陕西省中国作家协会三

届二次（扩大）理事会上，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以选票多少为序）被选为分会副主席。现呈送以上同志的考察材料及任免呈报表，请审批。文末“附：路遥等四同志材料。”（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路遥同志考察材料

路遥，男，曾名王卫国，陕西省清涧县人，生于1949年12月2日，贫农家庭出身，学生成分，1969年11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63年前在延川县城关小学等校读小学，1963年8月至1968年11月在延川中学上学，1968年11月回家乡延川县城关公社郭家沟村劳动，1973年8月去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9月分配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延河》编辑部工作。1978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任《延河》编辑部小说组副组长，1982年9月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专业作家，1985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路遥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加入延川中学群众组织“红四野”，被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后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他又被选为领导成员之一，主管宣传工作。1968年6月以群众代表身份结合为县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上延大学习时，脱离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文化大革命”初期，路遥尚未成年，以群众组织领导成员身份参加过一些活动，犯有错误，1984年省级机关第一批整党时，进行了认真调查落实，经宣传口整党指导小组批准，结论为“一般错误，不做处理”。

路遥返乡劳动，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逐渐有所认识，便自觉回避一些派性活动，在所谓“批林批

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对“四人帮”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罪行尤为愤慨。

他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文艺方面的改革，拥护清“左”破旧。他视野比较开阔，为陕西的文学事业和本会工作经常提出改革性、建设性意见和设想。

路遥勤奋学习，认真深入生活，刻苦写作，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十年来他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人生》。先后出版的有《人生》《当代纪事》《生活咏叹调》《路遥小说选集》等著作。其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先后获全国第一届及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他担任编剧的电影《人生》获1985年电影百花奖。还有《姐姐》《风雪腊梅》《在困难的日子里》等多篇作品获地方及报刊文学奖。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五年三月举行的奖励优秀文艺工作会议上，为他颁发了奖状，晋升两级工资。

路遥与群众的联系还不够普遍，应经常联系群众，听取意见，特别要注意听取老同志的意见。

1985年4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

1985年6月

7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正式发文明确路遥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

8月13至22日 与王汶石、杜鹏程、和谷等人一起赴太原，参加黄河流域8省（区）首届笔会。期间，路遥与记者于进^[1]就小说《人生》进行了问答。在关于小说《人生》续集的问题上，路遥回答：“实际上，现实生活没有完，人生也不会完。但作为《人生》这部

作品，我认为是完整的，没有续写的必要。”（于进《于进作品选·散文卷》）在此次会上，路遥认识了作家周山湖，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

8月20至24日 组织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长篇小说促进会。

陕西省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中青年作家32人在延安召开了长篇小说促进会，会议的宗旨和议题包括了解近年来国内外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和发展概况；分析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势及落后的原因；制定陕西三、五年内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划与设想。本次会议使“陕军”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路遥、贾平凹等人投入到了长篇写作当中。

8月24日 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路遥同志任职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党委：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路遥同志来我局需要较长时间体验生活搞创作，为了方便工作，根据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建议，经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于1985年8月21日常务会议研究同意：

路遥同志兼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组织部

1985年8月24日

8月25至30日 与“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参会人员赴榆林召开座谈会。

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书记处书记李小巴主持，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董墨、任士增、王绳武、白描、蒋金彦、沙石、子页、王宝成、朱玉葆、王观胜、牧笛、胡广深、师银笙、陈泽顺、韩起、白洁、杨小敏、封筱梅、文兰、张晓光、赵宇共、子心、李康美、孙见喜、李国平、袁林等三十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向晨、韩亚君同志应邀参加了座谈会。

这个会后两年，路遥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贾平凹出版了《浮躁》。随后京夫、王蓬、赵熙等人相继出版了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力与影响的长篇小说，呈现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浪潮。长篇小说的勃兴与发展标志着陕西作家在写作规模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大突破与追求。

8月 在“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会后，经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省煤炭厅来函提议，铜川矿务局党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路遥以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正式来到矿区体验生活并进行创作。路遥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以及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一头扎进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开始为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做准备了。在煤矿期间，路遥在弟弟王天乐的协助下，深入职工群众中调研访问，又多次和矿上的同志一起下到千米井下现场，深刻体验煤矿生活，搜集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9月 《路遥小说选》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秋 住进陈家山煤矿医院，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于当年岁末写完了作品的第一部。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这样描写创作的开头工作：

“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

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日子里，抽空躺在床上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是他最大的安慰。路遥说：“每晚读上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爱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

“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升井后，把安全帽从头上拿下来，往地上一放，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对矿上陪同的人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剑熔《路遥在铜川矿区的日子》）

10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七期读书会开学。

10月21日 作家秦兆阳应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邀请，偕夫人来陕访问。在作协陕西分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讲话，后录音稿发表于《陕西文学界》，题为《创作问题漫议》。

路遥知道秦兆阳到西安后，便联系赶往回西安的车。车到半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又联系坐上了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最后返回。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祈求秦老谅解：“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当路遥因为天气和道路的原因最终在赶往西安的路上又返回时，路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路遥曾坦言，如果没有秦兆阳，“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后来，路遥多次赴京，都鼓不起勇气看望他尊敬的秦兆阳。

11月 《姐姐的爱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月 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录下了自己的创作状态：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是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

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十一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攻’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

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

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

12月11至17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首届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87名代表均是35

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的骨干。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次秘书、会务会上，路遥一改平时随和的态度，认真检查起了准备工作，叮咛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地方。在这次青创会上，路遥做了专题报告。

12月19日《注意感情的积累》刊载于《文学报》总第247期。

年底《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初稿完成。

“终于要出山了。因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

“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终于要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难受的是，这地方曾进行过我最困难最心爱的的工作，使我对它无限依恋。这是告别地狱，也是告别天堂。总之，这将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

“寒冬中，我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此地，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二十多万字初稿。透地褰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记得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在毫无察觉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异。没有遗憾，只有感叹。过去那段时光也许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充实的日子。现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本年 电影《人生》获得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本年 出任西北大学《青鸟》文学社顾问。

【注释】

[\[1\]](#) 于进，时任甘肃省定西电视台电视编导。

|| 1986年（丙寅） 37岁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简称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

1月 《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总第7期）刊登了《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小说评论〉〈延河〉召开部分小说讨论会记略》一文，署名一评。

3月4日 作家丁玲在北京逝世。

3月 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审议批准第七个五年计划。

同月 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

同月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

4月1日 《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举行了纪念创刊30周年大会，出席的有省委及文艺界领导同志、作家、新老编辑100余人。当日，颁发了1985年度《延河》文学奖。

5月 《小说评论》1986年第3期（总第9期）刊登胡采的《作品要闪耀时代光辉》《当代小说发展与陕西中篇创作——1985年

陕西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发言纪要》和邢小利的《一幅历史与人的艺术画卷——读〈黑龙沟的传说〉》。

6月 邹志安的短篇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发表于《北京文学》1986年第6期，后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9月17至21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在西安召开了小说创作突破与提高研讨会。来自省内各地的近六十位老中青小说作家、评论家和文学期刊编辑出席了会议。会议自始至终充溢着宽松、自由、和谐的民主气氛和严肃认真的反思精神。会上有人讲，一般说来陕西的小说创作是有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例如路遥的深沉绵密、贾平凹的钟灵秀雅、陈忠实的淳厚朴实，这些都是作家自身逐步形成的创作个性和风格。会议肯定陕西文学创作形成的三个特点：一是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二是贴近时代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三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探讨陕西创作存在的不足，观念需要更新，作家群体艺术功底和知识结构存在不足。

9月 《上海文学》发表史铁生的小说《毒药》。

同月 延川中学成立“冲浪文学社”。

1月 由“笔耕”文学研究组撰写的《西北中青年作家论》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了畅广元撰写的《按照美的规律表现新时代的美——评路遥作品的美学特色》。

2月 开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稿工作。

“春节过后不久，就又进入周而复始的沉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能纯粹地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抄写第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

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春 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李金玉到西安约稿《平凡的世界》。

毕业分配到中国文联出版社两年多的李金玉到西安组稿，出版社让她盯住的首要目标是贾平凹正在创作的《浮躁》。然而，贾平凹的手稿被作家出版社抢走了，于是她就去见路遥，路遥正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当时叫《普通人的道路》）第一部，她向路遥约稿，路遥未明确表态。

同期 将《平凡的世界》手稿辗转交予赴西安组稿的《当代》编辑周昌义，据周昌义回忆当时路遥提出“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

周昌义谈道：“当天下午，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兴致勃勃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之后，周昌义以“《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为由退稿。

此后，《平凡的世界》的发表与出版也并不顺利，周昌义说：“《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

新作，他们的新任副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还不止松一口气，《花城》发表了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没了音信，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黄河》好像是山西文联或者作协的，比《花城》还要边缘啊。有传说，在《黄河》上发表也不容易，也费了不少周折……”（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

3月24日 受黄陵县文化馆李延军邀请为《青年诗友报》题词：“桥山沮水多神灵，先祖植下中华根。我辈岂敢怠且慢，万古精英待钩沉。”

5月 再次收到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李金玉的约稿。为了组到路遥的稿子，李金玉又一次到了西安，待了一个多月。通过一个多月的交流和观察，她发现路遥为创作进行扎实的准备工作，对全书结构有着精细构思，这坚定了她对书稿的信心。

诗人子页得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还没找到婆家时，主动给花城出版社总编辑、诗人李士非打电话推荐。同时，在京的陕籍评论家李炳银也向《花城》推荐了此稿。李士非获知讯息后，第二天就派《花城》杂志副主编谢望新乘飞机来西安看稿。评论家王愚是谢望新的老朋友，路遥一再要王愚询问谢望

新的意见。经过几天阅读，谢望新认为这部作品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不仅准备刊用，而且想在作品发表后由《花城》和《小说评论》联合在京召开作品研讨会，向社会推荐这部作品。谢望新返回广州后，把书稿交给编辑刘剑星，让他担任此稿的责任编辑。

6月中旬 李金玉带着三十多万字的《平凡的世界》的书稿回到北京。

当李金玉回到出版社后，出版社一些领导却认为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当时，社里领导为路遥能否完成这个三部六卷的百万字的长篇而担心。当时，李金玉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因为当她从路遥手中拿到誊写工整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后，她便被作品的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深深震撼了，她感到这就是路遥的气魄，路遥的风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手笔”。（周英峰《〈平凡的世界〉背后的不平凡》）

据王维玲回忆，1995年，在第一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召开的评委会上，中国文联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宋文郁先生告诉他：“路遥在把《平凡的世界》交给他们出版的时候，明确表示，假如王维玲来信、来电要稿子，他便要无条件地把《平凡的世界》抽出来给中青社出版。王维玲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让我受到难以承受的震撼，我想到在路遥身上陕北汉子的那种雄浑、淳朴和憨实的特点很突出，但在性格上自尊、自信、自强、自爱与执拗的个性也很鲜明。为

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路遥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呢？肯定是在什么环节上与中青社发生了芥蒂，结下了扣子，产生了疑虑。”（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

6月 与日本学者前川幸雄座谈。应聘在西安外语学院任教的日本学者前川幸雄，为了解陕西文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在3月、6月先后与胡采、王汶石、杜鹏程、路遥、陈忠实、王愚等进行了座谈。

本月 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举行。因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发表有眉目了，作为球迷的路遥放弃了看世界杯的机会，和弟弟王天乐南下广州城体验生活去了。路遥决定去广州逛几天，为第二部即将出场的“二流子”王满银体验一下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在广州期间，每天晚上回到旅馆，路遥就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回到西安后，路遥又对第二部中即将写到的一些内容进行必要的素材补充和尽可能的现场体验：一是，他在西北工业大学采访了几天；二是，在一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他专门趁省委书记一家外出时，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深入生活活动，了解到“省委书记”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

7月23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8期读书会开学。

7月27日 给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李金玉写信。谈及《平凡的世界》的封面设计。

8月1日 给刘仲平^[1] 签送《路遥小说选》。

8月23日 给李金玉写信。

8月 梅邵静的《她就是那个梅》出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1985—1986）优秀新诗（诗集）奖。

夏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二稿结束。在陕北吴起县人民武装部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但这却是真的。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9月17至21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小说创作突破与提高研讨会。

9月 《小说评论》第5期刊登了李勇《路遥论》。

秋 告诉弟弟王天乐说自己“恋爱”了。王天乐早已知道路遥与嫂子林达离婚已成定局，只是迟早的事情。路遥向王天乐展示了闪电式的恋爱证据：一封三

页长的信。《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一稿结束不久后，路遥与王天乐便飞往路遥早已想去的城市，但半年后这段“恋情”以告吹结束。（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

11月 代表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负责接待柏杨夫妇。柏杨从河南辉县老家为父母扫墓立碑之后，赶赴西安探亲访问。路遥代表陕西省中国作家协会负责接待柏杨夫妇。柏杨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西安，路遥在火车站一直等待着柏杨夫妇的抵达。柏杨夫妇在西安期间，由路遥主持了一场座谈会，就大陆与台湾作品比较方面以及作家制度的改革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之后，路遥代表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赠送给柏杨夫妇一只景泰蓝花瓶。柏杨在后来的著作《家园》一书中记载下了这一切。（汪炎《漫忆路遥》）

本月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1986年11月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

12月29至30日 出席《花城》《小说评论》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

《平凡的世界》在《花城》1986年第6期发表后由《花城》《小说评论》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在京和陕西的部分评论家鲍昌、谢永旺、朱寨、陈丹晨、缪俊杰、何西来、顾壤、刘锡城、冯立三、何镇邦、张韧、雷达、蔡葵、曾镇南、李炳银、晓蓉、白桦、朱晖、王富仁、陈学超、刘建军、蒙万夫、李健民、白描、李国平等同志应邀参加了座谈讨

论。座谈会由《花城》副主编谢望新、《小说评论》主编王愚、副主编李星主持。座谈会上，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纪要》，《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评论家蔡葵、曾镇南、朱寨等给予小说充分肯定。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会议纪要由时任《小说评论》编辑的李国平记录，他在《纪要》中写道：

座谈会上，评论家们给予小说以这样的总体评价，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是对十年浩劫历史生活的总体反思。在事件和人物之间，作家更着力表现新旧交替时期农民特有的文化心态，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和未来。

他们谈到，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纵向发展来看，往往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个长篇小说的高潮。在现代文学史上，从二七年之后到三十年代初，出现了《子夜》、《骆驼祥子》等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之后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高潮。在当代文学史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是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十年之后，出现了《创业史》、《红旗谱》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形成了当代

文学中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高潮。而一九八六年，正好是新时期文学的第十个年头，仅这一年里，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长篇小说达三十余部，可以说，一九八六年，我们真正意识到了新时期长篇小说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而路遥同志的《平凡的世界》是八六年长篇中一部相当有力度、相当突出的优秀作品，它同其它优秀作品如《古船》、《活动变人形》等一起，构成了这一年长篇创作的总体高度，并且预示着新时期第二个十年长篇小说创作将会出现的良好势头。

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指出，作品开头有些徐缓，其中有些章节读来有些沉闷、板滞。与会同志就这部长篇的创作提出了进一步的希望，并衷心期待《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取得更高的成就。

主持此次研讨会的《小说评论》主编王愚回忆：“1986年底，路遥同《小说评论》《延河》的几位同志，一起前往北京，十分认真地听取了北京评论界几位评论家的发言。并且在会上做了简短发言，认为评论家的评价是认真的。”（王愚《“文章憎命达”——忆路遥二三事》）

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曾思考过相关问题：“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

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

本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版的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一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地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冬 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初稿。“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注释】

[\[1\]](#) 刘仲平，陕西府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背叛》《机关红颜》，散文集《黄河潮》。

|| 1987年（丁卯） 38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刊发元旦献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文章强调：“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搞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月21日 中国作家协会召集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进行学习座谈。

同月 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在《北京文学》第1期。

同月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发表在《收获》第1期。

同月 《延安文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3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

4月7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报道问题的讨论纪要》。

5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处》。

6月22日 西安市文联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6月 《延河》1987年第6、7期，隆重推出“陕西文学新军33人小说展览”，向全国展示了陕西雄厚的文学新生力量，同时极大地激发鼓舞了省内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和信心。

7月21至22日 《小说评论》编辑部在西安召开贾平凹作品《浮躁》讨论会，会议肯定作品是从宏观上把握时代律动的重要作品，会议纪要在《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总第18期）刊出。

8月 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

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会议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0月26日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奖。

11月20日 作家出版社邀请十多位著名评论家在北京召开了贾平凹长篇小说《浮躁》研讨会。

11月21至23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有60余位小说作者出席，就两年来陕西省小说创作状况和创作中的问题充分交流意见。

本年 邹志安的系列长篇小说《爱情心理探索系列长篇》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月 《〈路遥小说选〉自序》刊于《小说评论》1987年第1期（总第13期），同期刊出的还有一评的《增强进取意识寻求新的突破——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小说创作突破与提高研讨会纪要》。

2月《小说评论》刊出《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会纪要》。

初春 身体感觉不适。“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春 准备出访西德，赴北京办理相关手续。当时，同乡海波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为方便见面，路遥住鲁迅文学院招待所。期间，在公交车上与叶咏梅^[1]相遇。叶咏梅回忆：“1987年春天，我俩竟在北京无轨电车上邂逅。我在拥挤的车厢里，一眼就认出了他。‘路遥！’我脱口而出。‘哦，……’他从沉思中一怔。‘真巧，在车上见到你！这是去哪儿？’‘呵，鲁迅文学院。’”（叶咏梅《中国长篇连篇连播历史档案（上卷）》）叶咏梅问路遥写什么好作品时，路遥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送她一本。正是这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竟促成《平凡的世界》1988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成功播出。

在北京期间，海波陪同路遥去了一次王府井。据海波回忆，路遥疾步如飞，一边快走，一边回头看他，示意跟紧。直到进了东风市场（现在叫东安市

场)，他的脚步才慢了下来，站在一个量体重秤上，伸长脖子朝人群里张望。海波以为路遥在找人，就问：“你在找谁？这么多人怎么找？”路遥说：“找‘七女门市部’。”“七女门市部”是“文革”前延川县百货公司的俗称，以有七位女售货员而得名。海波提醒他说：“我们在北京，不是在延川，哪有什么‘七女门市部’？”不料路遥却生气了，瞪着眼睛对海波说：“我说在延川吗？”之后，路遥见柜台就上，见东西就问；一会要售货员拿这个，一会又要那个。说的都是地道的延川土话，不要说北京的售货员了，就连从延川出来的海波猛一下也听不出路遥在说什么。回到住处后路遥完全蔫了，像一摊泥一样瘫在沙发上望着房顶发呆，嘴里一声接一声地长叹。路遥对海波说：“我见到她了。”“我搭了车准备回来，刚上车就看见那红色的衣服。我感觉像她，就下了车，走了过去。一看，果然是她。大模样和17年前差别不大，一样的小巧，一样的单纯，一样的礼貌和热情。我们说了一会儿话，非常平静地说话，感觉就像曾经在一块当过民工的熟人一样。”据海波回忆，这时他才明白路遥见到了初恋的女友，问他：“你为什么 not 请她吃顿饭，也好多聊一些。”路遥坚决地摇了摇头说：“没有这个必要。”（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3月2日至23日 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访问西德，作家王愿坚^[2] 担任访问团团长，代表团员有作家袁和平^[3]、扎西达娃^[4] 等。

在西德访问期间，路遥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他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这是路遥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在西德期间，路遥几乎跑了西德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在西德时，路遥突发奇想：“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一九八七年访问德国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3月12日《人生》与西影厂其他四部故事片《野山》《黑炮事件》《西安事变》《神鞭》参加《文汇报》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电影评奖。其中《人生》获最佳故事片奖，导演吴天明获导演荣誉奖。

3月23日 从西德返回北京。下飞机后，“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蒂克’的想法未能实现。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3月 《冷静中的燃烧——读〈远去的凉风垭〉》刊于《延河》1987年第3期。

4月28日 与评论家王愚共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的座谈会。

同日 收到贾平凹复信。信中，贾平凹答应路遥给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编辑李金玉一部长篇出版。

4月 养父去世。“一九八七年四月，他出国访问回来。我们去省中国作家协会看望他。在他的书房里，他兴奋地谈天说地，谈外国，谈中国，说洋人，道国人，突然门房来了电话，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延川的父亲病故了。他尽力抑制住悲痛，托其弟妥善料理后事，并说马上寄现金回去。而此时，在他办公室的桌面上，《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草稿整齐地摞了那么一大摞，足有一尺多高。”（王双全《我们的班长》）

本月 投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5月19日 中国陕西省委任命刘成章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副书记，后经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团同意，刘成章任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5月 《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集中刊登了一组评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文章：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丹晨的《孙少平和孙少安》，李健民的《从现实和历史的交融中展现人物的心态和命运》，苏冰的《纪实小说文体创新试验的意义》。

6月6日 在西安写《〈人生〉法文版序》。

“当这本书被张荣富先生译成法文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法国读者朋友致最亲切的敬意。我向来对法兰西辉煌的文化艺术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

6月23日 带病北上陕北洛川，准备开始《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

6月27日 因病转赴延安。路遥大学同学、时在洛川任职的王双全4月份见到路遥时，路遥拟定在洛川县两周左右时间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写作计划。而“两个半月之后，六月二十三日，你果然来到洛川，我不怀疑你在洛川的写作计划会实现。谁知你竟是带病来的，患的像喉炎疼痛难忍，到医院看了两次，咽部注射药液，效果甚差。第四天，我失望地同意你转奔延安。你不是来看病的，你是来完成自己的写作的。你对疾病全然不顾，吃不下饭，吞咽困难，你还一再对我说思维活跃，晚上睡不着，总想早点下笔。你说历史上好些作家，写作夭折，遗恨终生。我劝你，现代人不同，现代人长寿，你是急性咽炎能治。我劝慰你，也为你担心，你这么健壮，一般不会害病，得了病怕人地严重。事后知道在延安你也未能动笔，北上榆林，在一名老中医的精心诊治下，服了近二百服中草药，治好病。”（王双全《路遥的拼搏》）

6月 《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刊登在《花城》1987年第3期。

同月 为叶广芩的小说《远去的凉风娅》写短评《冷静的燃烧》，刊于《延河》1987年第3期。路遥担任《延河》编辑期间，不遗余力地帮助过多位文学青年。据叶广芩后来回忆：“细想我能走上文学道路，从一个普通的护士到一个专业作家，跟路遥大有关联，不是他的认可，我发不出第一篇小说，不是他的推荐，我进不了‘读书会’，他是我进入文学之门的领路

人，是我应该永远记住，永远感谢的朋友。”（叶广芩《清涧路上》）

7月3日 应宝鸡文联之邀前去讲课。

当日，在路上，路遥一行参观了著名的西凤酒厂的所在地——柳林镇。路遥在参观酒厂时说：“你看，就这么点小地方，竟震动了全国。”到了宝鸡已经晚了，李凤杰、商子秦等人都在大门口等候，见到路遥一行人后，李凤杰说：“天哪，你终于来了，我心头的石头才落地了。讲座的票前几天就全部抢光了，还有很多单位要票，可你老先生（指路遥）一直未到，我刚才还商量，如果你到不了，今晚这戏可咋演呢？现在好了。……先休息一下，晚上八点就去剧院讲课。”这次，路遥讲课的主题就是《人生》的创作过程，而听众也是围绕《人生》提问题的。在这次讲座当中，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到路遥跟前，递上了一个小纸条。路遥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小女孩，路遥与这位小女孩讲话时，同行的同事郑文华摁下了照相机的快门，留下了一张激动人心的照片。（郑文华《宝鸡之行》）

同日 签送李凤杰、商子雍^[5] 等人精装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7月8日 路遥给谢望新写信。这封信后来由谢望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望新兄：

您好。久别了，甚念！

现通过一位并不熟识的人，将《平凡的世界》二部手稿捎您，这样比邮寄要快和安全一些。稿件怎发，由您全权处理。因为第一部发在《花城》，我仍想在您那里发。二部几乎投进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我自觉出尽了力，稿件头天完，身体第二天就垮了，心力衰竭，气力下陷，整天服中药，也没气力和兴致和其他刊物交涉。问题是此稿我仍想由您手里发出，哪怕只发行一两份都可以——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使我受感动的是，在我耗尽心力寂寞地投入这件漫长工作的时候，得到了您这样的朋友的理解和帮助。再一次感谢您。

您那里的情况和处境我不很了解，但能猜出几分。唉，没办法，不想干事的人总要让想干事的人什么也干不成！

相信山不转水转，会有好的转机的，如心烦，可出来走走？

我如身体复原，即起程去煤矿下井（二十天左右），然后分别去陕北农村和大学去补充一些技术性的生活，有什么事，信仍寄中国作家协会，会及时转我的。

深致敬意！

路遥

8/7

7月29日 在榆林看病，收到林达的一封书信。信是从榆林地区文联处转给路遥的，此信目前收藏在清涧县路遥纪念馆：

遥：

昨天转去两封信，给天乐了。我接到去京组稿的任务，准备三天内动身，把远远带去，八月十五左右返回西安。

家里家居的玻璃等都已安装好。家居木头还没有结账，听阎华说单位已经催了，我手头还没款。这次去京带远远也要花费不少，不过能满足她的游心了。请你想办法借些钱，我回来后结账是要给公家还的，去时可以先用公款。今上午定下我出差，托郑文华去买火车票。然后忙于做走的准备，先写这些。

你那里怎样？

达

7月29日

8月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中，身体发生危机，病倒，且病情严重。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记录了这一阶段的经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浹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做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路遥抵达榆林后，老中医张鹏举给路遥号脉，看路遥的舌头，开了几副中药，几副中药共两毛八分钱。路遥回忆张鹏举老先生给他看病的详情：

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

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亚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会到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线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炼，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副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地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

吃了张老先生开的几副中药，路遥身体果然逐渐恢复了元气。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朋友、亲人出于真诚的关怀都劝他好好休息，养好身体，然后再进行第三部创作。然而，路遥对文学理想执着追求，害怕重蹈前辈柳青没写完《创业史》的覆辙。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告诫自己：“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

9月 《小说评论》刊出路遥《〈人生〉法文版序》。

10月19日 和刘成章、汪炎等与台湾作家汪笨湖座谈。

本月 赴榆林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11月底 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上半部分。

11月 被陕西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初冬 在榆林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这一回路遥来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大家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但吃清涧家乡饭和陕北揪面片儿，却是路遥终生不改的嗜好。所以，他还是像上次一

样，一两天就到我家吃一回揪面片儿，而且抓住这吃饭后的空隙，我还见机行事的请他为县里一些文学社团题词或提刊名。路遥的毛笔字并不很高明，但他写字那认真的态度和满怀的信心却不能不使人感动。有时候，一个题词写下来，就累得要喘几口粗气。他写给清涧宽州文学社（应为靖边县文艺杂志《芦溪》题刊名‘芦溪’并题词——引者注）的题词是：‘三边都豪气，芦河有绵情。’另外，他还给神木的《驼峰》小报写下了‘驼峰’两个字。”（朱合作《本色路遥》）

12月中旬 出席榆林大漠文学社成立大会，做简短讲话并为该社题写“存大气、成大器”六个字。讲话中，特别强调文学青年作者们，要树雄心，要大气，但必须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保持普通人的感觉。

年底 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朱合作回忆：“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我才真正看到了一个作家的工作量。每次路遥从宾馆出来，到我家的时候，我总是发现路遥劳累得一口一口喘粗气，有时候竟给人一种换不过气来的感觉。那种劳累的程度，实在比我们农村人常说的背老石头还累，他在整整几十天的时间里，简直就没有一分钟时间轻松的。”（朱合作《本色路遥》）

【注释】

[1] 叶咏梅（1949—），女，毕业于北京第四女子学校，插队2年，文艺兵6年，广播文学编辑30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任编辑，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文艺（小说连播）》研究委员会副会长。

[2] 王愿坚（1929—1991），中国电影编剧、小说家、记者。

[3] 袁和平（1949—1997），山东淄博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化春秋》主编等。

[4] 扎西达娃（1959—），四川甘孜州巴塘县人。1974年毕业于西藏拉萨中学。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长篇游记《古海蓝经幡》等。

[5] 商子雍，陕西西安人，曾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晚报》文艺部副主任。

|| 1988年（戊辰） 39岁

1月 史铁生的小说《原罪》发表在《钟山》第1期。

2月23日 由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2月 刘白羽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3月31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三届二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召开，讨论研究1988年工作要点及改革问题。

4月 1988年第四期《上海文论》开辟专栏“重写文学史”，发表了该刊特约专栏主持人陈思和与王晓明的对话，接下来又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其二是《“柳青现象”的启示》。由此，“重写文学史”的旗帜在全国文学界正式打出，对一些已有定评的作家进行重读、重评，除柳青和赵树理外，还涉及丁玲、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茅盾等作家。

5月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停刊。

同月 肖云儒著的文论集《中国西部文学论》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对几十位中国西部作家的研究，论述了中国西部文化的多维结构、审美特点和中国西部文学的产生、发展、流派类

别、艺术特色、演变规律。《中国西部文学论》出版后，被译成日文摘载于美国、加拿大等刊物。

7月1日 中共中央党校创刊《求是》，取代《红旗》，成为全党的理论刊物。

7月13至17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小说评论》编辑部在陕西太白县召开了陕西作家长篇小说讨论会。面对陕西长篇创作重新崛起的情况，会议在全国长篇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背景上，深入研究分析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经验、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希望把陕西长篇小说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7月19日 上影故事片《芙蓉镇》在捷克斯洛伐克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电影节大奖——“水晶地球仪奖”。

9月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发表在《文学四季》创刊号。

10月11日 《文学评论》《钟山》编辑部在无锡联合召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学术研讨会。

11月8至12日 第五次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曹禺为全国文联执行主席。

本年 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发表，后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同年 李天芳、晓雷合著的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同年 胞弟王天乐的新闻稿《汽车拖着火轮奔跑》获中国新闻一等奖。

1月1日 在榆林宾馆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一九八八年元旦如期地来临了。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

说，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但这毕竟是元旦。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地内疚。……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家里过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月27日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一稿完成。

为了表示庆祝，时任榆林行署专员的李焕政专门为路遥举行了一个庆祝酒会。

路遥曾谈道：“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第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3月初 因为《平凡的世界》将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播出，责编叶咏梅赶到西安，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大院里采访了路遥。在这段录音采访中，记录下了路遥的原声：“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

世界，但也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我呢，作为这个世界里一名劳动者，将永远把普通人的世界当作我创作的一个神圣的上帝。听众朋友们，无论我们在生活上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我们所生活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

3月16日 《人生》与《西安事变》《没有航标的河流》《红高粱》等十部电影在陕西省文化厅举办的西影厂获奖影片展览周展映。

3月27日 中午12点半，《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AM747频道长篇连播节目开始首播。“长篇连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品牌栏目，也是展示古今中外优秀中长篇小说的重要窗口。

3月30日 给王宝成^[1]复信。信中路遥说目前一边抄改稿，一边等候出版单位的来人；事情处理完毕，打算4月20号左右去陕北躲一躲。

4月20日 赶到了延安甘泉县，入住县招待所三楼。一进门，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甘泉是路遥的一块福地。

4月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5月4日 在甘泉为雷树礼签名。

5月19日 在陕北甘泉给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建勋写信。信中恳请刘建勋相助，希望能帮弟弟王天乐在这一届“作家班”就读。

5月25日 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二稿。在3月份采访中，叶咏梅给路遥定了第三部的最后交稿时间，即6月1日。路遥在要求的时间内完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当晚，在甘泉结束了简单的庆祝酒宴后，路遥在王天乐的陪同下赶到延安，从吴堡过黄河，先赶赴太原将复印稿交至《黄河》杂志。《黄河》杂志推迟二十多天发稿时间，就为等待他现在完稿的第三部。这样，《黄河》就赶在6月底刊出《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了。

“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忍受着病魔的折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从而给这个时代一个深厚的交代。《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近十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史诗作品。从1975年到1985年初，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从“左”的路线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把“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描写了城乡各阶层的普通劳动者平凡的生活。

好友曹谷溪在回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

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之中。”（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作家晓雷说，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后与他聊天说，他一直想写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题目就叫《生命树》，写他的家乡的黄土沟壑里的一棵老槐树，树下有几对青年男女的膨胀着的幸福和浓缩着的苦难，那是黄土高原上的亚当和夏娃的历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路遥彻夜未眠，他联想到陕北某城几个老干部家庭的崩溃，他试图由几个家庭探寻大千世界的奥秘，计划写一部较大规模的长篇，题目叫《崩溃》。此外，路遥还想用十年的时间写“文化大革命”，书名就叫《十年》，写一百万字，把上至中央的斗争，下至基层群众的斗争，把城市的斗争和农村的斗争，穿插交织起来，写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判断和剖析。

5月26日 与四弟王天乐抵达山西太原。在太原期间，路遥受到了周山湖和《黄河》编辑部的热情接待，路遥真切地感受到了《黄河》编辑部的诚意。路遥在太原停了三天时间，居住在迎泽大街上的冶金招待所，三天时间里路遥几乎足不出户地待在招待所里，起早贪黑地对《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进行了最后的修改润色，最终，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复印稿子交至时任《黄河》杂志主编周山湖的手中。

据王天乐回忆：在太原期间，路遥还受到山西作家郑义的招待，《黄河》杂志编辑韩石山等人陪同。“路遥在文学界没有什么朋友，和郑义也是一般关系，

但两人见面后非常友好，路遥对全国只有三四个作家比较看重，其中就有郑义。”（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他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直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和我的同事们，曾在一家不错的饭店宴请他。他的弟弟陪着他，我们向路遥敬酒，都被这位憨直的弟弟挡驾了。”（韩石山《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

5月29日 路遥赶赴北京。上火车前，由于路遥的钱包落在了宾馆。路遥与弟弟王天乐商定，路遥先去北京，王天乐回宾馆取钱包，然后赶下一趟火车到达。

“我是一路站着到北京火车站的，一路上没有任何空间让你转身，衣服因出汗而发臭。在北京和路遥会师后，两人好像十年没见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路遥怕我走失，就在火车站一个唯一出口处站了八小时。……在北京风风火火跑了半个月，才把他有关《平凡的世界》所有的事宜办完。”（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5月30日 在火车站出站口与王天乐会合后入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招待所。

6月1日 路遥按时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手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叶咏梅的手里。当晚，叶咏梅在自己的家里招待了路遥和王天乐，她和李野墨发现路遥的神情有些疲惫，望着一桌饭菜没有食欲，只是慢

慢地吃了几口豆腐青菜，慢慢地扒了一小碗龙须面便打住了……

叶咏梅后来看到路遥撰写的《我与广播电视》，她才了解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画了句号。然后当夜启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完稿子以后，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手稿送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李金玉编辑手里。

在京期间，路遥还与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员进行接触，他们想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通过电视剧这种方式将《平凡的世界》传播到普通大众那里去。

6月13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了纪念柳青逝去10周年、获奖作家优秀编辑颁奖大会。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出席并讲话。

6月25日 给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中心“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编辑叶咏梅写信。（叶咏梅《中国长篇连播历史档案（上卷）》）

咏梅：

你好！

感谢在京期间你的热情关照和亲切相待，在现今生活中，已经很少有这种感受了。同时，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也使我十分感动。这一点，也正是我所最为看重的，在这点上，我们完全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的合作特别愉快。

回来后，忙于各种事，才抽出点时间给你写信，主要的意思是再次感谢你为我的这部书所做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工作。

另外，请代问野墨同志好，他的质朴和才华，以及很有深度的艺术修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视野很开阔的人，这在北京很不容易。恕我直言，许多北京人以为天安门广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其实是人的心灵。

先唠叨这几句。请问李唯及小女儿好，你们的和谐的家庭真令人羡慕。

祝你们愉快！诸事顺利！

路遥

1988年6月25日

6月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刊于《黄河》杂志
1988年第3期。

7月 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导演潘欣欣赴陕北
体验生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工作组，拟将
《平凡的世界》改编为连续剧，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
年的重点献礼片。

“1988年7月中旬，我为了拍摄根据路遥同志长篇
小说《平凡的世界》而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自北
京出发去陕西找路遥。他是陕西省中国作家协会陕西
分会的副主席，于是我先到西安，在西安仅作短期逗
留便与路遥一同去了陕北。车一进黄陵县就感觉到，
接待的人们更加热情，路遥的话也随之多了起来，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地给我介绍着。我来的目的就是体
验生活，了解陕北，有路遥陪同，不虚此行。”（潘欣
欣《忆路遥》）

抵达延安以后入住延安宾馆。路遥的老师、时任
延安大学党委副书记的申沛昌回忆：

我正在忙着筹备延安大学成立五十周年校庆活
动，路遥的三卷百万巨篇《平凡的世界》也全部完
稿，正好来到延安。我们有机会在延安宾馆进行了一
次亲切而坦率的交谈。俩人主要交谈了各自工作和事
业方面的情况。路遥则主要讲他创作《平凡的世界》

的艰难过程。交谈中我直率地问他：“听到有些人说，你现在成名了，不愿承认自己是延大中文系的学生吗？我是不相信，但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听后很激动地对我说：“申老师，你应该知道，我从上大学前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告状、诬陷，这十几年，我就是在一些奸佞小人的诽谤和攻击中走过来的，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毁人名誉实在是无耻之极，好在我已习惯。说我不认延大，这只是个小谣言而已，绝无此事。我们不是一直在来往联系吗？”接着我就说：“那好，现在学校马上要举行首届校庆，你给学校题个词，到时候回来参加校庆活动，并给中文系师生作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他当即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全部落到实处。他给延大的题词是：“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这个题词现在珍藏在延安大学档案馆。

8月2日 126集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结束，历时四个月有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特殊的方式制作了长篇小说连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用的是出版作品，第二部是二校清样，第三部用的则是路遥手稿复印件。

《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随后浙江、新疆、内蒙古、陕西等十几个省市的电台又陆续重播，引起轰动。电台收到了数以万计的听众来信，其中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军人、离退休干部及待业青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的文学编辑叶咏梅回忆：“回想当初，《平凡的世界》第一

部问世时，它静静地躺在书店的书架上，也许因平凡而很少有人问津；可一经电台连续播出，叩动了千百万听众的心，竟使作品供不应求，又进行再版……”

9月22日 路遥参加“延安大学5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给延安大学中文系做专题文学报告。

11月3日 《人生》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写《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说《人生》被你们译成俄文出版，我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我谨向闻名于我国的青年近卫军出版致以崇高的谢意。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H·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一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极其珍贵。你们可以想到，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本月 台湾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在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周明陪同下访陕，路遥代表作协陕西分会在兴庆宫宴请，并赠景泰蓝瓶一只。

秋 路遥打电话给正在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的海波，让他去商量要事。海波见到路遥才知道是合伙做生意的事。路遥说自己有一个飞行员朋友，能从广东、福建那边往西安捎牛仔裤，要海波在西安登记一家店铺，路遥说：“进货的本钱和运输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卖；有风险我们承担，有利润咱们均分。”当时一心想当作家的海波反问路遥：“你把我看成做生意的

人了吗？”路遥无奈地看着海波，好半天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气。这样，路遥想与海波合伙卖牛仔裤的计划就黄了。

12月16日 蔡葵《〈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刊于《光明日报》。文章中肯定了《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价值。

12月31日 给蔡葵复信。信中路遥感谢蔡葵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与认可。路遥强调，国内文学界对这类“现实主义”作品的冷淡没有使他放弃努力创作。信中路遥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并表明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态度。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说：“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信全文如下：

蔡葵同志：

您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见您信，十分高兴，同时也拜读了《光明日报》您评拙作的文章。非常感谢。这部小说至今除镇南写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外，您这篇是最重要的一篇。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现在也还在手头带着。虽然我也看出来您的文章是被“剪裁”了的，但文章的论述使我很激动。您公正地用了一些大胆的褒词肯定了我的努力。您应该看得出来，我国文学界对这部书是冷淡的。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努力。六年

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您对小说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其实，这部作品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您知道，尽管我们群起而反对“现实主义”，但我国当代文学究竟有过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我们过去的所谓现实主义，大都是虚假的现实主义。应该说，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我是在这种文学历史的背景下努力的，因此仍然带有摸索前行的性质。不过，我的确是放开了胸臆，一丝不苟完成这部作品的；它的不足既是我的不足，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的不足。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总算完成了。我记起托马斯·曼的一篇特写（也可看作小说）《沉重的时刻》，是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写的，文中写席勒创作那部史诗《华伦斯坦》时的心理状态，其中有这样的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这也正是我目前的心境。当然，我也期待着我国评论家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部作品（包括它的不足）。至于我本人，我将尽量默不作声。我国文学界真正意义的自由争论还未形成，我认为这一原因主要是我国文学界自身造成的。比如，一张全国性的文艺报纸，仅仅发表几个编辑所持观点的文章，怎么可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呢？鉴于我国文学界的状况，你只能用作品来“反潮流”，不可能去用其他文章去论争，他们可以发表你的文章，但会安排在被审判的位置上，把你弄成浑身武力而未用尽的那些人的“靶子”。何必呢，老蔡，人一生有多少精力去扯这种闲淡，我已经孤独惯了，宁愿一个人躲在那些荒山野舍里；这样的時候，我才感到能更好地回到深远的历史和博杂的现实生活中去，也才可能使自己的心绪漫游在深广的宇宙中和人生意义的无尽的思虑之中。地球会爆炸，会消失，伟大与平凡将一起泯灭；生命是如此短暂，应该真正做点自己愿意做、也力所能及的事。一切不必要的喧嚣和一时的人生风光都没有什么意义。

扯得很远了。我十分愿意再能看见您对拙作的意见，我将能在其间看见您和我的一种心灵的交流，仅这一点就令我激动不已。

致

深切的敬意！

（您很忙，不必回信）

路遥

一九八八年的最后一天

12月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筹备评选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本月 同王愚、白描等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代表，在西安出席大西北文学研讨会，李存葆、莫言等出席，会后合影。

在这次会上，路遥与莫言第一次见面。早在中篇小说《人生》发表时，正在部队服役的莫言曾给路遥写去长达三千字的长信，探讨人生问题。

同月 应老朋友、《中外纪实文学》主编徐岳邀请，与莫申去汉中采访、撰写报告文学。

徐岳主办的《中外纪实文学》面临生存危机，他想借路遥的大名为刊物打开一条生路，路遥慨然应诺。于是，路遥和徐岳、莫伸三人到汉中后，始住汉中制药厂专家楼，并与制药厂领导搞了座谈会。住到第五天，路遥一行去汉中的消息传出，汉中文友与地

区领导拜访，这样他们再搬到地区招待所住。当时，路遥还采访了时任汉中行署专员的赵世居。采访中赵称“我们要把汉中建设成陕、甘、川、鄂四省的一个经济中心点，同时还有进一步增大汉中的经济辐射度，汉中的历史有这个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隔断了。现在开放了，我们应该把汉中搞成这样一个经济中心……省上把关中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但我认为应该加上关中和汉中一体化”。（路遥《汉中盆地行》）这篇文章是一篇文笔与思考俱佳的随笔，看不出应景作文的痕迹。

在汉中期间，他们还参观了武侯墓，路遥特意用身体贴着墓碑拍了一张照片。作家朋友王蓬还专门在剧院组织了一场针对文学青年和爱好者的文学讲座，路遥讲了一个多小时。

从汉中回来后，路遥专门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酒店，很认真地完成了《汉中盆地行》。

【注释】

[\[1\]](#) 王宝成（1944—2005），陕西蒲城花王人，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

|| 1989年（己巳） 40岁

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意见》认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稳定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机关要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对具体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

2月28日 中国小说学会、《小说评论》编辑部，召开新的年度里第一次在陕理事暨编委扩大会议，回顾1988年工作，研究1989年开展工作的重点。中国小说学会在陕理事、《小说评论》编辑委员、部分文学评论家，以及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领导同志和《延河》文学月刊、《文化艺术报》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做发言。

5月15至18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8日，《中苏联合公报》发表。

5月 《钟山》杂志从第3期开始，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倡导“新写实小说”。

同月 刘建军^[1]的文学论著《换一个角度看人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作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评论24篇，分为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于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代主要作家作品的讨论或评论；第二部分大多是关于文艺理论的专题研究，对陈忠实、贾平凹、王吉呈、李小巴等的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介。

6月23至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7月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文艺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1月 《小说评论》（1989年第6期，总第30期）刊出王汶石、王愚、玉果、李星、张沼清、董墨、魏钢焰的《〈月亮的环形山〉^[2]七人谈》，专栏“小说家创作谈”刊出李天芳的《正负零工程》。

12月 中共中央任命林默涵为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孟伟哉为党组副书记。任命马烽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玛拉沁夫为党组副书记。

本年 和谷《无忧树》、贾平凹《爱的踪影》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

本年 畅广元著的文论集《主体论文艺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文艺新学科丛书”。

1月1日（元旦） 急就《汉中盆地行》于西影大酒店。

1月5日 写作《业务自传》《个人小结（草稿）》^[3]。

业务自传

青少年时期大量阅读了中外文学名著和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传记文学，并开始热心文学创作。先写了一些不成熟的诗歌、

歌剧之类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并与谷溪、陶正等人合编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此书同时在香港出版）。

一九七三年开始小说创作。一九七三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同年在《延河》复刊后的《陕西文艺》创刊号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大学期间，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中外文学史，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七六年进入《延河》编辑部小说散文组搞编辑工作，并担任过副组长。在编辑期间，由于大量阅读、修改业余或专业作者的作品，在扶持文学新人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水平和创作能力。

一九八〇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反响，作品得到了各种形式的转载，改编，被许多大专院校编入教材，并再一次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由本人改编的电影《人生》也获得广泛影响，获得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其他几项奖。其后转入专业性文学创作。其间结集了中篇小说《人生》、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姐姐的爱情》以及《路遥小说选》。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用六年时间准备和写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三部曲。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夏天全部完成。小说陆续发表出版后，已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第一部已获《花城》文学奖。全书还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四个月又二十天时间里播出，目前，电台、出版单位和作者本人已收到听众和读者来信达五千封。同时，中央电视台确定改编为大型电视连续剧，作为建国四十周年的重点献礼片，目前已投入拍摄。

今后准备继续深入到生活之中，同时集中一段时间，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广泛地研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源流，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第三段创作”。

路遥

1989年元月5日

个人小结（草稿）

我的创作历程是艰苦地摸索前行的历程。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身心方面的巨大代价。我认识到，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于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捷径可走。因此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这不是“闹着玩”，而应该抱有庄严献身精神，下苦功夫。

我也极注重自己独立的创作个性，不愿盲目地趋赶潮流（不管这种潮流多大）。好多情况下，我正是因为对某种潮流感到不满足，才唤起了一种带有“挑战”意识的创作激情。我在学习研究各种流行的艺术流派的时候，力求不尾随，不被淹没，而使这些营养溶化在自己创作个性的血液之中。

我认为，作家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或者有了生活，而又不能用深邃的目光洞察它，作品就都将会是无根的草或不结果的花朵。我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要永远沉浸在生活的激流之中。

所有这些我都仍将坚持到底。

路遥

一九八九年元月五日

同日 写《本人对目前专业设想建议》：“就个人来说，要更深入地投入社会急骤变革的大潮中，同时力争将这一历史进程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上思考、体察和理解，以求写出更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武一平《路遥手稿现西安》）

1月6日 写《著作论文登记》。

1月8日 修改《个人小结》。将《个人小结（草稿）》中的第一段：“我认识到，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于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捷径可走。因此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改为：“我认识到，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于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

1月 为《三原报》^[4]题字“龙桥”二字，刊登在《三原报》试刊第3期。

3月4日 与陈忠实等参加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文联召开文艺家兼职深入生活座谈会。

3月上旬 在陕西省图书馆进行文学讲座。

3月24日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潘欣欣执导，鲁文浩、晏唐改编的14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在陕北延安市枣园乡庙沟村开机。

4月1日 在西影大酒楼给海波小说《农民的儿子》写序：

“海波和我是同乡，又是同学，少年时期一块在故乡陕北延川的城关小学、县立中学读书。那时我们都属家境极端贫苦的农民子弟，活像一对乞丐，除过内心的尊严，几乎一无所有。以后，海波的道路尤为艰难，年复一年为起码的生存在凄风苦雨中不停奔波。一般人在他那种情况下，恐怕早已垮掉了，但顽强的

海波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他内心的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这部凝结着他血泪的小说就是他人生态度的一个证明。”

同日 给阳春明写信，谈求医治病之事。

5月18日 路遥“去医院照看孩子，回机关路过作协游行队伍时，跟着前往新城广场游行队伍游行一次，沿途没有呼什么口号。对此清查清理中，曾多次作过检查，认识较好”。[\[5\]](#)

6月 《小传》《出自内心的真诚》收入由洁泯[\[6\]](#)主编的《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该书由求实出版社出版。

7月11日 与诗人尚飞鹏[\[7\]](#)在黄河壶口边邂逅。

“1989年7月11日，我只身一人去壶口看瀑布，在那里与路遥巧遇，才有幸听路遥唱陕北民歌。其情其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那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痛苦，甚至是折磨……记得那天天气十分好。老远，我就看见几个人，从河畔上走下来了，我很高兴，因为他们不管是谁都能成为我战胜恐惧的帮手。他们慢慢走近了，我首先认出了路遥，路遥也很惊奇，能在这里相遇实在是不容易，我和路遥的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从壶口返回宜君的路上，路遥首先唱起了陕北民歌，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又粗又厚。”（尚飞鹏《民歌的路遥》）

8月23日 推荐党永庵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其写了简短而又热情的推荐语并签名：“党永庵同志三十年间发表出版了大量诗歌和歌词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绩非常突出，希望能被总会接收为全国会员。”（党永庵《我记忆中的路遥》）

9月 写《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

10月1日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11月7日 与李天芳、王愚在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创作之家”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学院的三十余名学员做了系统的文学知识讲座。

11月27日 给陕西省教育学院做文学讲座。活动后，应时任“九月枫”文学社社长厚夫请求，路遥给文学社题词：“有耕种，就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悔。”

【注释】

[1] 刘建军，笔名江流。陕西蒲城人。中共党员。历任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主任。陕西省作协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似真似幻》，专著《文艺美学》（合作）等。专著《论柳青的艺术观》（合作）获中国首届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表彰奖，《文学与生命》

（合作）获199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论文集《换一个角度看人生》获1996年陕西省作协505文学奖。

[2] 《月亮的环形山》，长篇小说，李天芳、晓雷合著，作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

[3] 冯建斌先生收藏路遥4份7页手稿，手稿书写在印有“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16开稿纸上，内容包括《个人小结》《本人对目前专业设想建议》《业务自传》和《著作论文登记》，分别写于1989年1月5日、6日，8日对5日的《个人小结》做修改。这几份手稿是路遥写给上级部门的汇报材料。

[4] 《三原报》，中共三原县委机关报。1956年10月1日创刊，8开2版，5日刊。

[5] 见“路遥档案”中《路遥同志考察材料》，陕西作家协会存。

[6] 洁泯，原名许觉民，江苏苏州人。1937年在上海及各地生活书店工作，1949年后历任上海三联书店副经理、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办公室副主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秘书处副主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经理、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等。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人生的道路》《洁泯文学评论选》《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今天将会过去》，散文集《人面狮身》《眼睛》《人间风景》《读而未竟》《风雨故旧录》等。2000年获上海文汇报《笔会》年度奖。

[7] 尚飞鹏，1954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绥德，曾任《艺术界》常务副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并多次获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 1990年（庚午）41岁

1月5至1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李瑞环在会上做《关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

4月24日 李天芳与晓雷合作的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作品座谈会在西安召开，李天芳、晓雷、李星、王仲生以及西安师专中文系学生参加座谈会。

5月3日 首都青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报告会。

8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下达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精神。《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对知识分子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同时积极引导、严格要求，使他们更好地承担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9月 韩望愈^[1]的文论集《美的愉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集收作者从1957—1989年间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其中有对老一代作家、艺术家柳青、王汶石、赵望云、石鲁、方济众等创作思想的评论，也有对青年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赵熙早期作品的研究评述。

1月11日 在西安为刘仲平散文小说集《黄河潮》^[2]写了800字的序言——《六弦琴的歌词》。

1月27日 在延安宾馆见画家陈幼民^[3]。

“那是一九九〇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待得憋闷，就跑到延安去散心。正值放假，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忙跑去见他。……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神情疲惫，甚至带有一丝沮丧。意外的相逢，使两个人都很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谈到了完成不久的《平凡的世界》，我则更多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陈幼民《忆路遥》)

1月 为王蓬纪实文学讨论会发去贺电。

汉中地区文化局与汉中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王蓬纪实文学讨论会，陈忠实、李天芳、徐岳等人参加会议。路遥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名义发出贺电：“值此王蓬同志作品讨论会召开之际，特此表示热烈祝贺！祝贺王蓬同志长期坚持深入生活第一线，密切联系群众，热忱关注普通人的劳动和创造，近年创作成绩丰硕优异。祝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收获！”（王蓬《王蓬文集（四）》，第481页）

2月 给作家王安忆写下一捆“路条”，王安忆凭此“路条”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陕北之旅。

王安忆在《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

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王安忆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策划的，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王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校长再安排去安塞、绥德、米脂，然后到榆林。路遥写好了一封封信，临别告诉王安忆说有了这些信就不用发愁了。后来证明王安忆的行程果如路遥所说，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王安忆称，当时陕西“中国作家协会院子”里兴算命，为了和陕西文学界接轨，王安忆称他们出题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王安忆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王安忆回忆，路遥的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

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王安忆《黄土地的儿子》）

3月 根据路遥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播放，导演及主要演员来陕与评论界三十余人座谈。

《平凡的世界》导演潘欣欣回忆：“十六七年来，中央台播出不下五六回吧，当时收到一些观众来信，谈观后感……首播前后我被陕西省作家协会邀请到西安，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负责人王愚主持的《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研讨会，会议从该剧的观摩到研讨用了一周时间，路遥首先发言，充分肯定了这部电视剧作品，其他专家也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褒奖成功。《平凡的世界》获当年长篇连续剧飞天荣誉奖。”

春 与海波说，“找个挣钱的事做，写报告文学也行。”当时，海波正筹划一部电视剧，出资方是汉中市西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与海波关系很好，海波就把此事告诉这位副县长。副县长说西乡县有位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高中生，如果路遥能写写这个学生，对县里教育事业肯定有促进作用。路遥答应了，但要求海波与他同去。海波那时很忙，专门抽出时间买好火车票准备出发时，路遥却后悔了，说他不愿意去，“觉得别扭”。海波只好连劝带逼把路遥领到西乡县。西乡县对大作家的到来自然十分重

视，县长天天陪着吃饭，副县长几乎全程陪同采访。采访很顺利，谁知路遥回去后又后悔了，坚决表示不写，要海波撰写。海波只好向副县长道出实情，这件事才算不了了之。作为好友的海波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路遥非常需要钱。（厚夫《路遥传》）

4月4日 给王巨才^[4]写信。

4月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二套播放。

6月5至10日 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身份，参加陕西省写作学会承办的中国写作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6月 《小说评论》1990年第3期刊出李星的《新的崛起在传统的长河中——陕西作家论之二》，件埂的《追寻与受难——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7月 职称调整为创作一级（即正高职称），根据1989年陕西职改办一号文件精神，工资标准为艺术1级10档，从176元（基础职位工资160元、地区工资补贴8.5元、工龄津贴7.5元）调整为197元（基础职位工资180元、地区工资补贴9.5元、工龄津贴8.5元）。

9月下旬 大学同学王双全到访。

“我与他在他家聊天，他当时精神状态很好。当我们谈到党风和社会治安问题时，路遥说：‘社会在变革时期，一些人不能把握自己，难免要被历史淘汰。’”
（王双全《我们的班长》）

本年 在闻频的稿纸上写下一首《题红石峡》的小诗。

同年 据同事晓雷回忆，从1990年起，路遥把阅读的兴趣转向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前年开始，他把阅读的兴趣转向历史，他读《新唐书》《旧唐书》，读《资治通鉴》，他专门买了豪华型版本的《二十四史》，要随时查阅。谈到兴奋激动的时候，就要向我推荐，他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对中国官场的摹写和对政治改革的剖析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程度，他惊异一个美国人何以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如此精到和透辟。他说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是一部非常独到的历史著作，他说柏杨的杂文并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而读了他的这部史书，才深知他是一位大家……他如此如饥似渴地贪婪地穷经探史，是想建立他自身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进而构筑他的未来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晓雷《雨霏霏兮天垂：路遥离去的时刻》）

【注释】

[1] 韩望愈，笔名寒柏、何田，陕西乾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报告文学《人的正名》《慈善鸟》，文论集《美的愉悦》。

[2] 《黄河潮》，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3] 陈幼民，生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编审，长期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及理论研究。

[4] 王巨才（1942—），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人。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延安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陕西省常委、宣传部部长，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出版有《退忧室散稿》《退忧室散记》《退忧室散集》等。

|| 1991年（辛未）42岁

1月1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为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至1992年度，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包干指标，按1990年度计划略加调整，继续执行两年。

2月25日至3月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以及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

3月 《文学评论》等单位在京举行“新写实主义”问题座谈会。

4月10日 《小说评论》编辑部在咸阳召开王海小说集《鬼山》研讨会。

7月17日 延安窑洞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来自西安、北京、上海等十七所高校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入校就学。

10月27日 作家杜鹏程在西安逝世。

10月31至11月2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杜鹏程创作学术讨论会。陕西省有关方面领导同志支益民、刘力贞、魏明中、孙武学、王巨才、郃尚贤、胡采、王汶石等文学界人士共八十余人参加了开幕式，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评论家、作家参加了正式讨论。这次讨论会在筹备期间，杜鹏程同志原本打算参加会议并准备了发言。然而，在会议召开

前四天（10月27日），杜鹏程同志不幸因病逝世。在这样的时刻举行研讨会，大家都怀着沉痛的悼念之情，与会人员回顾了杜鹏程同志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生涯，对杜鹏程从各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

本年 贾平凹、杨争光、高建群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庄重文学奖”。

1月20日 给商子雍、朱文杰等签赠《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

1月23日 给作家、文学评论家白烨写信^[1]：

白烨兄：

您好。

大札早已收读，本想及早复信，结果病了一场，加之有许多紧急家务事，拖至今日，十分抱歉。

感谢您为我的事做了许多工作。您是一个实在人，相处一起很愉快。上次因急着去咸阳，吃饭未陪完您，很感内疚，有机会回西安，咱们再好好聊聊。

评奖一事，我尽量不使自己抱太大希望，今日中国之事，随处都是翻云覆雨，加之我这人不好交往人，只能靠作品本身去争取。朱寨、蔡葵、老顾等人虽交往不多，但我相信和信任他们，他们是凭学识和水平发言的，我内心对他们都很尊重。至于其他人，我大部分都不熟悉。在北京方面，我主要靠雷达和您“活动”了。另外，望兄考虑一下，见了阎纲和周明以及炳银、抒雁等老陕，也请他们也能帮做点工作。这就靠你跟他们说说，我虽然和他们关系都要好，但不好直接说，相信他们在评委中各有一些熟人，评委原十六人，现看报道，康濯已死了。

尽管中国是这个样子，但这个奖对我还是重要的。另外，也想给西北和老陕争点光，迄今为止，西北还未能拿这个奖，这一届作品中，凭良心说，我的作品还是具备竞争力的。

您什么时候还回陕西？请能及时告知，这里或陕北老家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尽管说，当会全力以赴的。希望您能看开的，不必为处分之类的事多虑，都是过来人了，这些并不能限制人，反而会促使人换个角度去生活和奋斗，说不定有种豆得瓜之欢愉呢！

致敬意！

路遥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白桦后来专门撰文回忆：

那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因为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种种原因，竞争十分的激烈。《平凡的世界》能不能最终获奖，朋友们都在心里捏了一把汗。我记得在评委们刚投完票，有了结果之后，先是蔡葵从评奖会场出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轻声告我刚刚投完票，《平凡的世界》评上了。稍后，朱寨又出来给我打电话，说《平凡的世界》得票第二高，获奖没问题了。我说，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说还要报中宣部审批，一般不会有问题。我说那我就告诉路遥了，他说当然可以，并代我们致贺。于是，我即刻从单位骑车赶到附近的地安门邮局，兴冲冲地去给路遥打电报。记得电文是这样写的：“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

贺。“这里的“朱”是朱寨，“蔡”是蔡葵，“雷”是雷达，“白”是本人。这个电报当天下午就到了陕西中国作家协会，据路遥事后说，那天下午，他在家里坐卧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中国作家协会院子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我发给他的报喜电报。他兴奋地要跳了起来，想找人分享这份喜悦，可那时的作协大院一片寂静，连个过路的都没有。他只好把这份喜悦收在心底，独自品味。（白桦《是纪念，也是回报》）

同日 给画家孙光题写“有耕种才会有收获”。

1月 应邀参加陕西新华书店新库房落成暨陕西省新华书店建店40周年大会，与吴三大、修军一同写了好多条幅。

本月 路遥赠给连环画画家李志武一套《平凡的世界》，让他用于改编和绘画。创作中，路遥曾三次观看李志武的画稿，在病榻上写下了授权书，并称李志武所画的《平凡的世界》让自己很满意。

早春 出席陕西人民出版社举办的有关文艺书籍出版计划的座谈会。

会上，李星坐在路遥的右边。陈忠实晚到，坐在路遥左边的空位上。在路遥背后，李星对着陈忠实凑过来的耳朵，告知路遥获奖的消息。李星回忆：“陈忠实说好事好事。要向路遥表示庆祝。过一会，我又伸

过头去，你（陈忠实）的长篇小说怎么样了？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就从这7楼跳下去。”

同期 在病中写《〈刘凤梅小说选〉序》于西安。

该文是路遥为自己同乡刘凤梅的小说集《春夜静悄悄》写的序。“我和本书的作者是同村人，住家一河之隔，父母同为农民，大的生活走向也相似，都是从黄土高原那个小小的山村启程，然后来到城市上学并加入了城市居民的行列，连同后代都成了城里人。……实际生活中巨大的矛盾引发了痛苦，引发了危机，于是艺术的冲动便出现了。当代中国的许多作家都出现在这个生活的断层上。刘凤梅就是其中的一个。”

同期 于西安写《乔维新的中国画》。

在概括乔维新^[2]画作特点时，路遥谈道：“从根本上来说，他的画仍然是典型的中国画。西洋画的技巧强化了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而并没有改变中国画本身的特质，这是无可置疑的。”

同期 写《惠怀杰的摄影艺术》一文。

路遥以为惠怀杰的摄影作品与陕北生活有着深刻的关联：“惠怀杰在表现陕北生活方面，有他自身的优势。他是陕北人，对陕北的土地和劳动群众有着深层次的理解，不同于一些专意到这块土地上‘寻找艺术’的匆匆过客，立刻被这里的大自然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抓住点什么就惊喜若狂。”

春在《延河》编辑部路遥为石竹、陈丽仙夫妻分别写了“汹涌无声”“人仁忍韧”八个大字。（石竹《感念路遥》）

3月9日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比揭晓，路遥《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与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以及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五部作品获奖。

3月10日 《人民日报》刊发消息《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5部作品、6位作家获奖》，报道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

同日 给蔡葵写信。路遥证实《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第一封想写的信就是感谢蔡葵给予这部作品自始至终的支持与关怀。信中路遥谈到“我想未来我写作的精神自由度会更大一些。这个奖与其说是一种收获，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信全文如下（路遥《致蔡葵》）：

蔡葵同志：

您好！

茅盾文学奖的最后结果，我深感意外。消息经官方报纸证实后，我第一个写信给您，感谢您在这部作品从一开始直至今天所给予的令人永生难忘的支持与关怀。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漫长而寂寞的努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理解，您是最充分的一个。在这一时刻，我的确深深地感激您却不能找到更多的词语。我想到北京以后还能见面，并准备和您及几位朋友聚一聚。

一切都已经在昨天结束了。我想未来我写作的精神自由度会更大一些。这个奖与其说是一种收获，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

我一两年中一直读书和思索一些文学问题。从全人类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作家来说，所谓现实，同时也就是未来，也就是历史，因此，必须有更具深度的思考，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有价值的劳动。我想我不会匆忙地投入创作，除非那确实是内心的一种真实要求。

此信主要表达的是我对您的深深地感谢。

致春天的问候！

路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

3月14日 用了三天的时间，撰写成题目为《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的一千四百字的发言稿，准备在颁奖大会上致辞。路遥在这篇发言稿中，着重强调自己“把笔磨秃了写”的理念，在其中用平实但又耐以琢磨的语言传达自己的文学思考。

3月16日 《文艺报》刊发消息《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平凡的世界”等5 部作品获奖2部作品获荣誉奖》。

同日 《文艺报》发表蔡葵等七人的署名文章《主题重大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众评委高兴地评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约3月中旬 赴京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委托陕西电视台新闻部，采制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

钟新闻片，供《新闻联播》播出。路遥在柳青深入生活的长安县皇甫村接受陕西电视台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与拍摄。

3月25日 赴京领奖。

路遥没有钱去北京领奖，在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前一个小时，弟弟王天乐凑到了5000元送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王天乐笑着对路遥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3月30日 在北京国际大饭店参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

路遥在颁奖大会上的致辞没有选用之前准备的稿件《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而是用了只有500字左右的《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非常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们几个人。本来，还应该有许多朋友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完全成功。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以伟大先驱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文学奖，它给作家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

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京领奖期间，路遥宴请了长期关心他的文学界朋友。后来白桦回忆：“他来北京领奖，到北京的傍晚就给我打来电话，我约了雷达赶到他下榻的华都饭店，三人不坐沙发，不坐床榻，就在地毯上席地而坐，促膝畅谈，那种率性、土气又亲切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时候的茅盾文学奖，奖金只有五千元。领完奖，路遥约了在北京文学界的陕西乡党在台基厂附近一家饭店聚餐庆贺，因不断有人加入，一桌变成两桌，两桌又变成三桌，结果一顿饭把五千元奖金吃完了。”（白桦《是纪念，也是回报》）

3月 垄耘的《开掘着的人生系列——路遥初论》在《小说评论》刊出，同期刊出的还有王仲生的《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陈忠实80年代后期创作》。

4月初 路遥是西北作家中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他从北京返回西安的那天，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副省长孙达人及路遥女儿、陕西省作协的同事们在火车站欢迎载誉归来的路遥。

4月11日 陕西省委宣传部、省中国作家协会、省文联联合发出《关于表彰〈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同志的决定》。

决定中说：“在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这是路遥同志的荣誉，也是我省文艺界的荣誉。为了鼓励路遥同志文学创作中继续做出新贡献，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热情，促使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决定对路遥同志予以表彰，并发给奖金5000元。”。

贾平凹后来曾在文章中提道：“路遥领奖回来说，你猜我在获奖台上想啥呢？我在想：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4月15日 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表彰大会，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副省长孙达人、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文化及新闻部门负责人、作家代表等各界人士300余人出席。会上，宣布了《关于表彰〈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同志的决定》，授予路遥表彰证书、纪念花瓶和5000元奖金。路遥致答谢词：

“我省文艺界有光荣的过去，有辉煌的历史，我是在文艺前辈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荣誉属于陕西文艺界。我作为陕西文艺界这个整体的一员，今后更要发扬陕西文艺界的优良传统，谨慎、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表彰会结束后，路遥把北京和省里给他的奖金，以孩子的名义存进银行。两笔奖金不多不少，恰是一

万元整。这一万元，也成了他身后留下的唯一一张存单。

5月24日 与王蓬在西安见面。临行，路遥签赠了一套《平凡的世界》。

6月1日 到宝鸡做文学讲座。签送李凤杰精装本《平凡的世界》（第二、三部）。

6月初 肖云儒完成了《路遥的意识世界》。

6月5日 给业余作者讲课。

“在讲台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讲自己苦难而辛酸的童年，讲对文学执着地热爱和追求，讲一个普通人的彷徨和梦想。那天他讲得十分精彩，激起了听众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找他签名题字。见到我，路遥很高兴，握着手很实在地建议大家合影留念，他的留言更是朴实得令人感动——‘脚踏实地’四个字，既是他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又是他人生态度的概括和写照。”（祁念曾《路遥，就这样风雨兼程》）

6月10日 应邀到西安矿业学院讲课，从下午两点十分开始，五点多结束，路遥畅谈文学、社会与人生，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讲话中，路遥谈起了自己青少年“爬下水沟”看电影的一次经历：“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放电影，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眼看着别的同学进去了，我们几个最穷的孩子没

有票，只有从小水道里往里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为了看电影，手在地上擦几下还要继续往里爬。谁知刚进洞子，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又从大门把你送出去。我们两眼含着泪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这地方。”

西安矿业学院这次讲课的录影带，后被张伯龙获得，他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学·人生·精神》，题目系整理者张伯龙拟。（路遥《文学·人生·精神》）。

6月18日 给李金玉写信。再谈《平凡的世界》封面。

6月 何志铭开始拍摄《路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电视片。这个电视片15分钟，据何志铭回忆，一周时间，他和路遥与西安电视台毛安秦走长安皇甫村，上铜川，下煤矿；唱陕北民歌、哼俄罗斯歌曲，感受到了路遥极富温情的一面。

7月1日 与贾平凹、金铮出席在西安古都大酒店举办的《女友》杂志创刊三周年活动。

据贾平凹回忆：“我认识金铮的时候，是一次会上，那天我和路遥在一起，我穿了一件大红T恤衫，路遥穿了一件深黑的T恤衫，金铮则一头如雪的白发，我们三人都跑到会场外吸烟，金铮就左右搂了我们说：‘颜色多好！要摄影师拍照。’”（贾平凹《怀念金铮》）

7月11日 写《〈箫焕画集〉序》于西安。

8月21日 在西安地质学院报告厅为《女友》杂志社主办的“‘91’之夏文朋诗友创作笔会”做报告《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对文朋诗友的讲话》。

路遥在报告中讲道：“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推到了极端，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路遥《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对文明诗友的讲话》）

8月 李星写作的评论《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路遥论》刊于《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9月16日 填写出国审查表，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访泰国。后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最终放弃了这次出访。

9月20日 回清涧县，受到清涧县委、县政府盛情接待。

9月21日 在清涧南坪大礼堂作文学创作报告。正在赶集的群众知道是路遥回来了，便纷纷拥来想看一

看路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路遥在街道被围两个多小时。

10月18日 写《艺术批评的根基》于西安，后作为《序》收入李星的作品集《读书漫笔》。

“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面，李星绝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路遥《艺术批评的根基》）

10月22日 给蔡葵复信。（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致蔡葵（四）》）

老蔡：

您好！

首先向您道歉，先前两信均收读，但因我家里出了一些事，心绪极不好，无心顾及其他，加之身体不好，又要四处奔波一些烦乱事，未能及时回信，十分内疚，只有请您看在老友面上，能予谅解。

写文章一事，我极想完成您的要求，只是心情不好，集中不起精力，因此在时间上只能求您宽限。两年中身体不好，一直未

动笔，手很生，而这类文章要求严密，深感力不胜任。不过，我想能集中一段时间认真考虑。

我要再次感谢您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这是永生难忘的。我也欢迎您和朱寨同志（问他好！）能来西安转一转。

在创作方面，我有一些想法，也做了许多新的准备，但现在还不能投入。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价值，就不写。对我来说，写作不是自娱，而是一件相当沉重的事，除非心中的块垒不吐不行方可考虑。现在的问题是体力不支，一旦激动就透不过气来。

如果方便，不知是否能寄一本刊物？我们机关很少见到。

问朱寨同志好！

路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同日 给白烨致信^[3]：

白烨兄：

近好！

7月及不久前的信均收读，本来早应复信，但身体近段极差，加之内外有许多难言之苦，心绪不佳，杂事繁乱。几个月不坐在桌前写一字，今天急忙回复，已太晚，只能请你谅解，好在朋友之间，想必能理解，有机会见面再详述原因。

两篇大作均细细阅读，十分赞赏，看来你是真正理解了我，也理解了我的创作。尤其是最近这一篇好到令我拍案而起！分析准确，行文相当漂亮（简练而讲究，又有深度），论断自信，

《平》书评论中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完全穿透了作品内核，猜到了我当时的心理机制。由此我看到了你评论的广阔前景。某个时候应该是白烨的时候！

雷达兄的文章也写得很不错，具有大家的功夫，只是我还不满足，本应更放开一点，又想到这是《求是》，因此也就不能苛求了。

换届一事仍拖着，已有一年，都已麻木，当今世事，就是如此，不必认真。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能庄严地生活，也能玩世不恭，因此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最近心很烦乱，放任自流。十二月四日去泰国，还是个团长，估计十一月底去京，到时再和你联系。问老蔡、老朱好。

雷达处请向他问好！

路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10月26日 出席延川县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

当时，延川县委、县政府召开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热烈祝贺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对路遥载誉重返故里表示热烈欢迎。当日下午2点30分，延川县委宣传部邀请路遥在县委五楼会议室作文学创作辅导报告，后根据录音整理成《在延川各界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路遥重返母校延川中学参观。

路遥在《在延川各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朦胧中产生过一个想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大部分的代表作，都是四五十岁完成的，诗人更早，一般都是二三十岁就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完成。我如果要接这一行的话，我就要再提

前，在四十岁以前，最少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长的作品，至于说是不是最好的一部作品，那难说，最起码敢于在四十岁以前写一生中最长的作品。”（路遥《在延川各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10月27日 杜鹏程病逝于西安，终年70岁。

11月7日 给高玉涛^[4]、苏剑^[5]写信。（高玉涛：《一首歌·一句题词·一生的敬畏》）

玉涛、苏剑：

二位好！

遵嘱写了两段歌词，发寄你们，请琢磨一下并可征求一点意见，等见面后再确定。如你们认为可以，也可打个招呼，我即可找赵季平让他谱曲。我年轻时曾写过一些歌词，后来再没写过。这次“重操旧业”，把自己都逗笑了。

祝好！

路遥

九一年十一月七日

11月 写作《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路遥在这篇文章中说，有两位作家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柳青，另一位就是杜鹏程，“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现在，我也默默地感谢他。在创作气质和劳动态度方面，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他晚年重病缠身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

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感到，他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我未来的写照。这是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对某一种人来说，他一旦献身于某种事业，就不会顾及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永远无悔的牺牲。”“杜鹏程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一切首先体现在他的史诗《保卫延安》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也给他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而属于巨人的灾难不也是另是一种勋章吗？”（路遥《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路遥在《杜鹏程：燃烧的烈火》中对杜鹏程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与肯定：“他在半个世纪中构成的巨大内容需要一代人乃至未来历史给予详尽诠释。”

同月 与李星、田奇、和谷等人在铜川耀县水泥厂参观。参观完之后，在厂办大楼门前合影留念。面对这座六十年代号称亚洲第一的大型水泥厂的流水生产线，路遥说：“这个地方不错，左边有漆水河，右边有药王山，再加上现代化的工厂，环境好，我下一个长篇就在这里写。”（郑文华《相遇在耀县》）

秋 与中国作家协会同事去华山脚下一个部队参观，晚上住华山脚下的华山宾馆，在一极其简陋的卡拉OK屋唱歌至凌晨十二点多。

同期 写《我与广播电视》。

初冬 开始写作《早晨从中午开始》。

12月3日 应邀为汉城饮料厂五百多名职工做了文学报告。

12月5日 给高玉涛复信。（高玉涛《路遥的影响——一封尘封了20多年的往事》）

玉涛：

信收读，很感慨。我知道你和苏剑创业的艰难。在这世界上干成任何一件象（像）样的事都不容易，更何况在目前中国的背景下。不过，你和你的战友们已经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并且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就应该咬紧牙关走完这最艰险的一段。正如登山一样，当你站在山顶再回头远望走过的崎岖之路，你会有另一番欣慰。在一些事业的紧要关头，谁都有撑不住的感觉。当然，退路是熟悉而轻松的，退下来也容易，但要是这样，丧失的不是此种事业的本身，而在于整个人生的失落。由此而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只有在重大关头才能得到检验，成功与失败常常在这种地方的毫发之间。要忍受，主要是忍受痛苦，正如那天我想到德国古典作家托马斯·曼的话：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这应该是一个生活强者的精神写照。

随便写了以上一些话，相当空洞，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是希望你们成功。我一介书生，某些方面手无缚鸡之力，不能给予你们具体的帮助，但内心满怀真挚的感情希望自己喜爱的朋友在不同的角度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至于目前的社会情况，只能随俗入乡，以保障事业的发展。整个中国处于大转型期，这一进程中所有的“把戏”都可视为正常。它有负面的东西，但也会造成许多可以通融的机会给有才华的人提供驰骋的天地。我相信你们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你们已经是这个社会成熟的果实。

厂歌一事请放心，我已将原歌词交赵季平，他刚接任省歌舞剧院院长，较忙乱，但极其热情地接受了这件事。过几天我再去和他联系，一块商量个别词句的改动。一旦完成，即交你们，如有不妥，还可改进。

我埋头写那个随笔，也相间应付一点杂事，因个人私生活的原因，心情不是很好，只能是走到哪里再说哪里的话。身体状况也不好，时有悲观悲伤悲痛之情默然而生。自己祝福自己吧。

苏剑不另。祝你们一切顺利！

路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12月7日 为高玉涛的惠普集团谱好了厂歌《惠普之歌》。

12月31日 由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机构评审通过，作为陕西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规定的特殊津贴。

12月 出席“西安事变”书画展。

冬 于西安写作《〈塞上雄风〉序》《少年之梦——为〈少年月刊〉而作》。

“临近发稿日期，还不见路遥寄稿来。我着急了，便亲临路遥家催稿。我敲开门，路遥热情地迎出来，看样子，他十分疲倦，也许是他写得很苦，写得很累，连着多少个夜晚没有休息好，但精神却十分好。

他像接待多年的老朋友，盛情地接待了我。我怕打扰他太久，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代表咱省700万少年儿童来的，想约你为《作家与小学生》专栏写一篇稿子……’说到这儿，路遥说：‘晓梅已经给我说过了，这个稿子我一定写！’我说：‘听说你最近很忙……’是很忙，不少刊物约我写稿，我都推卸了，唯独给孩子们写稿，推卸不得，因为孩子们代表未来，代表希望啊！’听到这儿，我心里非常激动，路遥对孩子们、对祖国的下一代怀着一颗多么诚挚的爱心啊！”（王宜振《忆路遥》）

本年 给周至青年文学社《青春》杂志题词：“脚踏实地，目光远大”。据陈月浩回忆，路遥的题词字写得龙飞凤舞，当时陈忠实也在场，笑着说路遥的字自成一家，谁也仿不来。路遥连声说：“我的字不行，是我字体。”

【注释】

[1] 此信由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收藏，未刊。

[2] 乔维新，宁夏中卫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任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3] 此信由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收藏，未刊。

[4] 高玉涛，陕北靖边人，时任西安汉城饮料厂厂长，现任《收藏界》杂志社社长。

[5] 苏剑，时为高玉涛的合伙人。

|| 1992年（壬申）逝世

1月18至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

1月14日 中宣部文艺局、文化部政策法规司、《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系列研讨会第三次会议。

1月29日 农历辛末年腊月25日，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的全部创作。

2月18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调整《延河》编辑部领导班子，陈忠实任主编，徐岳任执行主编。

3月26日 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深圳特区报》刊发。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

8月1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团委员、《延河》原副主编余念病逝。

9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赵熙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副书记、雷前进为党组成员。

9月 贾平凹主编的散文月刊《美文》在西安创刊。

10月30日 赵熙正式到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上任。

11月7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分会书记处停止工作，任命雷进前为秘书长；同时，成立换届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为王汶石，副组长为路遥、赵熙，成员有杨韦昕、刘成章、雷进前。

11月 《收获》第6期发表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

12月18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调整《延河》编辑部领导班子，由陈忠实任主编，徐岳任执行主编。

12月20日 《白鹿原》（上）刊载于《当代》1992年第6期。

1月10日 陕北籍作家刘仲平购买了30套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 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请路遥签名。（刘仲平《像灯塔一样照耀在前方》）

1月17日 《早晨从中午开始》完稿。在最后一节中，路遥坦露撰写此文的内在原因：

“从最早萌发写《平凡的世界》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十年。而写完这部书到现在已快接近四年了。现在重新回到那些岁月，仍然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正是怀着一种对往事祭奠的心情，我才写了上面的一些文字。

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和发展。许多过去我所倚重的东西现在也许已不在我思考的主流之中；而一些我曾轻视或者未触及的问题却上升到重要的位置。

一个人要是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中而不再前行，那是极为可悲的。

但是，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段经历大约地记录下来。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报刊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为我的这段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说一说自己。

可以说，这些文字肯定未能全部记录我在写作这部书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和书中内容平行漫流的曾是无数的洪流。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一切都储蓄在记忆里；尤其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许多无名的感情溪流更是无法留存——而那些东西才可能是真正有光彩的。不过，我总算把这段经历的一个大的流程用这散漫的笔调写在了这里。我不企望别人对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只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而已……”

1月 《杜鹏程：燃烧的烈火》，刊于《延河》1992年第1期。

2月4日 农历春节。春节过后的一天，《陕西日报》记者刘春生去路遥家串门，发现路遥正为肝痛而痛苦地呻吟着。此次见面，路遥央求刘春生去医院为他买最好的药物。次日，刘春生为路遥买了“护肝

片”，几天后，当刘春生再遇见路遥时，路遥说吃了以后，肝疼减轻了，托刘春生再买一些。”那天，路遥格外兴奋。倒不是由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而是他看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部文件了。他说：‘邓小平还是那么清醒，一点不糊涂，他的思想比我们还解放，真是英明啊……’之后，刘春生为路遥买了够吃两个月的‘护肝片’”。（刘春生《永别了，人间——路遥的人生之旅（续篇）》）

2月上旬 春节过后，路遥打电话叫来曾当过西安电影制片厂《大西北电影》杂志发行部经理的翻译家孔保尔，为他描绘陕西作协换届后的蓝图：作协要成立一个公司和五个委员会。五个委员会为：文学创作委员会、翻译文学委员会、散文文学委员会、诗歌创作委员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实行秘书长制，文学创作委员会秘书长由王观胜来当，翻译文学委员会秘书长由你来当。每个委员会每年搞一次大奖赛，要吸引全国的文学爱好者来参加这几个大赛，光参赛报名费每年就能挣不少钱。作协公司搞三产，专门搞发行，聘请你来当经理，搞这你是内行，作家们出书就不艰难了。作家们最痛苦的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书发行量上不去，没人看，劳动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搞一个公司，作家们谁出了长篇小说你都给咱铺天盖地发行到书摊上，不求挣钱，挣钱靠批发书和出版发行市面上流行的畅销书，这样作协就活了。这个发行公司你给咱好好干，都能挣钱，让作协的每个职工都过上好日子……孔保尔回忆：路遥“脸上

绽开笑靥。说笑靥，根本不够分量，简直就是笑逐颜开……”（孔保尔《常人路遥》）

2月23日 申晓、王作人来家聊天，三人长谈。

王作人回忆：“和路遥最后一次长谈是在1992年2月23日，我对这一天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我回家就记了长达几十页的日记。”（王作人《难忘路遥》）

2月 散文《少年之梦》刊于《少年月刊》1992年第2期。

“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一名国际刑事侦查，既神秘又刺激，进这个国家，出那个国家，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提供多种咨询性的选择方案。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遥远的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并把他交给联合国。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语言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早春 在《延河》美术编辑办公室，路遥看到了正在试穿新西服的郑文华，他看到路遥后说：你也试试

吧！路遥一试，挺合适。俩人哈哈大笑。路遥对郑文华说：文华，你给我拍几张照片吧！于是，郑文华给路遥拍摄一组早春中的照片。这组照片是路遥最后一组春天里的照片了。

3月27日 给王蓬复信。路遥在信中谈到《路遥文集》与有关《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出版之事，表露出自己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王蓬兄：

您好！

先后两信都收读，因许多无法启齿的原因耽误了复信，请能原谅。我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有时很难在口头或行为表述自己内心激越的情绪。但和您，莫伸这样一些人待在一块感到自在，因为我们真的超越了一些局限。

三本书^[1]出得都不错，我因身体不太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阅读完，我一定会用文字说说您，只是在时间上尽量宽容我。就目前而言，您是陕西最有冲劲的作家，您诸事备齐，只待东风，成功是肯定的。有人已成强弩之末，您正箭在弦上。干吧！

为聂震宁写稿一事，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手头编了一本文论性质的集子，名曰《作家的劳动》约十五六万字，包括以前的一些文学言论（七八万字）和有关《平凡的世界》的一篇大型随笔（六万多字）。

本来，此书可以不出，因陕人社拟出我五卷文集。这些东西也将会包括进去，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淹没在小说中有点儿痛心，因此单集了一本，一则我看重这些文字，二则也想多拿几千元稿酬，就我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来看，因身体差，写作拿点钱很不

容易了，现在，想请你出面同聂震宁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在漓江出这本赔钱的书。因为我目前遇到难以言传的苦衷（经济上），也许您以后会恍然大悟。

莫伸不久前来过，我们又谈起上您那里去逛一圈，但他日前走不开，又只能等到下一次了。

西安目前很“乱”，穷人富人都在谈论如何赚钱，想必汉中也一样，这一回，应该是有智慧的人赚点钱了，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好好论证一下，先写这些。

祝好！

路遥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3月 《早晨从中午开始》完稿后在《铜川矿工报》率先发表。

“在1991年冬到1992年初春创作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一完稿就交给了《铜川矿工报》副刊首发，当时，铜川百里矿区一时刮起‘洛阳纸贵’的旋风，可见报纸刊载路遥的随笔深受矿工和家属的喜爱。”

“1985年秋天，路遥就住进陈家山煤矿医院，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于当年岁末写完了作品的第一部。1987年秋，当《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三部，也就是大量涉及煤矿章节时，路遥又来到鸭口煤矿采煤五区体验生活。在《平凡的世界》中，从‘大亚湾煤矿’到矿工‘孙少平’等情景和人物中到处留下了鸭口煤矿的影踪，这让铜川人特别是鸭口人和陈家山人感到分外亲切。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升井后，把安全帽从头上拿下来，往地上一放，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

他对矿上陪同的人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在陈家山矿医院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日子，他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剑熔《路遥在铜川矿区的日子》）

本月 陈泽顺提出为路遥编辑出版《路遥文集》。

陈泽顺说：“我非常小心地向路遥提出，为他编选和出版一套包括到目前为止全部作品的《路遥文集》。……这次，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表现得十分兴奋。他甚至对我说：编辑和出版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一起在我的书房里商定了编选原则。他不让我沾手，他说这正好是一种休息，一定要亲手编选。”（陈泽顺《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

曹谷溪回忆：“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文集’还不是一个能够被使用的概念，陈行之为了争取上选题做了艰苦的努力，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春 在西北大学做报告。

春 完成《〈路遥文集〉后记》于西安。

路遥在《后记》里写道：“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四十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

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它永远告别了。”

4月2日 作家叶广芩从日本回来后，在《延河》编辑部子心的陪同下去看望路遥。

叶广芩祝贺路遥得了“茅盾文学奖”。路遥笑了笑说：“奖金一万块，还没有到北京，一半就请了客。”叶广芩说：“这奖金还没有我在日本打工刷碗挣得多，但是我刷碗没有你得奖有名。”路遥和在座的朋友都笑了。路遥说：“回来好，咱们搞文学，不能老在外国待着，那样就没有根了，飘着。”（叶广芩《清涧路上》）

当日，路遥给叶广芩签赠《平凡的世界》一套。

4月6日 将《路遥文集》交给陈泽顺。

当日，路遥抱着一个巨大的提包，将夜以继日整理剪贴好的《路遥文集》书稿送到陈泽顺的办公室。据陈泽顺回忆，“当我从他怀里把包接过来时，他几乎站不稳了，靠在墙上说：‘我累得不行。’”当时，路遥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动着捧着茶杯喝水。路遥临走前说：“出版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月 与来省作家协会办事的曹谷溪长谈。

当时，曹谷溪在省作家协会招待所住了三个晚上，路遥与他有三个晚上的通宵长谈。这次深谈，路遥几乎将他的生命历程，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梳理。路遥病逝后，曹谷溪回忆：“当时，我对路遥的这

一次交谈感到惊讶。他为什么要对我讲那么多事情呢？也许，是他对自己生命终结时刻，有了某种可怕的预感！”

5月1日 给何志铭写信，委托其帮助张世晔（航宇）。

5月22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举行首届“双五”文学奖颁奖大会，路遥与贾平凹一起获得突出贡献奖。

5月26日 给李金玉写信。谈及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出版事宜。

5月 《早晨从中午开始》开始在《女友》第5期连载，至第10期结束。

本月 委托邢小利去采访来辉武，后合作完成报告文学《东方新传奇》。

约5月 用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后来路遥在住院的时候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当时买的所有股票的总值为2500元。

作家李天芳回忆，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的郭匡燮当时给省作协的朋友们捎话说，他们单位已买到某某公司的法人股，分在他名下的那部分他买不完，哪位朋友愿要赶快来买。路遥自然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第二天随大家高高兴兴地去了。中途他还去出版社找了老同学，替朋友代买一份。他平日最受不了排

队拥挤的场面，那天竟老老实实在地坐下等待，只是一支支地抽着烟。缴款手续办得缓慢而复杂，收银员怕收了假钞，凡大面值者均一一登记编号，这样足足折腾了一上午。中午他听说后边的事还多着哩，什么认购证、身份证，什么领表填表，少说也得跑几次，一下就望而生畏，再也忍耐不住了，急忙求李天芳替他代办后面的事。哪知这股票拿到手，已是三四个月后，其时路遥已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李天芳《财富》）

6月5日 完成《序言一篇》，收入航宇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你说黄河几道弯》。

6月25日 接受中共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专家”荣誉证书。

6月底 女儿路远通过小学毕业考试，后半年就要上初中了。林达办好调动北京的手续，把女儿接到北京的外婆家过暑假。路遥和林达已经达成离婚协议，女儿归路遥管，林达准备放弃西安的一切财产，只身回京工作。女儿要跟自己生活，为了给女儿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孩子今后在心灵上能平衡一些，路遥开始着手装修房子……

7月中旬 发烧，体温高达39.7度。被航宇（张世晔）、徐志昕、李国平送至商业职工医院。医院给路遥注射了一针退烧针，没有细心诊断。后路遥又返回中国作家协会家属院。海波后来回忆：

我清楚地发现他病得不轻，是在他去延安住院之前不久。那天天气很热，我在作协附近办事。办完事后去找他，想和他说会话。敲了半天门，敲不开；正准备离开，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你是谁啊？”那声音不是来自他家，而是来自对门；仿佛是他的声音，但又不像。我说：“你是谁啊？我找路遥！”他告诉我说：“门没关，你自己进来。”这回我听清楚了，他确实是路遥，但也确定不在家里，真的在对门。

一进门，我大吃一惊。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子，最多五六个平方；屋里堆满了杂物，靠墙放一张小床；路遥躺在小床上，脸色铁青，身子比原来小了许多。我急忙问：“你怎么成了这种样子，为什么不去医院，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家里正搞装修，临时借了这个房子；病了好几天了，治了感冒拉肚子，治了拉肚子又感冒，现在软得动也动不了了。”我说：“赶快去医院，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我来照看你。”他说：“医院去了，大夫说不要紧。作协有人照顾，你住得远，来回跑不合算。”之后，他给我说了他出文集的事，说着就睡着了，我只好退出来。

现在想，他当时的病已经很重了。只是不知道，他没去住院，真是医院误诊了，还是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故意压在心里不说，“抢”着装修房子和出文集。这之后不久，他就病倒在延安了。（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7月 房子装修完毕，请同事李秀娥^[2] 陪同去文艺路布匹市场为新装修的房间配窗帘。

8月1日 给北京的几位朋友王蒙、阎纲、刘茵、周明、白桦等连写五封信，请求他们为马治权提供办刊帮助。

当时，马治权为筹办杂志《各界》，去北京约稿。临行前，路遥说：“北京我有许多朋友，我给你写

几封信，你带着信找他们，能方便一些。”共写了五封信：王蒙、阎纲、刘茵、周明、白桦。马治权回忆，路遥把信交到他手中时说：“北京这几位朋友，周明的活动量最大，人也热情，你先去找他，让他把其他人叫在一起，吃顿饭，就把问题解决了。”（马治权《与路遥最后的交往》）路遥给白桦的信件现保存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此信应视为路遥的最后书信^[3]：

白桦兄：

您好，久不通信，不知近况如何？

现介绍马治权同志来找您。他现正筹办一份杂志《各界》（由省政协主办），现来京想得到各方支持，我特让他来找您，希望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具体事宜由他向您面述。问雷达兄好。我面临许多棘手事，等理顺后再和朋友们联系。

祝好！

路遥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

8月3日 贺抒玉在作协大院遇见路遥，发现路遥瘦了，问路遥怎么瘦成这样？路遥说“我拉了一个月的肚子。”贺抒玉回忆，当时路遥避开话题，没有直接回答。

8月4日 请航宇帮忙买去延安的卧铺票，计划“在延安休息十天就回来”。（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8月5日 到航宇房间取票。

当晚，路遥看着火车票说：“刚才我从泽顺家回来，泽顺真的去不了延安。”航宇说：“要不，咱俩去。”路遥说：“你现在还不能去。家里有些事还没搞完，我走了，你看看给我把家里收拾好。”（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当天，王天乐给邢小利打电话，让邢小利给路遥传话，“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明天只管去。”

8月6日 赴延安。

当日早晨，晓雷、李星在作协院子里看见路遥，问去哪儿？路遥兴冲冲地说：“回去，回陕北。”路遥包里仅仅装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再就是两瓶矿泉水了，其余什么也没有。（邢小利《从夏天到秋天——路遥最后的岁月》）

火车上的路遥感觉不适，下午到延安时，没有力气从火车上走下，接站的李志强^[4]爬上火车，搀扶着路遥下了火车。据《平凡的世界》连环画作者李志武^[5]口述：“路遥到达延安住进延安宾馆北楼205房间后。延安文联艾生^[6]便通知李志武带着刚刚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连环画稿来到路遥的房间。路遥感觉身体状况很差，便说改日再看。李志武到副食商店为路遥买了些白糖等食品。艾生叫来他的朋友赵世雄医生到宾馆给路遥看看病情，赵大夫在客房简单问询路遥病情后，便到走廊向艾生建议送路遥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艾生又与延安地区医院住院部主任取得联

系之后，便和李志武一同陪路遥徒步到距宾馆仅一马路之隔的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在往医院的途中，李志武发现路遥不时看自己的手掌，并用另一只手搓按手掌发红的位置，路遥说从手掌看自己可能是肝上的病。由于医院已是下班时间，艾生便托熟人关系把路遥直径安排在干部病房一个单间住下。因未做具体检查，值班大夫仅开了几瓶常规点滴药。艾生安顿好路遥后便离开，李志武留下来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陪路遥吊针。期间，路遥和李志武聊了很多话题，在聊到自己状况时路遥显得十分沉重。输液到子夜时分才结束，之后李志武又将路遥送回至宾馆。”

8月7日“路遥感觉身体状况好了很多，加之星期天医院不便做全面检查，路遥便让李志武把画稿带到宾馆。李志武把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连环画画稿一批一批在床铺上展开请路遥观看。路遥情绪不错，对画稿非常满意，看完画稿后路遥还主动提议说：“等出版时我好好写个序”。一同在场的还有张春生^[7]和李志强”。^[8]

8月9日 第三次昏倒。延安地区医院三次会诊，诊断路遥患肝炎、肝硬化、乙型活动性半腹水形成，病情比较严重。

8月11日 张子良、张弢赶到延安，在延安宾馆一落脚就打听到路遥住南二楼，两人立即赶到路遥房间。张子良回忆，他们一进门，看见路遥与时任延安地区政协筹委会主任的冯文德并排坐在沙发上。路遥没有挪动身子，疲惫地抬抬手，表示欢迎。

8月12日 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据航宇回忆，当时他看到的路遥病例是这样记录的：（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路遥，1992年8月8日检查，怀疑患了肝炎。

12日，由原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宏如给路遥做B超检查证实，为肝硬化腹水，收到传染科病房住院治疗。

.....

路遥诉说他乏力两年余，加重伴腹胀一月。

医院查体，一般情况尚可，神清巩膜黄染，心肺C，腹膨隆，肝肋下未及，脾肋下3.0CM后中偏硬，纯溜，纯光滑，腹水征阳性。肝功异常，入院诊断，肝炎后肝硬化。最后诊断：

- 1.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活动型伴腹水形成。
- 2.肝右叶点状钙化灶。
- 3.腹腔占位性病变未确定。

8月15日 航宇携带十套《平凡的世界》到路遥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的病房。

8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知道路遥病在延安的消息后，专门派陕西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杨学义与省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前去延安探望路遥，并让捎去一封亲笔信：

路遥同志：

我今天去兰州开会。听说你因病住院治疗，特请我干部处长杨学义和作协王根成前来看望，你有什么困难尽可能告知他们解

决。我知道你是太累了。在延安抑或西安治疗休养更好，还望与他们商量决定。

祝早日康复！

王巨才

8月16日

8月17日 杨学义与王根成赶到延安后，动员路遥回西安治疗，路遥坚持留在延安，待病情稳定好转之后，再考虑回西安医治的问题。（航宇《路遥在最后的的日子》）

8月中旬 见贾平凹。

病中的路遥想见贾平凹。张子良和张弢几经打问，才知道贾平凹在耀县桃曲坡水库附近住着——没有电话也没有人知道具体地址。情急之下，决定派一辆车去耀县，把贾平凹接来。马治权曾回忆：“贾平凹见路遥，也只是默默地看着天花板。当代中国两大文豪，平时写作起来才如泉涌，此时却搜肠刮肚，不知从何说起……路遥先开了口：‘你看我这副熊样子，你要多保重啊！’贾平凹与路遥得的是一种病，此时正在创作《废都》，夜以继日，熬油点灯，面色蜡黄，十分难看。他听了路遥的话，黯然神伤地点了点头，从房间退了出来，一个人走到楼外，蹲在拐角，放声号啕起来——涕泪俱下，其伤心的激烈程度让身边的其他人莫不唏嘘潜然。”（马治权《与路遥最后的交往》）

8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印发了一份《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迅速分送给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等有关领导传阅。

8月21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派王观胜、李国平、徐志昕来延安看望路遥。路遥在输完液体后，主动提出要去杨家岭旧址看看。路遥想出去走走，同事们不好强迫，请示医院同意后，把路遥扶到车上，驱车前往杨家岭。一路上，路遥兴致勃勃地给同事们讲母校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旧址的有关情况。到杨家岭旧址后，路遥坐在一块石条上，让同事们自行参观。返回的路上，路遥很疲惫，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8月28日 下午三时，失眠七天七夜的路遥病情突然恶化，高烧39.8度，疼痛得在床上翻滚。下午5点30分，航宇接作协办公室李秀娥从西安打来的长途电话，航宇告诉了路遥病情严重的消息。

8月下旬 省委组织部部长支益民同志和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同志以及高建群等人，赶到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看望病中的路遥。

8月30日 一份“关于路遥同志的病情通报”送到省委、省政府。

9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同志在百忙之中看了省委宣传部印发的《关于路遥同志的病情通报》，立即在通报上批示：

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路遥同志。

张勃兴

1992年9月1日

同日 白描在北京给路遥发电报，希望路遥鼓起勇气信心战胜疾病。

9月2日 延安地委副书记张志德和秘书长张连义前往医院看望了路遥，转达了省委领导的意见，并了解了路遥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鉴于路遥病情较重，延安医疗设备和技術有限，并根据路遥的意见，决定转西安诊治。

9月4日 路遥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九娃）看望路遥，兄弟俩抱头大哭。路遥说：“哥不行了，哥照顾不了你们了。”

9月5日 早晨七时，清洗干净脸和胡子，吃了一碗小米稀饭。八时，延安地区政协的冯文德，延安行署的樊高林，地委宣传部的白崇贵，延安报社的李心达、李志强，延安文联的曹谷溪、高其国、杨明春，延安艺术馆的王克文等近百名干部群众在医院大院聚集，为转院的路遥送行。

到火车站后，路遥被朋友们扶着朝站台上走去，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跑向路口，拨开了一条通道。上了火车以后，路遥坐在紧挨窗口的床铺上，嘱

耐航宇：“世晔，把窗门打开。”路遥看着为他送行的人群，眼泪扑棱扑棱淌了出来。车厢里，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马安柱大夫和护士高洁，急忙开始收拾药物，准备输液。列车在人们的悲切声中启动了，路遥伏在车窗上，泪流满面地朝送行他的人群频频挥手告别……（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本日 下午18时30分，林达、霍绍亮、杨韦昕、王根成、李秀娥、邢小利、晓雷、王天乐等亲友到西安火车站迎接路遥。在王天乐与晓雷的搀扶下，路遥艰难地走下火车，抬起手，向人们招手致意。

同日 19时03分，路遥入住西安西京医院传染科七号病房。医生康文臻担当了路遥的治疗工作和住院生活任务。

康文臻回忆：“当时他肚子胀的高高的，脸黄的发亮，滴水不入，经常昏迷。我第一次进他病房时，他还清醒，我对他说，我姓康，是你的主管医生，他点点头。问他病情，他讲了，但是思路混乱，讲不清楚，他病得太重了。”路遥住院以后，康医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路遥。她是接触路遥最多的医生，性情温和的康医生，只有26岁，不仅要负责路遥的治疗工作，还要忙于自己的研究生实验课题。

西京医院护士长魏兰萍回忆路遥刚进医院的情景：“路遥大约是天黑时到的吧。我那天接夜班，见到他时，他精神很不好。整个人处在衰竭状态，脸特别黄，而且有点浮肿，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穿着一件老

式运动衣。我当时想，这个人不像个有名的作家，倒像个普通的农民。”

9月6日 上午10时，收到“病危通知”。

午饭时，护士宇小玲为路遥端来一碗柳叶面，面里配了菜叶，青青白白的。宇小玲对不想吃饭的路遥说：你看这面多可爱呀，我都想吃了呀！路遥被护士宇小玲柔声细语哄小孩吃饭的语气逗笑了。多日来的坏情绪见了晴天。吃过了饭，宇护士又为好久没有洗澡的路遥做生活护理。

9月7日 关于路遥的一份申请划拨医疗费请示报告送给副省长徐山林，五万元医疗费随即落实。

9月8日 下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郃尚贤前往医院探望路遥。因抢救及时，病情减轻。据大夫说，治好了他还要工作。

9月9日 省长白清才驱车前往医院看望路遥。

当日，路遥精神好转，能坐起来说话。白清才省长说：“拿出写《平凡的世界》的精神来，把病治好。”路遥微笑着说：“一定，一定。”问路遥想吃啥，路遥说想喝陕北的小米汤。一句话，道出了路遥的陕北情。白清才省长在楼道给医护人员说：“你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把路遥的病治好。”（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

9月10日 中午12时以后，路遥突然感到烦躁不安，再度昏迷。

同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牟玲生前去看望，路遥醒过来了，一句话也不能说。医生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路遥的病情变化，医生正在进一步讨论治疗方案。路遥四五年前可能已经肝硬化了，没有及时治疗，已到了肝硬化晚期。

9月11日 12时05分，路遥病情突然加重，神智渐渐不清，处于昏迷状态。医院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紧急抢救。

同日 下午3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来医院探望；4时50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牟玲生同志和他的秘书山振兴赶到医院探望路遥；7时45分，路遥从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9月13日 省人事厅郭开民副厅长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专家服务中心的四位同志赶到医院探望路遥。

9月17日 下午3时，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李森贵和秘书张魁冒雨赶到医院，探望病中的路遥。期间，路遥情绪稳定，腹水渐渐消除，食欲略有好转，但唯有黄疸指数仍在逐渐上升。

同日 孙豹隐与霍绍亮等冒雨去医院看望路遥。路遥在讲述自己病情后，突然提高了声音说：“悲剧，一场悲剧。”

9月18日 稳定了十多天的病情，突然加重。

9月19日下午 孙豹隐与韩望愈等冒雨去医院看望路遥。路遥在回答孙豹隐询问病情时，再次说：“悲

剧，一场悲剧。”

同日 给晓雷留一便条：“晓雷，请将写××大楼那壹仟元稿费领出交给林达。”

晓雷回忆：“初看此条，已记不起这在哪一年，但一注意字迹，我就判断出可能是那个不幸的年头。用圆珠笔写在随意撕下的一页条据纸的背面，笔画虽不潦草却歪歪斜斜。潦草不是路遥的书写习惯，歪歪斜斜难道是病中所为？果然，没过多久，我翻检出了林达在9月21日写的领条：‘今领路遥写××稿费壹仟元正。’这月日前写明了1992年，证实了我的感觉。”
(晓雷《破碎的借条》)

9月20日 上午10时，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再次来到西京医院传染科看望路遥，并转达了省长白清才同志的指示：“省长好选，人才难得。要他安心治疗，等出院后，可同贾平凹商量下，是一块儿出去疗养，还是单独出去，省上再困难，也要拨出专款，让他们到中国最好的地方去。”

9月22日 林达离开西安回北京上班。路遥住院期间，林达来医院看望路遥。原本计划找路遥商谈离婚的事，因为看到当时路遥的病情，却无法开口提出协商离婚，离异手续推后。

作为与路遥、林达一起在延川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多年的两人的共同朋友海波，对他们从恋爱到步入婚姻殿堂，再到后来的出现裂痕，有个明确的认识：

我认为路遥和林达的不愉快，主要责任在路遥，而不在林达。当年作为未婚妻时，林达为路遥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一切：在路遥最困难的时候和他订婚，为了供路遥上大学，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婚后甘当陪衬，勤勉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路遥去世后，面对许许多多的不理解，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林达的支持，路遥不会有如此成就；如果有，也会付出更多艰辛。

我同时认为，在总体上讲，路遥也没有辜负林达对他的爱，他用惊人的毅力、忘我的劳动和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给林达的承诺（如果有承诺的话），用事实证明了林达是一个有眼光的女人。他是一个和平年代的传奇英雄，一个值得男人学习、女人爱的英雄。和他的巨大人格魅力和非凡的创造能力相比，他的缺点是那样次要和微不足道。像一座雄伟的大山一样，在阳光下他雄劲壮丽，高大巍峨，但也难免有阴影。令人感叹的是，他把最好、最大、最本质的一面献给了社会、献给了读者，而把阴影留给了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爱人林达。（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9月23日 中午1点左右，吃了灶上送来的一条小鱼，朋友带来的六块带鱼、一小块饼与二两米饭。两小时后，突然感觉到肚子有胀痛之感，叫来医生，经B超检查，又患了中型腹水。

9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赵熙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副书记、雷前进为党组成员。

9月25日 捎话要见邢小利。

9月29日下午 因诸多事情，情绪异常糟糕，饭也不吃，悲苦地流着眼泪。

9月 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0月1日 向陕西创作之家写一借条：“今借到创作之家壹仟元整。”

晓雷回忆：“比之于上一个条据，这张借条的字迹已明显看出路遥的身体更加虚弱，力不从心。除却字形歪歪扭扭，笔画有气无力，一撇一捺，都已无法控制，笔尖好像一直在纸面上打滑，就像他此刻正拖着病体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移向一个黑色的对岸，实实在在显示出生命行将结束时难以支撑的悲凉步履。十天前领了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笔稿费；十天后，也许是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张借条。生活是在怎样描画着一位蜚声遐迩的作家的命运轨迹呀！”（晓雷《破碎的借条》）

10月11日上午 朱合作带着十来斤苹果，早早地来到了西京医院看望路遥。

朱合作从早上9点，一直陪路遥坐到12点。据朱合作回忆：“这中间，还来了三四起看望路遥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个年轻后生（李志武——引者注），操着延安口音，他说，他来一方面是想看路遥来了，一方面是想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礼品式（盒装）连环画，

经费问题已基本落实，是想让路遥写个便函，便于他出去和出版社联系。路遥被扶着斜坐在了病床上，找了片纸，但找不到笔；正好我身上带着笔，就脱下笔套递给了他。路遥一边写信，一边还几次对我说：‘这（人）画得好。’路遥的身体很虚，几行字写的一行比一行更向右边偏去，但落款写‘路遥’两个字时，还基本上保持了他平时签名时那种很潇洒的气势。那位年轻的画家，等路遥把信写完了，又说，希望路遥在正式出书时，再写个序言。路遥说：‘序写不成了。我手筛得连笔也捉不牢了。到时候，就题上个词。’我听罢，心里忍不住又是一阵沉重。”（朱合作《看望病中的路遥》）

同日 远村与郑文华带着路远来医院探视路遥。

10月12日 在医院要了一台电视，收看中共十四大新闻。

10月中旬 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前去看望路遥，他给路遥带去一个好消息：学校订购价值五万元的《路遥文集》，资金已经汇入陕西人民出版社账户。路遥在延安住院时，申沛昌校长在日本访问。回校得知情况后，专门召开校党政会议解决了此事。路遥听到结果后很是激动，连声说：“谢谢！……”

10月27日 托朋友从西安地方医院请来个老中医，给他开了十几服中药。

10月28日 腹泻。

10月29日 出现肝性昏迷，经抢救后，病情虽略有好转，但不久又进一步恶化。

11月1日 白描回西安去医院看望路遥。白描回忆，路遥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白描，拜托你，茗茗（路远——引者注）要到北京了，拜托你照顾她！”（白描《对路遥最大的支持》）

11月7日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分会书记处停止工作，任命雷前进为秘书长；同时，成立换届筹备领导小组，王汶石任组长，路遥、赵熙任副组长。

11月10日 开始拒绝输液，拒绝治疗。路遥说：“如果生命只剩下苟延残喘，既忍受痛苦又给大家带来麻烦，那活着还不如死了。”经过医护人员的再三劝说，路遥勉强同意继续输液，但改为两天一次。

11月11日 勉强吃下一碗面，之后任谁劝说也没有再进一口食物。医院通知路遥的四弟王天乐，转告路遥单位，希望来人做协助工作，希望能配合治疗。

11月12日 洪章去医院看望路遥。

据洪章在文章《黄土地的儿子》中说，路遥很怀念故乡陕北。路遥说等他病情脱离危险，就出院疗养，回到陕北老家，让母亲再照料一段时间，就完全恢复了。

11月13日 上午，路遥弟弟王天笑（九娃）到中国作家协会，告诉陕西分会作协新任领导路遥病情危

险。

下午五点左右，作家厚夫专门从延安赶到西京医院的肝病治疗中心看望路遥。厚夫的印象非常深：星期四的下午5点左右，赶到西京医院传染科病区的路遥病房。那时的路遥，跟夏天回延安养病时的情形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已经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

同日 在邢小利职称评定意见栏里签字。

“他欣然摸索出笔来，颤抖着签下他的名字。虽然那两个字在他写来已相当吃力，但仍然显出了他的一丝不苟，我也决然没有想到，这竟会是路遥此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公务，那两个颤颤巍巍的签名竟成了他的绝笔……”（晓雷《雪霏霏今天垂——路遥离去时刻》）

11月14日 见时任陕西省文化厅厅长的霍绍亮。路遥要求见霍绍亮，霍绍亮赶到医院，路遥说，“我已经在医院躺了两个月了，病情不见减轻，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治疗，或者转院。”

同日 赵熙、姜洪章、李秀娥去医院看望路遥。

同日 路遥给航宇讲过去的事情：从贫穷与饥饿的少年时代，讲到如何让父亲过继给延川大伯为子的艰辛路程；从年轻时期的恋爱，讲到现实的婚姻；从这次患病的朋友帮助，讲到朋友的友谊；还讲对同事邹

志安病情的同情，讲与好朋友、诗人闻频的早年交往；他甚至与航宇一一核对了所欠别人的债务……

同日 晚7点多，北京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六位实习女兵带了一盆黄菊花，并要求与路遥合影。路遥答应了，抚摸着菊花十分高兴，与这些实习女兵的合影竟成了路遥的绝照。

11月15日 情绪变得越来越坏，脸上气色十分难看，腹部有烧灼感，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沉思着。睡醒来时哭了，他不知不觉尿了床。

路遥情绪越来越坏的原因竟是主治医生康文臻因课题需要，由临床转回实验室，把病情复杂的路遥交给了主管医生仇燕琴。康医生虽然交了班，但每天依然到病房看望路遥一次。其实，当时路遥的肝功能已经全部衰竭，完全丧失新陈代谢作用，维持他生命的只是滴着血浆与白蛋白的皮管。

11月16日 路遥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当日，他问弟弟九娃（王天笑）：“今天是星期几？”下午7时，冥冥之中的路遥，呼喊着他的亲人们，不一会儿就昏迷了过去。6时，基本上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晚上12点，路遥肚子疼，难受地不停地折腾，躺下又坐起来，医生打针。

同日 下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新任党组副书记赵熙在秘书长晓雷陪同下看望路遥。此时的路遥已经平静下来，能躺在病床拉话。主治医生向赵熙、晓雷介绍了路遥的病情，将路遥的病历给他们看，厚厚的像

一部巨著。医生说，路遥是积劳成疾，病得严重，要准备打持久战，这需要路遥的配合……路遥听明白了。赵熙是路遥的老朋友，早在1970年时就熟识。路遥妻子林达就是赵熙从延川调到西安的。

赵熙与晓雷离开病房时，路遥抓着赵熙的手，低微而殷切地说：“生活太残酷了，我一定要站起来……”

同日 晚上12点多，在病魔折磨下的路遥无望地给陪护他的小弟弟王天笑提出一点希望，让他赶快给好友、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霍世仁打电话，让他马上赶来，尽快转院。王天笑跑到护士办公室，挂了好长时间没有挂通电话。痛苦的路遥在床上打滚，一声声地呼喊：“九娃，快救救我，快救救我……”王天笑抱着路遥，泪流满面，却毫无办法。

11月17日 当日凌晨四点，弟弟王天笑给路遥揉肚子，感觉不对，肚子里面全是血。凌晨五点，路遥开始昏迷，弟弟王天笑开始找大夫抢救，接着插氧气抢救。路遥在病床上痛苦地抽搐和呻吟，缩成一团，临终前给守候在身边的弟弟九娃（王天笑）说：爸爸妈妈可重要哩……爸爸妈妈可亲哩。

清晨，关中飘起了雪花。

8点20分，路遥心脏停止跳动。医生不甘心，仍然不放弃他们最后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路遥，想让路遥心脏重新跳动起来。在路遥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后医生们依旧抢救了七十多分钟。九点三十五分，医

生宣布：路遥死亡。（金铮《写给〈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读者》）

9点30分，在路遥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以后，天使们仍然不放弃她们最后的努力。参与抢救的晓雷目睹了全部抢救过程：他们推来一架仪器靠近病床，除颤器伸出两条电缆，电缆前端连着两只皮碗，一位女大夫用两只手举起两只皮碗，摁在那已酣睡不醒的胸脯，就像伸出两只手去打捞一个奄奄一息的溺水者。医生命令所有的人后退，离开铁床，霎时间通电，两只皮碗举起，路遥的胸脯上留下两个碗形的灼烫过的伤痕，但他依然长眠不醒。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最有希望的抢救措施了。随着天使们黯然而失望的神情，我挤在心电图仪前凝视荧屏，那平缓的不再大起大落的线条告诉我，即使用最危险的通电措施，我的朋友再也无法唤醒了，我的眼泪无法抑止地滚滚而下……

9点35分，这是个永远叫人揪心而绝望的时刻。天使们默默地推走氧气筒，推走输液架，推走除颤器，推走心电仪，拔掉路遥四肢和躯体上所有的电线和他鼻孔、嘴中的插管。病床上仍然留下一个有机体，但这个有机体却在刹那之间就变成无生机无意识无生命的了。此时，西安城里雪花飞舞，天地一片苍茫。天地动容，草木含情；悲我路遥，魂魄长存！……（晓雷《雪霏霏兮天垂——路遥离去的时刻》）

本日 新华社发了路遥英年早逝的通稿：“新华社西安11月17日电，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而

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路遥，今天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长期艰辛的创作使他积劳成疾，终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于今晨8：20分在西安西京医院猝然离世……”

11月18日《西安晚报》刊发短讯：《“人生”竟这般短促，路遥，你走的太早了！》，这是最早报道路遥病逝的新闻通讯稿。

路遥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从全国发来的唁函、唁电有一尺多厚，像雪片一样。巴金从上海发来唁电：“惊悉路遥病逝，不胜哀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马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玛拉沁夫从北京发来唁电：“猝悉路遥同志逝世，不胜悲痛，路遥同志逝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无比沉痛。”北京发来唁电：“惊悉路遥同志英年早逝，不胜哀悼。”诗人公刘从合肥发来唁电：“不该走的人偏倒走了，痛哉！请收下后死者的追念，请相信永生者的纪念。”作家张贤亮从银川发来唁电：“文星殒落，痛失良友，贤弟先行，吾随后到。”

当日，路遥去世的消息登报了，路远的中学同学都知道了，有同学问路远：“你看见报上登的吗？”远远莫名其妙，弄不明白，追问同学：“你们都说报上登，登的啥？”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了，不敢说实情。就在这一天，路远上街买了音乐卡，准备给爸爸过生日，想着那美妙的时刻，想着父女团聚的情景。（王兰英《哭路遥》）

11月18日 晚九点，林达乘飞机从北京抵达西安机场。

11月19日 路远与林达去医院看路遥遗容。

同日 上海《文学报》刊发消息《著名作家路遥英年猝逝》。

11月20日 在户县写作的贾平凹乘车返回西安。

11月21日 上午，陕西各界人士在西安三兆公墓向路遥做最后诀别。

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支益民等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参加了追悼大会。遗像正前方，摆放着一幅长长的挽联，上面书写着“路遥：你若灵魂有知，请听一听我们的哀诉。妻林达、女儿路远泣敬”。林达在亲友的搀扶下走到路遥遗体边，无限悲戚。女儿路远已经哭成泪人，悲痛欲绝。她手里拿着一张制作精美的生日贺卡，拼命挣脱开扶她的人，发疯地扑向路遥，边哭边喊：爸爸呀，你不是好好的吗？你回来吧，你再看看我吧。我还等着在家给你过生日呢……亲友搀扶着路远，路远极力地挣脱着：“不嘛！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看，他是我爸爸呀！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了，让我再看看他吧！爸爸，再过几天就是您的生日了，这是我给您亲手做的生日贺卡，您睁眼看看呀！”在众人的帮助下，掀起有机玻璃外罩，让路远将生日贺卡放在路遥遗体的胸前。

追悼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分会党组书记赵熙主持，介绍路遥生平。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的陈忠实致悼词：“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殒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这是路遥。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他的猝然离队将使这个整齐的队列出现一个大位置的空缺……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中，躁动着炽烈的追求光明追求美好追求健全社会的愿望，他没有一味地沉默也不屑于呻吟，而是挤在同代人们中间又高瞻于他们之上，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揭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青春男女的心灵的期待，因此而获得了无以数计的青春男女的欢呼和信赖。他走进了他们的心中。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的精神上的执言者。……我们深沉的惋惜正是出自对一个文学大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事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陈忠实《悼路遥》）

十点四十分，路遥遗体告别结束；十点五十五分，路遥遗体进行火化；十一点二十七分火化结束，王天乐、王天笑接过了路遥的骨灰盒；十一点四十五分，路遥的骨灰被放置在三兆公墓骨灰室1109的小木格橱柜中。（金铮《写给〈路遥在最后的的日子〉的读者》）

王天乐特意为哥哥留下两盒“红塔山”香烟。然后，神情疲惫到极致的天乐、天笑兄弟俩，相互搀扶着走出骨灰堂。刚跨出门槛，兄弟俩就悲恸难忍地哭倒在地……

同日 北京《文艺报》刊发消息《著名作家路遥逝世》。

12月15日 史铁生作《悼路遥》。

12月30日 王巨才作《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序言）》。

12月 《早晨从中午开始》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月 航宇完成书稿《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

本月 郑文华的摄影作品《著名作家路遥》刊于《女友》1992年第12期，摄影作品《路遥的生与死》，获陕西省1992年度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

【注释】

[1] 三本书指的是作家王蓬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水葬》、传记文学《流浪者的奇迹》和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黑牡丹和她的丈夫》。

[2] 李秀娥，陕西绥德人，笔名木子。著有报告文学《黄土地里的歌》《深深的脚印》，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3] 此信由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收藏，未刊。

- [4] 李志强，延安报社工作人员。
- [5] 李志武，《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连环画作者。
- [6] 艾生，画家，《平凡的世界》小说首版封面画作者。
- [7] 张春生，《平凡的世界》连环画脚本改编者。
- [8] 据《平凡的世界》连环画作者李志武口述。

附录1：1993—2019年 逝后

1993年1月 五卷本《路遥文集》与《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2月 航宇写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月 肖云儒《文始文终记路遥》刊于《延河》1993年第2期。肖云儒在文中说：“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历史发展性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第二，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的孤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痛苦。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个路遥则要求在社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现实的自我。”

1993年5月 《早晨从中午开始》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93年5月25日 《光明日报》刊登记者韩小惠的文章《陕军东征》。

1993年6月 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8月 赵伯涛《骑手倒下，路便死去了——路遥之死札记九题》，刊于《天涯》1993年第8期。

1993年8月 郑文华的摄影作品《作家路遥》（摄影）刊于《河南画报》1993年第8期。

1993年11月13日 郑文华的散文《我知道的路遥》刊于《西安晚报》，并获1993年度最佳作品奖。

1993年11月17日 《文友》编辑部召开纪念著名作家路遥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决定将已举办四届的“未来作家征文大奖赛”更名为“路遥青年文学大奖赛”，以路遥的精神激励广大文学青年。据统计，首届“路遥青年文学大奖赛”有10多万名参赛者投稿参赛。

1993年 《路遥文集》责任编辑陈泽顺调回北京，在华夏出版社工作。

1994年5月15日 郑文华的摄影作品《作家路遥》刊于《新报》。

1994年10月 《平凡的世界》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1995年1月 赵学勇《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关于路遥研究的专著。同月，张春生改编、李志武绘的《平凡的世界（连环画）》，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4月 在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省人大原政法委主任霍世仁、原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原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原榆林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赵国新、《延安文学》总编曹谷溪等同志和路遥的生前好友，在西安止园饭店开会。会议决定，一是在延安大学成立“路遥纪念馆”，筹委会主任由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同志担任；二是征得路遥亲属的同意后，把路遥的骨灰迁回延安大学后山安葬；三是在路遥逝世三周年纪念之际，举行隆重的路遥骨灰安葬暨悼念活动。

1995年6月 《路遥小说名作选》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1995年10月 《首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5年11月17日 路遥逝世三周年。来自北京、西安、延安的各界人士200多人汇聚在延安大学文汇山举行路遥骨灰安葬与路遥纪念馆奠基仪式。

1997年6月6日 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同意出版《路遥全集》。

1997年9月 《路遥获奖小说精选·人生》由经济日报社出版。

1997年10月 邢仪拎着画布和油画箱，奔赴延川县为路遥的养母画像。半个月后，她返回北京，带回三

幅画、一沓速写，还有一本记录她行踪和感受的日记。

1997年12月 王西平、李星、李国平合著的《路遥评传》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7年 时任汉中市委书记的白云腾听说路遥生前十分喜欢汉中市西乡县大巴山的白皮松并准备移栽两棵到省作协大院的故事后，深受感动，当即协同西乡县人民政府为延安大学路遥陵园捐赠了两棵白皮松。这两棵白皮松，亦给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陵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1998年1月 《第二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由女友杂志社出版。

1998年3月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路遥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9月 《第三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第四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由女友杂志社出版。

1998年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受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委托，进行了“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平凡的世界》在“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中排名第6位，是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唯一一部“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

1999年4月6日 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稿酬由原来的千字30元上调为千字40元；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建议。

1999年4月16日 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了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

1999年5月10日 林达致函广州出版社及太白文艺出版社，同意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并同意广州出版社力争以优质水平在1999年10月31日之前出版该全集。

1999年 连环画《平凡的世界》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中获得铜奖。

2000年3月 宗元专著《魂断人生——路遥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0年7月 《平凡的世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系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月《小说评论》刊出龙云的《永远的路遥——路遥作品重读论》。

2000年8月 《人生》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0年9月 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以“全集”的命名的方式出版《路遥全集》，这在国内属于首次。

2000年10月 姚维荣专著《路遥小说人物论》由新加坡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0年11月17日 路遥逝世八周年纪念日。出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延安、榆林市的代表会员，集体给路遥扫墓。

2001年11月 《路遥全集》荣获中国版协城市出版社工作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暨第十四届全国城市出版社社长年会优秀图书一等奖。

2002年8月 《平凡的世界》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2年9月6日 日本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来延安访问，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

2002年10月 由张春生改编、李志武绘画的连环画《平凡的世界》（上下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2年11月17日 由延安大学、延安市人民政府、榆林市人民政府、陕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举办的“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延安大学举行。同日，“路遥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同日，陕西师范大学邀请省文学艺术界、新闻界人士举办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会议，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出席纪念会并发言。同日，清涧县委、县政府为纪念路遥将清涧县图书馆更名为“路遥图书馆”。

2003年8月 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不平凡的人生》，内部印行。

2003年9月10日 林达与路茗茗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林达放弃对路遥生前所有作品著作权的继承权，由路茗茗全部继承；协议生效后，林达不得再行使对路遥生前作品著作权的任何处置权。

2003年12月 广州出版社与太白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全集》进行了第4次印刷。

2004年2月 路遥的养母李桂英去世。

2004年3月 《人生（连环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

2004年5月 《平凡的世界》（茅盾文学奖系列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 刑仪《知青·陕北速写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内容多以陕北风俗为主。其中收有《路遥的婚礼》《路遥头像》两幅。

2005年3月24日 作家李若冰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享年79岁。作家白描在纪念李若冰的文章中，记述过李若冰对路遥的精心呵护：“路遥在成长道路上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那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引者注），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里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

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白描《在故乡种棵树》）

2005年3月 《小说评论》刊出黄建国的《沉郁、雄浑、壮丽的崇高感——路遥小说的美学风格》、贺智利的《路遥的宗教情结》。

2005年5月 《路遥文集》（五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6月 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2005年7月30日 路遥研究会在延安召开了2005年“路遥研究会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有四点：一、进一步加强路遥的学术研究力度；二、加大路遥研究的宣传力度；三、积极培养路遥研究的后备人才；四、积极筹建“路遥纪念馆”。

2006年1月 由路遥研究会与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共同策划，马一夫、梁向阳共同主编的《路遥研究资料汇编》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06年3月 《小说评论》第2期（总第128期）刊出贺智利的《路遥的个性心理》。

2006年4月6日 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与延安大学联合举行了路遥汉白玉雕

像揭幕仪式，王巨才、白描、陈忠实、白桦、何西来、王天乐、路茗茗等人参加了揭幕仪式。

2006年4月7日 延安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共同在延安大学校园内举行了路遥汉白玉雕像落成仪式与扫墓活动。

2006年4月 廖晓军专著《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2006年5月 李文琴编选《路遥研究资料》，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7年4月 路遥胞弟王天乐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2007年5月 路遥胞弟王天笑患肝硬化并出现轻度腹水。

2007年7月17日 路遥生父王玉宽去世。

2007年7月26日 村民们为路遥的父亲王玉宽举行葬礼。

2007年11月15日 “怀念路遥”图片展暨《守望路遥》首发式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隆重开幕，展出路遥生前照片200余幅。图片展的绝大多数作品均由路遥好友、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社编审郑文华拍摄。同时，由申晓主编的《守望路遥》纪念集也举行了首发式。

2007年11月17日 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开馆。由延安大学、陕西省作家协会、榆阳区人民政府、清涧

县人民政府、延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大会暨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举办。同日，路遥文学馆举行了开馆揭牌仪式，路遥文学馆馆名由王蒙题字。路茗茗专门发来感谢信《瞭望父亲精神的窗口——写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开馆之际》。新华社专门发稿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2008年4月8日 八集大型人物纪录片《路遥》在西安亮宝楼召开新闻发布会。本片是由路遥文学联谊会组织发起，由陕西荣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陕北绥德籍青年导演田波执导。

2008年4月10日 《路遥》摄制组在清涧县王家堡村正式开机。

2008年5月 实业家潘石屹专程拜谒路遥墓冢，并在路遥文学馆题写：“走出高原，每当我遇到困难，您的作品总是给予我力量。”

2008年6月 阎慧玲《路遥的小说世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2008年8月 由张春生改编、李志武绘画的连环画《平凡的世界》（上中下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8年9月 马一夫、梁向阳、宋学诚主编的《路遥再解读》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8年10月 新浪网“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

榜首。

2009年3月12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行了纪念路遥座谈会。

2009年6月 杨阳导演的电视剧《人生》在延川开机。

2009年9月7日 纪录片《路遥》在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墓地杀青封镜。

2009年9月 杨庆祥等著《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同月，王维玲著的《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路遥，一颗不该早殒的星》。

2009年11月 石天强著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年12月16日 上午10时，路遥纪念室建成揭牌仪式在路遥母校延川中学举行。

2009年12月 李继凯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第六章第三节以《会通中西的文学创作取向：以路遥为中心》为标题做了专门的论述。

2009年 《平凡的世界》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做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同年，《人生》入选《中华读书报》评选“六十年六十书”。

2010年1月 《路遥全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推出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三卷本）、中短篇小说集《人生》《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及散文、剧本、诗歌集《早晨从中午开始》。

2010年1月17日 由榆林市作家协会、榆林市路遥文学联谊会主办的“永远的路遥——纪念作家路遥六十周年诞辰”活动在榆林举行。

2010年5月25日 八集纪录片《路遥》完成后剪辑制作。

2010年9月 吴妍妍著的《现代性视野中的陕西当代乡土文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章第一节为《路遥：乡村怀恋与现代性渴望》。

2010年10月 冯肖华著的《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审美形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九章第二节为《“路遥模式”的精神承载》。

2010年11月20日 八集纪录片《路遥》被剪辑成45分在香港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播出，这是《路遥》纪录片首次在公开的电视台播放。

2010年12月 叶咏梅编著的《中国长篇连播历史档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收入《路遥与他的平凡世界》《〈平凡的世界〉人生之思》。

2011年1月 王蓬著的《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上下）》由西安出版社出版。下册收入《路遥的生前与身后》。

2011年3月24日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等数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大型人物纪录片《路遥》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

2011年3月26日 路遥生母马芝兰因患突发性脑出血救治无效，于20时18分在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去世，年80岁。

2011年3月28—30日 纪录片《路遥》改编为上、中、下三集由中央电视台科教（中央10台）频道《人物》栏目播出。

2011年4月11—14日 八集纪录片《路遥》广播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世界了解中国，从陕西开始》栏目连播。

2011年5月“五月·延川，我们追寻路遥”大型文化活动在延川县举办。同月 李建军著《文学的态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三篇关于路遥的文章：《路遥何曾妖化河南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论路遥的才华及其特点》《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

2011年6月11至12日“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该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参加会议的人有来自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者。

2011年9月11至18日 八集人物纪录片《路遥》完整版首次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时代写真》栏目播出。

2011年9月 由傅博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路遥》在《电影文学》（半月刊）2011年第18期刊发。

2011年10月11日 第七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评奖结果出炉，纪录片《路遥》获得“年度十大纪录片”大奖。

2011年12月3日 路遥诞辰62周年纪念日，路遥纪念馆在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开馆。路遥纪念馆总占地面积5332平方米，建筑面积1006平方米，馆内展厅分困难的日子、山花时代、大学生活、辉煌人生、平凡的世界、永远的怀念六部分，共展出和收藏路遥生前生活用品、手稿、信函、照片、音频视频等珍贵实物及资料600余件（张）。

2011年12月 冯肖华著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张力：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诗学价值》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第十七章以《“路遥现象”与当下的价值呈现》为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2012年1月1日 武一平《路遥手稿现西安》，刊登于《西安晚报》2012年1月1日第13版。

2012年1月 徐刚的《“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在《南方文坛》（双月刊）2012年第1期发表。

2012年2月 山东大学文学院在全国十省市进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阅读调查，读过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读者占被调查者的38.6%，位列所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第一位。

2012年5月15日 程光炜的《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在《当代文坛》（双月刊）2012年第3期发表。

2012年5月 高松元著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路遥：平凡一生，透支生命》为题进行了讲述。

2012年7月 李遇春著的《西部作家精神档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四编“路遥·红柯·李锐”中以《焦虑的踪迹——路遥小说创作心理嬗变论》为题论述了路遥创作心理方面的内容。

2012年11月15日 延安大学路遥研究会和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路遥逝世20周年系列活动在该校举行。

2012年11月16日 陕西省作家协会、榆林市文联和清涧县委、县政府联合在清涧县举行纪念路遥逝世

20周年活动。

2012年12月1日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鲁迅文学院和《收藏界》杂志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文学回望与思考——纪念路遥逝世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2012年12月19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携手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馆长厚夫与北京师范大学400多位学子一起缅怀路遥。

2013年3月 张艳茜著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3年5月 程光炜、杨庆祥主编的《重读路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重读路遥》收入近年来最重要的路遥研究论文十余篇，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路遥年谱、路遥的写作发生学、路遥的影响史、路遥与现实主义的建构、路遥与八十年代社会等展开深入的知识考古式的分析讨论，试图展示一个充满了文学症候学意味的“路遥研究学”。本书作者均来自海内外一流的高校，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另有一批80后学者加入，提供了别样的研究思路。

2013年12月16日 《文艺报》推出“经典作家·路遥研究”专版。

2014年2月 海波著的《我所认识的路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4年3月 王刚编著的《路遥纪事》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2015年1月 厚夫著的《路遥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2月26日 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东方卫视等电视台开播。

2015年5月 《当代》2015年第3期“往期”栏目刊发了《从〈延安山花〉》到〈山花朵朵〉》《路遥的爱情》《那个陕北青年——路遥》《我所知道的路遥》《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等文章。

2015年5月25日 由中共清涧县委、清涧县人民政府举办的纪念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完成27周年暨路遥精神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同日，由清涧县路遥纪念馆主办的《路遥》杂志宣布创刊。

2016年1月 段建军主编的《路遥研究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6年6月 《路遥·2016年春夏卷》出版，收录了26篇纪念与评价路遥以及路遥作品的文章。

2016年8月6日 路遥胞弟王天笑（九娃）因病在清涧县王家堡村去世，时年48岁。王天笑，生于1968年，他比路遥小近二十岁。路遥成为名作家时，他还是个中学生。路遥去世以后，他有一个心愿，要为路遥拍摄一部反映路遥的纪录片。2008年，王天笑、吴建荣（王天笑好友，《路遥》纪录片总制片人）筹资

拍摄纪录片《路遥》，2010年完成全部制作，之后在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等先后播出。王天笑生前曾就纪录片《路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点遗憾，这部纪录片尽管拍得不错，受到业内人肯定，但大众所知不多。

2016年9月 由张春生改编、李志武绘的连环画《平凡的世界》（上下册）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11月17日 由延安大学、陕西作协、中共延川县委、延川县人民政府和延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主办的“纪念路遥逝世2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缅怀路遥。

2017年12月12日 《光明日报》刊发王刚的《〈人生〉发表的前前后后》。

2018年7月 杨晓帆专著《路遥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18年10月 由张春生改编、李志武绘的连环画《平凡的世界》（上中下册）入选“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专题系列连环画——春天的画卷·春风篇”，由连环画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因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受读者喜爱。作品深受传统文艺风格影响，黑白对比强烈，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完美再现了原著风貌，配图文字精练概括了小说主要的故事脉络和人物特征，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文学经典作品和艺术佳作的双重魅力。连环画家李志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经历，

就是他的经历。他就是生长在陕北，不论情感上，距离上，都是很熟悉的。”

2018年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100名杰出人物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以表彰他们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贡献。作家路遥入选，他被誉为“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2019年7月 《路遥的时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航宇是路遥的同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见证了路遥最后的时间。同月，关于路遥的长篇回忆实录《路遥人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海波在书中追忆了路遥的人生“花絮”和难以归类的故事。

2019年10月22日 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第一会议室召开。阎纲、周明、白描、白桦、李炳银、李国平、施战军、邢小利、厚夫等评论家，程光炜、王兆胜、赵勇、鲁太光、吴俊等学者，以及李建军、田美莲、周瓚、陶庆梅、杨早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全体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9年11月30日 由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延安大学承办的“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暨《路遥与

延安大学》“首发座谈会在延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路遥大学时期的同学，以及延安大学师生代表参加了首发座谈会。《路遥与延安大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7万字，收录各类文章79篇，刊登不同时期图片60幅。本书包括“路遥的大学时代”及关于路遥和路遥作品研究的文章与成果介绍、机构设置等内容。

2019年12月1日 路遥诞辰70周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典藏版《路遥全集》，以表达对路遥的追怀与敬意。路遥女儿路茗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作家格非、小说演播家张震到场与读者分享体会。典藏版采用了编年体例，以体裁分卷，共计6种8册200余万字，囊括路遥20余年创作生涯，收录其小说23部、散文62篇、戏剧2种、诗歌14首、书信56封，增加了此前未被收录的篇目，如路遥的自作小传，以及他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写给《当代》杂志主编何启治的书信等，是迄今最完备的路遥作品集。

2019年12月3日 第二届《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延川县委和延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就《山花》现象和路遥精神如何在新时代传承进行了热烈探讨。

附录2：路遥自传

我于1949年12月2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17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工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

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江河。这里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面对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选自《路遥小说选·自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参考文献

基本资料

《路遥文集》，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路遥全集》，路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

《路遥研究资料汇编》，马一夫、厚夫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路遥研究资料》，雷达主编，李文琴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年表与年谱

《杜鹏程年表》，舒其惠，《湖南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路遥纪事》，王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

《柳青年谱》，邢小利、邢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陈忠实年谱》，邢小利、邢之美，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回忆、回忆录与传记

《哭路遥》，王兰英，《文学报》，1992年12月10日。

《回首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郭秀君，《文艺报》，2006年第67期。

《人所未知的路遥》，张翼，《中国经营报》，2009年4月27日。

《路遥手稿现西安》，武一平，《西安晚报》2012年1月1日。

《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高歌，《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韩石山，《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2期。

《忆路遥》，陈幼民，《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

《记得当年毁路遥》，周昌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十五年后忆路遥》，申沛昌，《延安文学》，2007年第6期。

《一首歌·一句题词·一生的敬畏》，高玉涛，《收藏界》，2012年11期。

《路遥的影响——一封尘封了20多年的往事》，高玉涛，《收藏界》，2012年11期。

《在苦难的烈炎中涅槃——关于路遥与申易的回忆》，曹谷溪，《收藏界》，2012年11期。

《路遥致谢望新的一封信》，许建辉，《文艺报》，2013年12月16日。

《在王家堡路遥家中》，朱合作，榆林地区群众艺术馆编《信天游》，1993年。

《路遥在最后的的日子》，航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漂泊的语言》，王安忆，作家出版社，1996年。

《路遥评传》，王西平、李星、李国平，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

《作家路遥》，郑文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不平凡的人生》，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内部资料，2003年。

《知青·陕北速写集》，刑仪，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

《守望路遥——六十位著名作家讲述路遥身后的故事》，申晓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

《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路遥纪念集》，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王维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张艳茜，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我所认识的路遥》，海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路遥传》，厚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柳青传》，刘可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柳青传略》，蒙万夫、王晓鹏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

《陈忠实画传》，邢小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

《鬼才贾平凹》（第一、二部），孙见喜，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

《贾平凹前传》（第1—3卷），孙见喜，花城出版社2001年。

《陈忠实传》，邢小利，作家出版社，2018年。

《吴天明艺术画传》，陈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

大事记与地方志

《陕西省作家协会1954—1993年纪事》，《陕西省作家协会1954—1993年纪事》编写组，《陕西文学界》，1994年第2期。

《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1979年。

《陕西省作家协会大事记（1954—2014）》，陕西省作家协会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

《中国长篇连播历史档案》，叶咏梅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华文出版社，2010年。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延川县志》，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延川山花杂志社内部出版，2017年。

《陕西文学大事记》，邢小利、邢之美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论文与专著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黄正林，《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以“延川时代”为中心》，[日]安·本实，《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唐晓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新中国中篇小说史稿》，王万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

《神秘黑箱的窥视》，畅广元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继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魂断人生——路遥论》，宗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陕北文化研究》，吕静，学林出版社，2004年。

《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贺智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

《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廖晓军，三秦出版社，2006年。

《陈忠实研究资料》，雷达主编，李清霞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贾平凹研究资料》，雷达主编，梁颖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路遥评论集》，李建军、邢小利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乡土中国》，费孝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路遥的小说世界》，阎慧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

《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石天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三个人的文学风景》，梁颖，人民出版社，2009年。

《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冯肖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重读路遥》，程光炜、杨庆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横断面：文学陕军亲历纪实》，王蓬，西安出版社，2016年。

《陈忠实的蝶变》李建军，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17年。

《路遥论》，杨晓帆，作家出版社，2018年。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航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后记

年谱作为写作和研究的一种体例，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路遥年谱》通过追溯路遥一生的历程，来探索当代中国文学的另一面。

大概是2012年，笔者在完成本书初稿的书名下面又加了一行字：“文坛苦行僧和他的文学时代”，最后出版社没有采用这个副标题，但这个副标题一直保留在我的心里，可以说这是笔者对于这本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诠释。

为路遥撰述一部学术年谱，是路遥研究的需要，也是路遥研究领域取得实绩的一个说明。笔者相信，为文学界还原一个真实的“文学的路遥”，用年谱这种方式研究路遥，将会为重返20世纪“80年代”发挥一定的作用。

几年前，此书初版面世时，一些报刊曾刊登过一些书评，笔者也曾在《光明日报》（“光明悦读·出书者说”）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读路遥》一文。笔者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为了还原或者展现一个更真实、更立体、更本真的作家路遥，笔者开始了多年的

漫漫追寻，前后历时五年，多方调研走访数十位相关人士，钩稽辨析各类文献史料，最终完成了这部《路遥年谱》。”八个月后，还是在《光明日报》上，我看了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的文章——《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拖延不得》。在文章中，他说：“《路遥年谱》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路遥的人生世界，然而当代文学一些重要作家的年谱仍未问世，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程先生呼吁当代作家“抓紧做些年谱撰写的准备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不久之后，南开大学李润霞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作者隐身 史实开口——我看当代作家年谱的写法》的文章。在文章结尾，她写道：“作为作家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史料史实是年谱写作的学术生命线……让位于史实本身开口，这才是年谱的真正写法。”

本书从初版到再版，再到修订版，历时约十年。十年间，出现了不少新的资料。于是，借路遥7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将书稿修葺一过，增补了一些新内容，也将有误之处做了订正。《路遥年谱》在广泛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考辨，理清当下表面存在的热闹现象，纠正某种重复徒劳的研究，为不记日记的路遥还原出了一部经得起推敲的生活与创作史。

本书对路遥研究界师友著作有借鉴、吸收。程光炜教授、李建军教授、梁向阳教授、赵学勇教授、杨晓帆博士、王璐博士、程帅博士、曹谷溪先生、海波先生等都予我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与鼓励。另外，

还要感谢谭华、王水、刘艳老师对我所做工作的鼓励与支持，感谢本书编辑的精心编校，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深知自己学识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恳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2020年7月7日于西安